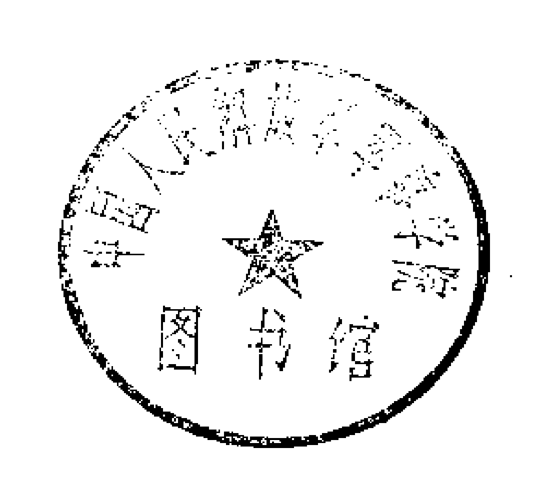


俄国人

（上　　册）

〔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Hedrick Smith

THE RUSSIANS

Quadrangle/The New York Times Book Co., New York, 1976

根据纽约夸德伦格尔图书公司/纽约时报图书公司 1976 年版译出

俄 国 人

(上 册)

〔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125 字数 270,000

1977年8月第1版 1977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171·341 定价: 1.05元

内 部 发 行

译者的话

近几年来，美国统治集团出于同苏修争霸世界的需要，加强了对苏联情况的研究。有关介绍苏联的书籍在美国大量出版，这本《俄国人》就是其中之一，是1976年美国的畅销书。作者赫德里克·史密斯曾于1971—1974年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现任《纽约时报》国内版副编辑。

作者利用新闻记者身分，到过苏联城乡很多地方采访，同各阶层人士有过广泛接触，《俄国人》就是根据他在苏联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作者在书中涉及的方面较多，从苏修特权阶层、党内生活、经济、文化教育直至苏联普通人民的生活，通过苏联人或作者本人的评论，暴露苏修统治集团的黑暗和腐败。本书对我们研究苏修当前的社会情况以及进一步了解苏修特权阶层的现状、苏修领导集团的困境及其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苏联社会的两极分化、苏联人民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对修正主义统治的不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应当指出，作者在评述苏联各种问题时的观

点是十分反动的。苏联目前政治腐败、经济困难重重、人民生活困苦、社会混乱，正是苏修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恶果。然而，作者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抹杀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控制下的苏联这两个时期的本质区别，荒谬地把目前苏修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溯源于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的改革，并且恶毒地攻击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在叙述苏联人民遭受苏修统治集团剥削和压迫时，作者着重描述他们软弱和苟安的一面，歪曲苏联人民的形象。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作者对蕴藏在苏联人民中的革命精神和他们反抗苏修反动统治的斗争着墨极少，而对那些亲西方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如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之流的活动却大肆渲染。此外，作者在揭露苏联经济落后、政治上搞法西斯统治的同时，又处处以美国的情况作为“对比”，吹嘘美国的所谓“物质文明”和“民主自由”，宣扬腐朽的美国生活方式，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唱赞歌。所有这

些都反映了作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暴露了他的反共反人民立场。对于作者的反动观点和所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批判。

本书中译本分上下两册出版。书中所引列宁语录等，个别未查明出处无从核对者，系根据本书英文字句自译。对于书中极端反动和黄色下流的段落，我们作了一些删节。译文中如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1976 年 12 月

目　录

（上　册）

序 言

1971年年中，我动身去俄国前不久，遇见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尔文·卡尔布，他对于他到莫斯科头一天的情景记忆犹新。他到达时是1956年1月，那是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秘密揭露斯大林主义清洗前不久的那段捉摸不定的时期。作为一个新任职的外交官，他有机会在第一天的上午在莫斯科各处闲逛一下，以便了解这个城市的大致情况。当他乘地下铁道到红场去的时候，他一眼瞥见一个人在附近瞅着他。他心里闪过了一个念头，以为这个人可能是个暗探，但他旋即把这作为一种荒诞无稽的想法打消了。然而，当他走出地下铁道的时候，这个人竟象影子似的尾随着他。当他停下来看商店橱窗的时候，这个影子也停下来看。当他穿过马路的时候，影子也穿过马路。当他慢步或快走的时候，影子亦步亦趋地跟着他。最后，尽管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卡尔布走向一个不管是什么季节一直在红场上贩卖冰淇淋的小贩，买了两根紫雪糕。他头也不回地把一只手臂伸向后面，递过去一支紫雪糕。影子一声不吭地拿了紫雪糕。他们俩就这

样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度过了一整天，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的这次遭遇有点象一部拙劣的侦探小说中的一段，唯一不同之点是，这倒确有其事。如果你打算前往莫斯科的话，这种可怕的小小的插曲就会粘在你的心上。而且对于我来说，对于一个到俄国去是为了接近俄国人以便象他们了解自己那样来了解他们的新闻记者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含蓄的挑战。

不过，很快我就经历了一件事，使我感到接近俄国人毕竟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一天晚上，我和我的妻子安出席了杜克·埃林顿[①]的音乐会（苏美文化交流的一项活动）后，乘办事处大型黑色雪弗兰羚羊牌轿车回家。这辆汽车和俄国人那种噗噗喷气的简陋小汽车驶在一起，显得不适当地耀眼。尽管不过是晚上十一点钟左右，莫斯科商业区实际上已经行人绝迹，人行道沐浴在虹彩般带蓝色的苏联街灯光辉里。这里那里，人们挥手招呼出租汽车或向自驾汽车的人要求免费搭车。使我惊异的是，一群青年夫妇，愉快地向我们打招呼，尽管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冒着未经当局许可同外国人接触的危险。我们让他们上了车，这些人刚从一家饭店里参加喜宴回来，兴致还很高。当我们驱车到他们居住的地方的时候，他们感情冲动地请我们进去饮酒。

那是一次真正俄国式的邂逅。所有的人，男男女

① 杜克·埃林顿(1899－1974)：美国爵士音乐家。——译者

女，都是医生或医学院研究生，结了婚，正二十来岁。后来才知是我们主人的米沙，是一个细长身材、脸色苍白、带有深思表情的青年，说得一口过得去的英语。其余的人说，他们能阅读，但不会说。就这样，我们用英语夹杂着俄语，叽哩咕噜地谈起来。他们坚决要坐在一起，七个人设法挤在我们背后的座位上，都对美国汽车，它的功率、大小、舒适、速度和车上的小玩意儿着了迷。他们对有机会同美国人谈话感到很高兴。我们把车子停在他们公寓的斜对面而不是停在正前面。米沙警告我们，进入房子悄悄地从女值班员旁边走过的时候，不要讲英语；值班员是一个穿着宽松下垂的毛线衫的老妇人，坐在电梯旁，注视着进出公寓的人们。

米沙的那套房间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俄国人的家庭。房子小，家具不多。但两个人住还是舒适的——一间起居室兼卧室，一间小厨房，一个过道，一间盥洗室，一个厕所。我们九个人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围着床，紧紧地挤成一团；这是张既当床又当沙发的两用床。谈话开头很尴尬，话题是埃林顿的音乐会（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去过，因为普通俄国人不可能买到票）、西方音乐和时装、我们的家庭、我的工作、西方的生活，关于俄国只谈了一点儿。米沙和他的杏眼妻子莲娜是新婚，除了俄国人认为最不可少的食品——几瓶藏在衣服里从饭店里带回的伏特加酒、两条还带着卤的大酸黄瓜、

一个黑面包头以外，他们拿不出什么来招待我们。五颜六色的计量杯、果汁杯和茶杯，权且用来盛伏特加酒。按照俄国风俗，喝伏特加酒不能搀其他饮料——头向后仰，很快地把一小杯酒一饮而尽。

这是我们第一次学习俄国生活中的这个重要礼节，别人都对我们的胆小感觉有趣。他们很快地教给我们怎样可以受得住伏特加酒的凶得要命的酒力：未喝之前先呼一口气，喝后立即吃点下酒的东西。女孩子们喝一口后都要作出可怕的鬼脸，赶忙咬一点不断传递着的酸黄瓜，也有啃面包的。米沙讲给我们听，在战争期间，面包很缺，好喝酒的人，拿点硬面包互相传递，只闻一闻，而不是咬一口。对他们来说，只要闻一下，就足以抵消伏特加酒的威力了。他示范了一番，然后把面包和一小杯酒递给我。我喝下伏特加酒，闻了闻面包，就咳嗽起来了。满屋都哄然大笑。米沙催促我再试一次，我摇摇头。其实，他只是要我再闻闻面包，这回坚持要我深深地吸一口气，我闻了那湿润、厚味、又甜又酸、象泥土似的俄国黑面包。我向他点点头，不懂得这么一闻，不管对鼻孔多么有滋润作用，怎么会把我喉咙里强烈烧人的酒味压下去。

我们就这样天真烂漫地喝着，直到把伏特加酒都喝完——已是约莫清晨三点钟了。在分手之前，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互相说了些友好的、温暖人心的话。米

沙再一次低声警告我们不要说英语，把我们带过了坐在电梯旁睡眼朦胧的老奶奶。在米沙和莲娜一再叮嘱我们要保持接触后，我们在屋外告别了。米沙坚持说，“我们一定要再聚到一起来。”

安和我驱车回家，我们对这种轻易的沟通思想、青年们态度的友好和他们对于美国那种抑制不住的好奇心，感到惊异。我们除了如何喝伏特加酒以外，对于俄国还不知道什么，但我们已经越过了人类相互接触的那种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当我们开车转离路边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了一阵惊慌不安，因为我从车子的反光镜里看到了后面汽车的前灯在闪耀。他们没有跟踪我们，但很可能在米沙的公寓前停下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为能够这么快地和一些俄国青年接触感到庆幸。

第二天，为了对米沙和莲娜表示感激，我开后门为他们搞到两张赴埃林顿音乐会的票子，并打电话到他们的公寓通知他们。我的电话不是没人接，就是号码错了。别的记者已经提醒过我说，莫斯科的电话系统靠不住，因而我就固执地坚持打。但在接连两次打扰了一个女人之后，我断定除了线路之外，一定还有别的问题。那天傍晚，安和我亲自把票子送了去。

女值班员不在了，电梯也不运转了，我们徒步走上了八层楼。莲娜在家，她感到惊异，但很高兴能够这么快又见到我们，而且欢欢喜喜地接下了票子。我提到

了打电话的麻烦并反复核对了号码。除了最后一个数字外，其余都绝对正确，米沙把6写成了7。那并不是字迹潦草的问题，号码写得很干净利落。

我们改正了号码就走了，要求代向米沙问好，接受了莲娜答应音乐会以后再见面的约会。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打了好几次电话。米沙总是不在家——不是上班去了，就是出外旅行或者去看望他的父母了。但莲娜听起来总是很高兴谈话的。有一次我们甚至还谈到了在米沙有空时我们可以在哪里会面。一天傍晚我打电话给他们的时候，莲娜告诉我，可以在他父母的公寓中找到他，并把计划安排好。她给了我电话号码。我打电话去时，米沙接了电话。但当我说出我的名字的时候，他把电话挂上了。我再试了一下，电话占着线。我又打电话给莲娜，告诉她米沙显然是不愿再见我们了，并为打扰了他们向她表示歉意。“很对不起，”她说，“你们谅解吧？”

我挂上了电话，很失望，但变得聪明些了。在我初到莫斯科的日子里，虽然没有象马尔文·卡尔布那样明目张胆地被人跟踪，而且很快就和一些人进行了接触，但现在看起来，逐渐了解俄国人并在他们当中交到真正的朋友，显然比我开头所想象的要难得多。我遇到过别的西方人，他们也是“一度交到过俄国朋友”，但后来就不能继续联系了。几个星期以后，在和一位曾

经在不同时期——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莫斯科工作过的有经验的美国外交官谈话的时候，我提到了我们同米沙和莲娜的经历。

“哦”，他说，“这下子你们可明白了铁幕并不是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交界处的铁丝网，而是就在这里，在莫斯科，在你们的眼前。你们伸出手就够得着，你们可以住在这里，就生活在他们中间，但并不真正了解他们是怎样生活的。控制是如此之严密，他们把你们关在外边了。一个夜里，一天傍晚，你可能和他们交谈，一道喝酒——特别是如果他们事后可以说，这是一次萍水相逢而把事情解释过去。但是第二天早晨，经过一番思量之后，他们就会觉得这样继续下去是太危险了。”

可悲的是，这位外交官的话看来是对的。然而，他所言中的谅必只是一部分真情实况。因为我从米沙矛盾着的感情中觉察到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的点点滴滴，这个社会比我当初所设想的更复杂，这个民族比我所想象的有着更多尖锐矛盾的冀求。很明显，米沙和莲娜在是否继续和我们会见问题上是有过不同意见的，后来我们还见到过别的俄国人对于同外国人交朋友也有类似的矛盾心理。米沙曾经几乎以一种天真烂漫的心情，为乘坐一辆美国汽车而感到非常高兴，他赞赏汽车的镀铬和马力。但他也很懂事，能够预先提醒我把

车子停在公寓的斜对面，在走过电梯旁的老太婆的时候不要讲英语。更令我感到不安的是，他的社会竟如此地支配了他的政治反应能力，甚至就连我们在举起伏特加酒杯祝贺我们友谊的时候，他的一部分脑筋还在集中考虑把电话号码的最后一个数字改动一下。所以，在米沙的心里，不是一个俄国而是两个——一个官方的俄国，警察控制、《真理报》和未经当局许可不和外国人交朋友的俄国，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比较富于人情味、容易冲动、多情善感、难以逆料的俄国。

当我开始把我所看到的点滴情况拼凑在一起的时候，我看到的问题似乎在于：在一般人脑子里形成的俄国人的形象似乎并未包含这种复杂心理，这种矛盾的情绪。关于极权主义国家的老一套提法，完全忽视了在表皮之下这种生活的迷人的背离常态的举动或态度，忽视了象莲娜那样情愿违反这种制度的不成文法规的人们。另一方面，大多数西方人相反的如意看法，（即认为俄国人同我们其余的人没有多大区别）却没有看到苏维埃体制在米沙身上所起的那种重要的制约作用。俄国现实生活中不可思议的情况，几乎无一事无一处不是在不断地迫使我改正自己的先入之见。例如，西方研究苏联动向的专家所作的费力的分析，已经拆穿了所谓共产党人铁板一块的神话，但是当我听到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妻子透露她是一个共产党员，或者花

费一个夜晚听听一名党的官员对我讲述关于列宁和勃列日涅夫的冷嘲热讽的笑话时，我思想上还是没有准备的。

我在莫斯科呆得越久，对于不合常规是否倒可能是条规律这一点，就越发摸不透了。我发现，尽管在咄咄逼人的官方无神论的气氛里，教堂信徒的人数比持党证的共产党员的人数多一倍；在一个把地产国有奉为神圣的社会里，一半以上的生活空间却属于私人所有；在一个严格的农业集体化体制下，差不多有百分之三十的农产品还是在私人拥有的土地上长出来的，而且其中很多也是经由国家认可的自由市场销售的；在沙皇被推翻六十个年头以后，对于俄罗斯的沙皇时代的过去及其人工制品的兴趣，还在一浪高一浪地发展滋长；尽管有由上而下强求的意识形态的严格一致性，许许多多人对政治还是漠不关心，而且私下里还在讥讽着共产党人的浮夸宣传；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国度里，人们还是比在西方具有多得多的等级、阶级和地位的观念。

在我去俄国以前，我就已经把没有阶级的社会这一神话置之脑后了；但当我第一次听到俄国人谈到富有的共产党员，有的甚至还是百万富翁的时候，仍然不免大吃一惊。最初，当我听到两个作家冷静地谈到某人"象米哈尔科夫那样富有"的时候，我还以为米哈

尔科夫是沙俄时代由于经营皮毛或盐矿而发财致富的某个商界巨擘。但人家告诉我，这位米哈尔科夫——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位极其成功的儿童读物作家，一个文艺界的警犬，作家协会的头面人物，后来第一个公开要求放逐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并发表过一些别的关于文艺的声明的人。作家们告诉我并且念念有词地说出了心里算的一笔帐，这个和米哈伊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也许还有其他一两个作家齐名的米哈尔科夫，从他多次再版的作品和文集以及由于他的忠诚服务而奖给他的丰厚的奖金中，合法地赚得了百万或近百万卢布。他们告诉我，他有两座乡间宅第、一辆带司机的汽车、一套城里的豪华公寓，他的银行存款和生活方式都同一个资本家一模一样。不仅如此，这种情况看起来是代代相传的。他有两个儿子，都是在文学界发迹致富的，还有一个女婿尤利安·谢苗诺夫专写美化克格勃（秘密警察）的间谍小说和连本电视节目，一下子就挣了十万卢布①。

尽管有象米哈尔科夫这样的百万富翁，我还得记

---

① 按官方汇率，十万卢布约等于十三万三千美元。我避免了关于卢布实际购买力的折算麻烦（因为在黑市兑换，一卢布只约等于三十美分）。同样，我也避免了从1971到1974年官方汇率的波动，一律采用了一个卢布等于一美元三十三美分的平均数字。

住，在俄国，金钱并不是一种可靠的衡量标准。为了设法对生活水平进行比较，我曾诚恳地向国际旅行社的向导和我的俄国办事处的译员们求教，在去工厂和在饭店同人们谈话的时候，打听他们收入多少，伙食和房租花多少钱，买一辆汽车要花多少钱等等。我一直忙着进行折算，直至我的俄国朋友告诫我说，真正重要的并不是金钱，而是门路，或"后门"（一种获得你所需要的门路的权势或关系）——进入象莫斯科这样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高质量和数量的食物、服装和消费品的城市的门路；进最好的学校、去度假胜地、使用公家汽车的门路；或者获得人们所最珍视的特权：到国外旅行，合法地混在外国人中间的门路；或是进入为权贵开设的特种商店购货的门路。在这些商店里，一辆新的苏联制菲亚特牌 125 型小汽车只卖一千三百七十卢布（一千八百二十五美元），而不是通常的售价七千五百卢布（一万美元），交货日期也只需要两三天，而不是通常的两三年。

我也不得不抛弃一种谬误的见解，即认为俄国已经成了一个和先进的西方并驾齐驱的现代化工业国家，因为这个概念所掩盖的东西和它所揭示的同样多。在现代化、导弹、喷气飞机和工业技术等面具的背后，隐藏着俄国若干世纪历史对于苏维埃社会结构以及俄国人民的习惯和性格所留下的烙印。在许多方面，俄国

仍然极其顽强地是原来的俄国，而这一点，是新来的人们，特别是强烈要求立刻理解、对于历史感到不耐烦、对于共产主义抱有固定见解的我们美国人所难以很快领会的。旅游者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个传统色彩很浓的国家的迹象——女人拿着长把扫帚耐心地打扫城市的街道，农民们弯着腰、拿着锄头在田间锄草，店员们用古老的木算盘嘀嘀嗒嗒地算账。就连我自己，也是经过好几个月以后，才开始意识到俄国的过去对苏联的今天所产生的影响。

我还开始了解，在庄严的大张旗鼓的五年计划的场面后面，存在着一种不稳定的手忙脚乱和一团糟的生产，这种生产对于产品的质量危害极大。苏联的消费者们都懂得用检查产品出厂日期的方法（很象美国家庭主妇懂得怎样检查新鲜鸡蛋一样）来避免购买在每月最后十天内由于疯狂追求指标而生产出来的那种不可靠的产品。在俄国原来不是只有一种经济，而是有五种——国防工业、重工业、消费品工业、农业和非法经济活动——各有它自己的标准。头一种和最后一种看来成绩最好；其余的多半都是胡乱对付过去。工人突击队那种孜孜不倦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宣传形象，很快就被女服务员们、修理人员或建筑工人们公然的吊儿郎当的态度给我消除得荡然无存了。“这里是工人的乐园，是世界上工人们混日子的最好地方，”一个俄国

青年语言学家嘁嘁喳喳地向我说，“他们不能把我们解雇。”

最使我感到惊异的正是俄国人生活中的这种潜在的无政府状态——在一个充满规章制度的体制下面，人们的抑制不住的不受约束的情况。我未去俄国以前就已经知道一点俄国社会的腐败情形，但在没有认识国立莫斯科大学女学生克拉拉以前，我对于俄国人在利用欺骗诡诈的手段去违抗这个制度方面究竟多么在行，它对日常生活的根本方面究竟有多大影响，是不了解的。克拉拉的家庭住在外省的一个肮脏的小镇上。她拚命想避免在毕业以后被政府分配到那里或西伯利亚去当教员。她发现自己不可能在莫斯科找到工作，因为无法在莫斯科登记到房子。（身分证的控制目标，是要把该城市人口限制在八百万以下。）克拉拉想出了一个主意，同一个莫斯科青年结婚，以便作为他的妻子取得在莫斯科登记房子的资格。她的一个亲密朋友告诉我，她花了一千五百卢布（相当二千美元，等于她第一个工作的全年工资）同另一个朋友的兄弟举行了假婚礼，根本连一夜也没有打算和他同居。事实上，这个新郎在举行婚礼后很快就迁出了。克拉拉所需要的只是利用她身分证上的结婚证明以及六个月的“结婚生活”，报进她在莫斯科常住的户口。一位科学家后来告诉我，有一对居住在外省城市的夫妇，为了取得在莫斯

科的居住权，甚至花费了比这更大的气力。他们俩先离婚，接着就各自和一个莫斯科人结婚以取得莫斯科的身分证，然后又和莫斯科的配偶离婚，再重行结婚。当我用怀疑的眼光看他的时候，这位科学家坚持说，事实的的确确就是那样。别的俄国人也告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成千上万的人采用这种俄国人所谓的"方便婚姻"办法，取得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这样的大城市的居住权，以避免呆在外省，因为他们把居住外省看作是等于流放。

竟然用这样狡猾的方法来挫败当局，特别是在所有的民族中被认为是绵羊般的俄国人，竟然会采用这样的权宜之计，这确实使我着了迷。因为极权主义国家这个概念，虽然对于政治学家粗枝大叶地认识苏维埃社会也许有用，但却忽略了人的因素。它给人提供的图景，是一群过着严密组织生活的机器人。的确，大多数时间，极大多数俄国人，表面上装着循规蹈矩的样子。但在私下里，他们却是花很大的力气，别出心裁，歪曲这些规矩或者从这些规矩中滑过去，来达到他们个人的目的。一位女律师笑着对我发议论说，"滑过去是我们国民的一种消遣。"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俄国人并没有丧失象陀斯妥也夫斯基作品中人物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容易感情冲动的性格。我对于听到持不同政见者咒骂他们的克格勃

审讯者——就象许多人所做的那样——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当我听到有人说他们的审讯者对他们很客气，或者听说若干年来有时在追捕者和被追捕者之间发展了一种私人的联系时，却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例如，我听到后来移居国外的诗人约瑟夫·勃罗茨基对我说，克格勃负责同他谈话的人也自以为是个作家，每逢他们见面时，这个人就会把自己写的散文给勃罗德斯基看，请他提意见或批评，当时我就感到很惊异。

象这样的一种关系不大可能是典型的，因为在任何国家里，同政治警察打交道基本上都是不平等的和胆战心惊的。我就知道一些极度残暴和卑鄙报复的例子。但我也知道有些苏联人，特别是那些进过劳动集中营而且不容易被吓倒的人，在谈到特务时，开玩笑地用物主代词的口气称他们为“我的克格勃人员。”在尼克松1974年访问莫斯科期间，因防止其可能举行示威或发表声明而被软禁起来的一个犹太家庭，虽然很难过，却对我说，看守他们的警察还到外面去给他们代买食品杂货。他们还笑着回忆起后来在一家食品商店里又和“我们的人”会见时，还隔着一大袋一大袋的食糖相互点头打招呼。

苏联生活之如此富有欺骗性的一个原因是，俄国人是善于明哲保身的大师。为了蒙混过关，或者为了追求某种特殊利益，他们总是披上一层保护色，以免被

发现而遭殃。俄国文化和精神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例如，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代禁止遗传学的时候，有些生物学家就设法到化学和物理学研究所里躲起来。据一位科学家告诉我，他们假装进行别的学科的试验，或者在家中厨房里做试验，在伪装下工作，从而把自己研究的学科秘密地保存下来。当控制论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科学”而不吃香时，也是用同样偷偷摸摸的办法保持了它的生存。

还有，当西方摇摆舞和爵士音乐在苏联报刊里遭受共产主义墨守成规的卫道士们公开谴责时，少数苏联音乐家悄悄地组织了摇摆舞团体并演奏了“被取缔的音乐。”不知怎的，一个未来派电子音乐室竟然在莫斯科中心活动起来，创建了最现代化的西方摇摆舞或宇宙音响电子音乐的各种先锋派小型爵士乐队，还伴以富于表情的现代派舞蹈，随着频闪灯光和莱塞般的光束而跳动。这整个场面，就是苏联重视优先发展无线电电子学的一种副产品和奇特的受惠者，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官方所能容忍的限度。然而，我听说有些当局虽然洞悉这一切，但只要它不引人注意，不象俄国人所谓的“惹起丑闻”，他们就准备装得若无其事。

把我带到音乐室去的电子专家和音乐爱好者，给我安排了一场动人心弦的色—声—舞乐曲的表演，他叫我不要在那个时候写新闻报道，因为如果在那时把

事情张扬出去，就会给音乐室所得到的不牢靠的半官方支持造成危害。有一次当我被带到一个私人办的狂摇摆舞演奏会的时候，人们也向我提出了同样的告诫。一个爵士音乐家对我说，“在这种东西获得官方的某种承认以前，我们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就靠没有人知道我们。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最有意思的事是在你看不到它们的地方私下进行的。不仅象你这样的外国人，就是别的俄国人也同样看不到。我知道，对你们说来，这听起来有些古怪，但对我们说来却是正常的。”

外国人要发现这类事情，其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苏联当局对俄国人同外国人之间正常的、随便的公开接触，设置了许多障碍。那些到俄国进行短期旅游的人们，通常是以代表团或旅行团的形式，被护送去参加官方集会或游览名胜，而且由向导和译员从早到晚象牧人照顾羊群一样的陪着他们，弄得他们始终忙于集体活动而无暇他顾。(尽管在我去俄国的时候对于这类故事抱有怀疑态度，但有一个国际旅行社向导告诉我说，导游人员对于那些离开集体、会说俄语或者想和俄国朋友或亲戚取得联系的外国人，必须向秘密警察汇报。他甚至把在国际旅行社旅馆门厅旁的一间房子指给我看，并且描绘了首都饭店顶层克格勃军官听汇报的密室。“有些导游人员对此很认真，有些人则不大

注意，”他说，“但每个人都有这样做的义务，如果你不做的话，过些时候他们会把你叫进去问你为什么不汇报。”)

那些作为常驻人员到俄国去的人，都是过着一种修道院式的生活。在我们第一次乘飞机接近莫斯科的时候，我记得安曾有过一种转瞬即逝的自由念头。当她从在莫斯科西郊飞得很低的奥地利客机的窗子里往外看的时候，她喊道，“看啊，有房子呢！也许我们能住在城外，而不必住在外国人住的公寓房子里。”但由不得我们选择。她所见到的房子是一些农民们住的小平房和小木房，或苏联权贵们住的乡间新式住宅和别墅。就象几乎所有在莫斯科工作的其他外交官、商人和记者一样，我们只是被指定住在一套公寓房子里，这是苏联当局在莫斯科给外国人提供的十来个居住区中的一个。我们甚至对房间也没有选择的自由。住到我们所想要住的地方去——即住在俄国人中间——简直连谈也不必谈。

在我们外国人居住区的周围延伸着一条“防疫线”。一道十呎高的水泥墙把花园环行路(自流路口)12-14号我们八层楼公寓建筑的院子同附近俄国人住的公寓房子硬行隔开，这道墙造得离我们的房子如此之近，以致停放汽车都非常不方便。进到我们大楼的唯一道路是一条经过一个岗亭的单一拱道，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

穿着军装的警卫人员在那里站岗。他们穿着普通警察的制服，但实际上则是为克格勃工作。

苏联当局试图维持一种明显的谎言，说这些警卫在那里是为了保护我们，但这种谎言已好多次破了产。有一回，我们的女儿劳丽的一个十二岁的俄国同学惊慌地从家里打电话给我们说，当她来看望我们的时候，警卫拦住了她，对她严加盘问，并把她送回家去。她说除非劳丽出来接她，她再也不敢来了（她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别的同学除了同大家一道来参加生日聚会外，根本就不敢来）。当我因警卫打扰孩子们而向他们提出抗议的时候，一名警卫理亏地回答说，他们只是在试图保护我们不受“流氓”的干扰。另一回，一位艺术品收藏家亚历山大·格莱泽尔相当愚蠢地想用说几句英语吓唬他们，以便闯过警卫到这座楼里的我的办公室来。他们抓住了他，把他扣留在岗亭里一个多钟头，当我同警卫争论要他们把他放走的时候，我从窗户里可以看到他那惊慌的面容。只是在一群其他新闻记者都聚拢来，警卫们显然害怕为这么一点小事而惊动很多人、影响不好的时候，他们才把他放走。他们的借口仍然是说他们是想保护我不上一个骗子的当，虽然我很知道这个人，而且也对他们说了。

冒险走近我们这个染疫区来，是大多数俄国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但由苏联政府机关外交人员服务局给

外国人和使馆提供的一批经过特别审查的翻译人员、女仆、司机、司阍、修理工人和职员可以不受阻拦地进来，他们的面貌是警卫们所熟悉的。官员们和其他知名的俄国人，可以向警卫人员出示请帖，从而通过这个警卫关卡，参加外交招待会或其他特殊活动。但是普通的俄国人就要受到质询和盘问。在莫斯科住了三年多，我几乎没有发现过有人情愿冒这种折磨的风险。我们可以乘汽车出去，接俄国朋友上汽车，把他们带过岗哨到院子里来，但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两次，警卫们就会跑到跟前来，不是想确认一下我们的客人是谁，就是想吓唬吓唬这些客人。其他的人，甚至连世界闻名的作家或诗人，大多数不说什么原因，就谢绝请他们赴宴的邀请。我记得有一个作家曾不寒而栗地说，"处在那样的气氛里，我受不了。"

我们所认识的另一对俄国夫妇，妻子出身于一个共产党员家庭，她以自己的独立见解而自豪。她认为，使她感到气馁的并不是由于害怕，而是不得不回答警卫人员关于她的身分和外国朋友等问题的麻烦。她的丈夫强烈不同意地说，"你怎能这样说呢？你怎么能装作不害怕呢？"他气喘吁吁地转过身来悄悄对我说，"也许她不害怕，但我是害怕的。"

这种害怕，使得我们同苏联人的友谊成了一种不平衡的交往：我们到他们家里去，但他们从来不到我

们家里来。生活由于其他一些控制而受到了牵制，例如：窃听电话；任何人一眼就会把汽车辨认出来的专门给外国人使用的黑底白字汽车牌照（我们的代号是K-04；K表示记者，04表示美国）；未经特别许可不得到离克里姆林宫二十五哩以外的地方旅行（申请特许手续很麻烦，至少要一个星期，而且到头来往往不批准）。有一次，对我们办事处的电话进行窃听的线路装得很拙劣，使我们的电话和警察总局的电话混了线。我不在办公室，但我的同事克里斯·雷恩不断地接到要交换台的电话。这样经过好几次之后他才终于明白了要的是什么交换台，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警察官员等人在抱怨。我们把这件事向他们报告后，得到了我在莫斯科整个期间的一次最迅速最认真的修理。

但是，说老实话，阻止外国人和普通俄国人接触的不仅是控制问题。由于很明显的障碍，外国人除了同几个指定的对象接触外，很少有人作认真的、持续的努力去会见并逐步了解俄国人。外国人居住区笼罩着一种相当舒服的照顾之风。不能自由选择住处也许对西方人的自由观念是一种侮辱，但却省掉了找房子的麻烦，而且还使他避免了同普通俄国人那种单调无聊的邂逅。在买东西方面也有类似情况。苏联当局开设了一些专用硬通货的食品商店，尽管在这些商店里象番茄、金枪鱼、橘子汁或草莓酱这类普通商品常会脱销，但总比

普通国营商店的货源要充裕得多，而且售价也便宜些。这样，很少外国女人会找麻烦到俄国人商店去买东西或者体验一下俄国女人买东西的滋味。还有，大多数外国人都是自驾汽车来往，因而也就缺少机会同几乎全都得乘公共汽车、电车或地下铁道的俄国人接触。外国人聚居在一起的生活方式，还由于设有外国人子弟学校而得到了加强——有由西方使馆为外国孩子们办的一所法国学校、一所德国学校、一所英美学校。给外国人提供女仆和翻译人员的政府机关外交人员服务局，为了使外交官的妻子们有事可做，还开办了特别芭蕾舞训练班，提供家庭教师教授语言，组织体育活动小组，有时还组织旅行活动。

每一个比较大的使馆自己都备有到农村旅行、野餐和举行宴会用的乡间住宅。在莫斯科西北约一百哩扎维多沃的伏尔加河上，有外国人为了体验俄国农村生活风味可以租用的政府房屋。（一位在该河上有一条航船的俄国朋友告诉我，他曾受到警卫们的严厉警告，不得驶近外国人使用的地区。）在莫斯科以西，过了一处可爱的松树林，就是莫斯科河，那里有一个"外交河滩"，但外国人如果想继续顺着河岸向下首驶向俄国人游泳和捕鱼的区域，就会受到民警们的阻拦，他们会把牌照号码记下来，并把不听话的外国人嘘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在通向俄国权贵别墅区的路上停下来，也是

不许可的。

这种特别优待的隔离的结果，是使大多数外国人——甚至连东欧人——只好按常规办事。他们把在莫斯科的旅游时间花费在彼此请客上，偶尔也到博物馆和游览区去观光一下。除了因公出席集会和宴会同俄国人接触外，生活很快就开始象在一条豪华的海轮上作长途航行一样，每天晚上碰到的只是一些打桥牌的老搭档。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尽管有这种隔离生活的措施，它并不能阻止一个有好奇心、意志坚强、会说俄国话的外国人会见并逐步了解俄国人。不过，这种限制也保证了外国人所接触的俄国人大多是一些特殊的人，几乎都是在某种方面与众不同的人。而这明显地要影响到外国人对于俄国的看法，使他们的看法带上某种色彩。

苏联的体制，为了同外国人打交道，造就了一批粉饰外表的俄国人，这种人成千上万。我们习惯于把他们称为“官方俄国人”，但我们所指的并不仅是政府官员。这种粉饰外表的人包括以外事为专业的高级新闻记者，国际旅行社向导，翻译，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或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专家，各对外贸易组织的负责人，党员科学家和管理人员。实际上从红军到

作家协会或俄国东正教教会的每一个苏联机构，都设有专门同外国人打交道的对外部门。外国人所经过的线路是如此固定，以致我到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和伊尔库茨克旅行的时候，被带去会见的竟是十年前《纽约时报》的另一个记者特德·沙巴德所会见的同样的一批专业人员。

这些实际上等于拿到了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特许证的"官方俄国人"的任务，就是介绍《真理报》的俄国，即科学上有成就、有社会主义工人民主和现代福利国家的俄国。虽然我同差不多三十个这样的人有工作联系，但要发现他们对于人生的看法并逐步了解他们个人的为人却很难——虽然也并非不可能。我的经历并不是独特的。我认识一位在莫斯科工作了几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大使，他抱怨说，他从未被苏联外交部里和他对等的官员请到家里去过一次。这位大使还说，甚至在那位官员的母亲死去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接近的机会。他打电话给外交部，想知道那个官员家里的住址，以便送唁函和花圈，外交部却拒不告知，要他把唁函和花圈送到外交部去。有的外国人受到的对待与此不同，但结果却往往一样。国际法学家和追求总统职位的萨金特·施赖弗对我说，他在莫斯科不仅得到了官方的隆重接待，而且还被几个对外贸易官员和行政官员请到家里去过。招待非常客气，但谈话却非常

枯燥。"我进行了外交界所谓的交换意见，"施赖弗说，"但从来没有同任何俄国人有过你我称之为谈话的那种东西。"

一个在西方坐在舒适的客厅里，习惯于开放社会的平等交流的人，是很难体会到这种缄默的外表所造成的障碍的。在西方常常有人问我，俄国的检查制度是否给新闻记者造成困难。按字面说不是。检查对外拍发电讯的制度，在1961年赫鲁晓夫时代就已经结束了。现在大多数记者都是直接通过电传打字机或电报发消息的(照片仍须经过检查)。俄国人有别的办法对付那些插手于他们比较喜欢掩盖起来的事情的新闻记者。最常用的一种办法就是，经常因他们所发出的电讯而追问、责骂和谴责他们，通常是在私下里，但有时也公开在报纸上干。为了吓唬他们，使他们不作未经许可的接触，偶尔也有记者的汽车轮胎被戳穿或记者本人被警察雇用的暴徒殴打的事情。有一次在我旅行期间，有两个西方记者在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刑事案件的调查中受到了克格勃的审问，这使得每一个听到的人都为之寒心。更常有的是，如果党对某些记者的报道有反感，苏联外交部就干脆拒绝批准他们到莫斯科以外去旅行或向官方采访消息。我本人就遭受过几次这类待遇。有一次，作为一种惩罚，在一次最高级会议前夕，当勃列日涅夫接见一批美国记者的时候把我排除

在外。最后，在我居留莫斯科期间，新闻记者被驱逐或被迫撤回去的，就至少有四人之多。

然而，这些折磨实际上所造成的困难还没有检查所造成的大。我所指的不是大多数西方人会立刻想起的那种书报检查制度，而是使得大多数俄国人在关于俄国社会的事情上不愿向外国人说老实话的那种检查和克制自己的本能。在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出于害怕、也是出于忠诚所形成的习惯。但归根结蒂，是来源于不惜任何代价把事实真相乔装打扮起来，把俄国生活中秘密的恶德或美德以及同共产党宣传相左的尴尬事实掩盖起来的那种民族习性。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感染上这种习惯，不去揭露当前苏联的生活实际上是同党的夸大宣传不相符合的——不管这种夸大是所谓苏维埃作家不必受到书报检查的那种拙劣的神话也好，苏联一百多个民族幸福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的虚伪宣传也好，或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女服务员不需要或不想要小费的那些小小的做作也好。

当然，许多西方官员和政治家也是非常不愿承认不体面的事实的，但他们很少会象苏联人那样采取太明显的甚至常常是令人迷惑不解的装腔作势或支吾搪塞的极端手法。苏联官员们会温文有礼地向美国法律代表团否认在苏联有死刑存在（尽管苏联报纸偶尔也发表关于处决的消息）；他们向美国国会议员们争辩

说，犹太人或别的人要求移居国外是自由的；坚持说苏联劳动集中营有非常良好的医疗制度（在一个著名政治犯由于患溃疡病没有专业医疗人员而由另一个犯人动手术致死以后）；以及作出其他一些会立刻引起外国人竖起眉毛表示不信的自我宣传。

由于没有公开的辩论或不受官方影响的新闻报道来起一种纠正作用，苏联的虚伪门面比在别的国家更容易使人产生错误的印象。访问者如果以为仔细参观发电站、载重汽车工厂或私人汽车就可以了解苏俄，那是白费力气。它并不是铁板一块，但它却能够戴上一个赏心悦目的铁板一块的假面具，使得外边人完全看不到把俄国及其人民同美国、西方甚至和东欧分开的那些难以捉摸的事物和无形的结构。

另一个问题是，一些个别的苏联人甚至在他觉得自己受到信任的时刻，有时也有意识地对外国人隐瞒真实情况。我记得有一位犹太科学家告诉我，有一次他在美国旅行，美国中西部的一位学者问他，苏联在学术上对犹太人有没有歧视。当时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但这位苏联学者告诉我说，他对那个美国人撒了谎，对她说不存在歧视，虽则在他自己的部门里，他就一再为这种事情感到烦恼。他说，他害怕如果他说实话，一旦事情传到莫斯科来，他就再也不能出国旅行了。他说他之所以向我承认这件事，只是因为他已经

决定移民到以色列去，割断他和苏维埃制度的联系。

当然，人类社会总是倾向于缩小他们自己的难题而给别人看自己最光明的一面，企图在访问者心中留下一个好印象。不过，苏联社会由于对自己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感到特别自负，因而使这种倾向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我逗留莫斯科期间，为了装璜门面以使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最富于戏剧性的事例，莫过于在1972年夏天尼克松总统访问俄国以前给莫斯科做的一次整容手术了。差不多就在他到达的前夕，整个街区的旧建筑被焚毁拉走，成百的人被迁出去，街道加宽重铺，房子重新油漆，栽上树木，铺上草皮，边上还围以花坛。就连我们这幢离克里姆林宫很远的建筑，也给它打扮了一下，以防万一尼克松可能在这里出现。在沙俄时代，这种做法叫做"波将金化。"这是由于在叶卡捷林娜女皇时代，波将金亲王为了使女王对他的领地的富足留下深刻印象，在女皇经过的大路旁建造了一些假的村庄而得名。现在俄国人把它叫做"装门面"。

装门面可以适用于任何事情，从硬通货商店、国营百货公司橱窗里陈设的花哨的进口小商品（这些商品通常不可能从里面买到）、给外国人参观的示范农场和工厂，直到招待旅游者的旅馆里印刷精致的菜单那样的小东西。印在光亮纸上的俄国菜单可能有好几页之

多，用四种文字开列着长长一大串给人深刻印象的、可供选择的菜肴的名称，只是在游客着手点菜的时候，他才发现真实情况：真正吃得到的菜，只有单上所开列的约三分之一。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以致歌剧团经理人索尔·赫罗克的一位同事告诉我说，每当俄国服务员把一份菜单放在赫罗克先生面前，问他要什么菜的时候，他会回答说，“别管菜单了，也不必问‘赫罗克先生你要什么？’干脆告诉我你们有什么好了。”

有一回我自己就偶然碰上一桩正在进行着的装门面的事。我有一次访问巴库，住在里海边上一家旅馆里，忽然听说有一个外国大使们组成的代表团即将到这里进行正式访问。象果戈里诙谐的讽刺作品《钦差大臣》里的外省官僚一样，全体工作人员都手忙脚乱起来，疯狂地想把旅馆打扮得象样一些。管走廊的女人把所有房间的钥匙都集中在一起，好让工人们用金字漆上新号码。一个长着斗鸡眼的电工开始把烧坏了的电灯泡都换上新的。女仆去刷洗窗子，掸掉灰尘。大门和沿海滨的走道上的栏杆全都油漆一新。食堂桌上的普通玻璃烟灰缸消失了，新的更美观的烟灰缸出现了。每张桌子都放上了一盆大的白色荷兰石竹，旁边还为大使们放了更漂亮、更有光泽和更高价的菜单。不仅是在旅馆里这样做，一位大使告诉我，凡他们所到过的其他单位也都一样。

有时候这种蒙蔽外国人的做法几乎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游戏。“我们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一天晚上，一位年轻伶俐的政府外交政策顾问在他的公寓房间里私下对我说，“这样做对我们有好处。欺骗是对虚弱的补偿，是在外国人面前自卑感的补偿。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可能同别的国家平等相处。不是我们更强大些，就是他们更强大些。如果他们比我们更强大而我们又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就用欺骗他们的方法来取得补偿。这是我们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特色。”当我对他说他自己的意见恰好推翻他所说的话的时候，他笑着回答说，他本人正是证明这一规律的一个例外。

幸运的是，他并不是唯一这样的人，我发现有相当多和他一样的例外。象萨金特·施赖弗以及许多别人一样，我曾花费过无数时光，隔着差不多每一个苏联机构都有的铺着绿毯的桌子，从事一种并不表达心意的对话。但在其他场合，在别人听不到的情况下，为了表示他们自己深通世故，或者由于对虚伪的门面感到厌倦，有些官方俄国人也会滔滔不绝地畅谈起来。谈论政治也许是禁忌的(却也并非总是如此)，但象别的民族一样，俄国人喜欢谈谈他们的个人生活，而在谈论的过程中，把有关他们社会的许多事情透露出来了。一般地说，他们很高兴外国人用俄语对他们谈话，而且对于外国人所犯的语法错误也能大度地容忍，因此，我很快就

发现，同他们用俄语谈话是一个很大的乐趣，而他们也感到更轻松些。

例如，有一次乘汽车在高加索作漫长旅行时，我有一个陪同者兼译员(一面帮助我，一面也是为了防止我太多地接触苏联生活)，她不知不觉地对我愁容满面地谈起她作为一个工作的妇女的种种困难和普通苏联妇女的艰苦生活来。在一次贸易展览会上，也许是由于渴望同我分担做父母的所共有的困难，一个共产党员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和我谈起了把他的儿子们教养成优秀共产党员的困难，因为他们把全部兴趣都放在西方摇摆舞上去了。一个负责监视外国记者旅行和采访的苏联情报人员，在他自已的办公室里告诉我，他对美国生活的开放性感到惊异，并向我炫耀了他有一次到美国旅行后带回来的裁制得很合身的西服和色彩鲜艳的宽领带。还有许多别的事例，为了怕朋友们受到报复，我不能在此一一列举了。要害在于，在不处于正式场合的情况下，俄国人与众不同地开始把那隐蔽在官方门面下边的另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俄国的某些情况显示出来。象米沙一样，他们的天性是友好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控制相当严格，官方俄国人差不多总是集体地同外国人会见。

还有一些别种类型的人，他们不象官方俄国人那样被准许同外国人交往，但往往有更多的个人动机，在

交往中也比较随便。这些人是上层知识分子、青年人、地下艺术家、持不同政见者、准备移居国外的犹太人。有些上层知识分子所感兴趣的无非是在西方保持一个自由派的名声，设法搞到一份去美国的邀请，或者被大使馆请去喝杜松子酒和威士忌酒而同时又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有些青年人不过是想买你身上穿的粗斜纹布裤子或者最新的西方唱片；艺术家们则是想出卖他们的绘画；犹太人和持不同政见者是要宣扬他们的抗议。但我发现，在所有这几种人中间，有个别人真正很有意思而且很能给人以启示；他们能够用批判的眼光看自已的社会，但却不是对本国不忠诚；他们渴望同外界接触，很想交流思想和经验。其中有些人还成了我们的莫逆之交。

担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有个有利条件。它使我比大多数其他外国记者有更多的机会和《真理报》、《消息报》以及别处的高级苏联记者接触。到外国旅行过的人，不象那些在西方记者面前感到不自在和一般不易接近的政府官员，没有象他们那么明显的教条主义态度。这些记者在他们的西方竞争者面前都要保持一种职业上的自尊心。在普通俄国人中间以《纽约时报》记者身分出现，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苏联报纸经常引述《纽约时报》的消息来证明他们报道的可信，它是俄国人所熟知的。我已经养成一种习惯，逢人

便说出我自己的身分。有少数人一听就会立刻警觉起来，但别的人，连那些抱着怀疑的态度说什么"哦，原来是个记者"的人，却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有些人似乎还决心作一些小的揭露或抱怨。他们显然认为，只要不把自己的姓名告诉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一个外国人，比告诉另一个俄国人还要安全些。

有一个时期，我常被一个说话颤抖的老妇人的电话所打扰，她坚持要同我见面，我勉强地去了。她向我讲了她同她的有病的丈夫和有病的父亲如何在违反一切住房标准的情况下被塞在一间屋子里，以及官员们如何拒绝给她们安排更好的房子。这个妇人难以置信地大胆，她不但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抗议，而且还认为，如果我将她的困难情况写一篇报道，苏联当局就会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反应恰好相反——如果用她的名字写一条消息，就会使她碰到严重的麻烦）。还有一种情况就更为常见了，有一个人不知从哪里弄到了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在一天夜里，用带着波罗的海地方的口音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有一次想到美国大使馆去，受到了苏联警卫的虐待……话未说完，电话就断线了。

不过，最令我感到惊异的，是我们在苏联各地同人们的偶然接触。安和我发现，离开莫斯科越远，那里的人们受到的约束和被灌输的教条似乎就越少。象格鲁

吉亚、立陶宛、亚美尼亚、乌兹别克、爱沙尼亚、阿塞拜疆、摩尔达维亚、甚至乌克兰这些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的人民，通常比政治上敏感的莫斯科人要坦率一些。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有着率直的反俄罗斯情绪，对于苏维埃制度持一种批判的态度。问题在于：不管是在饭店、剧院、火车或机场，应该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场合，以便有一个谈话的机会。

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在他们旅行的时候，总是匆匆忙忙的。我们在俄国旅行的时候，差不多都是乘火车，因为我们觉得俄国火车舒适，而且是逐渐熟悉人们的一个好办法。我曾一连两三个钟头坐在餐厅里，同一个身材瘦长而结实的国营农场场长一面用汤匙喝着俄罗斯甜菜浓汤、饮淡啤酒，一面听他说明他如何私下养了一群羊，因而比社会主义略胜一筹。我曾被一个拉脱维亚工程师招呼攀谈。这个人带着一副厚眼镜，不知他打哪儿看到美国人发明了一种能够矫正色盲的眼镜，问我能不能帮他弄到一副。最后还同我谈起了俄国建筑的一些小毛病。我曾乘着巴库—第比利斯间摇摇晃晃地行驶在高加索群山间的夜行慢车，颠簸在列车的通道里，听一个建筑工人对我吐露秘密：他怎样经过一系列曲折的安全盘查手续和教条的灌输，获得了在国外工作的机会，最后终于享受到国外工作的工资补贴。我曾同两个苏联战斗机驾驶员一道花好

几个钟头玩十五子游戏[1]，其中之一咕嘟咕嘟地喝着伏特加和威士忌，紧抱我的妻子，因为她的名字和他姊姊的名字一样，还不断地拍着我的背说，“你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因为他以前碰到过的美国人只是那些他在冷战时期驾着飞机在白海上空与之玩小鸡式游戏[2]并险些擦着翼梢的美国侦察机驾驶员。

因为我们是通过一个人又接触到另一个人的，当我们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从某些方面来说，在俄国的生活就成了一种传奇式流浪冒险的经历。虽然这种倏忽即逝的接触是不容易适应的，但安和我都很珍视这种一面之交的朋友中的某一些人，正如我们珍视那些在莫斯科比较亲密、时间较久的朋友的友谊一样——不管是因为有一个叔父在旧金山因而感情冲动地请我们参观他们的教堂婚礼、后来又请我们参加他们长时间家庭庆祝会的亚美尼亚人也好，或者是我们曾向他买过两幅现代派版画的神经质的立陶宛艺术家也好。由于见面的场合、突破相互猜疑和恐惧等障碍的困难，以及突然体会到人情的温暖等种种原因，这些萍水相逢成了很可宝贵的机会。我记得有一次在列

---

[1] 这种游戏双方各有十五枚棋子，用掷骰子来决定走棋的步数。——译者

[2] 原指美国一些青少年为追求刺激的一种冒险游戏。两人各驾一辆汽车沿一定线路迎面对驶，胆小离线者算输。这里是指两架飞机互相示威，相距极近。——译者

宁格勒，做教员的安在一家商店里请一位俄国教员帮她的忙，两个人就这样偶然地结识了。这个女人能说点英语。但这是在我们被邀请到她家里作客后才知道的。说也奇怪，我们同这个女人和她的丈夫忽然之间就成了好朋友。一连好几个钟头，他们如饥似渴地听我们述说西方的生活和文化，我们也如饥似渴地听他们讲述他们的生活和感情。我们吃简单的干酪夹面包和汤，一直流连到深夜。他们给我们放映他们在高加索山间野营旅行的幻灯片，我们也给他们讲述我们一家在弗吉尼亚和田纳西州的蓝脊和烟雾山野营的情景。后来，为我们带信给这对夫妇的别的美国人告诉我们，他们由于在"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听到了我的名字，曾为他们同我们有过接触而非常恐惧，但他们终于克服了恐惧，还通过这些中间人带信给我们，并赠送了留念的礼物。

可悲的不是不可能沟通思想，而是竟花费这么多的气力来防止沟通思想，因为苏联当局下决心要阻止的往往正是这种未经安排的、不受控制的接触——阻止的不是友谊和感情，而是随着这些交往所暴露的事情。在我逗留莫斯科期间，有好几个新闻记者由于和持不同政见者及犹太人接触而被殴打，并被暂时拘禁起来。我们大多数人有时被跟踪。在亚美尼亚首府埃里温，我记得有一次我曾去找一个同别的美国记者谈

过话的、出生在美国的亚美尼亚中学教员。那是一个早晨，我正在设法找到他的学校。一路上我不断地停下来向小学生们打听。偶然回头一看，在我后面约三十步，一个穿深色服装的人拦住并盘问每一个和我谈过话的小学生。在上课之前我在学校里找到了这位教师，问他我们最好在什么时候会见。他显然在上次同美国记者谈话后吃了苦头，回答说，“最好我们别见面了吧。”我同《芝加哥论坛报》的迈克·麦圭尔一起在里加的时候，很明显地有一群进行监视盯梢的人跟着我们达三天之久。我们给他们每个人起了一个绰号——首长、矮子和老兵，等等——还看着他们换班。在莫斯科有时我还会发现那些尾随我们的汽车。有一次竟明目张胆到如此地步，以致安和孩子们看到他从我们的公寓一直紧紧地跟到硬通货食品商店，还从车窗里伸出头来注视着我们。我还记得一个青年军官惨淡的笑容，他因在列车上到我们的房间里和我们谈话而被宪兵拉出去质问。其实我们不过是和他交谈对列宁格勒的印象而已。

有时外国人被克格勃盯梢或由他们布置的女性挑逗，给搞得过分紧张。外交官们还喜欢谈论关于苏联那些拉人下水的女人的故事，这也容易使大多数人保持一种过分的警惕。我记得，有一次在西伯利亚的一家旅馆的简陋的小餐厅里，我去吃晚饭时已经很晚了，

由于只剩下一张空桌子，我不得不和当地的三个女人同桌，刚刚有几个俄国男朋友丢下她们走了。她们都喝了酒，看到有一个美国人到她们桌上来都感到很有趣。这几个女人都很孟浪。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和我最近的一个梳着飘垂长发的微黑的女郎试图搀我的手，抚摩我的膝盖，怂恿我和她们一道去作深夜之游。这是不是个坑害人的圈套，我开始怀疑起来。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我回头看到一个彪形大汉的军官赫然耸立在我面前。他示意叫我到过道去。我感到纳闷，"原来竟是这么一回事吗？"我估计，还是呆在众目睽睽的饭厅里最安全，所以就拒绝动弹。他坚持要我跟他走，我又拒绝了，但他还是不断地坚持着。这几个姑娘都想叫他走，但他不肯离开。我靠近看了一下，觉得他也喝了酒，不过喝得不多。我急想使牵涉到我的这场纠纷平静下来，因而就同意跟他到过道去。当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回过头来跟我握手，告诉我我不幸碰到了当地的妓女了，向我说了许多道歉的话，并劝我离开那张桌子。他只是希望帮助我，绝对不可能是一个设计陷害我的特务，因而我对自己的恐惧也不禁哑然失笑起来。我也不相信对于记者的实际跟踪是一直不断的或系统的，因为没有这样做的必要。随时掌握我们行踪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当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让一些苏联翻译人员、向导和司机时时围着我们打转；

当我们到别处旅行的时候，让外交部、国际旅行社或苏联新闻社的人员陪着我们。

据我体会，就连在那种情况下，把外国人同俄国人隔离开来的办法也同苏联制度的其他方面一样，都沾染了乌烟瘴气的官僚主义和办事缺乏效率的毛病，我们仍然有很多时候可以自由行动。有时，就连苏联安全人员极其精心策划的预防措施也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迈克尔·帕克斯对我谈到，他为了报道美国的一个巡回展览会并考察外省生活情况，到莫斯科以东九百哩的乌法去作了一次旅行。他只得到了一张过夜的签证，但当他在星期六晚上准备回莫斯科的时候，苏联民航的班机已经没有他的座位。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惊恐，因为众所周知，登记乘苏联班机的人特别多，而如果让他留下乘星期一的班机，则这种明显地违反安全制度的事是绝对不容许的。机场上的安全官员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九个乘前往莫斯科的班机的俄国旅客拉下飞机，以便给帕克斯腾出座位。为什么要九个人呢？那是为了安全的原因。帕克斯坐在一个三人一排的座位的当中。他两旁的座位都空着，前后两排的座位也完全空着。当安全人员离开以及在那些被拒于飞机之外的俄国旅客中间突然发生了一场火山爆发似的争论时，帕克斯在那里完全孤立

地坐了几分钟。一个女服务员，忘却了安全问题，出来质问他为什么一个人坐在那里。帕克斯说他不知道。这个女服务员更关心于满足那些在外边吵吵嚷嚷的群众的要求，便让他周围的所有座位都坐满了人。在他的一边坐着一位陆军上校的妻子，另一边坐的是一位石油工程师的妻子。在到莫斯科的一路上，这两人一直不断和他谈话。工程师的妻子抱怨在乌法的商店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买；上校的妻子告诉他说，她很高兴她的丈夫终于离开了伞兵队伍，调到了装甲部队，因为伞兵经常发生事故，摔断肢体。她们听人谈到过美国的展览，但未能去参观，她们希望帕克斯给她们讲讲有关美国汽车和消费品的种种情况。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正好是克格勃希望制止的那种接触。

一 特权阶级

别墅和吉尔牌轿车

……任何一个列宁主义者，只要他是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都知道在需要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谬论……①

斯大林，1934 年

象我那样，随便你挑哪个工作日的下午，只要你从克里姆林宫出发跨过两条横马路沿着格兰诺夫斯基大街漫步闲游，就会看到两排闪闪发亮的黑色伏尔加牌小轿车停在那儿，车上的引擎空转着，司机警惕地注视着车上的反光镜。他们对路边"不准停车"的牌子熟视无睹，对警察显然毫不顾忌。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格兰诺夫斯基大街二号大门口。这是一座米黄色建筑物，油漆过的窗户，门口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1919 年 4 月 19 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曾在这所房子里向开赴（国内战争）前线的红军指挥员讲话。"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313 页。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译者

门旁还有另一块牌子，标明该建筑物是“身分证办理处”。但是我听说，这里不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只是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服务的。一个局外人如果不注意共产党的官员喜欢坐黑色的伏尔加牌小轿车，认不出中央委员会的汽车所挂的牌照MOC和MOII，那他就觉察不到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男男女女不时地从“身分证办理处”涌出，随身提着鼓鼓的手提包，还有用牛皮纸包得好好的纸包包。他们钻进在门口等着的伏尔加牌小轿车里，舒服地坐在后排的坐位上，让司机送他们回家。沿着这个街区，在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其他司机被扬声器叫进一个有警卫站岗的有围墙的院子里，接受把货物送回家的电话命令。一位白头发的看门人赶走了好奇的过路人。他也来赶我，当时我正在那个院子后墙外面，停下来欣赏一座古教堂的遗迹。

这些人是苏维埃权贵的一部分，他们在一家秘密商店里买东西，故意弄得不教人注意，而只有持有特别证件的人才准入内。

有这样一个完整的商店网，为苏联社会的上层——即那些头头们，或者被一位苏联记者不恭敬地称之为“我们的共产党贵族”——服务。这些商店使苏联贵族们免受社会上长期匮乏之苦，不用排长队，不去受那恶劣的服务态度的气，免除了每天折磨着普通公民

的其他一切烦恼。政治权贵们可以在这里买到俄国稀有的精美食品，象鱼子酱、熏鲑鱼、上等的鲟鱼罐头、出口的伏特加酒、罕见的格鲁吉亚葡萄佳酿酒和摩尔达维亚葡萄酒、上好的肉类以及在其他地方很难买到的冬令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有一次，一位苏联妇女告诉我一则老笑话，说有一个小女孩问她母亲在俄国穷人和富人有什么差别，回答是这样的："富人一年到头有西红柿吃，而我们只能在夏季吃到西红柿。"

某些商店还以低价和免税价格向权贵们出售无产阶级从未见过的外国货：法国白兰地酒、苏格兰威士忌酒、美国香烟、进口巧克力糖、意大利领带、奥地利毛里长统靴、英国毛织品、法国香水、德国短波收音机、日本磁带录音机和立体声收音机。还有些商店甚至向这些大人物提供由克里姆林宫厨师烹调的热饭菜。这些食品的质量比起国营商店的一般食品要好得多。一个出身名门的莫斯科女人告诉我，她和朋友们常常光顾老阿尔巴特区的一家饮食店，这里有格兰诺夫斯基大街"证件办理处"卖剩的食品。

苏联的特权制度有它自己的规矩：依职衔的高低决定特权的大小。最上层是共产党政治局的最高领导人、权力很大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内阁部长、最高苏维埃（即国会）少数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员，他们享受"克里姆林宫津贴"，每月足以供其一家人免费大吃大

喝。[①]（对比之下，一家四口的普通城市家庭每月吃饭就得花一百八十到二百卢布，占他们收入的一半。）最高领导人享受送货上门，或者可以直接在克里姆林宫和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商店内领取。副部长和最高苏维埃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在政府公寓大厦里有专为他们服务的商店；大厦在别尔谢涅夫斯基沿河路上“突击队员电影院”隔壁，是一座庞大的灰色的公寓建筑。1930 年以前入党现在领退休金过活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共青团街的一座三层楼里的专门商店领取他们的“克里姆林宫津贴”。物品的数量和质量，又按地位的高低分为若干等。

另外还有一些卖减价食品的特殊商品，可以到里面买东西的人有：苏联元帅和海军将领，高级科学家，宇宙航行员，经济管理人员，获得高级勋章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获得列宁奖金的作家、演员或芭蕾舞明星，《真理报》、《消息报》或其他重要报刊的高级编辑，以及莫斯科市的领导人。一个经常在那里接触官员的人告

---

① 一位前中央委员会官员在英国《研究》季刊（1974 年秋季号，阿·普拉夫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幕》）写道，发给党的最高层人士的“克里姆林宫津贴”有两种——一种是技术性的，为三十二卢布；另一种为十六卢布。这位叛逃者又说，但是这是故意迷惑人的，因为津贴的票面价值是按官价黄金折算成卢布的，所以津贴的实际值要高出十五到二十倍才能反映出其实际的购买力。这样，每月的津贴将等于四百八十——六百卢布（折合美金六百四十——八百元）。

诉我，在中央委员会机关里工作的官员和职员分成三个等级，因而要在三个不同等级的商店里买东西；在党中央大楼的食堂吃饭时，也要按严格的等级制度供应饭菜。党中央机关、政府主要部委、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或秘密警察等的中级干部都在中级商店里买东西，那里奢侈品少一些，他们付的钱比大头头们多。

许多政府机关还发给高级官员所谓“特殊配给卡”，这实际上是到设在各机关的特殊商店里买东西的出入证。有一个官僚告诉我，每一个官员在这种商店里可以购买东西的金额，都按级别有一定的规定，并且标明在卡上。购买的金额是不让下级知道的。在莫斯科国营百货公司三楼的100室，专门为一些权贵们秘密开设了一家特殊的服装商店。在加里宁大道上的军人商店的底层，还有一家专为军官们服务的秘密商店。秘密为特殊顾客服务的商店在莫斯科周围星罗棋布，有裁缝店、理发店、洗衣店、干洗房、镜框店和其他零售商店，一位经常出入这些商店的人告诉我，这样的商店包括食品商店在内共达一百家左右。一位中年的女记者随着一个有权势的朋友被偷偷带进一家秘密商店之后，向我吐露说：“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真想把店里的东西全都买下来。”她的丈夫接着说：“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已经来到了。”

苏联社会还有另一种特权：莫斯科设有八家硬通

货"小白桦树"商店，持有"卢布证券"的俄国人可以在这里购买廉价的进口货或本国的稀罕商品。卢布证券是一种特殊的货币，通常发给那些在国外挣了钱又把外汇换成卢布的人，例如：外交官、受信任的记者和诗人等。但是有门路的政府官员，一部分薪金大概也用这种证券支付，一个卢布证券在黑市上可换八个普通卢布。几乎所有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人，如国际旅行社的导游者、政府机关的译员、陪外宾的记者、教外国使馆人员俄文的教师等，也能得到若干"卢布证券"的津贴，用来买条进口围巾、花衬衫或领带，或者一双厚底高跟鞋，这样可以使单调的苏联服装更加华丽多彩一些。另外，有些饭店为偶尔招待外国贵宾的苏联高级官员备办宴席，听说在特殊场合连皮裘都借给他们的太太。甚至有位美国外交官发现，一个跟踪他的保安人员也到一家"小白桦树"商店里买东西。许多苏联人对这些特殊商店的存在怒目以视，这些商店实际上成了不接受苏联货币的消费品流通部门。"在我们国家居然存在连自己国家的货币都不通用的商店，真丢人哪！不要脸哪！"一位职员愤怒地说道。不仅是苏联的钞票不中用，而且那些未经许可进入商店的苏联人也要被门警赶出来，这一点使我的某些俄国知识界的朋友很气愤，因为它显然是对大肆宣扬的社会主义平等观念的极大讽刺。

格兰诺夫斯基大街上的商店，仅仅是整个获取巨额"外快"收入的体系中一个有形的部分；它是苏联特权制度的缩影：这就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利益。[1]这些特权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这是一种红利，只发给那些有政治地位或对国家作出个人贡献的人。在西方，不管是管道工人、小贩还是店主，只要他肯花钱，他就能象本州的州长那样买一辆华丽的卡迪拉克牌轿车，吃一顿美餐，在漂亮而幽静的旅馆租一间房间住，或者雇一名技术高超的外科医生。但在苏联制度下却不行。这种制度保证把一切美好的东西留给如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米洛万·德热拉斯所称的"新阶级"享用，这个新阶级"就是那些因独占了政治领导权而享有特权和经济优惠待遇的人"。

特权阶级是苏联社会中相当大的一个集团，人数约有一百多万，如果算上他们的亲属，大概有数百万

---

① 苏联的工资级别是一种借以掩护特权的骗人花招。据有人告诉我，勃列日涅夫的正式月薪为九百卢布，但他的额外津贴使得他的实际收入远远高于此数，虽然无法计算出确切的数字。其他许多高官显贵也是如此。从表面看，勃列日涅夫的收入似乎低于苏联元帅的收入（最高工资每月二千卢布）以及著名的国防科研人员和行政官员（每月也在二千卢布的水平），也大大低于一位名作家的收入，后者的一部著作如果编成电视或电影，其版税可得十五万卢布。权贵们不仅享有金钱买不到的许多特权，而且据了解苏联内幕的人士说，党内一些显要的官员还领取特殊的秘密工资，然而要计算出确切的数字是不可能的。

人。[1] 它的确切人数是苏联社会许多难以捉摸的事情之一，因为苏联人不承认存在这一批人。照官方的说法，苏联现在只有两个阶级：工人农民，还有一个雇员"阶层"(包括职员和知识分子)。正是这个知识界的上层构成了名副其实的特权阶级。其核心是党政的上层领导，即管理国家的政治官僚，再加上高级的经济管理人员、科技方面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员、党报和宣传系统的主管人。

这种制度的神经中枢，用苏联人的话来说，就是"名册"，就是那些被党的头头选来掌管最重要职位的人的秘密名单。这种"名册"存在于苏联生活中的各级机构，从乡村到克里姆林宫都有。最高一层是政治局的"名册"——由苏联统治者亲自指定下列人员的职位：内阁部长、科学院院长、《真理报》和《消息报》的主编、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负责人、最重要的一些部的副部长、驻美大使和另外几个主要大使以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比美国白宫班子的权力还要大的这个书记处，又指定数千人担任其他重要工作，虽然较低一些，但仍很重要。按照这个程序，一级指定一级，直到各加盟共和国、各州、各市、各区以及各个村

① 西方专家长期来弄不清苏联权贵到底有多少。T·H·里格比在《苏联共产党党员的成分》(196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一书第348页列表指出，党、政、经济等官僚机构共有九十三万六千党员。但是特权阶级也包括苏联社会其他各界的显贵，如科学、文化和军界等。

庄，在全国形成一个授官定职的庞大系统。

这种类似于纽约民主党总部[1]的授官定职制度，其奖励措施正是通过各类特殊商店和其他设施并严格按照其等级来取得实惠的。这种制度遍布全国，连州的首府也有秘密商店和其他特权设施，为当地的上层人物服务，当然其规模要小，也比较简单。“名册”制度之发挥其作用，象一个永世长存、挑选自己亲信的行帮，象一个秘密的团体。普通党员不得分享这个团体的红利，只有那些高居党的领导岗位或在党的机关里有官职的人——即机关权势分子，才能享受。

在苏联，还有另外一条通向上层社会的途径，也是衡量苏维埃制度下的地位和特权的另一个标准，就是要看个人在增强苏联国力和为国增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才能。大科学家、芭蕾舞主要演员、宇宙航行员、奥林匹克冠军、著名小提琴家和有名望的军事指挥官等对国家做了卓越的工作，也能在上层占有地位，当然仅仅是地位，而不是权力；而政治上的权贵们是有权的，这是他们同其他一切人物根本的区别。

虽然文化和科学界的著名人士对展示苏联的力量和成就效力不少，但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和特权，还必须显示忠诚。党独揽奖赏大权，既可以发给他们大量

① 纽约民主党总部又称坦慕尼协会，成立于1789年，一向以党魁独揽大权和政治贿买而闻名。——译者

的奖金，又可以授予他们保证过舒适生活的勋章和头衔，或者决定发表他们的作品，使之赚一笔钱。党还行使惩罚之权，可以撤销官方的承认，例如在早些时候不许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获得列宁奖金；或者在党受到触犯时，取消某人的特权，象著名的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由于为索尔仁尼琴辩护，就被剥夺了出国旅行以及甚至在国内演出的权利。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为了表示所取得的成就并收买那些已经成名的人，党的官僚机构就授予文化和科学界的名人以"人民艺术家"、列宁奖金获得者的桂冠，并赐与他们拥有乡间舒适住宅这类的特权。这种做法和当年俄国沙皇多少世纪以来的做法并无二致，对于那些死心塌地为沙皇效力的上流人士，沙皇就赐给他们庄园和高贵的称号。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规定：有才能的专家应该比普通工人的工资高；科学家应享有特定的食品供给。这种做法是同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目标背道而驰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的作者、美国共产党员约翰·里德，曾对苏联领导人独享特权的做法表示忧虑。但是斯大林却大力发展了这种特权制度，而且还用资本主义的逻辑为之辩护，认为某些人或某类人对国家有特殊的重要价值，应该得到特殊的报酬和奖赏。党中

央委员会现在有个名称不显眼的部门，叫做"总务部"，它有自己秘密的经费，专为权势集团管理和提供各种特权设施，如上等公寓、乡间别墅、政府宾馆、特别疗养院、汽车队以及以安全为借口提供的仆役。一位莫斯科的记者告诉我，这些仆役事前都签署了保证书，决不议论权贵们的私生活。他又说，这些仆役们因忠于职守而被赏给优厚的报酬：他们也有专门的商店和乡间别墅。

地位和特权最突出的标志，就是这些头头们拥有配备司机的小轿车，车上的灰色窗帘小心翼翼地遮住要人们，以免受到好奇眼光的窥视。这些小轿车在马路中央开足马力飞驰而过，而警察就得马上示意其他车辆让路。沿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从克里姆林宫回家的路上，在格兰诺夫斯基大街的转角处，装有一部警报器。当克里姆林宫的大亨们坐车驶向绿树成荫和宏伟壮观的别墅区时，警报器指示交通警立即阻止其他车辆通行，并且用无线电通知沿途下几站的交通警。

权贵的最上层大约共有二十人——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全国书记，他们使用黑色的吉尔牌小轿车，配有专职司机，每辆约值七万五千美元。有一次，我曾窥视了一辆停放在那里的领导人物乘坐的吉尔牌小轿车，直到保安人员把我赶走。这种轿车貌似长形的林肯大陆牌轿车，里面非常豪华：软塑料扶手坐位，长毛

绒地毯，装有空气调节器、无线电话以及其他装置。一位专爱研究权贵们挥霍享受情况的工程师告诉我，人们都知道斯大林有一个六辆轿车的护送车队——五辆吉尔牌，一辆豪华的老式帕卡德牌。每次外出他都换坐一辆，所以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坐在哪辆车里。赫鲁晓夫把车队减为四辆。自从1969年1月22日一个心怀不满的陆军中尉从克里姆林宫的鲍罗维茨基门向勃列日涅夫的汽车开枪射击以来，勃列日涅夫出行时，通常就是四辆汽车了。

对于那些资格够不上坐吉尔牌轿车的二流人物来说，海鸥牌轿车算是最好的汽车了。这种车体积大、车身高；看起来象个怀胎的五十年代的帕卡德牌汽车。在一些主要街道上，专门划出了中间行车线，供要人的汽车行驶，人们常把这种行车线称做"海鸥牌行车线"，因为海鸥牌汽车经常突然冲进这条线。能坐海鸥牌汽车的人是：内阁部长，海军将领和陆军元帅，以及来访的重要外宾和代表团。有些西方国家的大使馆和商业单位用一万卢布（一万三千三百美元）的价钱购买了这种汽车。普通苏联人有时办婚事也租用它。

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公家汽车的车队是如此之多（大多数是黑色的伏尔加牌），普通苏联人对政界大亨们的华丽轿车都已习以为常了。但我曾听见有人抱怨说，这些轿车的司机在狭窄的路口横冲直撞，吓得行人

四处逃散，象农村路旁的小鸡一样，其他汽车也不得不向路边躲闪。1973年，一位出席苏联召开的“世界爱好和平力量大会”的美国黑人妇女，对于载着她的官方代表团的海鸥牌小轿车蛮横地冲入人群感到很不舒服，她说这使她联想到沙皇时代的贵族老爷在路中央驱车飞驰，溅得农民一身都是泥的情景。苏联官方的向导向她提醒道：“嘘！别这么说。”

然而，配有专职司机的小轿车还不是炫耀地位和特权的最典型的标志。总的说来，苏联政界的上层人士过着一种与外界隔绝的、不露形迹地尽情享乐的特权生活，一般老百姓是看不到的。1974年，苏联为欢迎尼克松总统在金碧辉煌的克里姆林宫圣格奥尔基大厅举行的高贵雅致的宴会，使我颇感惊讶。当两国领导人步入大厅，站成一排，聆听演奏两国国歌时，我和他们相隔只有几呎。尼克松穿一身蓝色哔叽服装，党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噘着嘴，系一条紫红色西方格式的宽领带，尼古拉·波德戈尔内主席长着一个圆头鼻子，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显示不耐烦的神情，眼珠直转，象小孩儿一样盼望着仪式赶快结束。大厅两边的长形宴会桌，每只足有一百码长，桌上摆满了精美食品：各种鱼子酱、熏鲑鱼、烤乳猪。在巨大的水晶吊灯下，身着白衣的服务员穿梭往来，端上一份份热菜，管弦乐队在楼厢里为几百名出席宴会的苏联权

贵们演奏《南太平洋》影片里的乐曲。美国记者自然不会放过报道苏联领导那种奢华的好客情况，但苏联报纸却只字未提。这种炫耀排场和阔气的场面在苏联的电视屏幕上连一星半点也没有出现。这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一贯做法，因为他们的生活是不能给别人看到的。他们住在单独划出来的居住区里；在自己的休假地或按级别开放的俱乐部里娱乐消遣。当他们离开莫斯科到外地旅行时，有专用的机场（伏努科沃Ⅱ）供他们使用。普通老百姓对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特权也许略有所闻，但决不会知道其详细情况。

克里姆林宫本身确实雄伟壮观。但是莫斯科没有能和白宫相媲美的官邸。苏联领导人喜欢乡间别墅，胜过市内的寓所。勃列日涅夫住在库图佐夫大道二十六号一座旧式的九层公寓大楼的后侧，占了一层楼；楼上住着秘密警察头子尤里·安德罗波夫；楼下是内务部长尼古拉·谢洛科夫。柯西金住在市内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一座建筑在列宁山上的现代化公寓，可以俯瞰莫斯科河对岸的莫斯科市中心区。我听说，波德戈尔内住在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大街一座高大而保养得很好的黄砖公寓里。市内还有几处重要的地段供政界要人和莫斯科党的机关官员居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高入云霄的公寓有着明显的象征权力的标志：干净利落和现代化的设计式样，黄砖结构，大得非凡的画

窗，幽静的阳台，保养极佳的草地，以及在苏联说来最秀丽诱人的景色。

但是使一般普通苏联人眼花缭乱的却是公寓内部的装饰。一位在莫斯科统治集团内有熟人的女演员告诉我，她看到他们的厨房里有壁橱、塑料贴面的柜台、西德屈佩斯布施公司的电灶和冰箱，起居室陈设雅致，具有现代芬兰派的风格，这些家具都是免税进口，以打了折扣的低价买进的。这一切使她惊讶不已。她说，厨房里的设备非常新奇，在苏联市场上根本看不到，因而不得不派出技工到西德接受特殊训练，以便安装和维修这些权贵们的厨房。

给普通苏联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要人们家里的各种新式装置和陈设，而且还在于住房的宽敞，他们往往一个人享用一间卧室，完全不必睡在起居室里。我认识一位研究生，他经常到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儿子、颇有名望的阿列克谢·米高扬将军家里作客。使他为之愕然的是他们住在政府公寓一套七间（不包括厨房和浴室）宽敞的住宅里。他把它描绘得象美国纽约公园大道上最好的住宅：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用的房间，此外还有一间书房、一间起居室以及一间放一架范·克莱本[①] 弹过的大钢

---

① 范·克莱本（1934— ）：美国钢琴家，1958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的优胜者。——译者

琴也不显得挤的饭厅。这种宽敞和奢侈程度，对百分之九十九的苏联人是不可想象的。房间的高度也使他吃惊，正象西方人对大多数苏联房子的天花板矮得不舒服感到惊讶一样。他能看到苏联特权阶级的生活情况是不容易的，因为得以冲破特权阶级的圈子，看到他们私生活情况的苏联人是不多的。

一个年轻的政府外交政策专家巴维尔说："一切都给伪装起来了。"他是一个失宠的老党员的孙子。说这句话时，我和他正在西夫采夫·弗拉热克区散步，这里住着许多权贵的家庭，他以前曾在一所高官显贵子弟很多的学院里念过书，所以在这儿有一些朋友。他说："这些公寓是中央委员住的，"他的手指向那一边，"你再看看街那边的破房子，差得多远，简直没法比。再过去，在拐角那边就是中央委员会的旅馆。门口没牌子。你没法知道这是干什么的。谁经过这里也不会注意。他们就在这个旅馆接待来自朝鲜、蒙古和波兰等友好国家的高级客人。我有一个朋友被指派到奥地利工作。极度的好奇心驱使他想知道这个旅馆里边是什么样的，想看看里面的家具和内部装饰。于是他进去了。还没有来得及瞧，一个接待员就走来问他进来干什么。经过一番争吵，才放他出去。这下可闯了祸，奥地利去不成了，他的前途就让这么个过失给断送了。在这里，你不要问这问那，跟你无关的事儿，你就不要多管闲

事。”

我放慢脚步，粗略地看了一下这座禁止外人接近的大楼。台阶上的踏板是铜制的，门旁挂着一个长长的温度计，拉上的窗帘使人看不到里面，楼顶有玻璃的日光浴室。我停了一会儿，记下了门牌号码。

“咱们别在这儿停留，”巴维尔焦急地说。“快走，别让门口的女值班员看到我们。”

我们又向前走，看到前面有座拟古典主义的旧建筑，样子很难看，有五层，四周围着高高的栅栏。大楼的外表是发亮的红色花岗岩，并且有黑柱子的门廊。过去的两间石砌的警卫室已经下陷，现在彼此斜靠着。以前作为主要进出口的大铁门，现在用锁链封死了，人们从左面的大门进出。挂着显眼的MOC和MOП牌照的黑色伏尔加牌小汽车停在外面。有个司机，头戴扁平狭边呢帽，身穿克格勃便衣人员的深蓝色雨衣，在车旁踯躅。还有一个司机坐在有着刺眼的红座套的小轿车里，照看着后座上的一个小女孩。这时从楼里走出一位夫人，身穿时髦而合身的皮边外套，脚登一双齐膝的进口长统靴，钻进这辆红座套的汽车，一溜烟开走了。

巴维尔对我说，“这里是克里姆林宫的主要诊疗所。上面的圆屋顶和模拟希腊风格的大柱子，你看见没有？这是斯大林式的建筑。”

人们常常提到克里姆林宫诊疗所，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人们一般泛指的克里姆林宫诊疗所，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诊疗所，而是由许多诊疗所和医院组成的一个医疗体系。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家设在格兰诺夫斯基大街商店转弯过去的列宁图书馆正门对面。它也没有什么标记，只是门旁有一个锤子和镰刀的图案。但是我间或也看到政治局的吉尔牌轿车停在门前，这时就有一些克格勃的特务在人行道上聊天消磨时间，司机擦着挡泥板。然而我的苏联朋友们却认为，勃列日涅夫或其他大亨们不会到这里来看病，正如一位记者说的："他们得了病，医生就会登门医治。"

苏联的要人喜欢在僻静的地方看病，例如设在权贵们的别墅区的孔采沃医院，东欧的领导人诸如东德的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就在这里接受过专门治疗。按照苏联标准来衡量，这是相当豪华的了，一位曾在那里治过病的著名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编辑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向朋友们说了一句俏皮话，"那是为八十张病床服务的共产主义。"

斯大林看病的医院甚至更加与世隔绝，地点在通往明斯克的公路边的松林深处的一个叫做菲利的地方。其他疗养院和诊疗所分布在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以及有利于健康的矿泉附近。这些设施专供"名册"上的权贵们使用，人们提到这些医疗设施时只能婉

转地简称“四局”，意即卫生部第四局。一次在官方安排的采访中，我问一个漂亮的妇女做什么工作，她脱口说出在“四局”工作。之后，你看到她那副神情，一定会以为她象是个被抓住的间谍坦白了某些可怕的事情一样。倾刻间，她垂下两眼，希望我不会注意到她说漏了嘴；幸亏在旁的主任医生把话题岔开，回避了这场陷入僵局的谈话。

其他有名声的机构，例如科学院、芭蕾歌剧大剧院等也有自己特殊的诊疗所和医院，医生远远超过一般水平。这些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赫赫大名，使为他们看病的一些医生如牙科医生也抬高了身价；他们还私下为别人看病，收入颇丰。但是莫斯科的犹太人告诉我一句顺口溜，说明事情并非完全如此。这句顺口溜可以直译为：“镶木的地板，可靠的医生。”意思是说：诊疗所的设备如镶木地板一样精致，但是医生必须在政治上可靠。这就使得许多在政治上不大可靠而医术十分精湛的犹太人或其他人被摒除在外。因此，在这些医疗机构里可能不会随时都有医疗水平最高的医生。说到药物，苏联权贵们得到的无疑是最好的，药品在苏联确实很便宜，但长期供应不足，以致党报隔一段时间就得抱怨一番。一个年轻的外交政策顾问巴维尔经常向他的有权势的朋友借身分证，钻到克里姆林宫的药房或者配一副新眼镜，或者要些象芥末硬膏之类

的普通药、野生的止疼草药以及沙棘油等药品。我从另一些人(包括药物学家)那里听到，除了在克里姆林宫诊疗所或其他特殊医院外，市场上不仅西方的药不好买，而且很难为心脏病人买到消心痛、治精神病的氨基丙酸，而类似三乙醇夹竹桃霉素这样的合成抗菌素也难买。

然而，高级人物最大的特殊享受，是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苏联领导人及其家属在外地有许多僻静的别墅区，就其单个的别墅来说，可能没有象尼克松在棕榈海滩以及在加利福尼亚的疗养地那样豪华，但是这些分散在各处的别墅，使勃列日涅夫既能享受黑海之滨克里木或皮聪大的温暖气候；又能象以前德国的男爵一样，同国务卿基辛格这样的外国客人一起在扎维多沃附近打猎，那儿是俄罗斯中部的狩猎区，气候凉爽宜人；既能和法国的乔治·蓬皮杜在明斯克郊外的松林里的疗养地休息，尽享幽雅宁静之乐；又能住到列宁格勒附近用玻璃和柚木造的国家宾馆，领略现代芬兰式建筑的风味。

在苏联几乎所有大城市和许多小地方都有权贵们和高级来宾的特殊公家宾馆，它们座落在道路的尽头、篱笆的后面、松树或白桦林的深处，在人们所看不到的地方。一次，我和一群美国记者来到岗峦起伏的西伯

利亚西部一个叫做苏尔古特的产石油的城镇，住在过去柯西金总理使用过的一个招待所里。招待所里的房间用松木板镶嵌，具有农村特色，非常舒适，而附近的工人家庭的住宅都是千篇一律的预制构件的房屋，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招待所的双人房间既宽敞又亮堂，有舒服的床和照明用的变阻灯，只是抽水马桶漏了。招待所里的专用饭厅供应颇佳，有新鲜蔬菜和水果，这在早春的西伯利亚是闻所未闻的。

另一次，我在火车上偶然遇到了柯西金的女儿柳德米拉·格维夏尼，她是一个中年妇女，一家人同去拉脱维亚的政府休假地度假。当时和我一块儿旅行的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迈克·麦圭尔。我们和她的丈夫杰尔缅·格维夏尼交谈起来。他是有名的东西方贸易问题专家，有一次在有关苏美贸易问题的记者招待会上我曾见过他。我们就谈了一会儿贸易问题以及苏联的一些休假地。格维夏尼是个漂亮的格鲁吉亚人，衣冠楚楚，穿着合身的衣服，系一条巴黎戴奥公司制作的领带，走到哪里都会被当作是西方国家的企业经理——而且确实如此。在谈话中，他说他们一家人喜欢波罗的海海滨的凉爽天气，他发觉黑海之滨的索契那种炎热的夏季气候，对他的背疼病很不利。

我们正谈着话，服务员一反苏联的惯例，从相隔六个车厢的餐车为格维夏尼一家人端来了饭菜。我们俩

忙起身告辞，然而服务员把我们当作格维夏尼一家的熟人，允许我们享受在客车车厢里用餐的特权，而且很有礼貌地解释说，在拉脱维亚铁路线上一向是把饭菜送到乘客面前的。但在回来的火车上，当我们向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说我们要定饭时，她显出很惊奇的样子说："我们从来不这样做。"

我们同格维夏尼一家在里加车站分手。我们跟着一大群乱哄哄的人等出租汽车，可是一直等不到车，最后只好放弃乘车而步行到旅馆。他们一家却有五个人来车站接，两个女人手里拿着花束，三个身穿黑色衣服一本正经的男人前来拿行李和负责安全保卫，而这一点在火车上时似乎却注意得不够。格维夏尼一家立即被引进一辆海鸥牌大轿车，驶往部长会议所属的一家宾馆。宾馆位于离里加湾人群拥挤的海滩二十哩的一个僻静地点。格维夏尼夫人在火车上告诉过我，那个地方太隐蔽了，你可以"漫步成百成千码，独自同大自然相对交心！"对于无法摆脱休假地内人群拥挤的大多数俄国人来说，这简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享受。

在克里木和黑海沿岸等地方，有些政治局委员的别墅豪华异常，其中最出名的要算乌克兰的前党魁彼得·谢列斯特的别墅。这些别墅太奢侈了，使得稍为朴素一点的共产党官员也看不惯。由于克里木是乌克兰的一部分，谢列斯特可以为所欲为地调配劳力和材料。

乌克兰的其他领导人也在海滩建造别墅。有一位了解该地区情况的科学家告诉我，谢列斯特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电影巨头那样，在雅尔塔草木茂盛的尼基塔植物园附近，让工人们在一块半哩长的海滩上建起一座四层的高大宫殿。铺垫海滩用的沙子，以及各种家具和陈设，都是专门用卡车运来的。修筑了海堤。在热带丛林中蜿蜒伸展的防波堤，横跨海滩，最后隐没在海浪之中。保安人员不让游泳或散步的人接近这些海滩别墅的屋宇。告诉我这些情况的那位科学家曾在参观植物园时到附近地方游逛过。

不论苏联其他领导人对谢列斯特的挥霍无度感到多么不安，但一直到他失掉政治局委员和在乌克兰的职务时，他才被迫交出自己的别墅。在这方面，党的规矩常常是无情的：丧失地位意味着失去公家别墅。不过谢列斯特作为一个级别颇高的副总理，即使在降职以后，他肯定还会得到一所差一点的别墅。根据这种制度，被提升职务的人也会得到更好的别墅。1974 年 6 月，正当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会谈期间，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陪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乘坐游艇沿着奥列安达游弋时，葛罗米柯在基辛格面前炫耀他当上政治局委员以后在克里木分配到的新别墅。葛罗米柯当了十六年的外交部长，但一直到 1973 年 4 月当上政治局委员以后，才住上了最高级的别墅！

享受特权规定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外人物，就是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这个亚美尼亚老头是个搞党内阴谋诡计的老手，正如苏联人说的，他是个“从伊里奇到伊里奇”幸存下来的人物，即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没有米高扬活得长。1965年，米高扬作为赫鲁晓夫的亲信而被赫鲁晓夫的继任人勒令退休，但他设法在黑海的加格拉附近保留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别墅。这座别墅以大理石砌成的两个游泳池而驰名，一为海水池，另一为淡水池；不仅如此，他还在莫斯科郊外保留了一座有仆役的巨大宅第和豪华的庄园，墙外绕有一道干涸了的深沟。十月革命以前，这里的主人是个高加索的巨商。

俄文中有些神秘而富有弹性的词，它所掩盖的东西超过了它所透露的，意义令人捉摸不透，“别墅”这个词就是其中之一。“别墅”的意思，首先是指逃避拥挤的城市，进入幽静的俄罗斯乡村。它方便地掩盖了社会差别，它的含意有时比现实还要美妙，有时则比现实简单朴素。或许这就是苏联人喜欢常用这个词的原因。很多人谈到他们在某处“有一座别墅”时，总是神采奕奕，目光炯炯，但是无论从他们的眼神还是从言语里，都无法得知这个所谓别墅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别墅”可以指稍微大一点的工具棚，或者一小块土地上的

独间小屋，周围还有许多类似的小屋，这些都不是作为休养用的；可以指普通俄罗斯农村里简朴而舒适的有四间房屋的村舍，但没有卫生设备；也可以指旧贵族的大宅第；也可以指四十年代德国战俘建造的不拘一定格式的比较时新的乡村别墅。别墅与别墅之间还有一点最大的区别在于：有些是国家或某个单位的，可以免费使用或只交象征性的一点费用，即每年二、三百卢布（二百六十七至四百美元）；另一些则是私人的，或者是国家在斯大林时代赠给那些为苏联立过大功的人的奖赏，或是通过合法的合作途径建造的，或者是经过几次买进卖出。这种买卖，有的是倒买倒卖牟取暴利，有的则按照变通的解释才是法令所允许的。在莫斯科西南的伏努科沃附近，有一所五间房子的别墅，十年中换了三个主人，价钱从一万五千卢布升到七十年代初期的六万五千卢布（从二万美元升到八万七千美元）。在通常情况下，高价的私人别墅，只有买得起的人——获得奖金的忠心耿耿的作家、电影导演、作曲家和歌剧演员——才能享用。

党的领导人占有的别墅，一般占地面积达数亩，一律是国家免费供给的。别墅的周围有高高的绿色栅栏，有个莫斯科人告诉我说，普通苏联人从小就知道，不能走得太靠近这些栅栏。许多别墅座落在通往乌斯宾斯基村的公路旁边，附近的莫斯科河岸边有一片河

滩，供外国使馆人员游乐。凡是通往这些权贵们的别墅区的岔路上，都插着“禁止入内”的松木牌子，防止好奇的人闯进去。在最高级人物的别墅周围，不仅在树林深处有便衣警卫，而且为了防止汽车司机无意中把车开到里面去，一些主要路口还有武装警察把守。

莫斯科人感到这套生活方式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理想的一种讽刺，因而他们给勃列日涅夫编了个笑话。我在莫斯科时，勃列日涅夫的母亲还活着。笑话是这样的：勃列日涅夫想让他母亲知道他干得多么成功，他决定把母亲从乌克兰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老家接到莫斯科来。他先领她看看他在城里宽敞的公寓，但她并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甚至还有点不自在。于是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克里姆林宫，叫来吉尔牌小轿车，和母亲坐上车，飞速驶向他在乌索沃附近的别墅。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曾在这里住过。勃列日涅夫领着母亲到处看，一间一间的房子，漂亮的庭院，但她仍然没有说什么。于是他又叫来了自己的直升飞机，带母亲到扎维多沃的狩猎场去。在那儿，他陪她看宴会厅，向她炫耀大壁炉，他的各种猎枪以及所有的一切。最后勃列日涅夫实在忍不住了，恳求似地问道：“告诉我，妈妈，你认为怎么样？”

他母亲踌躇地说：“哦！很好，列昂尼德。但是红

军回来了怎么办呢?”

莫斯科的西郊和西南郊，丘陵连绵起伏，一些重要的别墅区都坐落在这里。其中在国外闻名的大概要算彼列杰尔基诺的作家别墅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曾在这里居住过，从事写作；人们喜爱的儿童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也曾在这儿住过；《真理报》为它的高级编辑们在这里准备了许多别墅；被西方国家称为苏联特殊的情报人员的维克托·路易斯，在这里拥有一座很大的富丽堂皇的两层住宅，里面有橡木大壁炉、蒸气浴室，墙上挂着圣像，而且还有一个网球场，冬天泼水成冰就成为滑冰场。作家协会把它在这里的两所不整齐的钢骨架别墅分配给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和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这里还有一座东正教的小教堂，其色彩之灿烂浓艳，其美观之难能可贵，均堪与红场的圣巴西尔大教堂相比。

从克里姆林宫西行二十五公里左右，就到了尼科林山，有许多夏季别墅建造在绿树成荫的丛林里，专供科学院院士、记者、作家以及象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伊巴科夫这样的政府官员使用。闻名世界的物理学家彼得·卡皮查和儿童读物作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的别墅，坐落在可以俯瞰整个“外交河滩”的悬崖上。所有这些别墅区都在彼此只相隔几哩的范围

内，离茹科夫卡很近。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里露耶娃把茹科夫卡称作她在苏联的最后一个住所。

茹科夫卡是苏联政界、科学界及文化界的要人所居住的整个别墅区的心脏，集中体现了苏联社会顶端的圈子是何等狭小。在朋友们打开地图给我看茹科夫卡的地理位置以前，听到有些莫斯科的居民把莫斯科叫做"畸形发展的村子"，我总是不解其意。这么个熙熙攘攘的工业大城市，人口有八百多万，他们的种族和民族象纽约一样纷杂，却把它叫做村子？我长期来搞不明白。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他们是说，如果你也在这个圈子里，而且是属于这个圈子的一分子，你就看到这里的人们互相传递消息和干其他许多事情就象一个小镇上的情况一样：人们彼此熟识，非亲即故。就这样大的城市而言，就这样大的国家而言，莫斯科的那个小圈子真是小得惊人了。莫斯科是苏联一切事物的中心，正如伦敦是英国的中心，巴黎是法国的中心一样。

美国人一想到苏联的陆地面积大于美国两倍以上，就很难理解上面这种情况。美国汽车工业的大本营在底特律；电影工业集中在好莱坞；钢铁工业在匹兹堡周围；原子能工业在洛斯阿拉莫斯和橡树岭。政治首都是华盛顿；金融、出版和电视的中心是纽约。但是在苏联，莫斯科是一个样样都有的"大苹果"①。此外，

① 美国纽约市的别名。——译者

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可以简单比喻为象一个菱形，在上层的高官显贵相对来说要少一些，中层的中间阶级特别膨胀，底层的人数也是较少的；而苏联社会则不然，它是宝塔形的，底层极大，中间较狭，越到上层越尖越小。实际上不只是一个宝塔，而是一系列的宝塔，各个领域都有一个宝塔，各个宝塔都汇集到一个顶端，而顶端上的所有人又都汇集到茹科夫卡。

茹科夫卡的外表并不壮观，如果未经世故的过路人在这里投上一瞥，看到的只是一簇簇用圆木建造的苏联农民的典型小房子以及菜园里看菜的小屋。唯一明显的标记是，这里有个低矮的但十分庞大的用水泥建造的综合性商店，店旁设有露天停车场。外国使馆人员和记者想在那里停一停买些东西，就会被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武装警察迅速而无情地赶走。由于不知内情而冒失地走进去过的俄国人，对商店供应的商品之丰富，大吃一惊。一位惊讶不已的中年夫人告诉我说，“那里有炒菜用的平底锅、搪瓷锅、法国和意大利的服装，莫斯科没有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这座商店是在赫鲁晓夫时期专门为住在周围别墅里的权贵们盖的。从官方来说，赫鲁晓夫在苏联社会上已经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可笑的、不值一提的和已经不存在的人物了，然而在这里，赫鲁晓夫却以微妙而好笑的方式活着，因为茹科夫卡的权贵们甚至直到如今还称这个商

店为"赫鲁晓夫商店"。

茹科夫卡之所以具有一种宁静的农村气息，而且看起来象个集体农庄的村子，其原因之一是实际上它有三个而不是一个居住区。从莫斯科路过这里的司机或旅行者，在路的右边看到的，就是众所周知的"茹科夫卡村"。在路的那边，目所不及的密林深处，越过通往莫斯科的铁路支线，还有另外两个村子，用整齐美观的路牌标着"茹科夫卡一号"和"茹科夫卡二号"。然而当地人却把"茹科夫卡一号"叫做"部长村"；把"茹科夫卡二号"叫做"学者村"。部长村住的是内阁部长和他们的高级副手，四周围着砖墙和铁栅栏。进入部长村要凭特殊的通行证，而且里面的等级制度森严。实际上，部长村从它建立以后就在不断扩大，这是不奇怪的；现在分成两个居住区，一个靠公路稍近，里面住着地位较低，但仍很重要的官员；另一个在铁路线的更隐蔽的一边，住着更高级的人物。

别墅是按照级别地位分配的。有一次，一位数一数二的科学家曾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位科学界的高级领导人，在被提升为副部长后，随即接到通知，将在部长村分配到一所公家别墅。但在这之前，他已经在一个科学界的居住区购买了一所豪华的别墅，因此尽管分给他的公家别墅是一种荣誉，他还是不想搬家，也不愿放弃自己宝贵的财产，所以他企图婉言谢绝。结果

上级严厉批评他:“你是不是想蔑视‘名册’制度? 你必须把私人买的别墅卖掉，住进和你身分相称的公家别墅。”他遵从了。

有时也有例外。某些有特殊地位的人即使下台之后，仍保留着他们的别墅。斯大林的严峻的外交部长和亲信,现在已是须发斑白的老头儿——莫洛托夫,仍在部长村占有一所别墅。独裁者斯大林的外孙约瑟夫,在这里也有别墅,他现在是个医生。

学者村是个比较松散、不太正规的居住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斯大林把位于部长村附近的两层的乡村住宅奖给发明苏联原子弹、氢弹和第一座回旋加速器的科学家，这是学者村的开端。赫鲁晓夫时代，又住进了太空时代的科学家。现在这个居住区已有大约一百五十所别墅。发明创造原子弹和氢弹的高级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和尤利·哈里顿都在这里拥有自己的夏季别墅。最近几年来，在文化界崭露头角和赚了一笔大钱的人物，从学者村某些科学家的寡妇手里买了一些夏季别墅，这些别墅原先是国家奖给科学家的。作曲家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和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就是这样在这里搞到别墅的。索尔仁尼琴一度确实住在罗斯特罗波维奇别墅内园丁的小屋里。

在原先那个简朴的茹科夫卡村内，在那些圆木小

屋以及老式而舒适的、没有油漆的楔木板乡村房屋之间，一所所新别墅最近几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地建造起来了。专门负责监视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克格勃的一名将军，在这里占有一所老式别墅。在他的对面，一个负责边境保安部队的克格勃的将军，用进口的黄砖给自己造了一所现代化的别墅，它的四周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住房，村里的人在夏季把它们租给来这里避暑的政府官员、作家、演员、记者、艺术家以及其他有钱的人。

学者村的背后就是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巨大庄园以及位于波杜什金公路上中央委员会的疗养院。朝莫斯科方向再走一、二哩路，过了巴尔维哈，就是党的最高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住的地方，一般人认为正是这个幕后活动家组成了推翻赫鲁晓夫的联盟。朝相反的方向走，从茹科夫卡出发，经过两个小村庄，在乌索沃居住区的对面，有一些最高级最隐僻的官邸，住着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基里尔·马祖罗夫（柯西金的第一副总理）和葛罗米柯外长。葛罗米柯是在进入政治局以后才从他的在伏努科沃的部长级别墅搬到这个勃列日涅夫"飞地"来的。

谁要是在夏天到茹科夫卡来呆上一个下午，就会知道这些高官显贵为什么会被这块地方所吸引。这里令人心旷神怡，有着纯粹的俄罗斯风味。别墅村座落

在悬崖上，俯瞰潺潺流水的莫斯科河，眺望微微起伏的俄罗斯中部草原。在矮松树的丛林中，有时会碰到战壕的残痕，地面崎岖不平，行走很艰难。

列夫·科佩列夫是一位身材高大、嗓音沙哑、满脸络腮胡子的俄国作家，他和索尔仁尼琴一起住过集中营，经常喜欢拿着一根笨重的手杖散步，实际上是一根从树上砍下来的结实的树枝。他对我说，"这些都是战争的伤痕。战壕是用来保卫莫斯科的，可是德国人没有走这条路，所以这里没有发生过战斗。"

这是一块秀丽、幽静、使人怡然忘却岁月的地方，离喧闹的莫斯科城不到二十哩，简直是另一个世界。夕阳西下时，你可以坐在河岸的高处，极目眺望几世纪来停滞不变的俄国原野。田野和灌木丛林在这里蜿蜒伸展，杂乱丛生，无人管理。天空染上了一层柔和的色彩，不象美国佛罗里达州或加利福尼亚州晚霞那种灿烂的橘黄色和红色，但这里有一种淡淡的白漾漾的回光返照，因为这个地区太靠近北边了。微风吹来了一股强烈的松木味。耳边听不到噪音，只有狗叫和鱼儿的跳跃声，远处树林里孩子们的笑声。煞风景的是，一架喷气机在上空吼叫，列夫·科佩列夫随口打赌说："总有一天会有人因发明无声的喷气引擎而发财的。"

他和妻子拉伊在这里度过了二十个夏天，虽然他穿着伐木工人的服装，但有点象是这个地区的主人。

在傍晚散步时，他不时停下来向那些偶然相识的人打招呼，欢迎他们到茹科夫卡村来。“在整个世界上，这里是我最喜爱的地方，”他说，眼睛里闪现出孩子般的神色。

拉伊接着说，“过去这里还可以游泳，现在不准游了。没有特别的许可连鱼也不准钓。这里是水源保护区，这水是供应莫斯科的。”

但是，当我们穿过树林时，透过小白桦树和矮林丛，就可以看到有些钓鱼的人在水里放出长线垂钓。十几岁的儿童有的骑着马沿着河边转，有的向水面漂打石片，有的爬上倒下的树上去玩。在陡削的河岸上有一位年轻的姑娘，身上穿着一套新的进口粗斜纹布衣裤，在翻领上别着美国式的领扣(这说明她的父亲地位很高，经常出国访问)，她坐在松树桩上，安祥地凝视着远方的农村。

列夫·科佩列夫指向西面三、四哩远的地方说，“在那儿可以看到勃列日涅夫的别墅。水塔，看见了吗！那是专门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马祖罗夫的别墅修的。别墅，你是看不到的。它们就在水塔旁边。大家把勃列日涅夫的别墅叫做‘一号别墅’。斯大林住在那儿时，这个别墅叫做‘远方别墅’。1959 年尼克松来时，赫鲁晓夫住在那个大别墅里。从河上看得见这所别墅，或者说过去常常可以从河上看得见它。我们是

在赫鲁晓夫时代看到的。当赫鲁晓夫陪尼克松乘他的游艇游河时，我们也在河上。这真是一所漂亮的官邸，幽美的庭院，讨人喜欢的河岸，大理石的台阶直通水边。可是现在不准到那片河上去了，连我们俄国人也不让去。”

我们沿着村舍间的羊肠小道返回村子时，列夫谈起了苏维埃权贵们的别墅在地理上的紧密关系。

列夫沉思着说：“若是在1972年秋或者1973年春的一个早晨，你站在赫鲁晓夫商店的旁边，就会看到所有的人。早上九点光景，萨哈罗夫和他的妻子会打这儿路过，到河边去游泳。之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马祖罗夫坐着‘吉尔’从这儿急忙驶往克里姆林宫，天气好的日子，他们都住在自己的别墅里。大约十点钟，索尔仁尼琴会到这个商店里给儿子买牛奶。当时他住在学者村内罗斯特罗波维奇别墅的园丁住的小屋里。过一会儿，你就会看到莫洛托夫从部长村走到商店来买东西。一次，索尔仁尼琴碰到莫洛托夫，事后他说，他曾打算走上去跟这位老人说：“喂，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咱们聊一聊好吗？”索尔仁尼琴又想象莫洛托夫会说些什么。他猜想莫洛托夫说的话一定还和以前一样僵硬。我问道：‘是否因为他相信这些话？’索尔仁尼琴回答说，‘不是的，他不相信这些话，只是出于习惯罢了。’”

我从别人那儿听说，1972年夏季的一天，莫洛托夫正在赫鲁晓夫商店里排队买西红柿，一个妇女说："我不愿意和刽子手站在一起排队。"据说，莫洛托夫没吭一声，就离开商店走了。

列夫把赫鲁晓夫商店说成是各种人物聚会的中心地点。他说，在索尔仁尼琴和莫洛托夫走过之后，"后面来的可能是斯大林的外孙约瑟夫，他是斯维特拉娜的儿子。然后就是苏联原子弹的权威哈里顿，再后面是从部长村来的罗斯特罗波维奇和肖斯塔科维奇。罗斯特罗波维奇总是来得很晚，他是个艺术家。随后，从尼科林山开来的彼得·卡皮查和谢尔盖·米哈尔科夫的汽车也会从这里驶过。米高扬也许会从巴尔维哈车站附近的别墅驱车路过这里。二十年来，他常常在这一带骑马，现在他不骑了。你看，不论是科学界、文化界还是政界的大人物，全都路过这个乡村小商店。"

但是，聚居在莫斯科郊外隐蔽的别墅区或全国其他的特别领地内的苏联权贵们，不光是比其他居民吃得好、穿着讲究、住房和医疗条件优渥，而且还为自己创立了一套庞大的特权制度。他们的生活条件同社会上其他人有着天壤之别。正如高官显贵们有着配备司机的小轿车这个条件一样，他们享受着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的舒适生活；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国内或去

国外旅行，享受听西方音乐和看西方电影的乐趣，为自己的孩子安排一所好的学校或好的工作，也可以干脆上馆子吃喝。这种制度为权贵们和人民大众的生活方式规定了两种悬殊的待遇；对于那些正在向上爬但还没有到达权贵地位的人，也按地位高低有好些差别。权贵们把这些特权都视为天经地义的事，他们极端鄙视普通人，那种骄横的态度，比起西方最高傲的富翁来，常常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国际旅行社的向导曾私下吐露说："经理们都懂得，每一趟火车、每一班飞机、任何一个旅馆或剧场，一定要为有关当局留出一定数量的位子。不仅在莫斯科，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其他城市要为莫斯科来的高级官员、州里党的官员、市里党的官员留出位子，只是为了他们有可能要来定购。旅馆为他们保留房间，谢绝别的旅客，只是为了万一他们会来住。飞机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假如留给他们的票子又不要了，那么就得临时卖掉，譬如说在飞机起飞前或剧院开演前半小时处理掉。到处都是这样的做法。总要为有关当局留些空位子，以防万一。

"或者还有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譬如说，有一个倒霉的家伙买了一张飞机票，准备齐全，要到某个地方去。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来了，并且对他说：'你不可以去，我们需要你的座位。你等下一趟班机吧！'这样，他

就挨了这位党的大亨的闷棍，而且也许得在机场等上五、六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事情就是这样。这位旅客对此毫无办法。”我从许多普通的苏联人那里听到过这类侮辱性的事，人们非常气愤，但最后也只好忍气吞声。我还听到一对中等级别的新闻记者夫妇吹嘘说，他们凭自己的地位住上了旅馆的房间，并且把原先住着的普通俄国人赶走。他们认为这是由地位赋与的一种天然权利。

政界和文化界的显贵们还有许多俱乐部和专用的、对外不开放的餐厅，他们可以在那里尽情吃喝，免受普通俄国人站在餐厅外面排队等候之苦，也不必在莫斯科拥挤不堪的饭店里看服务员的白眼。最高级的官员可以在希姆基水库附近党中央委员会和内阁开设的供膳旅馆这类的地方用餐。权力较小但有名望的人，可以在作家协会、建筑师之家、武装部队军官俱乐部和记者之家等专业俱乐部里吃饭，那里供应鱼子酱、牛排、上等伏特加酒（一般只供出口），服务员彬彬有礼，上菜很快。

要是在旅行或看演出时，不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会受到迅速的接待，坐进第一流的包厢，而且比较重要的政界权贵以及次于他们的文化界、科学界和经济界的显贵们，也都可以受到优待。例如，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其他重要机构都有特设

的售票处，上层的权贵们可以指示其助手预先办理旅行事项，或者为他们搞一些精采节目的票子，这些票子一般都是极为紧张的，人们通常要通宵排队才能买到。1972年9月，就在轰动一时的苏联对加拿大第一次冰球比赛前夕，我有一位朋友是加拿大的外交官，他到卢日尼基公园的售票处去拿球票，那时正好走进一个手拎皮包的公子哥儿似的年轻人。他把皮包往桌上一放，拿出介绍信说明他是中央委员会来"取球票"的人。在场的官员都放弃手头的事情前来接待他。当中央委员会的年轻人拿走了每场（总共四场）三千张的球票时，这位加拿大外交官弄得目瞪口呆。这个数目超过了全部座位的四分之一，在中央委员会大楼里，平均每两人就可以拿到每一场的球票，而其余八百万莫斯科人得票的机会还不到千分之一。

这位外交官说："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觉得不对，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也没有发牢骚。我只要给加拿大大使馆弄到二百张球票就行了。"苏联的高级运动俱乐部，尤其是军队的俱乐部，以及其他有权势的人都可以优先得到票子。等到这一部分票子私分完毕，就没有什么票留给那些普通冰球迷了，也许最多还剩几十张票子在售票处象征性地卖一下。每当外国较大的文艺节目在莫斯科演出，或者即使象莫伊谢耶夫舞蹈团或大剧院的主要芭蕾舞演员们从国外归来演出这

类精采的节目，都会出现上述那种私分票子的事。一位很少有机会看到这类演出的中年妇女说："在这种情况下，票子不是出售的，而是分配的。"

对显贵中某些人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有权享有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人不得享有的东西。例如，厄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内是苏联创新派的雕刻家和画家，一度受过批评，以后被赫鲁晓夫看中了；他因替有名望的人刻墓碑而发了财，但又经常同苏联当局发生冲突，因为他热衷于创作的艺术品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说太难理解、太抽象和太悲观了。普通的俄国人从来没有机会看到他的作品，但是我确实从朋友那里知道，勃列日涅夫的一位私人助手叶夫根尼·萨莫泰金在自己的公寓里藏有涅伊兹维斯特内现代派的雕刻品。一位到过苏联外贸部的几个高级官员家里的美国人说，他不仅看见涅伊兹维内和苏联其他现代派艺术家创作的非正统派作品，而且显然还有从西方旅行时带回来的抽象派艺术品。更令人惊讶的是，我知道有些著名的苏联作家在自己的书架上公开摆着索尔仁尼琴的禁书和其他走私进来的书籍，这是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曾为此而坐班房的犯法行为。但是，这些作家的特权地位保证他们安然无恙。

显贵们和普通的俄国人在生活方式上最引人注目的不平等待遇，莫过于特权阶级能够得到西方的东西：

看西方的杂志、书籍和电影，以及坐西方的汽车，到西方去旅行。据说，特权阶级可以看到审查官禁止普通苏联人看的西方电影，如《放大》、《轻松的骑手》、《午夜牛仔》、《邦尼和克莱德》、《皈依者》和《八部半》。这些禁片放映的秘密地点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各专业俱乐部或电影界的俱乐部——电影之家。能看到这些电影，成了知识分子非常珍视的一种权利。在最高一层，即苏联统治者的别墅里，备有家庭电影放映机，既放苏联电影，也放西方影片。苏联文化部有时秘密邀请前来苏联访问的外国剧团演一些内容非常庸俗和下流的节目，专供艺术界和文化部的官员观看，尽管文化部不准给一般公众演这些所谓腐朽不堪的资产阶级艺术。

我认识一位芭蕾舞迷，有一次他捞到机会去观看法国歌舞团的他认为是色情的秘密演出，他回家时眉开眼笑，因为尝到禁演的西方歌舞的滋味而兴高采烈。其他人也同样因为看了秘密电影而得意洋洋。一位茶褐色头发的女编辑对我说："领略了某种违禁的东西的风味，同时又意识到自己属于能够看到《八部半》这样的电影的特殊人物之列，此中乐趣，你简直无法想象。"这位女编辑出身于上层知识分子家庭，但其地位并不高，她因此不能随心所欲地经常接触西方的东西。"在罗马或纽约，你们西方人随便买票，看你们喜欢看的电影。可是在这里确实要有些门道儿才行呢！"很清楚，

对这位妇女和那位芭蕾舞迷来说，他们因有机会享受别人不能沾边的东西而产生的兴奋心情，就同观看电影时的快感一样大。

在物质方面，苏联权贵们从西方学来的最时髦的象征着地位的东西，就是西方昂贵的豪华小轿车。勃列日涅夫一边搞缓和，一边使西方小轿车在苏联时兴起来。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酷爱豪华的西方小轿车，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投其所好，送给他许多西方汽车(罗尔斯·罗伊斯银云牌、雪铁龙-马塞拉蒂牌、林肯牌、梅塞德斯牌和卡迪拉克牌等各种汽车)。然而，不大为人们知道的是，苏联其他要人也喜欢西方汽车。波德戈尔内主席坐一辆梅塞德斯-600；经济计划头子尼古拉·巴伊巴科夫有一辆雪佛兰羚羊牌；大剧院的主要女演员玛雅·普利谢茨卡娅喜欢一辆哈尔曼-吉亚1500牌，而男演员弗拉基米尔·瓦西利耶夫和马里斯·列帕分别有一辆雪铁龙牌和大众牌；前国际象棋冠军波里斯·斯巴斯基拥有一辆英国罗弗牌轿车；同克格勃保持联系的记者维克多·路易斯有一辆波歇牌、一辆罗弗牌越野车以及一辆梅塞德斯220牌，后者也是作曲家阿拉姆·哈恰图梁等人所喜爱的小轿车。拥有西方小轿车的人数逐年增长，因为离职回国的苏联记者和外交官以及出国演出的高薪演员都神魂颠倒地迷恋西方汽车。

他们这些人平生第一大目标都是想到西方去，以此满足自己的贪欲。“在苏联制度下，钱算不了什么，”一个工资很高但不能去西方的作家抱怨说。“有钱还得有地方花才行。中央委员的工资并不太高，可是他一切都免费。他可以送自己的孩子上最好的大学或学院念书，或者送他们到国外去。”他停了一下，又挖苦地说，“他们（领导人）现在都忙着把孩子往国外送，就象忙着送走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一样。”他象一个十岁的美国小孩在看棒球比赛时数着击中的球数那样，从记忆里挖出一个个的名字，因为他十分恼怒，他们都可以出国，而他却不能。例如，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里，在瑞典当了十年商务代表，到其他国家的旅行更不必提了；柯西金的女儿柳德米拉，经常陪他一起出国，还有他的女婿、贸易专家杰尔缅·格维夏尼；葛罗米柯的儿子阿纳托利是驻华盛顿大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在此之前则在伦敦任职；秘密警察头子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儿子伊戈尔·安德罗波夫，经常到西方去旅行，他曾在美国搜集材料写一篇有关美国工人运动的学位论文；第一副总理基里尔·马祖罗夫的儿子米哈伊尔·马祖罗夫，是个动物学家，在肯尼亚呆了两年，目前正在国外旅行；前乌克兰党魁彼得·谢列斯特的一个儿子是个海洋生物学家，在他父亲政治上得意期间，曾到美国佛罗里达州考察旅行。

很多人还有一些非正式的关系，这使公开的特权制度得到补充和加强。凭着这种关系，一位将军可以通过一位科学家把他的儿子送进大学，作为答谢，这位科学家又可以弄到一张缓役证；凭着这种关系，一个有名的反特电影剧本作者可以到保安机关为他的妻子和女儿搞到去西方国家旅行的许可证。“走后门”在俄国生活中是个最为经常、十分重要和渗透一切的因素。一个高级科学家告诉我：“我们这儿是种姓等级制度。军人子女跟军人子女结婚，科学家子女跟科学家子女结婚，党的干部、作家、演员子女的婚姻也是门当户对的。儿子盼着父亲或岳父通过走后门使自己飞黄腾达，父亲也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事。别人都这样做，我替儿子这样做，为什么不行呢？”

某些大专院校已被人们认为是党、政、军高级人物培养自己子女的领地，例如国立莫斯科大学的新闻系和法律系，因为这些系主要是属于“政治”领域的；又如外语学院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因为从这里可以通向到国外旅行以及去国外发迹。党和政府的某些最高领导人，就把自己的子女或孙子孙女送进这些学校，他们经常通过走后门使入学考试不及格的分数变为成绩优秀。

“要投考国际关系学院，得经过党团组织的有力的

推荐，”一个毕业生这样告诉我。他提到了二十个通过后门关系入学的党、政官员的子女。他自己出身于党的干部家庭，他说这些学生有一种优越感，喜欢搞小圈子。学院内“普通”学生很少，因为这所学院没有列入苏联高等院校报考手册，尽管它不是一所秘密学校。我有一个朋友说，他听说国际关系学院有个教师，是个党员，他由于不服从系主任关于给权贵的子女评最高分数的命令而被解职。一些俄国人中嘲笑权贵们的子女为“苏维埃的少爷小姐”。我的朋友说，那位教师在校任教时，有许多学生出身于高官显贵家庭，功课虽然极差，但在家庭关系的保护下，没有被开除出校。我的朋友回忆说，最吊儿郎当的学生要算苏联内务部长的儿子伊戈尔·谢洛科夫。人们都知道他在他父亲的别墅里酗酒和寻欢作乐；驾驶着父亲给他的梅塞德斯牌轿车上学；尽管他的表现恶劣，但他从不担心学校会给他打不及格的分数。我的那位年轻朋友用英语说，伊戈尔的许多门课都得了两分，按学校规定他应开除了，但相反，他在五年级时被派到苏联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临时工作，作为“实习”。他享受了非同一般的特权，尽管按他的成绩是根本没有资格去的。

一天，有几个年轻朋友出了一个有趣的点子，让我夹在他们中间混进国际关系学院，到那里去见识见识。这是苏联的一所对外不公开的学院，门口没有挂牌子，

有警卫站岗，不让闲人入内。入口处的一块牌子上写着"出示证件"。朋友们叮嘱我，走过警卫时要稳步沉着，果断地点头示意，好象和他们认识似的，这样就可以混进去。我发觉他们说得对。陪我来的朋友们指给我看了贴在墙上的课程表，带我到图书馆，参观了专门"收藏"的西方报纸和书籍。但使我失望的是，我感到这所有特殊地位的学院和苏联的普通院校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墙报栏里登着有关战备的一些文章，有些段落下面画着红线，以显示西方国家的防务开支。一间间教室就象二十年代建造的旧式学校的房子，普通的木头课桌和讲台表面被刻得疤疤瘢瘢、画得乱七八糟。我没有看到一件新式的直观教具，而这在美国的大学里是非常普通的。

不过，有个美国姑娘与几个东欧国家的朋友(这里也是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的乐园）参加了在这个学院里举行的一次舞会后说，国际关系学院的私下聚会确实弥漫着道地的西方气氛。她的朋友指给她看，一对对跳舞的人中有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孙子孙女，在伴奏的学生爵士乐队中，外长葛罗米柯的孙子正在弹吉他。这位美国姑娘说，"他弹得不错。那天晚上这个乐队演奏的舞曲没有一支是俄国的。全是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一类的西方货色，都是用英语唱的歌。"

有些机构，诸如新闻社(这里非常强调人员政治上

的可靠性，一些西方情报机构认为它是克格勃的一个分支单位）或“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已成了尽人皆知的政界权贵们安插自己子女的地方。通过走后门，其他人则在出版社或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获得轻松愉快的工作。俄国人自己评论说，上层社会的气氛愈来愈象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一个工程师对我说，马克思为资本主义社会所预言的情况——经济大权越来越被一小撮人所把持，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似乎正在今天的苏联发生。在许多方面，不论年龄大小，显贵们都显示出一种阶级感。一个有钱作家的妻子说，她的一个八岁的儿子，以前总不好意思带同学来家里玩，后来遇到一个有名的陆军将领的儿子，才把他带到家里来，“因为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生活得这么好，但他觉得这个将军的儿子是可以来的。”

苏联统治集团似乎有一条不成文法，即他们不得把自己的后代硬塞进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岗位，同时，在苏联现领导的孩子中表现出愿意或确有能力从事政治生涯的人确实寥寥无几。葛罗米柯的儿子阿纳托利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他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第三号人物。另一个例外是柯西金的女婿格维夏尼，他现在担任颇有权力的国家科技委员会的副主席。

这种对移交政治权力的限制，以及禁止继承公家别墅和其他公开的官方特权的做法，被一些苏联人

——其中包括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持不同政见者——引为证据，认为苏联社会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一个新的特权阶级。一个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的生物学家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同我争论说，“一个阶级应具有永久性和稳定性。在旧制度下，贵族感到自己地位很牢靠。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个人的地位不是很牢靠的。失掉地位，就失掉了一切。现在不能把自己的地位和特权传给自己的子女。这些地位和特权，不是永恒不变或与生俱来的权利。”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别是如果考虑到沙皇时代的贵族继承了贵族称号、庄园，以及说明官方地位的一切标志。但是有权势的显贵们让自己的儿孙们上最有名望的大学，利用权势让他们在最好的机构获得工作和职业，他们用这种方法为他们的下两代提供了长期的地位。而且在科学界和文化界，高官厚禄的父亲们除了给他们的子孙后代带来了发迹的机会和地位外，确实把诸如别墅、公寓、汽车、金钱等私人财富和财产都传给了他们。

也谈不上什么不稳定和不牢靠。苏联权贵们的一个突出特征恰恰就是他们稳定地和长期地把持着职位。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行政人员的更迭极其缓慢。现在没有斯大林的清洗，也没有赫鲁晓夫的突然改革，这样使得党和国家的最高官僚机构

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牢固。美国的内阁官员和企业经理的更换，比起苏联的部长和工厂经理的更换，不知要快多少倍，有些当权人物一干就是十年、二十年，不仅他自己的地位，而且他的家属在今后的社会地位，也都得到了巩固。某工业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向我的一位朋友抱怨说：七十年代苏联经济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一个企业经理以上的干部被降级。”他主张，为了提高效率，要经常变动。但他并不代表这个新阶级。

米洛万·德热拉斯提出的，共产主义已经产生了一个“新阶级”的论点，指的不是个别官员，而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存在的整个政治经济官僚机构，它独揽大权，独享特权，而且团结一致，因为个人的特权有赖于集体的生存。一些俄国人和西方学者认为，苏联的大官们确实不是铁板一块，这无疑是正确的。在苏联的权贵中，也有守旧派和革新派，一方面是惯于采取强硬路线的警察和保安人员，严厉的理论家；另一方面是工业界和科学界中强调效率第一的专家治国论者。文化界的上层也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时代，为了避开分歧，保持统一，只要摩擦公开化起来，领导上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保守的折衷办法。因此，尽管有种种摩擦，苏联的权贵们仍然忠于党、忠于给他们带来权力和特权的“名册”制度，他们

仍然是抱成一团的。

有些西方社会学家硬说，苏联最富的权贵和最贫穷的俄国人之间的差距，比起美国贫富之间的差距要小得多。如果纯粹从金钱的角度来看，情况确实如此；但是苏联权贵们在特殊商店里买到大打折扣的便宜货，免费使用公家汽车、别墅和其他公家设施，这些无形的收入是很难加以精确统计的。无论如何，金钱不足以衡量贫富的标准，因为苏联权贵们享受的利益是通过那些用金钱买不到的权势、社会关系和门道而取得的。

苏联政府的高级官员、各外贸公司的经理、有名望的作家和高级记者经常到国外去旅行，拥有丰厚的收入，穿着进口的服装，住在舒适的环境里，而政界的要人还有别墅、佣人，享受克里姆林宫厨师准备的佳肴美味，到特殊商店购货，叫人把精美的食品免费送到家里；在我看来，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是俄国的钢铁工人或集体农庄的女挤奶员无法理解的。这跟美国的情况一样，经常作环球游览的美国富翁这一个星期到瑞士去滑雪，下一个星期在加勒比海泛舟，他们通过巧妙的投资和注销帐面税值的舞弊办法捞到巨款；这种生活方式同美国底特律汽车工人或加利福尼亚农场的移民工人的生活也是大相径庭的。

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苏联特权阶级的高级生活方式和拥有的无形的财富，实际上尚未形成一个引起

社会注意的严重问题。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例如安德烈·萨哈罗夫和罗伊·麦德维杰夫都谴责特权制度，但是，即使这些人也认为这个问题跟其他许多问题比起来还是次要的。在普通俄国人中，对于政界权贵和科学文化界名人所过的特权生活略有所知，但对这种生活达到什么程度则不太清楚，因为特权人物习惯于小心谨慎，而不是大事声张地挥霍，另一方面也由于对特权阶级的私生活根本没有公开报道。苏联的新阶级尽管有着一切优越条件，但还是相当缺乏教养，他们象普希金在《叶夫根尼·奥涅金》中所刻画的沙皇时代的贵族那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个新阶级还没有象革命前俄国某些省吃俭用的豪商巨贾那样聚敛起巨额的财富。

此外，对俄国人来说，公开谈论是要冒风险的；绝大多数对这种制度不满的人都是在私下发牢骚。一天夜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路过一家专为权贵们服务的乳品店时，忍不住对我的妻子安抱怨说："我们恨这些特权。在战争年代里，当他们确实是我们的领导人时，这还可以。可是现在不行了。"斯维特拉娜·阿里露耶娃曾描述过住在茹科夫卡别墅内的权贵家的青年与当地的农村少年发生争吵以至殴斗，使人嗅到一股阶级对立的气味。我在塔什干曾亲眼看到，一群疲乏不堪的人们排着长队等出租汽车，一个高级军官走来站到最

前面，抢先坐上第一辆空车；候车的人群叽叽咕咕地发牢骚，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挺身而出讲几句反对的话或用行动制止他。有个曾给高级军官的公寓安装空气调节器以及厨房装置的技工，对他的朋友愤恨地说："看看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吧！我们奋战搞十月革命究竟为了什么啊？"

以下是我遇到过的最突出的一次抗议的事例：在重要的政治局委员兼农业部长波利扬斯基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一位非常著名的诗人的夫人公开发泄了她的不满。宴会上，大家开怀畅饮，在酒酣耳热之际，诗人的妻子带着三分醉意上盥洗室去了。不一会儿，客人们听到了大声的吵闹。原来诗人的妻子正在摔波利扬斯基夫人的法国香水——"朗万"、"斯奇帕雷莉"、"沃思"——而且边摔边骂："真是伪善透顶！还说什么这是一个工人国家，人人平等，睁眼瞧瞧这些法国香水吧！"

然而，更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位物理学家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的绝望情绪。他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在莫斯科市中心一家珠宝商店的橱窗里，几年来一直陈列着一只珍贵的、用纯琥珀雕刻成的猴子，人们都知道这是不出售的。一天，这位物理学家发觉这只猴子不见了。他就跟几个朋友走进店里去问问到底怎么一回事。

"我们卖掉了，"一位售货员冷冰冰地回答说。

“不过据我们知道，这个玩意儿是不出售的，”其中有人反驳道。

这个女售货员耸耸肩表示无法回答。

“谁买的？”有人又问了。

“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利娅，”女售货员回答，她急于把谈话打断。

“还算好，她没有到爱尔米塔日[①]去买东西！”人群中有人这样说，他们只好垂头丧气、无可奈何地离开。

是的，一般苏联人对高官显贵们享受种种特权的反应只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而已。俄国人说，俄国自古以来就有一部分人享受特权，大家都听天由命。一个在苏联呆了十个月的美国展览会的年轻讲解员，在同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接触和交谈后得出的结论是：人人设法为自己捞一点。他说：“人们不想改变这一部分制度，而只是想沾它的光。他们不说苏联的制度不好，而是想自己也得到一点。”

---

① 在列宁格勒，原为沙皇宫殿，现已辟为国家博物馆，陈列各种珍贵的名画。——译者

二 消 费 者

排 队 的 艺 术

我们的目标是使苏联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更美和更幸福。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71 年

生活并不象走过田野那么简单。

俄国谚语

我到达朋友家已经是傍晚了。他出去了。但他的母亲在家。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瘦削的老太太，早期信仰过共产主义，以后在斯大林主义的集中营和流放中度过了十八个年头，她开始考虑俄国一代一代人的变化以及新出现的物质第一主义的思想情绪。

"中年人，三、四十岁甚至再大些的人，都是我所说的'饥饿儿童的一代'，"她安祥地说着，深褐色的眼睛注视着我。"他们在儿童和青年时代都受够了艰苦的生活。他们今天的态度就是'给我们吃的、住的，给我们工作，政治上随你们的便吧！给我们最低限度的物质

生活。我们并不要求更多的东西。'”

她继续说下去：这些苏联人都相当于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儿童”。她在分析到这些苏联人开始提出物质要求的动机时，冬天的夕阳慢慢消逝。昏暗的暮色并没有影响她，她连灯也不开，继续讲下去。“我认识一家人家，父亲是个穷工人，一点也没有什么技术，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母亲也是个普通妇女。他们生了十一个孩子。父亲在工厂里劳动，一家人都住在宿舍里，简直象是一种营房。大家挤在一间很大很大的房间里。房间里用一块帘子隔开，床就都安放在后面。他们通常都是轮流睡觉。战争期间如此，战争结束后也是如此。那的确是非常艰苦的时期。母亲刚生下最后一个孩子就去世了。

“现在么，孩子们都长大了，结了婚，而且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家庭，但是，比起他们的父母来，生活好多了。大家现在都有自己的住房，虽然很小，每套只有一间或二间。但是有各种设备，象电炉，可能还有电气冰箱。有一家还有一辆汽车。原先的十一个孩子现在变成四十到四十五人了，包括孙子孙女在内。工会发给他们优待券，可以在夏季去休假。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工厂里工作，一个在食品企业，一个在发电厂，一个在利哈乔夫汽车厂，别的人在其他工厂。

“他们都知道，今天的生活比起战时的饥饿岁月以及战后的生活不知要好多少。他们简直无法想象还有比目前更好的生活。他们觉得一切都有了，而且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他们自己辛勤劳动的结果。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自然也不如十月革命后初期的人们那样对政治发生兴趣。我记得，当时我们是饥寒交迫，但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大家都愿意忍受一切。可是，经过十五到二十年以后，我们发觉社会主义并不是十全十美的。1937 年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太可怕了。可是，今天的人们都不太多地想这些问题了。他们只考虑怎样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些。”

经过斯大林阴暗年代和战争年代的这位老太太，双手赞成新出现的物质第一主义。但是其他老布尔什维克表示痛惜和反对这种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报纸上有时也用一种警告的语气提醒说，艰苦俭朴的社会主义理想正受到追求财富思想的腐蚀。中央计划工作人员的权威刊物《计划经济》在 1975 年初曾悲叹道，“片面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尤其是在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教育情况下，就会有传播诸如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贪得无厌等社会‘疾病’的危险。”

但是，这是一种维护旧制度的努力。因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亲自为七十年代定了调子。1970 年 12 月波兰发生消费者暴乱之后，他提出了一项有利于

消费者的五年计划，保证“有充分的消费品供应市场”。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并没有出现消费品特别充裕的情况，但是，对于长期遭受忽视的苏联消费者来说，生活水平确实在各方面都有相当的提高，使他们觉得自己正享受着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最美好的生活。

我在莫斯科最初得到的印象之一是：人们的穿着比我过去想象的要好。但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引起我注意的特别时髦和雅致的服装。我们到莫斯科时是秋天，人们衣着的颜色都是暗黑色的，简直就象丧服。但是，我在人行道上看到了穿布衣服的无产者那种令人尊敬的庄严形象。尽管莫斯科人不炫耀他们最时髦的服装，他们还是有一种注重外表的小资产阶级本性。他们不象许多西方城市居民那样装模作样地故意穿着邋邋遢遢的衣服或者撕破的褪色粗斜纹布裤。妇女的衣服都很朴素；男人的服装简单而耐穿，尽管都没有熨过。我在公园里看到女学生穿着超短裙，脚上穿着塑料的长统靴，一般都是奇异的粉红色或鲜艳夺目的紫色。当时我并不十分清楚莫斯科人的生活比外地人到底好多少（俄国人对此有这样一种说法：“莫斯科是全国的坡地”，意思是说全国最好的东西都汇集到莫斯科来）。可是，在我以后到过的几乎所有地方都可以明显看到，尽管美国资产阶级的物质第一主义或许受到官方的谴责，而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却成了越来越多的俄

国人、尤其是城市里的俄国人所向往的目标。人们希望有自己的公寓、更时新的衣服、更时髦的音乐、一架电视机以及其他生活用品，而对于那些运气很不错的人来说，还希望有一辆自备小汽车。

我们呆在苏联的三年中，看到人们的生活缓慢地有所改善。市场上逐渐出现了自动售货商店和预先包装好的食品。有些人觉得已经富裕得可以去装假发，养些喜爱的小动物，甚至可以上美容院整容了。科学家们宣布，由于战后年代饮食大大改善，苏联儿童长得比他们父母高了二、三吋。十年前在意识形态上说来属于禁忌品的沙皇时代的古董和十月革命前的饰物，今天在拍卖行里却成为将军们和御用作家的夫人竞相出高价抢购的东西了。有些专栏作家就下述情况大发牢骚：雕花玻璃的枝形灯架有时要卖到一千卢布（一千三百三十三美元），女式戒指二千卢布，黑貂皮大衣四千卢布。《文学报》的读者来信讨论女青年找对象的道德标准时承认，她们是根据对方的收入和生活条件来选择自己未婚夫的。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和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曾作诗讽刺这种新出现的物质第一主义，可是有一个专栏作家却在一家青年报纸上大胆地宣称，优秀工人应该比懒汉多拿十倍的工资，年轻人为出色的辛勤的劳动而要求多拿些钱，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在苏联的几年中，最能引起苏联人资产阶级欲望大发作的，莫过于那种为时已晚的对私人小汽车的狂热了。苏联领导集团为了给权贵和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工程师、专家出身的官僚和中级经济管理人员——提供物质刺激，在1965年到1975年间投资了一百五十亿美元来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其中一大部分用来建造载重汽车，最后生产出来的汽车有相当一部分被指定削价出口）。一度被赫鲁晓夫嘲笑为“气味难闻、带轮子的扶手椅子”的汽车，终于在苏联社会上吃香起来了。

西方世界可能正在努力摆脱由于早先使用内燃机而引起的空气污染、交通拥挤和燃料缺乏等问题，可是，七十年代初的俄国却对汽车的兴趣方兴未艾。一个西方国家的大使告诉我说，有一天，他的夫人坐着进口的林肯大陆牌小汽车在路上遇到红灯停下来时，一个皮肤黝黑的过路人(一看就知道他是格鲁吉亚人)示意叫她摇下车窗，然后出价三万卢布(合四万美元)要买她那辆汽车。有一次，我在亚美尼亚旅行，一个工厂厂长骄傲地指着停在这座有五千五百工人的工厂门口停车场上的二、三十辆汽车，向我吹嘘说，“这些都是我们工人的自备汽车。”我认识的一位工程师，因为有了自己的车子而觉得彻底得到了解放（直到这辆车子抛锚为止）并且欣喜若狂地谈到乘车畅游的乐趣（这就

是说可以不受有组织的游览人群、公共汽车游览路线和固定的假日旅游计划的限制)。在盛夏和初秋的季节，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和田野上，到处都有躲避大城市喧嚣的一辆一辆方形的日古利牌小汽车(即苏联造的菲亚特牌)。

我在莫斯科的三年期间，苏联私人汽车的数量从一百八十万增加到三百万辆(美国将近一亿辆)。但是，私人小汽车还是每月挣一百八十七美元的一般工人所无法问津的。苏联汽车工业生产的小汽车型号五花八门，从扎波罗热人-968型，一种欧洲式的微型汽车，内装四十三匹马力发动机，售价三千五百卢布(合四千六百六十五美元)，直到伏尔加M-124型，一种五个座位的轿车，外形象美国中型顺风牌，但要卖九千一百五十卢布(合一万二千二百美元)。受欢迎的日古利小汽车大约一万美元左右。汽车不能赊购，要付现款。苏联朋友告诉我说，买汽车的人如果没有机会列入特权阶级的特别登记单上，就得等上一年至五年。我认得一个记者，他为了买一辆伏尔加牌已经等了六年，他预料说，"我还得再等上五年才能买到。"实际上，他通过一些关系只花了几个月时间就弄到一辆。那些不得不按正规轮流次序、在全市性公开的登记单上登记的顾客即使轮到自己买车时，也几乎没有机会可以挑选颜色或质量特别好的车子。但是，看来人们对此并不

介意。只要能买到东西，俄国人就会眉开眼笑。

苏联的汽车时代还具有使外国人难以理解的其他特色。交通规则大都是不准左转弯的。按照苏联的制度，你要到某一条路去，先得穿过这条路，开到法定大转弯地方，转一个U字形大转弯后再绕回来。可是往往那个法定的U字形大转弯的地方很少，而且离得远。汽车加油站是按照自己动手的办法行事的，没有十几岁的少年抢着来帮你检查一下加油情况，或者擦一擦挡风玻璃。城市间公路上的加油站都挂着写有数国文字的告示牌子，使任何一个要求服务的顾客望而生畏。一块（用英语写的）牌子叫我看得楞住了："揩前窗玻璃——十五戈比；揩边窗玻璃——二十一戈比；揩后窗玻璃、转弯指示灯和停车信号灯——十五戈比；轮胎充气和漏气检查（每只）——十五戈比。"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俄国人规定夜间驾车只准开停车灯，即使在城市间的公路上也是如此（按西方标准，没有一条够得上真正的"公路"）。这就使得在天黑以后驾车成了一种使人伤脑筋的事。我曾经差一点撞上灯光很暗的大货车以及走在马路旁边几乎无法看清的穿着黑色棉衣的农民。因此，苏联的车祸率非常高，大大超过美国，就不足为奇了。我听到非官方但是可靠的数字：1974年死于交通事故的大约有四万五千人，几乎同美国的四万六千二百人一样多，可是如果把这个数字同两国所

拥有的汽车总数比较一下，那么，苏联的车祸死亡率大约要高出美国十倍。

最后，车主最头痛的还有修理问题。在苏联，汽车从工厂装配线上开出来之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足够的汽车修理服务中心。我回国时，莫斯科有十六家修理站，其中三家规模确实很大，而其余则很简陋，它们要维修的却有二十五万辆私人汽车。1972年曾提出一个为日古利牌汽车建立全国性修理服务系统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是，据报纸报道，到一九七四年中期，在计划新建的三十三家修理服务站中，只开设了不到三分之一，其余远远没有完成建造计划。这些修理站即使开张了，零件又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因为苏联的汽车工业对生产新汽车比生产零件兴趣更大，零件在五年计划的图表上没有占重要的地位。我认得一位车主，他因为换不到后窗，把一辆伏尔加牌的小轿车丢在一边好几个月。另一个当工程师的朋友，有一天傍晚，约我们坐车去郊游，但是，他不得不在最后一分钟表示遗憾，因为他的汽车抛锚了。两个月后我问起他修车的事情，结果汽车还在修理没有拿回来。零件缺货的情况又引起了零件经常被窃，甚至连一些象反光镜和刮水器这种小零件也象许多大零件那样缺货。作为一种防护措施，苏联的驾驶汽车的人，每次停下车子或者天气晴朗时，总是把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卸下来，藏在汽

车仪表板下的小贮藏柜里。

我在莫斯科看到的最滑稽的景象之一，就是在交通繁忙时突然遇到一阵暴雨的场面。这时驾车的人急急忙忙把车开到路旁停下来，然后象从前查利·卓别林电影里的人物那样，从车子的这一边跑到另一边，有的穿着上衣，有的穿着衬衫，弯着腰小心翼翼地爬在车前发动机的罩盖上，一面旋紧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一面又因怕淋着雨点而显得畏畏缩缩。我曾多次在路旁和这伙驾车人一起参加过这种狂乱快步舞表演。

迄今为止，苏联社会只有一小部分人进入了汽车时代，但是，苏联经济也吃力地为那些收入较少的苏联人提供了其他一些福利。到1974年初，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备有电视机，将近百分之六十的家庭有缝纫机和洗衣机，大约半数家庭有冰箱。[1] 蓝领工人的工资也在稳步增加，1975年平均年工资为一千七百二十八卢布(二千二百四十四美元)。储蓄额上升到超过八百亿卢布(九百二十亿美元)，存款利息为二厘。美国经济学家格特鲁德·施罗德在指出苏联自战后初期以来的巨大变化时说，从1950至1970年，苏联按人口平均的粮食消费量翻了一番，个人收入增加三倍，每周

① 引自佩列维坚采夫的一篇文章，载于1974年4月24日《文学报》。

的工作日缩短了，福利增加了，纺织品等非耐用品的消费量增加二倍，家具汽车等耐用品的购买力上升十一倍。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成就是显著的，那么不足之处也是惊人的。外国人在估计苏联的生活水平时，总觉得很难选定用以衡量这种水平的尺度。根据苏联过去的情况看来，它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但是根据工业化的欧美国家的情况看来，它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正如格特鲁德·施罗德所说的，“虽然取得了给人印象深刻的成绩，苏联人民1970年的生活水平只能抵上美国的三分之一，相当于英国、法国或西德的一半左右，可能比意大利或日本还要低一点，大大低于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东欧共产党国家。”[①] 这个差距可能会在七十年代中期有所缩小，但也不过是略为缩小一点而已。不仅是生活在俄国人中的西方人有这样的反应。一位在俄国工作过几年的东德科学家也对我吐露，他“对普通俄国人的生活如此贫困感到震惊”。其他一些东欧国家的人也有类似的反应。

---

① 格特鲁德·施罗德指出的这个材料见《苏联经济增长和消费者的福利：回顾和展望》一文（载农业部公报《同苏联进行农业贸易的前景》，1974年4月号），后来北约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苏联生活的经济方面》（1975年1月发表，附有1973年的数字），重新肯定了上述材料。

尽管勃列日涅夫曾许诺要执行一个以消费品生产为重点的五年计划，但是，全国经济计划最高负责人、副总理尼古拉·巴伊巴科夫在1974年结束前承认，这个许诺和大肆宣扬的消费品生产指标在1971—1974年期间"已证明没有完成"，而苏联领导集团在1975年又公开准备把重工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了。

名声很大的卡马河汽车厂建设工地的头头，那个脸色红润、经验丰富的维克多·佩尔斯捷夫把一张实际上一直在兴建的最优先施工项目的图表拿给我看。他解释说，在每四个卢布的投资中，有三个卢布用于工厂建设，只有一个卢布用于建设一个将拥有十六万人口的新城市，而城市里的一切设施都要从零开始，包括全部居民的住房、商店、服务性行业、娱乐场所等。佩尔斯捷夫说，为了加速汽车厂的建设和同旷工现象作斗争，他们已下令禁止工人饮伏特加酒，这是俄国工人消愁解闷之物，也是雇主烦恼的泉源。五万名建筑工人散布在莫斯科以东六百五十哩无处避风的平原中间，住在拥挤的宿舍里，娱乐设施廖廖无几。我问佩尔斯捷夫，这个城市有没有啤酒厂。我觉得，这样一支建筑工人大军，既没有伏特加酒也没有啤酒，真是难以想象。

他说，"没有，没有啤酒厂。五年以后你来吧！那时我们一定会有啤酒厂。这已经列入了计划。"接着他

吃吃地笑着说，“不过请不要在五年以前就来找啤酒厂。因为我们必须先造汽车厂。”

苏联官方就经济先后缓急次序所作出的抉择，对俄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首先提出的要求是提供统计数字来比较一下苏联和西方的生活水平，他们常常对房租的惊人低廉而吃饭穿衣要花那么许多钱产生深刻印象。我记得有一次在飞往塔什干途中同一位妇女的谈话。她镶有九颗金牙，同丈夫一起在纺织厂工作。她说，他们俩一个月总共挣得二百一十卢布（二百八十美元）。一家三口（他们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吃饭就要花去三分之二的收入，而两间一套的住房只要十二卢布（十六美元）。余下的五十六卢布（七十五美元）就用在衣着、交通、娱乐、香烟以及交一些微不足道的税上。

但是，这些数字并不能反映苏联消费者生活的真相，也不能反映俄国人每天为购物备受折磨和美国人那种舒适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别。我的俄国朋友们听说美国郊区的家庭妇女每周两次乘上面包车赶到超级市场或市中心的商业区去买食品，都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总是每天都要上商店去买食品，常常要走很多路，而且还得跑好几家商店，一家买面包，另一家买奶制品，再一家买肉，等等。有些人愿意到市中心的商业区去买食品，因为那里的几个超级市场供应的商品

比较丰富，然后还得费力地拖着大包小包坐公共汽车或地铁回家。其他一些人之所以不得不到市中心商业区去买东西，是因为许多新住宅区虽然已经分配给居民住了两、三年，却还没有供应生活必需品的商店，住房建设和商业布局配合得很差。我在报纸上看到很多人发牢骚说，为了修一双鞋或者其他一些必要的小修小补竟要走一哩路。

买东西总是象大规模的摸彩一样。我到莫斯科之前，曾经听说过消费品匮乏的情况，但是刚到之后我觉得商店里备货还是相当充足。只是在我们以住户身分开始认真地上街买东西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俄国消费者的苦境。首先，我们需要为自已的孩子买教科书（他们在俄国的学校上学），但是我们发现六年级的教科书已经售完了。没有多久，我们又想给十一岁的女儿劳丽买双芭蕾舞鞋，结果发现在这个芭蕾舞名演员辈出的国度里，在莫斯科竟然找不到八号的芭蕾舞鞋。国营百货公司是一家坐落在红场上的遐迩闻名的大商场，有一个喷泉和乱哄哄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室内商场那种奇形怪状的气氛。我想在那里为自已买双鞋子。可是，我穿的尺码的鞋子一双也没有，只有凉鞋和单薄的轻便鞋。售货员看了我一眼，建议我不要买。他说，“这种鞋子不耐穿。”安出去买搪瓷器皿（俄国人劝她不要买锌铝合金的器皿，因为它会使食品沾上

一股味道；不锈钢、铜制品或特氟隆的制品都没有）。她走遍了莫斯科四家最大的百货商店以及几处小店，都没有买到。换句话说，当初使我印象十分深刻的备货充足的商品，大都是挂在衣架上的粗制滥造或式样过时的各种服装，或者是俄国家庭妇女不要买的、放在架子上的茶壶、锅子以及其他冷门货。

苏联经济尽管经过各种修修补补的改革，但仍然是按照上面的计划来经营管理，而不是为了满足下面的消费者的需要，因此造成了商品品种不齐，花色单调。商品是为了完成计划，而不是为了出售而生产的。这种荒唐的现象有时使人感到迷惑不解。列宁格勒可能有堆积如山的越野滑雪鞋，却几个月买不到洗餐具用的肥皂。在亚美尼亚首府埃里温，我看到手风琴供应充足，但是，当地老百姓却抱怨说有好几个星期买不到普通的汤匙以及俄国式茶炊。我认识一家莫斯科的人家，他们花了整整一个月工夫拚命到处寻找，要买一只小孩用的尿盆，而无线电收音机却在市场上存货过剩。在罗斯托夫六月里最热的一天正午，气温高达华氏九十四、五度，可是，冷饮摊却在下午两点钟就全都收摊了，一位导游者告诉我说，这是因为整个地区的冰淇淋都脱销了，而且每天都是如此。一位来访的美国记者想买几颗打火机上用的电石，吸烟的俄国人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因为电石在莫斯科已缺货两个月了。

缺货的商品确实是数不胜数。虽然不是永久性的缺货，但是，谁也没法预料什么时候有货，诸如牙膏、毛巾、斧头、锁、吸尘器、陶瓷餐具、壁炉柴架、地毯以及从烘烤面包器或照相机到汽车等的零配件、时新服装以及美观大方的鞋子，只消提一提苏联报纸上列举的一小部分就够了。我在苏联各州旅行时，还看到了象肉类这种基本食物匮乏的情况。在下瓦托夫斯克和布拉茨克这样的城市，到了冬天，食品商店里的肉品部干脆关门大吉，已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了。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的家在加里宁市附近，这个城市有三十八万人，位于莫斯科西北一百五十哩。他告诉我，他每次回家探望父母，总要带一些肉回去，因为在加里宁市除了熏红肠和香肠外，什么东西都买不到。

产品的质量是俄国消费者另一个头痛的问题。苏联消费品质量的低劣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必在这里细述了。俄国人自己对许多商品都嗤之以鼻，这些商品好象是从模子里压出来的，是工业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劣质产品的缩影；或者干脆就是不能用的或一碰即破的废品。尤其差劲的是商品色彩单调，外形难看，式样陈旧，毫无吸引力。不知道什么原因，鞋子的质量特别令人感到头痛。1973年底《文学报》曾报道说，全国生产的每八双鞋子中有一双被检验员鉴定为不合格，不得不报废处理。至于谈到家庭用品，美国的家庭

妇女平时在报刊上读过一些报道，因而对苏联的商品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的话，一看事实，准会大吃一惊。一位乌克兰的调查人员甚至也在1972年说，苏联的洗衣机有百分之八十五是废品(没有干燥装置，不能自动控制，每次都要用手扳动，一次只能洗三、四磅衣服)。他还说苏联的冰箱也远远落后于外国产品(容积只有外国的三分之一左右，几乎都没有制冰槽)。我所得到的明显证据，就是看到苏联许多家庭在冷天为了保持食品不变质，依然是把食品放在网兜里挂在窗外。

但是，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苏联在七十年代出现的新的革命性现象，却是俄国的消费者越来越成为疲于奔命的顾客。乡下人也许还是实际上碰到什么就买什么，可是，城里人却比较挑剔和讲究式样。他们口袋里也许比过去任何时候有更多的现钱，但又不轻易花掉。然而，由于消费品的供应就象天气那样无法预先知道(而且几乎没有为顾客服务的广告系统)，俄国人为了对付这种情况已经创造出一整套的窍门了。他们知道有些苏联工厂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的工厂出产一些好东西，如稍为入时的女式服装、鲜艳的男衬衫、优质的睡袋、收音机以及小型马达等，只要这些商品一出现，立刻就被抢购一空。所以他们不断地在商店门前徘徊，希望商店就在此时此刻——正如

俄国俗话所说的——“抛出点好东西来”。正是为了碰运气，妇女们都提着网线袋，在俄语中“网线袋”就有“碰巧”和“碰运气”的意思。[①] 也就是说，随身带个网线袋，可能会偶然买到点意外的东西，因为商店里并不供应纸袋。男人们也是一样，不论到哪里几乎每人都拎一个公事皮包。我回想起当初看到那些老是拎着公事皮包的俄国男人，总觉得他们有一副勤勉、认真的样子。后来，有一天，我同一位颇有名气的科学家在公园里谈话，突然他把手伸进自己的公事包里。我还以为他要从包里拿出什么文件来说明他所谈的问题。但是，当我的目光随着他的手伸进包里时，我突然看见一块用报纸马马虎虎包着的血淋淋的鲜肉。这位科学家住在莫斯科郊外，买了点肉想带回家去，这会儿正在用手摸摸那块肉是否血水渗出来了。久而久之，我发觉公事皮包里装的东西，多数是橘子、牙膏或鞋子等东西，而不是书籍和文件。

买东西的另一有备无患的措施，就是身边随时携带大量现金，因为苏联的制度是没有什么赊购卡、赊账、开支票或简易贷款的。分期付款只适用于牌子不受欢迎的收音机和电视机，这些都是存货堆积如山、卖不出去的东西。因此，有一位胖胖的金发妇女告诉我说，为

---

① 俄语中 АВОСЬКА 意为网线袋，АВОСЬ 意为碰巧，碰运气。——译者

了不失去买到稀罕商品的良机,"你身边得带许多现钱。如果你突然发现店里正在出售七十卢布一双的优质高统靴,你就得马上去排队。你来不及回家去拿钱。如果等你拿了钱回来,靴子早已卖光了。"

这种情况使俄国人养成了一种动人的品质,那就是有点象美国西部的拓荒者那样,随时准备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帮助朋友和同事们购买价钱大的物品。奇怪的是,俄国人的钱比大部分美国人的钱少,但在接济朋友方面却生来比美国人慷慨大方。人们对于借贷二十五、五十或一百卢布(到下月发工资时归还)都觉得满不在乎,不管他们是否有多余的钱,或者甚至有时没有多余的钱,都是如此。对大多数俄国人来说,钱是不大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否有花这些钱的好机会。

在俄国消费者生活中的另一条重要规则就是替别人买东西。例如刚巧碰上一些稀罕的东西,如菠萝、波兰的胸罩、东德的壁灯或南斯拉夫的牙膏等,如果不多买几份给你正在上班的最要好的朋友、给你的母亲、姊妹、女儿、丈夫、表兄弟或其他亲戚和邻居,那就好象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发现人们因此都记住自己最亲近的一帮亲戚朋友的鞋子、胸罩、裤子和衣服的尺寸、腰围和身长,他们喜欢什么颜色以及其他种种重要细节,以便他们碰巧在商店里遇到这种商品发售之际,随时可以购买。这时,他们就把

身边的钱全部花光。

莫斯科的一个中年妇女还告诉我说机关职员们如何组织合伙买东西的互助团体（类似美国家庭妇女合资购买一辆汽车），然后每天轮流为大家购买食品。她又说，在她们办公室的这个小“集体”中，有人甚至在吃午饭时间去为大家买主食品，以免每一个人在下班以后还要到商店去你推我挤地排队受累。妇女们还经常在上班时间轮流溜出去，到市中心区的大商店去侦察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商品，如果发现东西很多需要大量购买，就赶快回来通风报信讨救兵。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小规模的倒卖投机活动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他看到一个妇女，网线袋里装着二十支一般人很爱用的南斯拉夫信号牌牙膏上了公共汽车。乘客们就立即七嘴八舌地问她是在什么地方买到的，有几个人就悄悄地提出愿意多出几个钱向她买几支。

购买进口货是防止吃亏上当的另一个办法，不论普通消费者或特权阶级都是如此。西方商品在苏联市场上虽然为数寥寥，哪怕是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商品也对势利的顾客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即使在苏联本国生产的商品供应还比较充裕时，俄国人也宁愿多出些钱购买进口货。在弗拉基米尔，一位年轻的导游者告诉我说，“我情愿出一倍的价钱买进口皮鞋，而不愿

意买苏联制的皮鞋。”他穿着一双从西班牙进口的皮鞋，花了三十五卢布（将近四十八美元），即比他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还要多一点。甚至售货员也首先推销外国货，其次才推销苏联货。

有一天晚上我去逛国营百货公司，想买一些苏联的梳洗用品，作为一种试验。可是，我在打手势指着一只用俄文写的“剃须膏”的盒子时，女售货员却劝我买另一种牌子。

“那是苏联货吗？”我问道。

“不是，”她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货色。比我们的强。”

然后我请教她买什么样的牙膏，她推荐保加利亚的“美丽牌”。

“那么，苏联牙膏怎么样？”我问道，“有没有苏联牌的？”

“当然有罗！”她说，把我看成是一个相当怪的顾客。“可是这种保加利亚牙膏比较好。”

我还是要买一支苏联牌子的橘味牙膏。回家用了一次后，我才明白她为什么要推荐保加利亚牙膏了。苏制牙膏有一种没有跟牙膏的其他成分调匀的酸橘子味道。

“谁都要买进口货，”一位科学家说，“我记得我妻子有个朋友，她是一位有地位的妇女，是莫斯科电影制

片厂党的高级官员。她是负责‘编辑’电影剧本的一个部门的主任。”他越过自己的眼镜瞟了我一眼，弄清楚我是否听懂他的意思。“我记得——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她经常说，‘我才不在乎人家说料子质量不好，我就是要进口的服装。’连她这样一个人也如此！这对于她的政治信念或者对党的忠诚自然并不发生影响。可是她之所以需要舶来品，是因为她认为外国货好，这是使生活过得美好的先决条件。当年，人们总是称这些东西为舶来品。而现在他们往往认为舶来品比较高级。所以出现了一个新词儿‘洋行货’——来源于一家有商标的洋行。其实‘洋行货’和舶来品都是一回事。人们都要一种不是苏联出产的东西，一件衬衫、一条领带、一个手提包以及其他各种小玩意儿，不论什么都要外国制的。他们有了这些东西，就觉得高人一等了。”

那种要有点儿出众的、比别人更好的东西的强烈欲望，已给俄国人那种传统的习惯即排队带来了新的压力。全世界各地的顾客购物都要排队等候，但是，苏联的一字长蛇阵，自有其独特的规模，就象埃及的金字塔那样。它充分揭示了俄国人的困境和俄国人的精神状态。队伍的运转比人们一瞬间看到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旁观者看来，那支队伍就象一队队几乎一动不动的凡人，为了购买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命该经

历一种商业炼狱似的。但是，局外人所没有看到的是排队对俄国人所具有的无形吸引力、他们那种内在的动力，那种独具一格的规矩。

在最近的美国历史上，人们真正体验到不辞艰辛地熬夜买东西的滋味的就只有那么一次，那是在1973—1974年冬季发生汽油危机的时候。天还没亮，人们就在加油站前排队。当时在美国产生了一阵民族自怜感。但那是暂时的现象，而且只是为了一种商品而排队。请想一想买各种各样东西都要排队、时时刻刻都要排队的情况，你就可以了解到，苏联人买东西就象一年到头都在抢购圣诞节物品一样了。按照一般标准，苏联妇女每天要花两小时排队，一星期七天，她们每天所受的罪比美国家庭主妇每周在超级市场所受的一两次罪还多一倍。我从苏联报纸上看到，俄国人每年光在排队买东西上就花掉了三百亿个工时，这还不包括花在裁缝店、理发店、邮局、储蓄所、干洗店、各种空瓶回收站等候的几十亿个工时。但仅就三百亿个工时来说，就足以使一千五百万工人按每周四十个工时计算劳动一年了。

我就亲耳听说过有些人为了买四个菠萝排了九十分钟的队；为在公园里乘坐两分钟的空中转轮等了三小时；为买三棵卷心菜排了三个半小时，结果是在快要轮到他买时，卷心菜已卖光了；为了登记日后可以买到

的一张地毯站了十八小时；为了在购买汽车的单子上登上个名字，在冰天雪地的十二月排一整夜的队，实际交货还得等十八个月，即使这样也算是十分走运的了。队伍之长可以从几码到半个街区，乃至将近一哩；而且往往是以使人难熬的爬行速度前进。我们有些住在莫斯科西南区的朋友，曾看到一支四人一排的队伍，穿过一大片公寓区，整整持续了两天两夜，他们给这个场面拍下了照。他们估计排队登记买地毯的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人，因为这种机会在莫斯科的那个地区一年也只有一次。有些人在雪地上点起篝火来取暖，木头的噼噼啪啪声和不断谈话的喧闹声吵得我们的朋友通宵不能入睡。

尽管排队是这样辛苦受罪，但是，一个俄国妇女一看到有人在那里站队，她的本能的反应就是立即排了进去，甚至她还不知道到底在卖什么！排队心理有它自己的一种吸引力。俄国人一再告诉我说，谁只要看到前面有人急急忙忙地排进了队伍，他就自然而然地想到那里准在出售值得为之排队的东西。至于出售什么东西，那是无关紧要的。先排进了队伍，再打听卖什么。等你排到了前面，就会知道在卖些什么，也许在此之前人家会传话告诉你。一位女律师对我说，有一次她见到一支庞大的队伍，从莫斯科百货商店的前门排到后门，她问问队尾的人在出售些什么东西，“他们有的回答

说不知道，有的向我嚷嚷，叫我别打扰。我往前走了二、三十码，再问问排队的人，还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最后我就不再问了。”

儿童文学翻译工作者尼娜·沃罗涅尔说，有一天她碰巧到商店的家庭用具柜台买一只三十个卢布（四十美元）的普通手摇搅拌机，当时有个售货员拿进来一箱东德制的壁灯。“我告诉女售货员，‘我要买一只，请你给我开张付款单，我就上出纳员那里去付钱。’我去付钱时，大约已有五十个人排好了队伍。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晓得的，可能是一传十，十传百，这是我们这里一直熟悉的一种方法。当时几乎商店里所有的人都拥在那里。至于他们是否需要这种壁灯，那是无关紧要的。来到这里的人们不完全是买他们需要的东西，而是看到什么值得一买的东西就买。有些人可能把这些壁灯转卖给别人，有些人可能买去送朋友。但大部分人买了以后都搁着不用，反正灯总是需要的。优质的纺织品也总是需要的，毛皮外衣、皮帽子、优质的冬靴、颜色鲜艳的夏装、地毯、碟子、搪瓷食具、水壶、上等开襟羊毛衫、伞、大方的钱包、漂亮的写字台、打字机、式样美观的胸罩——不是那种蓝色、下垂、既松软又难看、没有衬垫也没有能调节松紧的纽扣、为大胸脯的农村姑娘设计的苏联胸罩；而是捷克或波兰的胸罩，颜色雪白，样子漂亮，还有玫瑰蓓蕾的花饰。这就是

人们迅速去排队的原因。也许有上面说的任何一种东西在出售呢。”

排队抢购的人就象池子里的鸭子竞相游去抢一片面包一样。有一次我在基辅市一家百货商店，走到女式手套柜台不远的地方，听到边上有人说“进口手套”这几个字，我差一点被蜂拥的人群猛烈推到柜台边。这时，有一对闯劲特别大的年轻人挤到前面，掠过另一个顾客的头顶仔细看了一下这种手套后，说声不是进口货，又从人群中挤出来走了。排在头上的几个人也慢慢溜走了。但是排在后面的人由于什么也不知道，还固守在那儿，后来，一个穿蓝衣服的售货员推着一车式样新颖的男式有衬垫的防风皮上衣从队伍后边的过道走来时，排着队的顾客就象落潮时的潮水似的，从手套柜台前泻过来，简直把这个可怜的售货员一下子冲到墙角里。她显然不准备就在那里出售外衣；只是在那些排在前面的人盘问她外衣价格、尺寸、在哪个柜台出售等等后，她才得以脱身，把她那车大衣推进了电梯。

而且苏联的队伍一旦形成，往往不象外表看来那么固定，流动性比较大。队伍中有漩涡和暗流在起作用。例如，在大多数商店里，顾客买一样东西不止是要排一次队，而是要站三次队，第一次是挑选要购买的东西、问清价钱和开单子，第二次到设在商店另一处的收款处付钱和拿收据，第三次交收据，领取购买的商品，

因而拖长了顾客所受的折磨。

有一次，星期六上午，我到乳品店里买东西，发现排队这玩意儿比上述过程既简单又更复杂。我进去是要买些干酪、黄油和大红肠。倒霉得很，这三件东西是在三个不同的部门出售的，每处都各有一个长蛇阵。总共得排九次队哪！我不禁暗自叹气。但是，不一会儿，我发现许多有经验的老主顾都跳过第一个阶段，直接到出纳员那里付钱开单子，因为他们知道大部分商品的价钱。我对商品价格琢磨一番后，也这样做了。然后我就拿着单子，排到取干酪的队伍里，首先闯过最长的队伍——大概有二十个人——这一难关。可是，我站在队里还不到一分钟，排在我前面的一个妇女就转过身来要我替她看住她的位子，她一个箭步窜到买黄油和牛奶的队里。领干酪的队伍进展很慢，等她买到黄油和牛奶回来时，我们只前进了三呎。我也决心要冒一冒险，结果也买了黄油，而干酪队伍还是在慢吞吞地蠕动着。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整个店里人们犹如浪潮翻腾，原来是一会儿排进了队伍，一会儿要人代看位子，再一会儿又离队出去，又再回来。大家把干酪队伍作为根据地，所以这个队伍几乎动也不动，它的中段在不断扩大。因此我再次请我后面的一个老先生帮我看好我的位子，便跑去买大红肠。这一次又成功了。到头来，我一共花了二十二分钟买到了黄油、大红肠和干酪；我

不但没有感到气愤反而感到奇怪，仿佛我用这种种捷径，总算钻了这个制度的空子。

跳队的办法只能用于购买普通商品，而不适用于购买稀有商品，这是一些比较认真的顾客后来告诉我的。有些妇女说，"东西变得紧张了。"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说："大家凭经验知道，他们在站队时，东西实际上快卖光了，所以，假如是排队买真正的好东西的话，你离队的时间很长，队里的人就会非常不高兴。他们会大发脾气，咒骂你，在你回来时不让你重新占有原先的位子。这就得看原来排在你后面的那个人是否肯替你讲话，证明你本来就站在他前面。因此请人家替你保留个位子不是件开玩笑的事情。替你保留位子的人所承担的道义上的责任，不仅要让你依旧站在他们前边而且要替你讲话。你则必须硬撑一下，顶得住，任凭别人骂你几句，瞪你几眼。等到你排到了队伍的前头，要是售货员没有限制购货数量的话，你就会听到后面的人，也许是后面第六或第八个人在对你高声叫喊不要买得那么多；说你这个人真缺德，一点儿不替别人着想。这可能搞得相当不愉快。"

争购东西的现象使俄国人生活的紧张程度表面化了，同样地又拉长了普通老百姓和显贵之间的距离。有位美国记者曾经把买东西比作美国新兵接受陆军基本训练，军士们故意趁机压一压新兵。这个记者想到的

是那些工资低、常常劳累过度、要不就是懒得要死的售货员们粗暴恶劣的服务态度。你在饭店里得花一个小时等女服务员来收点菜单，接着又要等半个小时她才来通知你，你点的菜已卖完了，诸如此类的事真是不胜枚举。在塔什干，一个老太太对我说，她有一次到食品商店去买肉，排队等了很长时间，总算排到前头了，可是那个卖肉的人跟他旁边的朋友在闲聊体育新闻，她又不得不再等五分钟。她说，当她对他讲要买些肉时，他转过身来向她大发雷霆说，"下一次大概你要我替你把肉塞进你的嘴里吧！"售货员这种粗暴的服务态度是如此到处皆然，以致苏联的第一流喜剧演员阿尔卡季·莱金那档讽刺一个女售货员的节目总是大受欢迎，这个售货员完全不顾某一位苏联的卡斯珀·米尔奎托斯特[1]要买件礼物送给一个中年妇女的请求，而硬要他买一门玩具大炮。售货员这种态度是整个苏联销售市场的复杂制度的重要部分。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对我说，"售货员们认为：'我一个人，你们人多；我干吗要着急呢？反正你们总得等我。'他们自然没有说错，如果他们手里有你要买的东西，你还能跑到哪里去呢？"

有许多商店，顾客不能自己动手拿取商品，商品都堆放在柜台后面，小心翼翼地跟顾客保持一定距离；要

---

① 美国连环漫画家韦伯斯特（1885－1952）作品中的人物；这里形容胆小怕事，一味表示歉意的人。——译者

不是售货员乐意效劳，顾客伸手是拿不到的。面包店则是个例外，顾客在那里可以用商店备有的金属叉子，挟一块面包看看是否新鲜。但是，在大百货商店里，往往把女式外衣、童靴、运动器材等分别用绳子圈成一片片商品区，有控制地分批接待少量顾客入内。食品自动售货商店的出现，已经开始改变原先那种冷冰冰的、对顾客敬而远之的现象。但是俄国人对这种改革并不热心，一个原因是他们受习惯势力影响过大。例如在莫斯科闹市区加里宁大道有一家二层楼的食品商场，我看到人们已习惯于购买袋装面粉、白糖和干面条，但是许多人仍然欢喜排队，看着女售货员把新鲜酸牛奶一勺勺装进家里带来的罐子里，而不愿买预先装好的酸牛奶，即使这要快得多。为了防止小偷冒充顾客行窃，有些顾客在排队结帐时，还要被拦住，接受他们认为是"侮辱性"的对顾客手提包的检查。

商店不作预先通知而突然打烊或者停止服务，也使俄国顾客们排队受罪复杂化了。苏联商店的"清洁卫生日"和"盘货日"，也就是停止营业的日子，比其他国家多得多。有时候，顾客可能意想不到地碰到店门口写着"整修内部"，但实际上这是无限期地外出吃饭的一种很普通的幌子。特别在州一级城市里，商店为了适应自己店员的需要，可以不顾规定的营业时间而打烊。"他们就象是自己当老板那样在工作，"一个

沮丧的农村妇女在高加索一个村子里对我说。当时我们都在附近唯一的一家食品店门外感到无可奈何。"他们认为有东西卖，就开门；不然就关门。"其他行业安排自己的休息时间，也极少为顾客着想。乌克兰旅馆门厅里的小卖部就是一例，它从正午到下午二点停止营业。又例如莫斯科高尔基公园，它在冬天有个很讨人喜欢的做法，即把公园树林间的路面注满了水，水冻了好让大家滑冰，可是公园经常在最关键的时候，也就是星期日下午四点到六点关门。更有甚者，我痛心地获悉，那些女售票员在下午三点以后就拒不出售门票了。一个女售票员怒气冲冲喊道，"时间就要到了，滑冰前的准备功夫也不够了。"不论你怎样好说歹说都不能使她改变她那武断的敕令。

俄国人对这一切的麻木不仁态度，真是使人吃惊。他们普遍把买东西看成是一种体力上和精神上的战斗，这跟纽约市民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打起精神赶乘地下铁道颇为相似。大家闯进商店，你挤我推，一副闷闷不乐好打架的神色，根本不屑于向替他们开门或让路的那些人道声谢。莫斯科人是性情冷酷的城市居民，那种特别粗暴的态度已在其他俄国人中有了名气。隔一阵子就有专栏作家批评他们态度生硬。不过，俄国人在私下接触时表现得特别热情，而且他们听说外国人觉得他们在公开场合脸无笑容、十分冷酷往

往还会感到吃惊。“你得知道,”一位花白头发、态度和蔼的文学评论家说,“就我们记忆所及，买东西就是一场斗争。生活就是斗争。在队伍里站上一个位子就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回想一下战争岁月,那时节,如果一个小男孩起得不够早,排不上前头的一些位子,那一天,家里就没有面包吃。当然，如今情况好些了。但是,人们在买东西时依然有着那种紧张感觉。”每天的操劳,不仅是因为买东西,而且还有工作、吃饭和生活上的其他过度劳累,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印记;他们衰老得比较快。我发现,在三十岁以上的人中,俄国人往往认为美国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八到十岁;而美国人也认为俄国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八到十岁。

然而，消费者那种永无止境的活受罪也有其积极的成果，那就是买到不寻常的商品后就好象如获至宝那样极为珍惜。俄国人虽然不象美国人那样讲求实利，可是，他们只要买到一些比较普通的商品,就感到格外高兴和大有所获，比购买东西方便的西方人反应热烈得多。一位曾经到过美国参观访问并与美国人有交往的女记者说，“在美国，要是你的妻子买了一件漂亮的新衣服,而我看到了,我会说,‘哦！很漂亮,’这就完了。可是在莫斯科,当我搞到一双心爱的皮鞋时,这简直就是取得了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立了丰功伟绩。这就是说,我是设法通过一个朋友几经曲折搞到的,或

者是，也许我找到了一个可以行贿的售货员，或者是，我一家一家商店都跑遍了，而且一连排了好几个钟头的队。请注意我的提法，这不是‘买了几双鞋’而是‘搞到一双鞋’。所以当我买到一双自己心爱的皮鞋时，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朋友们对我说，‘哦！你搞到新鞋啦！告诉我，在哪儿搞到的？’这不是一个出于礼貌的无所谓的问题，而是个实在的问题。因为他们心里也在思量：‘或许她可以帮我弄到一双，或许我也能替自己搞到一双象这样漂亮的皮鞋。’美国人简直无法理解这一点，不是吗？”她说得很对，因为我曾经看到，排了很长时间才买到一束美观的发髻或一件南斯拉夫运动衫的妇女们，眼里闪烁着胜利者的激动神色。这真是一幅动人心弦的情景。

然而，对于大多数俄国人来说，在经济生活方面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可以弥补消费品供应制度所存在的明显缺陷，并使他们宁愿要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不要西方人那种比较自由但不大有保障的生活方式。西方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其中有些人最近对苏联的制度更有信心，尽管那个制度还存在着种种缺点。在美国出现的两位数通货膨胀、失业、昂贵的住房费用、医疗费和大学学费等都使他们吓了一跳。在许多俄国人看来，住房费用低、免费医疗、大学教育有津贴，工作有保证——

尤其是就业有保障——这些优点胜过了市场供应紧张的缺点。我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到一个环境保护学家的公寓里作客吃饭，他是欧·亨利短篇小说的爱好者。他弹着吉他，唱起伤感的伏尔加河歌曲给我和安听后，我们的话题就转到经济方面。“我们知道这里的生活不如美国好，你们最熟练工人的工资比我们的高两、三倍，你们的房间和住宅比我们宽敞，”他说。“但是我们这里不必积蓄一笔钱以防今后失业。我把工资拿回家交给柳巴，让她安排家庭生活。我还有什么要操心的呢？钱是够用的。虽说你挣的钱比我多得多，但是你得把钱存起来。你得有储备，因为你随时会成为失业者；你还要为退休而操心，我可不一样，我永远不需要担心。我有专长。我可以走出我的研究所，另找一个符合自己专业的工作，还是挣一样的钱，每月二百二十卢布，没有任何问题。我可以指靠我这二百二十卢布。这就是你我之间很大的差别。我不必担心未来的生活，你却要担心。”

上述这类议论是报纸上每天反复宣传的，俄国人遇到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也总是这样说的。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尤其是关于失业这个问题。

苏联有关福利方面的统计数字听起来倒是给人深刻的印象，而在数字背后的现实往往就不那么打动人了。例如，政府的官员爱讲每年在养老金上就要支出大

约二百亿卢布。可是当你发觉这笔钱要在四千一百五十万名领年金者中分配时，算下来每人每月平均只摊到四十卢布（五十三美元），这就在苏联非正式的贫困线之下了。许多老奶奶和老爷爷，实际上都有减轻困难的缓冲办法，因为他们都同自己成年的子女生活在一起，有许多人则按规定退休后还继续工作，担任工资低微的门卫、清洁女工、电梯司机、衣帽间服务员或者女佣人。政府也鼓励他们这样做。毕竟这不能算退休吧！

相似的情况是，苏联经济近年来没有遇到西方经济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但是，也不象政府官员所说的保险不会出现通货膨胀。诚然，俄国人乘坐国家补助的地下铁道时，同二十年前一样，只花五戈比（约六点五美分）。公家房屋的房租是固定的，而且一直很低；两间住房、一间小厨房、一间洗澡间，每月租金六——八卢布（八——十一美元）。半公升标准级牛奶，如今的价格同十年前一样，为十六戈比（约合三十五美分一夸脱）。国营商店的土豆仍固定在每公斤十戈比（每磅约六美分），国营商店牛肉的最高牌价名义上没有变动，每公斤二卢布（每磅一点二美元）。旅行也很便宜，俄国人乘坐一千哩火车或飞机只花五十——六十卢布（六十六——八十美元）。在旅馆里，通常是同陌生人合住的房间每个床位每夜收费一、二卢布。

持有国家补助的休养证仍然是一种很大的优待。在中等休养所住二十六天，食宿在内只花一百二十卢布（一百六十美元）。在少先队夏令营度假三个半星期收费九——十五卢布（十二——二十美元）。但是，对于住旅馆、乘火车、持休养证休假或夏令营活动等，要花招的范围越来越大了。

此外，在1974年年底，当我在莫斯科的最后几个星期里，老百姓都在私下里嘲笑官方所谓自1970年以来零售物价指数实际下降了百分之零点三这种说法。一个中年妇女断言，几年前卖五个卢布的东西现在要七个卢布了。一位语言学家估计，她一家四口（包括两个小男孩）吃穿的费用比1970年多一倍。一位医生比较不夸大地估计为增加百分之二十。西方有些经济学家曾猜测，苏联隐蔽的通货膨胀率每年约为百分之五。①

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价格是公开提高的。1973年，鱼子酱、熏鲑鱼、毛皮制品、珠宝等奢侈品的价格一夜之间翻了一番，虽然某些电视机和收音机的售价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左右。但是，比较惯用的手法就是用涨了价的新品种代替原来价格的旧品种，而质量差不多没有、甚至根本没有提高。另一种通货膨胀形式的出现是

① 基思·布什所著《苏联经济生活情况》（布鲁塞尔"北约组织"，1975年版），第13页。

由于物资匮乏引起的，它迫使人们到农民的主要食品自由市场买东西，在那里，肉类和蔬菜价格大幅度上涨。1970年，俄国人生活中普遍的日常饮料伏特加酒，通过一种不引人注目的狡猾手法提高了售价；象半公升售价为两点八七卢布的“首都牌”老牌名酒，(由于出口)在俄国国内市场上根本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低质量的新牌子，干脆就叫“伏特加牌”，售价三点六二卢布。1974年老式的日古利牌Ⅰ型轿车(苏联式的意大利菲亚特—124型)开始逐渐被日古利牌Ⅱ型(类似菲亚特—125型)所替代。新式日古利牌小轿车的马力大一些，车内装璜比较吸引人，车门打开时指示灯即发出亮光，镀铬较好，还有一些其他的小改进。但是，车价却提高得使意大利和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为之眼红，老式的日古利牌每辆七千三百三十三美元，而新式的售价一万美元，一下子上涨了百分之三十六。

比较一般的商品，从长统袜到男孩的户外茄克衫或是食品，也玩弄这种骗人花招。一个家庭妇女在谈到买鸡时对我说：“各式比较便宜的童子鸡品种已经绝迹，如今可供选择的品种多半是较高级的每公斤两点六五卢布(每磅一点五九美元)的优质鸡，要不就是进口的更昂贵的匈牙利鸡或丹麦鸡，如果你确实十分需要的话，以每公斤三点四卢布(每磅合二点零四美元)的价格购买去毛开膛的鸡。这就是这里搞通货膨胀的

主要手段。最便宜的品种已无影踪，中等价格的商品极为罕见，供应的都是最贵的东西。所以这里的生活费用是在甚至并不变动物价的情况下上升的。”

医疗是基本上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部门。摆脱医药费用帐单的重担是苏维埃制度引以自豪的成就之一，尤其是在美国医药费突飞猛涨的时期更是如此。

我个人对苏联医疗制度的接触，仅限于参观过几次诊疗所，这些诊疗所打扫得干干净净，是专为外宾服务的。有一次，我们的孩子到外交人员门诊部去检查体格，那是个坐落在莫斯科闹市区隐蔽在两扇大铁门里的褪了色的米色建筑物。医院化验室一天只对外开放一小时，由于不向体格检查者提供化验物容器，因此人们都把自己的“化验物样”装在速溶咖啡空罐、水瓶以及其他各种容器里带到化验室来。进行一次体格检查要上医院好几趟。但是，医生都是中年妇女，挺和气，能力似乎也挺强，安对于体格检查做得很周到印象很深刻。

列宁说过：“不是虱子战胜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战胜虱子。”自此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苏维埃制度取得的比较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要算是苏联医疗卫生方面的全面的进步了，这一点我在中亚和其他地方旅行时感受极深。流行病基本上已被控制住了。婴儿

死亡率已降低到接近全世界十五个最先进国家的水平。平均寿命达到七十岁。到1970年，苏联的医生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是世界各国最高的，每一万人有二十三点八名医生（而美国只有十五点八名）；苏联的病床也多于美国（每千人拥有病床数苏联为十点六，美国为八点二，虽然原因之一是苏联医生们把某些在美国只作为门诊病人处理的人，如慢性酒精中毒病人也收进医院作为住院病人）。据西方估计，克里姆林宫把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六用于医疗卫生，而美国为百分之七。①

苏联官员总是不厌其烦地谈论说，苏联人不会因患病而倾家荡产，这一点是苏维埃制度最重要、最得人心的一个方面。我认识的俄国人，常常谈到一些收入有限、地位不高的熟人享受实际上免费医疗的待遇，其中包括到很远的医院和医学院去动手术或治疗，而这一切在西方就昂贵得出奇。

但是，许多俄国人私下向我抱怨说，他们的医疗卫生制度象其他消费部门一样存在着很大问题：医生工作时间过长，药品短缺，设备很差，医疗质量普遍不高。他们主要责怪政府给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的工资太低

① 这些综合性的对比数字根据马克·菲尔德著《医疗卫生——苏联社会的一种"公用事业"或"对生产能力的维护"》一文，载于马克·菲尔德主编的新书《共产主义社会内现代化的社会后果》（巴尔的摩市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版公司，1976年版）。

(医生多半是妇女，从经济收入来看，她们的工资级别几乎最低，每月挣一百到一百三十卢布，合一百三十三到一百七十三美元，低于工厂一般工人的工资)。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认为苏联的医疗质量“很差”，因此把自己的妻子送往国外治疗眼疾。苏联科学院院长姆斯季斯拉夫·凯尔迪什请了一位美国专家给他医治心脏病。另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小心翼翼地谈到苏联医疗保健制度时说：“质量不一。有些医生、有些医院、诊疗所很好，有些很差。你也说不上哪个好哪个坏。我讲的当然是莫斯科的情况。在乡下那就更差了。”

有一位苏联的医学家(1974年移居美国，在此之前在莫斯科一家首屈一指的医学院工作）赞扬苏联的医生比美国那些以赚钱为目的的私人开业医生“人道”。他赞同公费医疗制的办法。“但是，你简直无法想象一般的医疗质量是多么差劲！”他说，“在我生长的梁赞(有四十万人口的城市)，医疗设备很蹩脚，缺乏基本的东西，例如药品。医生的水平比莫斯科的低得多。但是这个医疗制度最伤脑筋的问题是组织得不好，护理很差。护士的消毒工作做得很糟糕。即使在我们这样很高级的医学院，手术过后常发现脓毒病、伤口化脓、感染和积脓现象。护士们没有消毒干净，在手术过程中也常出差错。我们的院长手术做得很高明，但手术

后病人往往有感染，所以他非常生气。感染情况太频繁了。你知道，中等水平的医务人员拿不到高工资；他们不可靠，工作能力差。有一次，我在哈尔科夫得了阑尾炎，不得不在一家普通的区级医院里开刀。医院肮脏得真是难以想象！床单用得太久，都变成灰色的了；医院工作人员穿的衣服也洗得不够干净。我因为是从莫斯科有名的医学院来的，他们算特别照料我。但是，我跟其他病人一样都感染了。我亲眼看到一个病人因阑尾炎手术消毒不净而送掉了性命。"

七十年代，有些苏联医生随同苏联境内的其他犹太人移居国外，当时帮助他们熟悉国外医疗制度的美国医生和以色列医生意想不到地发现，苏联医生水平一般说来比他们预料的为低。"差距很大，"一位帮助苏联医生进修的纽约医生告诉我说。另一位医生感到吃惊：来自列宁格勒一家第一流的儿科门诊所的一名女医生竟不知道如何使用耳镜（检查耳朵的器械），问她怎么知道来看病的儿童耳朵发炎呢？这位苏联女医生回答说："我们学来的办法就是拉拉小孩的耳朵皮，小孩哭了就说明耳朵发炎。"

我在高加索遇到的一位曾在列宁格勒工作过三年的东德妇科医生，他同意美国人的上述估计。"苏联人喜欢大肆宣传他们的医疗卫生制度，"他对我说，"我在他们的门诊所和流动医院工作过，那里医护工作很差。

药品和医疗用品非常少，必要的医疗设备也很缺乏。他们当然也有医学研究机构以及象‘克里姆林宫诊疗所’这样专为要人看病的特殊医院，它们很可能同你们美国的医院差不多，有很好的专家和充足的医药用品。我们东德人在总的医疗质量方面落后于你们约十五年，但是，俄国人还远远落在我们后面呢！政府对普通门诊所和医院的投资很不足。急救车太不及时，往往耽误病人。在许多情况下，急救车都被叫去拉醉鬼去了，心脏病发作的病人要等两小时才能坐上急救车。医院里拥挤不堪。现在他们盖的医院病房比过去的小，比如说六个人住一间，可是我看到的病房里有很多病床。气氛很不舒服；伙食很差，多数人家给住院的亲属送饭菜；给助理护士送钱或送礼，这样就会定期更换床单，用具也弄得更干净些。”

住院拥挤和耽搁入院时间是许多人都提到的问题。“急诊病人住进医院是不存在问题的，急诊马上会得到处理，”一位莫斯科医生说。“但是要作‘计划手术’（非急诊，病情属于慢性病，应按计划排定手术日程）就成问题啦，各地都一样。”摩尔达维亚的一个电力工程师告诉我，他为了动腹部手术，在基什尼奥夫已经等了几个月。另一位科学家说，在莫斯科心血管外科手术研究所等上“三年甚至五年”并不稀奇。在不大有名的医院，等的时间较短，但也相当长。

东德的那位医生认为我关于莫斯科外交人员诊疗所的评论不值得一驳，他说："你们有一家专门为外国人看病的医院，那里的医疗工作比为俄国人看病的医院要好得多。"即使如此，我所认识的、曾在那里住院的西方病人都被医院不讲卫生的情况弄得非常不安。使其他西方人感到吃惊的是，苏联的医生在做象人工流产和阑尾切除等小手术时都不用一般的麻醉剂，而只用奴佛卡因；牙科除拔牙外几乎都不用任何止痛剂。

药品便宜，一张处方的药费往往不到一块美元，这是苏联医疗制度一个很大的优点，可是，这个优点往往被药物缺乏抵消了。这也是俄国人公开发牢骚的一个问题。甚至苏联的报纸也因缺少普通药品或制药原料而经常批评制药工业，如缺少心脏病人用的甘油、碘酊、氢氧化铵、奴佛卡因以至急救包和止血带，更不用说高级的抗生素了。有一个医生对我说，医生们不断接到指示，要他们在处方时不开已知的脱销药品。我跟其他住在莫斯科的外国人一样，经常有俄国朋友跑来求援，要求帮助他们搞到点迫切需要的药品，这些药品在莫斯科是出多大价钱也买不到的。不过，对多数俄国人来说，跟过去相比，今日所取得的进步大大超过眼下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了。他们认为，公费医疗制度是苏联社会主义最值得赞许的特点之一。

住房问题也许最能说明苏联消费者一则以喜一则以悲的特殊心情了。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但仍然存在的缺点也是惊人的。1956年以后的二十年中，由国家、私人和公私合作建造的新住房大约有四千四百万套，这个数字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① 在最近十年的头五年中，为建造住房拨款就达三百五十亿卢布（将近四百八十亿美元），仅在1975年一年，其计划指标将改善一千一百多万人的住房条件，其中半数以上将迁入新房。

苏联住房计划的显著效果是引人注目的。阔别十年重访苏联的西方人，看到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大城市郊区耸立着一排排用预制构件建造的有镶嵌板的九层、十一层和十四层的公寓房子，无不大为惊讶。但是，建筑式样的单调以及那种不近人情的面积却使人发愣；房屋内部的装修较之宏伟的外表也简陋得多。但所投入的力量之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我所到之处几乎总是碰到学者、工程师、工人和教师在吹嘘他们的新公寓。这些公寓，按西方标准看，也许很平常，但是房子光线充足、空气新鲜，对于那些过去挤在合住的套间里，四至六家人合用厨房、浴室和厕所的人们来说，足

① 引自亨利·莫顿所著《苏联领导人是如何解决住房危机的?》一文，载于亨利·莫顿和鲁道夫·图凯斯主编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的政治和社会》（组约自由出版社，1974年版）第163页起。本章许多对比的统计数字均引自莫顿此文。

以使他们对生活产生焕然一新的看法。“你简直无法想象这一变化对人们是多么重要，”一个中年的教师这样断言。

然而，苏联缺少住房的现象，仍然很严重，很伤脑筋，以致西方的经济学家如格特鲁德·施罗德仍然认为，苏联“是欧洲任何一个大国中住房条件最糟糕的，即使按照苏联政府最低的健康和保持体面的标准来衡量，也是非常糟糕的。”俄国的“住房卫生标准”早在1920年就规定每人最低限度住房面积为九平方米，相当于10×10呎的一间房子。但是时隔半个多世纪，美国研究苏联住房问题的专家亨利·莫顿发现“城市里的苏联人，绝大多数没有达到1920年规定的最低住房水平。”

苏联官员承认，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苏联人仍然几家合住一套公寓，而西方专家认为：几家合住一套房子的人数可能将近三分之一。据1972年统计，苏联城市每个居民住房面积，全国平均为七点六平方米，约为美国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为西欧城市居民的二分之一。在苏联境内，莫斯科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的首都里加和塔林等城市的生活条件，比起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不大发达的城市如塔什干、埃里温和杜尚别要好得多。

可是，这个问题与其说表现在统计数字上，还不如

说是反映在具体的人身上。为了使我有一种生动的感受，莫斯科的朋友们在11月某个阴沉沉的下午，带我去参观离和平大街不远尔热夫斯基浴室附近的一个老区。数以百计的人，就跟罢工时布置的纠察线一样，一连几个钟点在那里转来转去：手插在袋里，脖子上紧紧围着御寒的围巾，扛着招牌或者把手写的招贴别在皮茄克衫和结实的布外套上。他们有时三三两两停下来悄悄地交谈几句话，又继续走去。他们尽管样子挺象，却不是纠察员。他们走来走去是想招徕换房的人——这些莫斯科人为了改善住房条件正在做交换房屋的广告。

一对时髦的年轻夫妇走过我们身旁，他们的换房条件是很吸引人的，“一处换两处”，一套四间的公寓房（按苏联标准是非常宽敞的）调换两处较小的公寓房，他们因为新婚不久，不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一个老太太正连哄带骗地在劝说一个戴深色呢帽的男人，要他接受她分别在两处与人合住公寓里的两个单间，调换他一间一套的住房（包括小厨房、浴室和厕所；这些在合住公寓里却是公用的）。大家都知道，吃饭间是没有的，白天的客厅晚上就成了卧室。一家四口——夫妇俩、一个小孩和奶奶，住两间房算是一般水平，要是房间大些，就算相当优越了！那个星期天的换房交易无甚进展，大部分时间花在看看，问问，唧唧咕咕，谈谈，

拒绝交换或继续找对象。

然而，在小巷尽头还有活动。几个房主在那里表示愿意出租一个小套间、一间房、甚至一个铺位。一些学生和军官就围着他们转来转去。一个年轻妇女，四周围着四五层人，她在闹市区有一个单间；但她拒绝了一个衣冠楚楚的陆军少校要租她的房子的要求，她显然担心这位少校会把他呆在城外的妻子和小孩接来住。她说，她的地方太挤，容纳不了那么多人。一个蓄着波浪式银丝白发、身穿藏青色厚茄克衫的结实高大的男人，表示要出租一个旧楼里有煤气取暖设备的两间一套公寓房子，这就引起了一阵骚动。

“用水和厕所都在后院，”他说。这就把两个青年打发走了。

他们厌恶地走开时，其中一个说：“谁要那种房子？”

但是，一个租房心切的中年妇女仍然跃跃欲试。她要租这套房间，给她的女儿和女儿的同学住，她俩都是医科学校的学生。

“她们都是很好的女孩子，是成绩最优秀的学生，”这个妇女说。

“我不管她们的成绩是优是劣，”房主回答道。“我不欢迎学生。他们会把我的房子变成宿舍。”

“你欢迎有家室的人吗？”一个站在最外圈的褐色

头发的年轻妇女问道。他点点头，于是她转过头来喊道："阿咪，快来！"大家都哈哈大笑。阿咪就是猫咪，通常在俄文中是私底下表示亲昵的称呼。阿咪过来了，棕黑皮肤，卷发，很漂亮，穿着拉链衫，二十六岁上下。他们来回地提出一连串有关房子的问题。接着房主详细盘问这两个很可能成为自己房客的人。

"你是干什么的？"他问道。

"我是研究生，"阿咪回答说。

"你在莫斯科有户口吗？"房主想了解这一点，显然希望避免以后的麻烦——报户口是同当局搞一桩旷日持久但也往往是白费劲的磨嘴皮的事儿。

"有的，是临时户口，"阿咪说。

"那么你的妻子呢？"房主看着那个年轻妇女问道。

"我不是他的妻子，"她坦率地回答说。

"嗯，她的户口呢？"房主问阿咪，他关心的事是有没有官方证件，并非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她有莫斯科的户口，"阿咪向他保证说。"房租多少钱？"

"月租五十卢布，先付一年，"这个白发房主很自信地说。五十卢布相当于新建的类似公寓租金的三倍，新建公寓还有抽水马桶和其他设备，而那个旧套间却没有这些设备。住房的紧张使这一对伴侣连房间都没有去看，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了房主的条件，把房子租下

来了。他们三人走开去填写必要的书面合同。

莫斯科有三十处象尔热夫斯基浴室附近这样的换房处。在这个拥有两亿五千万人口的辽阔广大的国家，各地有数百处。许多城市，象莫斯科那样，都办起当地的换房小报。大家都很内行地从字里行间辨别出哪些是嘈声大、不太吸引人的、五层楼的“赫鲁晓夫公房”，哪些是结构较好、比较新式的套间。莫斯科的一个找公寓房子的人出主意说，“不要住最高层，因为屋顶往往漏水；也不要住底层，因为噪音大，不清静。装有电话的公寓确是个有利条件。不然的话，要安装架电话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看看整幢房子有没有垃圾滑运道。”

由于要符合国家关于住房面积种种限制的繁琐手续，房子往往要经数月之久才能调成。调房有点象一场巨型的“抢椅子游戏”，一次调房可能涉及到五、六、七甚至十二户人家。

我认识一个瘦长、头发乱蓬蓬的先锋派艺术家，他住着一套两间的公寓，但是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希望面积住得更大点。他们夫妇忙了几星期，一无结果。他们说服他的生活较富裕的父母放弃一套四间的公寓，以调进两套三间一套的公寓。但也没有成功。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套三间的房子，可是合住着两家人和一个单身的老头。所以这位艺术家和他的妻子就得着

手帮助这些住户安排这个小小的但相当复杂的调房问题。当交易最后做成时，牵涉到六套公寓和八户人家。这个单身的老汉不十分满意他的新居，他们不得不付给他五百卢布现金才把他弄走。接着，还得把这次调房的全部情况向市政当局登记，由市政当局逐一审查，以确保是否违反那种严格得象拜占庭帝国的限制，是否符合对不同类型的人（学者、某些官员、领取特别津贴的残废军人等）所规定的最高和最低的住房面积标准。最后，警察局得核对调房者是不是在莫斯科都有合法户口，以防外地人口流入莫斯科。

这位艺术家对朋友们说，"这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到头来还是值得的。""我们毕竟住进了一套很好的公寓房子。"

有时候，调换房子的结局是并不很愉快的。苏联著名的小说家尤里·特里福诺夫写了一篇名叫《交换》的小说，描写因为住房拥挤可能给人们造成的后果。在故事里，儿子和儿媳妇为了扩大住房面积，合谋把因患癌症快要死去的母亲迁出她终身居住的公寓，免得在她死后房子就得自动归公。还有一些作家和许多个人，都把住房紧张归咎于苏联是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列宁格勒一位剧作家在一出扣人心弦的话剧《不要遗弃你的爱人》中，刻画一对夫妇办了离婚手续后，又因为找不到房子住而被迫继续住在一起的那

种痛苦心情。这不完全是虚构的作品。我曾听说，在苏联的现实生活中，确实发生过这类事情。

苏联的人口统计学家把俄国城市的家庭人口之少(通常每户一个小孩)归因于住房紧张。报纸上经常指责企业或建筑工程单位未能提供足够的住房，致使苏联工业中的劳动力流动极为频繁。对工人来说，住房问题往往比工资高低更为重要。我认识的一个工程物理学家，离职一年半之久，到莫斯科郊外帮助建造新公寓房子，以便得到一套新的公寓。有许多人用这种办法来改善自己的住房条件。他一家三口原先跟另外五十四人合住一套九间房的公寓。末了，他们有了独用的一套两间的公寓，但是，他们发现新建的住宅区基本上没有商店，交通也不方便。他的妻子对我说，他们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去原处上班每次要花将近两个小时。他们住了两年就不住了，又搬回原来合住的公寓。此时，住在那里的人只有二十七个了。

由于政府给予大量补贴，苏联的房租很便宜；这是造成大家迫切要求得到住房的一个原因。尽管过去二十年进行了建设，但住房短缺的主要原因乃是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当时斯大林把住房建设几乎放在最末位来考虑。除此之外，一些新城市的迅速增长以及战争期间俄罗斯欧洲部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遭到极大的破坏，这样你就明白造

成战后住房紧张的种种因素了。近年来已经作出了很大努力以适应人口的增长和人口迁入城市的情况。虽然从 1956 年到 1975 年建造了四千四百万套新住房，但人口也增加了四千五百万。

1962 年以来，比较富裕的家庭解决住房的一个渠道一直是在政府机关、企业单位、科学研究所或文化团体等发展一批批合作公寓①。按照苏联的标准做法，得先付现金百分之四十，余数在十五年内还清。随着住房需求的增长，价格也上涨了。朋友们对我说，在新造的合作公寓里，三间一套的舒适住房 1966 年造价为六千——六千五百卢布（八千——八千六百六十美元），现在要八千五百——一万卢布（一万一千四百五十——一万三千三百美元）。尽管西方人会认为价钱不贵，可是对于月薪四百卢布左右的苏联人来说，却觉得大大提高了。况且，只是有钱的俄国人才住得起合作公寓，而它们不过占城市全部住房的百分之三左右②。

在许多方面，住房状况体现了七十年代中期苏联消费者的生活情况。他们的生活水平虽然显著地有了

---

① 指自建公助的住宅。由住户自己出资，分期付款，公家提供建筑材料等条件，合作建造住宅。——译者

② 很有意思的是，亨利·莫顿估计，私有的合作公寓，加上农村中绝大多数的苏联人都住自己的房子，说明今天住私人房子的苏联人多于住公家房子的人。

改善，可是，还远没有接近西方的水平，尤其是美国的水平，而后者是俄国人渴望与之一比高低的。克里姆林宫向消费者作出了一些让步，但是俄国还远远不是一个消费者的社会。例如，向消费者作出的承诺，在最近十年的头五年里一再降低标准，而不让任何东西干扰克里姆林宫取得与华盛顿的核均势、加强苏联海军或者继续向阿拉伯人提供大批经济援助的巨大劲头。我觉得，俄国老百姓仍然被他们的领导人视为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即便向消费者作出让步也还是着眼于为促进日后更大的生产而提供物质刺激。

确实，俄国消费者的期望越来越高。但往往使西方人惊讶的是，在作出半个世纪的牺牲以后，他们的期望没有变得更迫切或更坚决。克里姆林宫尽管有它的心事，但从来不曾遇到过类似于 1970 年震动波兰政府、推翻哥穆尔卡、被迫向波兰消费者作出让步的那种消费者的爆炸性不满事件。同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的领导人比起来，苏联领导人较为成功地说服老百姓暂缓要求满足愿望，为了实现向他们许下的更美好的未来的诺言（虽然这个未来越来越遥遥无期）现在勒紧裤带。苏联老百姓愿意排队——比世界上大部分人排的队还要长得多的、有形或无形的长队。有一次，我在高加索跟一个送我们作长途旅行的司机谈起俄国的汽车来。他五十来岁，开了二十五年的汽车，每月挣九十

五卢布(一百二十七美元)。我问他，在他看来伏尔加牌、日古利牌、吉尔牌、海鸥牌或者其他牌子的汽车(我是指也许有什么外国汽车)究竟哪一种最好？他的回答从汽车最早的情况讲起。

“胜利牌在当时是很好的牌子，”他不揣冒昧地说。“老式的伏尔加在那时也是不差的。新型的伏尔加更好了。我从来没有开过日古利牌、吉尔牌或海鸥牌。技术总是在发展的。后来者总是胜于前者。但是，每种汽车在它自己的时代都是比较好的。所有的车子在它们的时代都是好的。”

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俄国式的回答。它反映出一般俄国人(尤其是四十开外的人)完全不知道每个时期在别的地方一直在生产更好的汽车，也反映出他们只要新的型号一问世就毫不挑剔地加以接受的态度。青年人和属于中产阶级的城市知识分子或许热烈向往进口消费品，但是象这个司机这样的普通工人只要生活有点改善，他们就随遇而安、心满意足了。说来有点矛盾的是，即使有些人对苏联的商品以及苏联存在的缺点牢骚满腹，但是过了一会儿，还是说他们的生活比过去好。

“这里的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这一点你也许很难理解，但是你必须理解，”有一个对苏联制度大肆挑剔的苏联科学家对我说，“其中许多人住在城

市的公寓里，两三间房，都是小房间，你也许觉得小。可是，这些人并没有忘记他们的父母过去是住在农村那些小木屋里的。你知道这些小木屋什么样子吗？根本没有什么设备。如今，他们在这里有了城里的公寓房子；而且一直有其他种种改进。这些人甚至不会停下来想一想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在不断改进。他们不会拿自己来跟你们比，他们拿自己的情况跟自己的过去比，跟他们的父母比，因而觉得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所以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三 贪污腐化

靠捞外快过活

偷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资本主义无法根绝的伴随物之一。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因财产而造成的犯罪行为也极大地增加。

《苏联大百科全书》，1951 年

我抵达俄国后，不久就到了列宁格勒，住在欧罗巴饭店。一天，我正迫不及待地想叫一辆出租汽车。国际旅行社曾打电话订了一辆车，但等了二十分钟，不见车子到来，我赴约要迟到了。我走到街头寻找出租汽车站，正好海军部门的一辆海鸥牌轿车开到门口，车里走出几个身穿镶边蓝色制服的苏联高级海军军官。他们夹着公事包，穿过雨点，奔进了饭店。司机把车子停放在附近。眼望远处，甚至连一辆类似出租汽车的车子也看不见，我就走到海鸥牌跟前，用相当蹩脚的俄语问司机，近处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出租汽车。

“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司机问道。

我对他说了。那是另一家旅馆，我心里正想走过去，不知需要多长时间。

"来吧，"他说，一面招手要我乘坐他的海鸥牌。我急忙找了向导，乘上海军部门的轿车开走了，对车中装有带流苏的窗帘和老式的沙发座位我颇为欣赏。

我的俄国向导指点说，"要懂得这是'捞外快'。"意思是这个司机不仅是帮我一次忙，而且是利用海军的车子为自己赚些钱。照字面捞外快是"在左边"的意思，但有时也作"兼职"或"偷偷地干"解。

"他不担心那些海军将领们出来吗？"我问道。

"大概他们正在饭店吃午饭，"她说。"他有空。可能他们给了他吃饭的时间，而他正好用来为自己办事。"

到达目的地时，司机要了一个卢布——超过以公里计算的车费，但不久我就认识到，这是流动性搭客车子最低的出车价格。司机点了一下头，远离饭店而去，也许还有别的生意要做。

象在街上正巧碰上有人向他兜售宗教圣像或非法兑换外币的任何旅客一样，我认为我也经历了一次许多国家中本地人用以欺骗旅行者的那种小交易。在俄国，这类事不计其数——学生们设法在街上从你这儿买到美国唱片或时髦服装，还有那个大名鼎鼎莫斯科餐厅的服务员领班，在递给你账单时，在你耳边低声地

说，“一共七十二卢布，但，如果你想付美元现钞，只要五十元。”做生意的人真的对这一非法的花招冒一下风险，就为自己节省四十六美元（按官方牌价，七十二卢布兑换九十六美元）。而这个服务员拿了美元到黑市上以四对一或更高的价格兑换，可获利约一百三十卢布。但我以为，这也仅仅是同旅游者进行的交易。

一个莫斯科妇女曾提到，当修理工来为她的电冰箱作所谓初步检查时，表示当场就可修好，省得她再要等上几个月，然后那个人向她要了三十卢布。对于这一情况，我没有多加思索。一位戴着厚镜片眼镜、具有学者风度的化学家，却在研究所里私自蒸馏伏特加，他告诉我说，他有一辆小轿车已五年了，一次也没有去过加油站，每逢星期五下午，汽油就会送来。国营企业和政府停车场的汽车司机，会到私人车辆停放的地方来。他们会从自己的油箱里吸出汽油——由他们的单位用政府补助券买来的汽油。这时，我开始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广泛程度了。

使我感到好奇的是，这一地下交易竟如此井井有条，但我的那位化学家朋友却说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每个人对这一投机买卖已习以为常，当驾驶员们路过时，你只要伸出两个、三个或四个手指，就能换取二十、三十或四十公升（五、七点五或十加仑）汽油。76

号辛烷汽油的价格，通常是一卢布换四十公升（一角二分半一加仑）。汽油不需花司机一个戈比，他就赚到一卢布，而我只需花固定价格三分之一的价钱。我认识一个人，他买了一辆莫斯科人牌小轿车已十一年了，想必已买了一万公升（二千五百加仑）汽油，但一次也没有去过加油站。”①

汽油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事。在莫斯科地区，所有的车主还会遇到令人头痛的事情。他们砖砌的车库是在烂泥地上建造起来的，没有地板或地基，这一地区泥泞不堪。因此他们必须自已设法铺设水泥地板，在通过正常的国家渠道难以弄到建筑材料的情况下，我曾设想这是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那位化学家说，他也象其他人一样设法对付过去了。

“最简捷的办法是站在环形大道旁——就是围绕莫斯科的一条大环形公路——假装你要搭车，等待那些大型的水泥搅拌车，”他说，“那里一直有不少这种车子。不需多久，就有司机来招呼你上车。你搭了一会儿车，然后对他说，‘瞧，我需要一些现成拌好的水泥。要多少钱？’他点了下头，会问你需要多少，然后你讲定了一个价钱。至于我，司机把拌好的水泥直接送

① 1975年1月1日《消息报》透露，从1972年至1973年，全苏三分之一以上的私人汽车用的是公家汽油。根据苏联其他资料统计和西德自由电台估计，每年被偷窃的汽油数字达一亿五千万加仑，价值六千万卢布。

到我的车库。几分钟的功夫，交易就做成了。他口袋里多了十卢布。我得到了自己需要的水泥，而车上还剩下大量水泥，足够他运去供建筑工地使用。没人注意。没人关心。不管怎样，混凝土确实不属于任何人。”

又有一次，安和我正同一位年轻的生物学家共进晚餐，我们对他妻子准备的上等和新鲜的牛肉感到惊奇。这要比我在国营饭店里见到的牛肉好得多。但他说，他是在一家普通的国营商店里买到的，三卢布二十戈比一公斤（合九点九二美元一磅），比规定价格约高百分之六十。我问他是怎么弄到的。

“很简单，”他吐露说。“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幢摩天大楼附近的一家国营食品店里卖肉，那些摩天大楼是斯大林时期建造的。住在那里的是些重要人物，因此他们可以得到较好的供应。下午，他们通常可以得到五十磅新鲜牛肉。我到那里同我的朋友商量一下，看看他们是否有切剩的好肉。假如他说有，我就到收款处开一张二十戈比的取货单，不管我准备买多少肉。然后我小心地把一张三卢布的钞票夹在取货单里（等于五美元的小费），这样就不会有人看到。我挤入队伍，把我的那张夹有三卢布的二十戈比的取货单交给我的朋友，他就给我一公斤特级肉。我买到了肉，他拿到了三个卢布，而国营商店得到二十戈比。”

“但是那个卖肉的从哪儿弄来肉呢？”我问道。“他

要向经理报这笔账吗？”

“恐怕要吧。但他们只要在卖给其他顾客时这里少切一点，那里多卡一点，给他们少于应有的分量，这样卖肉的就可以一点一点抵消他们私下卖掉的肉。”

“他们？”我提出疑问。“我以为你只有一个卖肉的朋友。”

“喔，那是开始时的情况，但现在他们都认识我了。他们都在这样干。我估计他们大约有五十个象我这样要照顾的顾客。”

“你是怎么同他们搭上钩的？你怎么知道他们愿意干呢？”

“我的一个好朋友，是个女的，带我去并且给我介绍。她对卖肉的说，‘这是我的兄弟。照顾他一下。’”他一想到这儿就笑了。“他们就这样把我当做她的兄弟给予照顾了。”

愿意接受贿赂的人并不总是对金钱感兴趣，也不老是从事非法交易。他们可能只不过是向朋友们和老关系提供难以买到的物品。一天晚上，安和我同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和他的妻子卓娅共进晚餐，我们正在饱尝稀有的时鲜鱼和其他的俄国小吃（这是俄国菜的精华，比主菜更为讲究），这时，电话铃响了。安德烈有一架与众不同的电话机，会象鸟儿一样发出啁啾声。他神态紧张，又是答话，又是急急忙忙地讲个不停。他

用手按住了电话听筒，问我怎样才能搞到两张明天晚上世界冰球赛瑞典对俄国决赛的票子。正巧那天晚上我有两张多余的票子带来给安德烈作为礼物，但还没有机会告诉他。他很高兴，满面笑容地告诉了他的朋友并挂上了电话。

当时在莫斯科，这种票子是非常珍贵的。我满以为他同他的朋友一起去观看，但听说他打算把两张票子都送给电话里的那个女人，就感到有些失望。

"没关系，"他要我放心，"对我来说，送两张票子给这个女人更为重要。你知道她是谁？对于我们，她比政府还重要。她是莫斯科最大的一家食品店的经理。她卖给我们最佳的食品。我们今天晚上吃的整桌菜，所有这些无法弄到的小吃，就是她供应的。你不能为这些东西额外付给她钱。她的钞票多得吓人，因为已经有很多人给了她大量的钱。她再也不需要钱了。但她是一位狂热的冰球迷。她只搞到一张票子，结果给了她的丈夫。但她还想要两张，因为她想同她的情人一起去。因此，如果我能给她两张冰球票，就是件伟大的事情。这比钱还要好。我感谢你。这是件伟大的事情。"当安德烈用英语讲话时，他强调和拖长了"伟大"这个词，因此发出来的音就成了"伟伟大"、"我感感谢你"、"这是件伟伟大的事情。"

有的时候，不是最高级的官员而是地位最低下的

人帮了最大的忙。隆冬季节，新鲜水果已从莫斯科餐桌上消失，当我同电视记者伊琳娜在她的厨房闲谈时，她端来了一盘装着几个略有伤痕的苹果，上面散满了甘美的葡萄。她看到我瞠目吃惊，就对我说：她的门路是个矮小的杂务工，名叫萨沙，他是附近一家水果蔬菜店的水果搬运工。她说，这种活谁也不想干，因此，只要有人愿意做这种下贱的工作，领导上一般都接受。伊琳娜说，那家商店的窍门是：水果运到后，不管实际质量如何，经理就以腐烂或略有损伤和不宜出售为名，大量报损；然后，萨沙私下把这些处理水果按标准价格外加一个卢布卖给住在附近公寓里的老主顾。

“他自己留下了外加的卢布及葡萄的一半价钱”她说，“而那位商店经理则拿了另一半的钱。”

我在到任的头几个月中，通过和各种人物的会见，开始注意到在苏联有范围非常广泛的非法交易。在巴库，我遇到一个年轻的出租汽车司机，他告诉我在他的村子里，只要向当地的警察孝敬五百卢布（六百六十七美元），就可占用一块地皮，并获准在那里盖一幢私人住宅，同样以四百卢布（五百三十三美元）可以在巴库获得象出租汽车司机那样的职业。一个工人告诉我，在他跌入电梯升降机井后，为了在腿上开刀，付给国营医院的一个外科医生五十卢布（六十六美元）；而一个司机说，他的妻子因镶三只牙齿竟花了一百五十卢布。

在亚美尼亚埃里温的一家乐器商店里，一位职员附耳对我说，只要比规定价格多付五十卢布，他就可以卖给我一架进口的手风琴，这比我正在注视的橱窗里的那架好得多。在第比利斯，有人告诉我，进医学院上学要贿赂一万三千卢布。有一次在火车上，一个国营农场的场长就他私人养的羊群(远远超过官方的限额)从养大、宰杀到出售的成本和收益向我算了一笔细帐。

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涉及到一位工程师的个人非法活动。这位工程师从一家大汽车厂偷了足够的零件，为自己建造了一辆野营用的拖车式活动房屋，在俄国简直从未听到过有这样的奢侈品。一位秃顶的语言学家同这位工程师有私交，他对我说，这个工程师是在莫斯科为政治局制造高级轿车的吉尔汽车工厂的工地上，一点一点地把他的拖车式活动房屋装配起来的。大概其他的工人也在搞投机，或是认为那座拖车式活动房屋是为某位要人造的，谨慎需要他们别声张出去。不知什么缘故，这件事一直没有被发觉，但那位工程师并不是就此没有问题了。

“几个星期前，我同他交谈时，他正在为不能把拖车式活动房屋弄到厂外而感到忧虑，”那位语言学家对我说。这是因为每个工厂随时都有警卫和看守人在检查，防止从工地上偷窃国家的财产。“工程师担忧的是怕找不到可以行贿的合适的警卫，放他把拖车式活动

房屋弄出厂门。但两个星期后，我又见到他，他告诉我他终于设法把拖车式活动房屋拉到了他的乡间别墅。他找到了合适的人。”

在俄国，贿赂和非法的私人商业活动（有些俄国人开玩笑地称之为“正在蔓延的资本主义”），是由于苏联经济的本性及其无能——物资短缺、产品质量低劣、商业部门的极度拖延耽误等所造成的。正如西方人士习惯地认为，这些活动构成一个比黑市还厉害的市场。同官方经济体系并存的，是一个完整的、兴旺的非法经济体系，它经营着为一些机关和个人所不可缺少的、不公开和半公开的庞大交易。任何物资和服务——从乡村里租赁一间假日小型别墅，在一家国营商店买一件雨衣或一双优质皮鞋，弄到一件做工讲究的漂亮衣服，运送一张沙发到另外一个城市，安装抽水马桶或在你的公寓门上装置隔音设备，到一个好的牙科医生那儿治疗，送你的儿子进一家私人托儿所，安排一个最高级的外科医生来家看病，在集体农庄建造房子和敷设水管——几乎都可以通过给点外快而得到安排。

这一非法的经济活动已成为苏联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了苏联社会的一种内在的、长期的特征。它无所不包，从少量的贿赂、黑市买卖、国营商店的大批偷窃以及私设地下工厂，一直发展到“教父”式的

神通广大的投机买卖，后面这种投机活动的揭露，导致了一个共产党的高级人物、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垮台。这种非法经济活动很象是以一种讨价还价的方式进行的，并且不知羞耻地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状况。毫无疑问，这种状况将会激起那些最老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义愤。然而，普通公民却认为理所当然，把它作为对刻板的计划经济的一种主要补助。权贵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特殊商店和特权制度合法地弄到东西，普通公民就只好在国家的非法经济活动中去寻找门路了。我的化学家朋友笑着说，“这就帮助我们保持了社会主义的人情味。”

有一次，我问起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安德烈·萨哈罗夫关于非法经济的规模，他估计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或更多一点，”或者可以说大约五百亿卢布(六百六十亿美元)。我还听到比这稍高或稍低一些的估计。苏联的专业经济学家，甚至那些私下承认非法经济活动规模很大的人，也不敢唐突地说出一个数字。一个最近移居国外的前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评论说，“它的规模十分庞大，特别是在(零售)商业部门中，但有关它的统计数字是靠不住的——没有人知道精确的数字。”

但是，没有人否认这一非法经济活动的存在。报纸连续登载了大量有关贿赂、偷窃和非法牟取暴利的

文章，虽然报纸有个特点：从不发表完整的统计数字，以免透露整个地下投机活动的规模。但每年总要公布几起经济犯因投机倒把被判死刑的案件，金额达数十万卢布，偶然也有上百万的。（对经济罪判处死刑是在1961年恢复的，显然由于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1966年，一家报纸披露：国内所有经济罪行的四分之一，都涉及到侵吞国家财产。1972年9月《真理报》透露，最近一个时期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占人口的一半）发生了二百起以上大量盗窃国家资财的案件，而在最严重的案件中有一半以上属于犯罪集团从事的长期盗窃活动。

问题是那么严重，因而内务部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名为“反对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办公室”（简称：“反办”），在全国各地行使职权。这个机构不仅没有打击盗窃活动，而且据我认识的俄国人谈到不公开案件时说，“反办”的代理人已被收买，就象西方麻醉品缉私人员遭到毒品诈骗犯的暗中破坏一样。此外，报纸的报道表明，在许多案件中，由于管理人员都是阴谋集团的成员，因而仓库、工厂、农场以及其他许多机构精心设计的一套所谓检查和管理制度都宣告失败了。

当然，贪污并不新奇。一些俄国人告诉我，甚至在最严厉的斯大林时期也发生过贪污事件（斯大林在1932年强制实行合作化和工业化时期，首次实行对经

济犯判处死刑，直到战后1947年才取消)。但俄国人坚持认为，从最近的六十到七十年代，当苏联社会变得比较富裕时，贪污才大肆泛滥起来。一位在莫斯科有老朋友的西方人士告诉我，他在离开一段较长的时间后又在1972年回来，他问起一对夫妇，在这十年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贪污腐化"。

那位丈夫抱怨说，"贪污腐化越来越成风了。"

"你不知道我们这里的贪污成了什么样子了，"穿着时髦的妻子哆嗦了一下说。"从前，大多数人是互相帮忙——芭蕾舞票子换香烟，送一点鱼子酱给裁缝。现在，什么东西都要钞票，实实在在的钞票，"她用拇指在食指上摩擦了一下，做了个国际上通常表示要现钞的手势。

苏联的非法经济活动有它自己的学问和行话、渠道和规矩，并已为大家所熟悉，事实上它几乎成了每个人的日常需要而被运用。这些活动五花八门，千变万化。但是最普遍和无罪的办法就是俄国人所谓的走后门——利用权势、关系和拉线。在经常出现短缺和规定了很多种特权的经济中，走后门成了生活中拉拢关系的主要手段。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越有地位和权势，门路就越多。但实际上几乎每个人都能把走后门的好处赐给别人——一个看门人、铁路上的搬运工、食

品店里的清洁女工、店员、汽车机修工、或者一位教授——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别人盼望或需要而又难以搞到的东西或服务。当某人要求别人帮一次忙，并意识到最终也要以帮忙作为回报时，走后门就开始起作用了。从法律上来说，走后门并不涉及金钱。一个女演员坚持说，“走后门不是真正的贪污，这只是你为我，我为你。”换句话说，“我给你方便，你也给我方便。”

几乎任何交易都可通过关系或熟人走后门来进行，从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送给食品店经理两张冰球票子，到一位将军请一位教授给他儿子在大学入学考试时打个好分数，而那位教授则要将军为他儿子准备一张缓役证(真有其事)。上面提到的那位女演员还想让她的儿子进儿童游泳俱乐部。她的儿子离运动员的标准太远，因而没有考取。这样，她又迫切希望搞到一本《花花公子》[1]，作为礼物送给教练。还有一个例子，一个乌克兰妇女，通过走后门在基辅的保加利亚领事馆弄到一个职位。她对朋友说，唯一不幸的是，一些熟人开始回避她，因为他们认为，任何一个苏联公民被外国大使馆或商业机构雇用，也就是为秘密警察工作，这使他们都要对她提防——她说，这是不公正的。

我认识一个年轻女秘书奥丽加，她通过走后门，可

① 美国的一个黄色刊物。——译者

以免费乘坐民航飞机在苏联国内许多地方旅行。她的一位同学当上了民航公司的调度员，掌管某条国内航线的乘客名单。当奥丽加想要旅行时，她只要同她的调度员朋友商量好即将起飞的航次和目的地。到了约定的那天，这位调度员就会让奥丽加排在乘客队伍的最前面，等候登上这班飞机。甚至没有机票，奥丽加也会得到头等的座位。如果飞机客满或超重——这是经常发生的事——这位调度员会告诉那些排在最后的倒霉的乘客，说是有人错误地预售了过多的机票，因而他们只得等待下一趟班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尽管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却并没有闹成满城风雨的丑闻。多亏朋友的照顾，从来没有查奥丽加的票。我从未听说她给了那位调度员什么东西作为回报，虽然这里必定有些好处。

然而，走后门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尖端。行贿也同样的广泛流行。阿拉伯人叫“小费”，墨西哥人叫“外快”，美国人叫“揩油”，俄国人叫“吃摔”，直译就是“捞进”。它的最普通的形式是：低工资（每月八十———百二十美元）的苏联商店营业员普遍地非法抬高价格以牟利，服务人员则收取“小费”。正如一位计算机专家对我说的，“没有人能靠固定收入过日子。你也知道，在敖德萨有一句俗语，如果你对一个人确实感到恼火，你就诅咒他：‘让他靠工资去过活吧。’这种

命运是可怕的。谁也不能想象。”

正如我早先提到的，我在莫斯科的第一个印象是，人民的穿着要比我预料的好得多。但当我开始把他们身上穿的同商店里实际出售的加以对比时，两者并不一致。很明显，能买到的要比看到的多。因为那些吸引人而又终年缺货的、俄国人叫做“紧张商品”的东西，是在柜台下面向售货员行贿换来的。售货员的惯用手法无非是隐藏一部分有吸引力的紧张商品，并偷偷摸摸地卖给一些固定的顾客，他们有的已事先行过贿，有的可以指望他在取货时付一笔酬金。通常一件六十卢布的雨衣要外加十到十五卢布。

这种做法十分普遍，致使苏联报纸一直在抨击它，但毫不见效。我记得给莫斯科周围城镇居民看的州级报纸《列宁旗帜报》在1973年2月登载了一篇文章，揭露了在谢尔科沃一家供应极好的海鸥商店抬高物价的典型例子。谢尔科沃是宇宙空间技术人员、科学家、国防工作人员居住的郊区。报纸说，调查员在一次检查中发现非法抬高价格的紧张商品有三十五种，包括：皮帽、皮领、“阿拉斯加”牌的女式长统靴、老式的皮鞋和靴子、绒线衫、冰岛方格花纹的毯子、奥伦堡制的手帕、羊毛小地毯、手套、茶具、公事皮包、马海毛围巾，等等。

苏联幽默杂志《鳄鱼》讽刺了这一做法，它曾模仿

百货商店的值班经理推销新到的商品的样子，嘲弄说："亲爱的顾客们，我们商店的皮革制品部已到了五百只进口的女用手提包。其中四百五十只已被商店职工买去，四十九只藏在柜台底下，已被朋友们事先订购。一只手提包陈列在橱窗里。我们邀请你们参观皮革部，去买这只手提包。"

哪里停止抬高价格，哪里就开始黑市活动，因为，正如《鳄鱼》指出的，店员们自己购买紧张商品，然后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非法出售，或者其他顾客把高档商品藏起来，然后再转手出售。报纸对这些投机者一直在大发雷霆。一张二卢布的普通戏票要付四到五卢布，人们竟把它看成了例行手续；一场热门戏花费就更多。这种做法竟习以为常。一个青年人对我说，他从投机者那里为他的"妹妹"买了一双齐膝的长统靴，那个投机者按标价付了六十卢布（外加给店员二十卢布的小费），然后向他索价一百四十卢布。学生们出外旅行买车票可以打折扣，他们就通过转卖有补贴的车票以牟利。但这种投机活动涉及的数量往往很大，如一个妇女通过国营商店的门路，买进二百条围巾、八百条手帕和大量的绒线衫，最后当她把这些商品放在手提箱里在杜尚别露天市场出售时被逮捕了；又如一个集团出卖的兔毛帽子要价三十卢布（官价十一卢布），而青灰色的貂皮大衣价格竟达五百卢布（官价二百六十卢

布)。

黑市没有固定的地点。通常只是在买者或卖者的房间里。至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易，简直是无处可寻而又到处皆是。但部分的黑市确实有固定的场所。一位莫斯科妇女告诉我，莫斯科最活跃的口红和化妆品黑市，就设在大剧院旁边沿街的公共女厕所里。这里成了妓女特别喜爱的地方，因为男警官不能闯入。我发现，进口短波收音机、盒式录音机和高保真度录音器材的黑市，一堆一堆地集中在专门经营电子器材的旧货商店前面的花园环形路上。

在俄国历史上的印刷创始人伊凡·费奥多罗夫的雕像附近，有一个莫斯科小公园，园里就是出售书籍的黑市场所：有合法的书，也有自己印刷的地下书籍。我在莫斯科时，一本地下出版的索尔仁尼琴的《癌症病房》在那里可卖到一百卢布，一部西方出版的已故的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全集三卷本要卖到两百卢布。有些在俄国国内印刷的书籍也大大提高了价格，因为出版的数量有限，丝毫不能满足需要。我记得1973年较晚的时候，已故的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一本包括三篇小说的集子（其中一篇是讽刺斯大林时期俄国的小说《主人和玛格丽塔》）曾引起一时的轰动。该书正式印了三万册，但据报道，两万六千册已送往国外销售（一位作家抱怨说，“这是为了给你们西方人士

留下印象，我们是多么自由。”），国内剩下的四千册，一夜之间全部卖光了。但我听说，印刷厂实际上秘密添印了九百册，由厂内人士出售，获得了惊人的利润。该书的定价为一点五三卢布，但黑市价格平均在六十到二百卢布之间。

然而，莫斯科的高档黑市商品有两条最充裕的货源：一是参加体育团体、芭蕾舞剧团和官方代表团到西方去的旅行者，满载各式各样的西方商品而归，他们可以从中得到一大笔利润；另一条是各“小白桦树”商店，一些有外汇收入的俄国人（如外交官、去国外工作的专家、获得外汇版税的作家、接受国外亲属礼物的人，等等）或持有“卢布证券”特殊津贴的人，才可进入这种硬通货商店。

“小白桦树”商店对黑市投机商是个公开的诱惑，因为那里有低价的稀有商品。从“小白桦树”买进，再在黑市上卖出，保证有成倍获利的效果，就象买股票有赚头一样——但不冒任何风险。例如，一个有外汇收入的犹太籍科学家，在1974年较晚的时候对我说，浅色的日本伞十分热门，在“小白桦树”只要四个卢布证券，而在街上可卖到四十卢布。他说，当意大利制的“特级步枪牌”粗斜纹布裤到货时，在“小白桦树”里售价为七点五卢布，而在黑市要卖七十五或八十卢布。商品的市价并不一直是直线上升的，但一张甲种“卢布

证券”(分有好几种)最多可以换到八个普通卢布。

苏联非法经济活动中的一项特殊创新就是半黑市，各类商品都有这种市场。特别是旧汽车半黑市，出售的车子比新汽车还要多。国家在全国各地开设了寄售商店，经营电器、服装到盆景等一切物品。这些国营商店对每一种商品标上价格，并收取百分之七的手续费。谈到汽车，国家规定的价格是很低的，但由于人们长期等待新汽车，大量的需求受到抑制，加之许多人事实上无论如何不可能列入购买新汽车的名单，因此只好买一辆旧车子。这就产生了半黑市，产生了汽车寄售商店里的两套价格——国家规定的价格和事实上由买者和卖者之间自行商定的价格。

10 月份的一个阴天的下午，我同一个朋友来到莫斯科旧汽车市场，观察它是怎样进行交易的。这是一个失修的泥泞场地，铺上从附近建筑工地搬来的水泥石板，停满了各式各样的汽车，从一辆小型的老式莫斯科人，到新的日古利牌轿车，或是一辆黑色的梅塞德斯-本茨和一辆 1968 年型的旧福特-费尔莱恩(这两辆都是几年前通过一个苏联政府机构向离任回国的外交官购买的)。一小群人聚集在各种汽车周围，察看车子或同卖主讨价还价。

我注意到一笔公开的交易。一个漂亮的黑发女人和一个留有山羊胡子的青年人对一辆用旧了的黄色莫

斯科人(一种微型小汽车,俄国人好歹可以设法挤上四个人)在进行商业上的调情。如果在别的国家或别的场合,你会以为他们正在对另外一些东西讨价还价呢。她,车子的主人,坐在汽车里,摇下了车窗,回答他轻声提出的问题,并向他温情脉脉地使了个引诱的眼色。她在谈交易时的那种逗弄姿态,引起了几个旁观者的兴趣。他绕车子兜了一圈,她跑出来夸耀自己的车子,并用一块软抹布擦干净挡风玻璃。他紧跟在后面,一面提问题,一面看车子,轻轻地踢一下轮胎,而她这时卖弄风情地让开了,去擦一块挡泥板,然后又去揩车头灯。最后,两人都钻进了汽车,谈了两分钟就开走了。

"这是最紧要的时刻,"我的俄国朋友指点说,"把车开走是因为买者要试车。但双方都想摆脱人们不必要的注意,去私下协商价格。"照官方说来,抬高价格是非法的;但这是个公开的秘密,即使在莫斯科的旧汽车市场上布满了密探,伪装成可能买车的人,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国家估价人规定的价格购买或出售旧汽车的。在绕街区试车时,实际的价钱一经讲妥后(通常高出官价几千卢布),买主与卖主就回到场地,敷衍了事地履行国家估价和寄售的手续,填写正式单据。所有这些需花三天时间,车子方能易手。

我不知道那个黑发女人对她的莫斯科人牌开价多少,但其他车辆的要价可能提供一点线索。尽管福特-

费尔莱恩和梅塞德斯-本茨已驶过相当多的哩程，每辆仍要二万卢布(二万六千六百美元)。使我感到更惊奇的是，当一对穿得很体面的夫妇驾驶一辆新的白色日古利-3轿车来到时，竟没有一个人对它露出惊讶之色。这辆汽车内部仍用防护的塑料布封着，它的路码表上只转了四百九十三公里(三百零六哩)，要价一万二千卢布(比一辆新车价格提高四千五百卢布)。我认识一位学者，他的一辆旧伏尔加牌轿车卖了一万二千卢布，可是买进时只花了五千五百卢布，而且已行驶过近五万哩。两个从阿塞拜疆来的穆斯林兄弟不管价钱多少都乐于把它买下来，准备作为有利可图的出租汽车派用场。

“他们简直兴奋得从窗口飞了进去，”我的朋友回忆说。“他们根本没有朝车底下看一看，什么也不检查。三分钟之内，他们就以相当于两辆新卡迪拉克牌的价钱买下了一辆旧车，也不开动或检验一下。他们几乎不会讲俄语或听懂俄语。他们买好了汽车后，其中一个人恳求我说：‘请帮我们开到旅馆去。我有驾驶执照，但我怕在莫斯科开车。’”我的朋友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象旧汽车市场一样，兼干私活是正在蔓延的、非法经济活动的另一组成部分，这种活动从半黑市渐渐变成了黑市。从法律上来说，俄国人从事一些有限的私人打字、翻译、家庭教师工作，或出租一间公寓房间给

度假的人或寄宿人，是合法的，只要他们付所得税，交易的价格和规模不过分。可是实际的做法早已超出了这些界限，而且利润十分惊人。莫斯科的一位工程师告诉我，住在对门的一个教语文的女教师，每月在学院的工资是一百十卢布，但她可以为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的高中学生进行填鸭式辅导而挣得五百到六百卢布。莫斯科各处布告栏上的招贴广告表明，在家庭教师这个行业中的私人成分有多么庞大。甚至有这样的说法：一个野心勃勃、十分善于个人钻营的家庭教师，除了已在某教育机构获得一份不错的差使外，还在一次有五百名准备投考大学的学生集会上介绍了他如何辅导学生补课，并当场签约成交价值四千多卢布的补课生意。家长们说，这种家庭教师能从效果出发，不去教苏联中学里那种生硬、枯燥无味和重复的课程，因而对人们具有吸引力。一位私人教师自夸说，"我们教的是学校里不教的东西——思考。"

象经济宽裕的中产阶级为进大学竞争一样，私人汽车的出现也给另一种非法的服务行业带来了真正的动力。出租汽车司机或公家汽车的司机出卖偷来的汽油或零件，以牟取暴利，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只要有点机械技术的人，就会不断有人上门来请。我听说一个每月有二百卢布固定工资的汽车技工，经常替私人修理汽车，每月至少可拿到七百至八百卢布的外快。一

位工程师对我说，“这位技工赚了很多钱，可以给准备投考大学的两个儿子聘请私人教师。一个孩子要补习三门功课——数学、物理和英语。象这样的私人上课，几个月下来费用是很昂贵的。这位技工单为那一个孩子就要花掉一千多卢布。但是为了负担这一笔费用，他正在捞足尽量多的外快。”

兼干私活的人提供的服务项目应有尽有。女人们极欲使自己的服饰做得时髦一点，出出风头，可是苏联工业目前还没有学会做这些东西。她们就拿了衣料去找私人裁缝，或者向国营商店的女裁缝行贿，要她们照西方杂志上的服装式样或照片裁制。一些知识分子和权贵们的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条件较好的私人托儿所去（索尔仁尼琴和文学评论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给自己的孩子包了一个托儿所）。我认识一位给一个著名的国际艺术团体治疗的牙科医生，他不辞劳苦地把医疗器材从固定的诊疗所搬到公寓，在家里重新安装后私人开业行医，生意非常兴旺。这个人对病人细心照料，不象国家门诊部的那些牙科医生，钻孔连奴佛卡因都不用，一见到严重的蛀牙就拔掉。曾经偷偷去看过牙病的一位美国妇女对我说，“他镶的牙确实不错，他还会制作假牙或齿桥。”

非法经济活动中的价格有时也会极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默里·弗罗姆森，一次雇用了一

个自由单干的苏联摄影师为他做些事，而这个干私活的人开出来的费用使他大为吃惊，他拍的每个镜头竟索价三卢布(四美元)。

“这是自由经营者一般的风格，”这位苏联摄影师为自己辩护说。

“嗯，可是却缺乏竞争的风格，”弗罗姆森反驳道。“在自由市场上，你开的价钱叫你马上就没有生意。”

然而，使我感到惊愕的是，竟会有那么多的人参与了这一活动，有那么多的货币在非法经济活动中流通，以及有那么多的人——他们都极想有按时完成的服务或象样的服务质量——会愉快地转而请教那些捞外快的人。例如，苏联的房屋建筑质量极差，崭新的公寓房子普遍地需要修理。一次，我看到报上文章指出，工人在安装门窗时故意马马虎虎，管子漏水也不过问，电灯开关、门铃的线路都没有接好，等等，以便再去给住户干私活，捞取外快。据作家协会的周刊《文学报》可能是较低的估计，仅仅莫斯科一地，新公寓的户主们每年为基本修理至少要付给非法投机者一千万卢布。

这个数字只不过是开始暗示了非法交易的范围以及人们依靠非法交易的程度。因为报纸上定期揭露出来的情况表明，不仅个人对非法经济活动有所需求，而且集体农庄或工厂也求助于它。1974年年中，《文学报》登载了一篇关于两个集体农庄主席购买非法投机

商的赃物而被判罪的报道。他们并不是为了私人利益，而是想完成农庄的经济指标。一个农庄主席急需装苹果用的柳条箱；另一个农庄主席很想为一座牛棚弄到一些管子，可是没有一个人能通过正常的途径及时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农场和企业也有求于私人建筑队来帮忙，不然就无法按时完成任务。有人告诉我，这种做法在西伯利亚和北方特别流行，在那里甚至因条件艰苦，支付津贴费的公司也很难招到固定的工人。虽然官员们应该遵守雇用临时工的规定，但从报纸报道和俄国人私下谈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劳动队实际上是小的“私人公司”，经常同国营农场、企业或建筑机构签订合同，按照双方商定的期限和价格，建造房屋，敷设管道或铺柏油马路。这些建筑队每天的工作时间较长，完成任务比正规的建筑工人快得多，并因此而享有盛名；而那些正规的建筑工人则因怠工、浪费和拖延时间而声名狼藉。

俄国人往往根据自己亲身的经历谈到一些小规模的非法经济活动，但报纸也偶尔揭露一些苏联的大规模贪污案件。1973 年，报纸报道了一个贪污集团在立陶宛私吞了价值二十六万卢布的纺织品和纤维品；另一个集团在阿塞拜疆非法销售六十五万卢布的水果汁；还有一个集团从一家莫斯科钻石加工企业中偷窃

了价值七十五万卢布的宝石。1975年初，另一个集团在莫斯科受审，它的头子在秘密交易中净赚了二百万卢布左右，因而被判处死刑。主犯米哈伊尔·拉维耶夫是高尔基大街上的塔吉克商店经理，他被起诉的理由是：贿赂国家检验员，低报各种丝绸、酒类以及从塔吉克共和国运来的特产的价格，然后商店以高价出售这些商品，他就从中贪污了这笔差额。

然而，黑市交易比较高水平的做法，即把所有非法经济活动——从偷窃、伪造账册到制造、销售和分配——综合在一起的做法，要算完整的地下私人工业了。这类工厂在各地都有所揭露。1972年，巴什基里亚有一整座工厂被破获，它生产塑料制品、台布、妇女的凉鞋以及其他物品。两年后，报纸登载了一则消息：在敖德萨有一帮人开设了一家非法的毛皮工厂，用国家的生皮制成时髦的外套，获得十分可观的利润。

然而，近几年来，在苏联格鲁吉亚围绕地下工业发生的轰动一时的丑闻，可算是首屈一指了。

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生活，具有一种拉丁民族的独特风味。第比利斯的人民、气氛和习俗，与其说接近莫斯科，倒不如说更接近于地中海各国。第比利斯的街道，更多地是以诗人而不是以人民委员命名。黄昏时，凉风习习，黑眼珠的格鲁吉亚人沿着鲁斯塔维里

大街懒洋洋地漫步游荡。在炎热的早晨，工人们流向尘土飞扬的中央广场。狭长、多坡的大鹅卵石铺的道路，蜿蜒曲折，象干涸了的河床，躺在旧区装有铁花栏杆的阳台下面，使人们想起了贝鲁特或阿尔及尔的小巷。追求时髦的青年人走进糖果点心店或美发厅，向外国人做手势，表示愿花五十卢布买一双英国式拷花轻便皮鞋，或花三十卢布买一件漂亮的衬衫。傍晚，人群停下来观看警察穿过来往如梭的车辆追逐青年人；不象俄罗斯人，这里没有一个人肯出力同当局合作。人们从这里可以明白无误地嗅到西西里人那种目无纪律的气息。

1893年，据一位不知名的法国旅行者记载，当时该城有一百二十六个裁缝，一百零四个做长统靴的皮匠，四十个理发师，四个首饰匠，五个制钟匠，十六个漆匠和八个三弦琴演奏者；这说明格鲁吉亚人喜爱华丽的服饰和轻松愉快的生活。甚至在苏维埃年代，第比利斯就曾大肆炫耀自己的铺张浪费，使这个社会主义共同体看来多少有点有失体统。裁缝们照旧在缝制昂贵的服装，而格鲁吉亚人在闹市区的饭店里唱着山歌，把半箱子酒一饮而尽。他们会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把酒作为礼物送给那些偶然碰到的陌生人。有一次在旅馆的小餐厅里，他们向正在用早餐的《华盛顿邮报》的鲍勃·凯泽和我送了白兰地酒，作为一种好客的表

示。

在苏联人当中，格鲁吉亚人因下面一些事情而赫赫有名：向商店营业员付最大数量的贿赂以换取紧张商品；愿出最高的价格买进旧汽车；在莫斯科老的桑杜诺夫斯基浴室租下一个包间，以及象贵族一样，非法地包用专机，把特制的鲜嫩烤羊肉串——连同服务人员——从第比利斯运来宴请客人。一个长着钩鼻的格鲁吉亚农民，戴着鸭舌帽，留有一撮胡子，专门在莫斯科和其他北方城市贩卖热带水果，或者在隆冬季节把鲜花装在手提箱里用飞机运往莫斯科——一朵鲜花卖一个卢布不成问题。

俄国人讲了一个笑话：一个瘦小的格鲁吉亚人乘民航客机去莫斯科，途中一个劫持者挥舞着手枪，闯入机舱，要求飞机飞往伦敦。驾驶员改变了航线。不久，第二个劫持者又冲了进来，拿了两支枪，命令驾驶员飞往巴黎。当然，航线又作了改变。最后，这个瘦小而结实、有着橄榄肤色的格鲁吉亚人拿着一枚炸弹走了进来，并宣布道，“把飞机飞回莫斯科，不然我就把它炸了。”驾驶员表示同意，第三次改变了航线。当他们在莫斯科降落时，前两个劫持者被囚车送进了监狱，而这个瘦小的格鲁吉亚人则受到一个高级代表团的祝贺。

“同志，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要把这架飞机从巴黎方向转回莫斯科？”一位有点儿感到迷惑不解的高级官

员轻声问道。

“我在巴黎怎样处理这五千朵康乃馨呢?”那个格鲁吉亚人回答说。

斯大林生于格鲁吉亚,在他逝世后的二十年中,克里姆林宫容忍了格鲁吉亚人那种暴躁、热忱和嗜酒的特性。过去从苏联朋友处曾听到有关地下百万富翁的谣传,当我在1971年秋第一次去那里时,格鲁吉亚的官员断然否认了这些谣传。一位苏联记者对我说,他曾采访过一个格鲁吉亚人,这人住在一座有大理石楼梯、有后院游泳池的宫殿式的住宅里。在第比利斯,一位身材细长的学者谈到一些工厂非法生产地毯、纺织品、太阳帽檐和海滩浴装。可是当时有权势的、褐发的格鲁吉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维多利亚·西拉泽女士驳斥了所有这些含沙射影的谩骂和攻击。“我们没有百万富翁,”她在一次接见中坚定地对我说,“百万富翁就是我们的集体农民。”

十个月之后,在我第二次访问时,气氛已有所改变——党的路线也同样改变了。人们正在谈论着有关清洗的问题——这种情况正在从根本上动摇着格鲁吉亚的生活方式,并且正在揭露“地下财富”,至少有一个出名的百万富翁。(在我会见西拉泽女士时,由她的最密切的政治保护人领导的调查,实际上已在进行。)克里姆林宫最终已对格鲁吉亚那种随心所欲的经营商业的

方式感到厌烦,很显然,因为实际上它已破坏了莫斯科为格鲁吉亚制订的经济目标。至于格鲁吉亚党的新头头,政治局挑选了一位曾当过警察(内务部长)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担任,他是一个克伦威尔式的正直的人。

1972年,在我从机场进城的途中,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对我说,"新来的头头很厉害,他喜欢发号施令。他不会让投机者赚了钱跑掉,他先向每个人提出警告,然后……"他言有未尽,意味深长地摇着头。事后我听说,谢瓦尔德纳泽上任后来了个下马威,把所有内阁部长召集起来,叫他们举起左臂,于是,这些人手上戴的昂贵的进口金表露了出来,然后命令他们把这些象征资产阶级生活的东西扔到桌子上,以示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事件的中心人物、苏联式的"教父"奥塔里·拉齐什维利,从前是个庸庸碌碌的司机,大学经济系的肄业生。从六十年代后期起,拉齐什维利勾结了一些商人,合伙建立了一个私人地下企业网,从而发了横财。有几个俄国人告诉我,他同共和国党的前头目瓦西里·姆日阿瓦纳泽关系密切,以至他和他的同伙可以在第比利斯雇用和解雇共和国的部长、党的高级官员、直至这个地区的最高官员——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党书记。虽然他谦逊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小小的合成

纤维实验室的主任，苏联《劳动报》说，拉齐什维利是“一个地下百万富翁，当他最喜爱的足球队踢赢时，他就在莫斯科、基辅、阿拉木图的饭店里设下价值一千卢布的宴席。”他有两座附设有游泳池的别墅，一座在第比利斯附近，另一座在黑海之滨的阿布哈兹。

工会报纸《劳动报》透露了拉齐什维利和他的同伙——共有八十二人在一起案件中被控告——诈骗了价值一百七十万卢布的国家物资。这个集团利用实验室为掩护，迎合那些愿意出高价购买紧张商品的苏联人的需要，生产高领绒线衫、围巾、塑料雨衣、海滩拖鞋以及大多数苏联人在购物时“必须”携带的各色尼龙网袋。《劳动报》说，“事实上，这是一家私人商行，叫拉齐什维利公司。”“调查时，警方〔在商行里〕发现价值十多万卢布的人造革茄克、绒线衫、针织品和其他物品——没有一件在〔政府的〕货单上登记过。”据后来揭露，至少还有三家工厂在搞投机，一家隐蔽在山区，另两家在第比利斯正规的工厂企业内活动。

按照苏联报纸解释，私人企业家的主要手段是利用计划工作中的漏洞，向国家骗取他们搞生产所需要的原料。譬如说，一家工厂获准生产尼龙网袋，每只需要十四盎司的合成原料，而实际上每只网袋只需一盎司。剩下的原料就成了私货。有的国家生产定额可以在一班的时间内轻易完成，但车间却偷偷地开两班。为

了增加产量，甚至还多开了五台机器。

拉齐什维利的毁灭，是他和谢瓦尔德纳泽之间不可调和的仇恨逐步发展的结果，这种仇恨在1972年谢瓦尔德纳泽担任党的头目之前就已开始了。在过去的日子里，拉齐什维利经常是党的前头目姆日阿瓦纳泽（尼基塔·赫鲁晓夫安插的人）的座上客。姆日阿瓦纳泽是莫斯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嗜酒如命、生活奢侈、喜爱虚荣、意志薄弱的领导人，很大程度上受他妻子的影响。他的妻子以喜欢接受商人、部长和官员赠送的贵重的皮裘、珠宝和许多奢侈的礼品而闻名。在莫斯科时，有些党员和同党有密切关系的人告诉我，在姆日阿瓦纳泽担任格鲁吉亚党的头目的十九年间，他们夫妻俩曾有好几次成了百万富翁。

在拉齐什维利全盛时期，有人说他把第比利斯市党的负责人当作是自己的保护人。据说，他一度企图撤换难以对付的敌手、担任党内重要职务的谢瓦尔德纳泽，谢瓦尔德纳泽正是在担任这项职务时开始干涉拉齐什维利的地下工业王国的。但是，身材细长、清秀、生活朴素的谢瓦尔德纳泽毕竟用一张伪造的彩票诱捕了拉齐什维利的一个同伙。当这个人去领奖——一辆新的伏尔加牌汽车时就被逮捕了。尽管上诉到莫斯科的最高庇护人，拉齐什维利最后还是被捕并定罪。但是从1973年2月对他的判决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一

些蛛丝马迹，说明他仍能向格鲁吉亚的法院施加影响。而在别的地方，许多比他小得多的家伙却因一般的涂改账目而被判处死刑，而拉齐什维利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随着“教父”靠了边，清洗运动把各式各样的党和政府的官员撤了职，几个中级官员被关进了监狱。苏联报纸公布的经过修正的经济统计数字，透露了格鲁吉亚过去几年在完成计划方面遭到多大损失，以及贪污腐化如何把它的经济搞得千疮百孔。据专门研究党务、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称，格鲁吉亚新任的检察长想要追究党的前头目姆日阿瓦纳泽(他已于1972年9月被撵出政治局)。虽然麦德维杰夫说过，“有足够的证据”可以下令搜查姆日阿瓦纳泽在第比利斯豪华的巴诺夫大街上的公寓，以及在皮聪大、伊赫涅捷和利卡尼疗养地富丽堂皇的乡间宅邸，但克里姆林宫领导集团阻止了这一调查。这一案件就此秘而不宣了。麦德维杰夫认为这同水门事件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说明在苏联由党的领导人出面干预刑事诉讼案件，“并不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他说，党的官员们只有在上级批准时才能受到调查。

实际发生的情况要比外界人士了解的多得多。对党的官员们的调查和审判是秘密进行的，因而不会玷

污党的公开形象。例如，一位苏联记者告诉我，1973年较晚的时候，伏罗希洛夫格勒州有四名重要的党的官员因贪污罪而被秘密审讯，最终导致该州的党魁弗拉基米尔·谢甫琴柯被强令退休。但了解内情的苏联人说，在这种案件中，其主要动机往往并不在于迫切要求肃清党内的贪污，而是由于长期以来内部敌对派系之间政治上的倾轧。这位记者说，在伏罗希洛夫格勒案件中，乌克兰党的负责人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一直在伺机调动一个敌对派系的重要成员谢甫琴柯的职务，而贪污则提供了有用的借口。据党员们说，在党内还有其他许许多多贪污案件，没有受到惩罚。一位来自北方城市的党员、女工程师对我的一个朋友抱怨说，"他们搞这一套已变得如此明目张胆。在我们城市里，党的头头们只要打个电话给毛皮制品工厂，就可以叫人把皮大衣送来给他们，分文不付。"另一个有相当地位的莫斯科人说，负责为莫斯科党的机关服务的特殊商店的官员，通过非法交易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

在我旅居莫斯科期间，最出名的案件牵连到了文化部长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她一度是赫鲁晓夫的宠儿。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她成了苏联历史上第一个女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几年间，流传过有关准备搞掉她的说法，因为她是赫鲁晓夫遗留下来的人。可是她紧紧掌握住自己的文化部。她精力充沛、能干、

嗜酒、讲话粗鲁，在文化事务上交替采用强硬与温和的手法。后来在1974年春，风传她犯了错误，并将丢掉她在最高苏维埃的席位（这是她长期以来每次选举时稳得的职位），而且很可能还会丢掉文化部长的职位。借口是关于一所豪华的乡间别墅的丑闻（价值约十二万卢布——合十六万美元），这所别墅是她在权贵们的别墅区里为她已成年的女儿斯维特拉娜修建的。福尔采娃和她的丈夫、外交部副部长尼古拉·费留宾早已有两所别墅，一所在莫斯科郊区，另一所在黑海之滨。

这桩丑闻最初在造新别墅的莫斯科建筑托拉斯的工人中间、后来又在党内人士中流传开来，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这是她的第三座别墅，而是因为她按照打了折扣的批发价格支付建筑材料费，而且公开以她女儿的名义建造这所别墅；她如此厚颜无耻地把享受特权的权利移交给下一代，以致一些党的官员也不以为然了。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建筑托拉斯的经理同意削减价格，因为福尔采娃在五十年代中期担任莫斯科党组织负责人时，这位经理曾获得一项重要的国家奖金，因而他对福尔采娃感恩戴德。当这个流言传开以后，有报道说党的领导曾决定要她按原价支付别墅的建造费用，补偿国家六万卢布左右（约八万美元），她在两天之内就付清了这笔款子，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证明一些高级官员聚敛的财富多么惊人。

虽然福尔采娃偿还了这笔费用，私下的议论仍然认为她会被撵出内阁。当丑闻在外国报界引起轰动时，据说她曾两次去见勃列日涅夫，要求保留她的职位至少到1974年6月新内阁正式就职之后。不出所料，福尔采娃确实丢掉了在最高苏维埃的职位。她对勃列日涅夫提出的请求，以及国外宣扬这桩丑闻所引起的复杂情况，显然说服了克里姆林宫保留她的文化部长职务；不然的话，如果撤销她的职务就等于公开承认了这一丑闻。福尔采娃于1974年10月25日在任职期间去世。

除了这种耸人听闻的滥用职权案件外，在苏联的非法经济活动中只有一小部分在西方会被认为是刑事犯罪行为。固然，在苏联存在着贪污盗窃犯，偷窃汽车集团，妓女，毒品贩子，武装抢劫银行者，以及伪装成警察、穿着整套制服、带有手铐和证件、迫害无罪者的临时组成的敲诈勒索集团。这些违法乱纪的人在任何国家都会成为刑事罪犯。但是，倘若苏联的共产主义教义允许那种在匈牙利、波兰或东德牌号的共产主义下合法存在的少量私人贸易成分生存的话，那么，在黑市上的许多私人交易就不会成为非法了。至于大多数捞外快的活动，正如1974年10月《共青团真理报》在一篇冒险的评论中所大胆指出的：错就错在这个制度没有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需要。

有时，也仅仅是非常少的时候，有迹象表明，党内统治集团中有人有意无意地使当前捞外快的私人企业的某些方面合法化。1971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应该考虑创造条件，使某些人“或者单独在家里或者组成合作社，都能在服务行业中做些工作。”十六个月之后，《文学报》登载的一篇文章指出，俄国人可以向东德、匈牙利和波兰学习，允许个人“在服务行业范围内有某种行动的自由”。作者想到了小商店、咖啡馆、妇女服装商场、小饭馆以及修理服务商店。但是这个主意并未产生结果。那种活动仍被看作违反法律的行为。

说也奇怪，尽管对贪污提出了种种非议，政府似乎对非法的经济活动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任何热中于搞集中控制的制度，必然会认为一切不按计划、不遵守规定的活动是该诅咒的。对于国家财产遭到巨大损失以及人们在工作时间内因从事非法的兼职活动而明显地浪费了大量时间，当局确实感到震惊。共产党担心贪污成风会引起道德败坏和品格寡廉鲜耻。

但是这个政权面临着困境。正如一个俄国人对我说的（也反映了其他许多人的看法），“在苏联的零售交易中，每个人都是小偷，你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关进监牢。”当局采取的实用主义政策是抓住、揭露和惩罚那些最大的非法投机倒把者（只要他们不使共产党直接

感到难堪)，而对数百万小的投机倒把者只限于给他们设置一些障碍而已。一位经济学家认为，从某一方面来讲，当局勉勉强强地容忍"小人物"的个人贩卖活动的存在，把它作为消费者失望后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渠道，并可转移人们对这一制度进行任何更严重的挑战的注意力。他解释说，共产党知道，在非法经济活动中追求非法商品的人们并不担心会出现改革。而且，只要公众把非法经济活动看作是生活上必不可少和愿意接受的事实，他们就很少有可能在采取严厉的改革措施方面同当局进行合作。

难怪在俄国人中间有一个含泪而笑的笑话，这个笑话反映了他们认为贪污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并且把这种恶习说成是美德。

"我认为，"伊凡对瓦洛加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富的。"

"为什么？"伊凡问道。

"因为，近六十年来，每个人一直在偷窃国家的东西，而且至今还有剩余的东西可偷。"

四 私生活

作为人民的俄国人[①]

同志们，我们现在所建设的不是一个河里流着奶与蜜的懒人国家，而是人类历史上最有组织、最勤奋的社会。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将是历史上最勤奋、最认真、最有组织和最有政治觉悟的人。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72 年

当门开的时候，我一瞬间竟以为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复活了。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同样嶙峋的面貌。一双灵敏、和蔼、深思的眼睛在突出的颧骨上向外张望。花白的头发看上去蓬蓬松松。前额稍微高一点、下巴稍微长一点，同样健壮而瘦削的头，同样细长而脆弱的脖子。站在门口的这个人没有我根据照片所想象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那么高。但容貌是如此惊人地相似，以致我竟木然站在那里好一会儿才向诗人

① 英国作家赖特·米勒出版了一本以《作为人民的俄国人》为题的很好的书，从中我增长了不少的见识。

的长子热尼亚介绍我自己和我的妻子，他热情和蔼地欢迎了我们。经过一月复一月，一年复一年，我们对于热尼亚、他的妻子阿廖尼娅、他们的儿子鲍里斯和别佳以及他们的小女儿莉萨逐渐熟悉起来了。

遵照帕斯捷尔纳克——热尼亚总是称他的父亲为"帕斯捷尔纳克"——的劝告，热尼亚放弃了艺术，因为艺术在政治上是太危险了。他本是工程师出身，现在成了自动控制系统专家，但是面对这个政权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矛盾态度，他的真正使命和热情却是搜集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件和其他未发表过的著作，将其付

画，从墙上给拿了下来，以便给临时凑合的银幕腾出地方。影片使这家人的一些朋友感到失望，他们认为人物的塑造太肤浅，他们还对影片似乎是宣传性的结尾很有意见：一对青年人在大坝旁漫步走去，很象苏联官方电影，却不象帕斯捷尔纳克。但热尼亚比较宽容，他认为影片把握了日瓦戈的自由浪漫精神，而且在主要方面也还是忠于帕斯捷尔纳克的。

令我久久不能忘怀的一瞬间是，影片描绘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从巴黎乘火车回莫斯科，青年日瓦戈同他的父母给予她温顺、怯生生的欢迎时，所有在座的，不管是外国人或俄国人，无不对这样的处理哄堂大笑起来。欢迎是粗鲁、冷淡的，按照西方的方式，匆匆忙忙、没精打采、不动感情地对着脸颊的轻轻一吻和握手，导演和演员显然不知道俄国人在车站上接人或离别时的那种热情奔放的感情流露。俄国人在这种场合会沉浸在无休止的紧紧拥抱之中，在两边脸颊上热烈地连吻三次，而不是摆样子似地吻一下，他们的接吻是有力的和坚实的，而且常是吻在嘴唇上，不仅是男人和女人之间，或女人与女人之间，而且男人同男人之间也是如此。西方人惯于把这种接吻贬低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个人癖好：赫鲁晓夫同着一身士兵劳动服的大胡子菲德尔·卡斯特罗象熊一样拥抱是赫赫有名的。但这是俄国人的方式。俄国人总是旁若无人、兴致勃

勃地领略这种久别重逢的乐趣并对离别的悲哀感到难舍难忘，仿佛这不是一个公开场面。那天晚上电影所表现的是如此平淡，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是如此不相称，以致在电影结束之后，俄国人还笑个不停。的确，在全部影片中，除了日瓦戈和拉拉之外，所有人物的谈话都缺乏柔情蜜意的细声低语，以及家人、朋友或者甚至近邻之间彼此不加思索大量使用的爱称，这就毫无甜蜜滋味。这些小小的亲密话是俄国人的亲密关系中令人愉快的特色之一，而正是这一点，外国人在看到一般的生硬粗暴态度时，往往容易忽略过去。

有一天我在一次爵士音乐讲演会上所看到的那种完全缺乏热情的反应，则是俄国人在公开场合的一种比较典型的形象。演讲人列昂尼德·佩列维尔泽夫，是对美国爵士音乐的一个真正的权威。他的讲话又生动、又热情，还用了极好的爵士音乐录音来举例说明，对于很少有机会听到这类杰作的苏联听众来说，确实是一次难得的享受。然而没有一个人随着节奏上下来回地点过一次头，也没有一个人和着音乐的拍子捻动或拍打过两个手指。没有人轻轻地敲脚。没有自发的鼓掌。人们用心地、一动不动地、毫无表情地听着。听众是一千名青年人，弄到票子很不容易。他们专心地听着音乐和讲解，但没有流露任何感情或有节奏的动作，表明音乐对他们没有任何触动。他们普遍的冷漠态

度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后来我问一位青年教师这是什么缘故，为什么听众对于音乐没有反应，是不是他们不喜欢它。

“哦，不是，”她说，“我们的感受是在内心里。但我们这里认为在这样的讲演会或音乐会上公开地表示感情是不妥当的。我们克制了自己。”

在火车站上的热情奔放，在爵士音乐讲演会上的自我克制，这两种令人困惑不解的两重性，是俄国人生活中最令人费解的现象之一。作为一个民族，俄国人所具备的那种使得他们能够坚持到底，终于在俄国严酷的寒冬拖垮拿破仑和希特勒大军的坚忍不拔、强韧不折、刻苦耐劳、容忍克制等美德，曾经遐迩闻名。这种外在的顽强不屈，在公开场合常常表现为粗鲁的漠不关心、消极的宿命论和盛气凌人的不礼貌。西方访问者常常谈到俄国街头群众的阴郁拒人的面容和服务人员粗暴乖戾的态度。在我们初到俄国的头几个月，当我在公共场合在较近距离碰到俄国人的时候，我记得在我向他们点头或问好时，我所得到的唯一答复就是一种毫无表情的瞪瞪眼睛。一个俄国人告诉我，象国际旅行社这类其雇员经常同外国人打交道的苏联机构，都得到了专门指示，叫他们要多向西方人表示笑容，因为西方人希望这样。

的确，俄国人尤其是莫斯科人，在公开场合常常显

得粗鲁、冷漠、顽固、没有人情味。但在私下，在得到信任的圈子里，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热情、最快活、最慷慨、最易动感情、最好客的民族之一——通常是在家人和亲密朋友之间，但如果触动了个人的某种移情作用的弦，结交新朋友往往也很快。我指的不是苏联官场在一个来访的代表团来临时装出来的象勉强客人多喝一杯伏特加之类虚情假意的友好表示，而是指那种真正的、无私的、暖人心怀的友谊。约瑟夫·勃罗德斯基是一个有爱尔兰人容貌、脸上长着雀斑的诗人，当我们在一个寒冷的下午在莫斯科溜达时，他对我说："俄国人，在他们的贫困方面，在其精神的强烈方面，在坚定的个人关系方面和感情容易激动方面，就象爱尔兰人一样。"

这种冷漠和热情的两重性，部分地是由俄国的气候和历史所锻炼出来的俄国人心灵和气质的深刻两重性所产生的。它使俄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既是禁欲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既是长期忍受苦难的烈士，又是自我放纵的享乐主义者，既恭顺，又不驯服，既自以为是，又虚怀若谷，公开场合华而不实，私下里又朴实无华，既漠不关心，又体贴备至，既凶残，又有同情心。

一位埃及新闻记者提醒我说，陀斯妥也夫斯基在他的作品里曾说过俄国人是一半圣人、一半野人。他的肥胖的俄国妻子接着补充道："俄国人既能多愁善感，

又能冷酷无情。俄国人能够一会儿因念一首诗而痛哭流涕，过一会儿又能在同一地方把一个仇人杀死。”很了解俄国人性格的英国作家赖特·米勒在1973年出版的《谁是俄国人？》一书里追述了可怕的伊凡雷帝在盛怒之下杀了自己的儿子，然后又懊丧不已地跪下来忏悔，或者一会儿劫掠寺院，一会儿又捐献巨款。我曾在一次更为世俗的场合体验了这种变幻无常的心情和道德思想。一天晚上，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里我惊异地看到俄国观众被一出肤浅庸俗伤感的戏剧感动得流泪，这出戏以一种可以预料得到的人类友爱的调子而收场。在我周围的妇女感动得直擦眼泪，甚至连鼓掌也不能参加了。但过了一两分钟，正是这些妇人在衣帽间里争先恐后，穷凶极恶地你推我撞，观剧所得到的教训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哭泣与推撞都是内脏感情，它们是打肚子里来的，不是从心里来的，”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后来对我说，“这对俄国人来说是很典型的。”

不过，俄国人行为举止的这种两重性，还有另一个根源。在他们的极权主义环境里，俄国人从童年时期起，就对于地位和礼貌，对什么事行得通，什么事行不通，什么事能够蒙混过关，什么事最好不去尝试，养成了一种敏锐的辨别能力。他们顺从他们的环境，扮

演希望他们扮演的角色。就好象故意装成患精神分裂症一样，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分成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两部分，并在“官方”关系和私人关系之间作了区分。当然，在任何地方，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这种情况，不过由于强求一致的政治压力，俄国人比别人分得更鲜明罢了。就这样，他们对于他们的两种生活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准则，在一种生活里，他们是沉默寡言、伪善、小心谨慎、保持戒心、消极，在另一种生活里，他们健谈、诚实、直率、坦白、热情。在一种生活里，思想和感情都受到了抑制。（“我们的公共生活是一种活的谎言，”一位实验物理学家曾苛刻地评论说。）在另一种生活里，感情无节制地热情地流露着。

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表现的规模也大不相同。比如说，莫斯科的表面景色就具有一种浮夸的外表。斯大林建造了七幢仿哥特式的摩天大楼，象笨拙地由砂石筑成的带飞檐的城堡一般耸立在城市之上，大楼的尖顶上则冠以红星。比较新的一块市区林立着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的、由预制构件建成的又粗又大的公寓，单调得索然无味（在全国各地的城市里都如法泡制这种格式的建筑）。象苏联所有的建筑物都容易立刻变得陈旧一样，这些建筑也都马上带上了麻点，并且变得灰暗起来。它们总是光秃秃的，没有草坪或灌木丛，没有百叶窗或花坛，就象是一群失修的海轮搁浅在某个荒

瘠不毛的海滩上，其庞大的形体，使来往的行人显得就如同侏儒一般。市领导人最喜爱的当地独特风光之一是俄罗斯饭店，这是他们迷恋于巨大建筑物的一个标志。这恐怕是欧洲最大的饭店了，有三千零七十六个房间，五千七百三十八张床位，九个餐厅，二十所自助食堂，六个宴会厅，回廊有十哩长，但没有空气调节设备。街道的宽广也是气派十足。穿越市区的林荫大道有十、十二、十四条单行车道那么宽，广阔得使纽约市第五街相形之下就仿佛是附近的一条小街了。

俄国人公共生活方面的另一种浮夸建筑物是大于真人的雕像。在莫斯科，中心圣地就是列宁墓。其他城市的中央广场也都竖立着巨大的列宁塑像，通常是穿着一件被风卷起的大衣，满怀信心地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或者目光炯炯地高举着手，劝告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这种艺术形式的生气勃勃的公民精神，在伏尔加格勒高大的、引人注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碑上鲜明地表现出来了。那是一座屹立在山顶上的一百六十呎高的俄罗斯母亲雕像，她举着剑直指敌人，斗争中的牺牲者被虔诚地埋在她的脚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雕塑方面一个最为老一套的题材，就是树立在莫斯科的、具有传统风格的共产主义建设人物的巨型不锈钢雕像——一个强壮的青年工人，一只手紧握着一把锤，另一只结实的胳膊紧挽着一个高举着镰刀的壮

健农村少女。在附近，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的旁边，为了纪念苏联空间成就，装了一支引人注目的向上倾斜作向天空发射状的火箭，火箭拖着的尾气有十五层楼那么高。

这些纪念碑规模之大，是探索公众的爱好及深入了解苏联人性格的一个重要线索。俄国人喜爱使人肃然敬畏的建筑，给人深刻印象的宽广马路、辽阔的景色和显示力量、表现巨大业绩的形象。他们具有得克萨斯州人那种对于过分庞大事物的爱好，超过了一般美国人对于庞大事物的爱好；就象苏联人把国民经济增长奉为金科玉律的观念超过美国人现在已经动摇了的、认为经济发展会自动带来幸福的信念一样。俄国人有保罗·布尼安[①]的精神，为他们建筑在西伯利亚宽阔河流上的水电坝的无比宏伟而自豪。他们为他们的载重汽车、炼钢厂和洲际火箭的规模巨大而洋洋得意。规模巨大就是力量。

但在他们的私人生活方面，他们却力求避免巨大，而把事物缩小到人的规模。莫斯科或任何其他城市的内部风景和它们浮夸的外观大不相同。走过寂静的、被脚踏坏了的、不整洁的庭院，进到阴暗的入口通道，登上吱吱作响的老式的装有两扇门的木制电梯，我感

① 美国民间传说中的一个伐木巨人。他用一把斧子就可以完成种种超人的事情。——译者

到自己在作出调节以适应一种不那么做作、不那么傲视一切、比较合乎人情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上交游广阔和比较富裕的家庭，有成套蜡克家具，但在我们访问过的几十所公寓房屋中，还有许多房间里摆设的大多是些七拼八凑的桌椅，就仿佛是从不同的顶楼里拿下来似的。房间不亮，色彩暗淡，但俄国人并不在乎。他们把床在白天当长沙发用视为理所当然。有时在一个大的房间里用帘子把父母卧处和子女卧处隔开，特别是在大门上装有五个门铃的集体公寓，每一个大房间住着一家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地毯是不大有的。根本没有什么专门吃饭的房间，最大卧室里的写字台就权充饭桌。许多公寓似乎处于经常的但却舒服的混乱状态中。即使有客人来也不大会匆忙地特别收拾得干净些，就象这些房间的主人不大会因为有新客来而换上一套新衣服一样。只有在节日或俄国人正式准备接待外宾的时候才会这样。俄国人家庭的生活方式是自然而质朴的。我觉得这是俄国人生活最吸引人的特点之一，是同俄国人私生活一般不铺张招摇相一致的。俄国人不象美国人那样，比如不需要为了外表好看，为了不落后于这家人或那家人，为了擦洗得雪亮，为了使身上始终没有一点臭味儿，为了气息芬芳和经常容光焕发而操那么多心。在俄国，尽管一个人脸上有粉刺、外貌不扬、满身臭汗、衣衫褴褛，仍然可以受人接

待。

我们也发现，在俄国家庭里真正受欢迎的客人通常都是立即被引到那最差的然而却是最温暖的地方——厨房里桌子旁边，如果厨房大得足以容纳超过两个人的话。不管是在厨房或起居室，桌子在俄国人家庭里总是一个中心的地方，这是从农村生活带来的一个传统。不象西方人有他们的鸡尾酒时间和会客厅，在朋友来访的时候，俄国人总是立即请他们到桌边来。通常桌子很小，很拥挤，但也更亲切，因为总是生活得很接近的俄国人，喜欢身体靠得很近的。

有一个星期日在帕斯捷尔纳克家里吃午饭，十个人围着一张跟美国家庭吃早饭的地方放的差不多大小的桌子。孩子们和成年人以及祖父不分次序地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一直是不自觉地膝盖碰膝盖，就象俄国人买东西的时候或在教室里站着的时候彼此相碰一样。如果我们是特别的客人，也许可能为我们特设一桌，但我们彼此象家人一样，所以桌上餐具的摆设也就象家人就餐那样——大小不一而又不成套的菜盘、普通饭馆用的刀叉和汤匙。饭菜很有益于健康，但很简单，分量够吃，但不过分——油醋酸菜、黑面包、象清水似的蔬菜肉汤、牛肉馅饼、土豆和豌豆，甜食是甜味冰柠檬水苹果片。那毕竟是一顿星期日的午餐，如果是平常饭食，那可能很差——荞麦粥、一点干酪和少量

咸鱼或熏鱼，几块黑面包，也许还有点香肠和茶。

不过，桌子不仅仅是俄国人吃饭的地方，它同样也是一个聚会的场所。安和我常一连几个钟头同俄国人围坐在桌子旁边，一面喝着深赤褐色浓茶——俄国人喜欢喝滚烫的加好多糖的浓茶(有时甚至浓得发“黑”)——或者狂饮什么别的更为强烈的饮料，嚼着硬的烤面包或干酪或其他简单食物，一面无所不谈地闲聊一整个下午或晚上，甚至直到深夜。俄国人家里的桌子就等于美国人的小书斋、休憩娱乐室或壁炉边。它是社交生活的中心，人与人沟通的桥梁，交流思想感情的场所。

正是在自己的家庭里，俄国人找到了逃避他们公共生活的枯燥乏味和伪善作假以及躲避市场上令人恼火的争吵的好地方。在家人和朋友之间，他们就成了托尔斯泰小说里那种优美、健谈、富有感情的人们，彼此分享幽默、忧愁和信任，达到了一种纯朴而诚挚的亲密关系，而这种亲密关系看来似乎比通常在西方所看到的较少以自我为中心和忸怩作态。

正因为他们的公共生活受到严密监视，不能和大多数人开诚布公而坦率地交往，俄国人对于交朋友非常重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至少在城市里，都是硕果仅存者，因此，他们最亲密的朋友，就开始取代了他们所失去的兄弟姊妹的地位。他们差不多每天都要彼

此探望，就象家里人一样。他们的社交圈子通常比西方人，特别是比重视名气的美国人小，但一般地说，俄国人彼此间的关系通常则是更热情、更严格要求，更持久而且常常是更为有益。

我知道有一对夫妇，因被派往古巴出差两年，另一个家庭就把他们十多岁的儿子收下代为照管，尽管他们自己的两间公寓房屋已经很拥挤。当诗人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第三次结婚的时候，她和她的丈夫都一文不名，他们的朋友为他们买了配备全部家具的一整套公寓房间。如果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碰到困难，真正的朋友会冒着可怕的政治风险去营救他。安和我也都对俄国人的热情和感情冲动的慷慨大方有过亲身体验。列宁格勒的一位演主角的女芭蕾舞演员听到我们为我们的女儿买芭蕾舞鞋有困难，她问了她脚寸的大小，立刻从桌旁起来，把为她自己扮演的角色特制的一双舞鞋拿来送给了她。在塔什干，我们第一次会见很快就结成坦率朋友的一对夫妇，热情地把一本珍贵的乌兹别克考古发掘物图录送给我们作为纪念，这本书已经绝版，而且上面还有作者赠给他们的亲笔题词。在另一家，我的妻子很赞赏女主人刚买的相当昂贵的一套大茶杯，她立刻就把它送给了我们。在高加索，一位黑头发登山导游者听说我的母亲患癌症，很感人地把他仅有的一点儿少得可怜却很宝贵的“木乃

伊”全部送给了我们。“木乃伊”是用一些生长在高山上、由爬山人员艰难地采集来的草药泡制成的药膏。当朋友有病的时候，俄国人会不怕麻烦、不辞辛苦地赶来帮忙。

友谊不仅是对公共生活冷酷无情的一种补偿，而且也是证明个人特性的一个重要根源。“朋友是我们拥有的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东西，”一位数学家向我交心说。“在我们的生活里，这一部分是我们能够完全为自己作出选择的。在政治、宗教、文学和工作等方面，我们都不能这样做。上面总是有人影响我们的选择。但在交朋友方面却不是这样，我们为自己选择朋友。”

这种选择，至少在知识分子中间，是特别小心地作出的。因为对俄国人来说，友谊的重要成分之一，就是要在政治方面经得起信任的考验。这就赋予友谊以特别的深度并使之承担特别的义务。不必经受苏联的政治清洗、迫害和经常要求意识形态一致的压力这类暴力的美国人，不需要作出这种区别真朋友和狡猾告密者的非常重要而敏锐的判断。但苏联人却必须经常地而且始终无误地作出这种判断。

“人和人的关系在我们这里是一种非常严肃的事情，”一位科学家对我说。“如果一个外国人在参加晚宴时把俄国朋友一同带来，我们就会很生气。那会把我

们的整个夜晚都糟蹋掉了，因为我们认识一个人并开始信任他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在斯大林时代，连一个家庭的成员都会互相反对，尽管从那时以来情况已有所改善。这种除极少数人以外对于所有的人都不信任的自我保护，是使得人们不自觉地互相对立起来的政治控制的最令人沮丧而又最有腐蚀性的后果之一。“除了你自己的枕头外任何人都靠不住，”一个青年人在得知他的一个老朋友向克格勃告发他以后愤愤地对我抱怨说。在常和西方外交官混在一起的地下艺术家之中，不止一个人私下里表示担心在他们一群人当中有哪几个人正是监视别人的告密者或同克格勃秘密勾结的人。他们认为，在这些艺术家中肯定就有几个告密者。

大多数人在相互关系中形成了一种野兽般的官感。“你决不可以对任何一个并非真正朋友的人说实话，”一个茶褐色头发的儿童读物编辑解释道。“你知道，我们和另一对夫妇差不多一辈子都是紧邻。从童年时代起我就认识那个女的，但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实话。我们始终很友好。我们和他们很熟悉。他们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也到他们家里去。但他们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我们觉察得出来。”

“怎样觉察的呢？”我问。

“丈夫是个很好的人，一位科学家，”她的壮健的卷

头发的丈夫，一个科学读物作家插嘴道。“你可以同他一道喝酒，一起聊聊漂亮姑娘之类的事情，但不能谈正经事。你知道，当你遇见人的时候，你会觉察出这个人有没有批判能力，至于他们是农民、工人还是知识分子，这倒无关紧要。你会觉察出他们是不是能独立思考，如果不能，你就不会对他们讲任何重要事情。”

为了安全起见，俄国人彼此之间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不愿意同那么多的人建立个人关系，”一个人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只向少数人交心，但他们非常珍视这些人。在受信任的圈子内，俄国人彼此间关系之热烈是西方人认为既令人振奋又使人筋疲力尽的。当他们终于开怀畅谈的时候，俄国人希望对方是一个知心的人，而不仅是一个谈话伙伴。他们所要的是他们能够与之推心置腹的人，以分担他们的不幸，诉说家庭困难或跟情人或情妇的矛盾，减轻人生痛苦，或尽情地同哲学上假想敌手作无休止的论战。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有时发现这是一件怪难对付的事，因为俄国人所要的是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他们不理解一个新闻记者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同所有的人保持公开接触，公开讲明自己独立和无所偏倚的思想。俄国人所追求的不是体面或公平对待。他们要的是盟友和同党。官员，持不同政见者和处于中间的人都是如此。他们的友情是带部落性质的——既是包含一切，又是排斥一

切的。他们以朋友、派系、集团为彼此衡量的标准，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纽带，无论在激烈的政治生活或个人关系中，都要比抽象地效忠于制度或党有意义得多。他们向朋友或同伴所谋求或提供的个人承诺，是西方人除了对极少数人外一辈子很少给予的。

俄国人的感情通常是含而不露，只向亲人或密友或在特殊场合中才吐露出来。但我发现，命运的某种微小转折———一场真正的灾难、一个笑话、一种姿态、一个小孩的出现、一种个人的喜好——可以使俄国人滔滔不绝地畅谈起来，这时，如果他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知心的人，这种亲密无间和休戚相关的感情，也能施在一个初次相识的人身上，特别是如果有点伏特加酒使友谊之流畅通无阻的话。正是俄国人性格中的这种率直，这种惊人的开放，使得美国人感到在气质方面俄国人同他们很象，比复杂的法国人或拘谨的英国人和德国人更象他们自己。俄国人把这种开放叫做胸襟坦荡，他们以这种心贴心的（或可直译为灵魂对灵魂的）交谈而自豪。

俄国人的这种特性——感情脆弱——有其公开的一面。因为他们所忍受的巨大苦难，不仅使他们强化为一个逆来顺受的民族，同时也使他们软化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罗曼蒂克的民族。外界人对于普通俄国人的这种逆来顺受和不动感情的宿命论思想可以从流行全

国的口头语“尼切沃”一词中正确地领会到。这个词直译是“没有什么”，但它的转义则是“没关系”、“不必让它打扰你”、“你毫无办法”、“所以别打扰我”等意。它所表达的是：不发牢骚的耐性、漠不关心、徒劳和拒绝承担责任。吃了这个词的苦头的人虽然受到损失，但别人却很少向他道一声歉。一个美国报纸主编打算从莫斯科乘飞机到伦敦去。他早晨五点钟起身，乘汽车跑很远的路到机场去搭班机，结果发现班机并不在他票上写的当天而是在第二天才起飞。按预定计划，那一天根本就没有飞机。他的飞机票把日期写错了。在二十四小时以内没有别的飞机可乘，以致他不得不错过一些在伦敦的约会。“尼切沃”(没关系)，人们说。

但同俄国人这种性格相反的一面是，一场真正的灾难，由于它引起人们的同情，有时倒能放宽或中止规章制度的执行。听说在家庭有非常迫切需要时，外交部和护照科会在两天内就把出境护照发出，而不是通常的四五天。这种同情心受到普通俄国人的衷心赞许，因为尽管官方就工作纪律和为经济计划而献身说了种种漂亮话，使俄国人受感动的还是某人为人的热情，而不是他的工作成绩。“一个人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工作人员，但工作只是一回事，”一个秃顶的政府经济学家对我解释道。“真正重要的是他的精神，他同别人的关系。如果他太认真、太冷酷，人们就不喜欢他。我

们有个词形容这种人——'有点干巴巴。'"他把鼻子皱起来表示不赞成。"但'干巴巴'这个词更坏。最后，'面包干'，意即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最坏。"

在公开一面，这种多愁善感表现于俄国人热爱柴可夫斯基的浓厚的忧郁以及《天鹅湖》和《睡美人》之类浪漫主义芭蕾舞里的神话世界。大剧院绚丽多彩的演出对俄国人心灵的影响，就在于它把宏伟与臆造掺合在一起，从而以一种崇高的手法提供逃避现实的艺术。对于俄国人的那种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趣味来说，没有比芭蕾舞女演员脚尖立地不断旋转时薄如蝉翼的裙子褶边的回旋飞舞更有吸引力的了。象杰罗姆·罗宾斯[①]之流的舞蹈动作设计师的现代理性作品，是不会使大多数俄国人感动的。一天晚上，当纽约市芭蕾舞公司在莫斯科演出罗宾斯的一些节目时，我看到一个人由于舞蹈缺乏故事性感到莫名其妙而大步退出会场，还抱怨说，"这简直不是芭蕾舞。"对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说来奇怪的是，皇室的排场越铺张壮观，音乐越花哨伤感，布景越豪华奢侈，化装舞会越别出心裁，情绪越喧闹激昂，虚构的成分越多，观众的心弦扣得越紧，俄国人就越欣赏。

当漂亮的美国青年范·克莱本，以内心的激情演奏了他们的柴可夫斯基作品的时候，他们就爱上了他。

① 杰罗姆·罗宾斯(1918—)：美国舞蹈家。——译者

当拉·斯卡拉歌剧合唱团在莫斯科巡回演出时，俄国人简直象被他们演出的威尔第的《安魂曲》的威力与感情征服了一样，对合唱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喝彩与花束。对俄国人来说，花是表示钦佩与爱慕的一种特殊标志。俄国人最可爱的风俗之一就是到人家里赴宴的时候总要带一束鲜花，那怕是包在玻璃纸里的一朵也好。在埋葬著名人物的新圣母公墓，人们会购买鲜花，漫步在墓碑间；这里那里，在他们特别尊敬的死者墓前，放上一束鲜花。在戏院里，经理人员作为一种礼节，经常为明星演员车来盆花或花束。俄国观众受到强有力的感动的时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许多花束从观众席上举起来。对拉·斯卡拉剧团的反应不是偶然的，因为俄国人同意大利人一样，喜爱强烈的感情和十足的英雄行为。从性格上来说，他们是处于最北地带的拉丁民族。"我们一直感觉自己同西班牙很接近，"一位文艺批评家深思地说。"这不仅是因为西班牙内战的缘故，而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同西班牙人沾点儿亲似的。他们是一个高尚的民族。西班牙是一个有骑士精神和浪漫气息的国家。我们非常喜欢堂吉诃德。"的确，堂吉诃德是能够成为一个俄国英雄的。

如果说，多愁善感是俄国人逆来顺受的对应物，那么，他们的随和的、传统的和农民般的作风则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关于苏联新人的浮夸辞藻的对立面。他们是随和的、懒惰散乱的，而不是科学的、理性的和有效率的；而且他们在闲暇时是单纯而质朴的，就象他们的友谊一样。尽管在危急关头，他们可能是自我牺牲的烈士，但在其他时候，他们也是精力充沛的享乐主义者，喜欢大吃大喝、洗澡等，耽于声色口腹之乐。同科学社会主义的严格要求公然违反，在他们的内心，他们是神秘、虔敬和迷信的。

我的语言教师是一个政治上属于正统的中年人，他试图使我相信，迷信已经过时，只有穷苦和未受教育的人，或者被疾病折磨的人才迷信。她坚持说，身体健康和富裕的人是不需要迷信的。一位年纪相当大的作家对此表示同意，但补充说，正是疾病和俄国生活的艰苦，才使得俄国人坚信预兆、奇迹或征兆，使他们象异教徒似的为毒眼而非常烦恼，成为荒诞传说和民间疗法的热情传播者。我记得一位诗人曾郑重其事地劝我，出门以后如果忘记了什么，切不可再回房间去取，因为回去而又得再出来就一定会碰上坏运气。一位美貌的教师告诫我说，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女孩子的臀部亲热地拍一下，他就应当立刻拉一下她的裙子，否则的话就没有人会向她求爱了。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劝告我们一家：在任何人外出旅行之前要全家聚在一起静默一会儿，这显然是从过去宗教仪式上传下来的

一种习惯，因为当她站起来的时候，她说，“和上帝同行。”另一些人则小心谨慎地不提旅行的确切目的地，以免引起毒眼的注意。

我们的俄国女仆告诉安说，他们有一个很普通的习俗，大除夕把三张纸条放在枕头下边，上面写着“好年”，“坏年”和“中等年”几个字。元旦早晨伸手从枕头下面随便抽出一张来，看一看未来一年究竟如何。女仆说她总不敢尝试一下，因为如果她知道难免要面临坏年，她受不了这种沉重的精神负担。我们还认识一些别的俄国人，他们象东方人一样，相信以动物作代号的生肖年份所包含的吉凶意义。还有些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发誓宣称闰年是不幸的，并把1972年的农业歉收及其他一些灾害归之于这个原因。象婴儿出生这样宝贵的事情，也引起各式各样的警惕。预先起名字要倒霉，提前买礼物也要倒霉。谈论婴儿可能在哪一天出世就更不吉利。有一次我无意中问一个即将做父亲的人，婴儿该在什么时候出世，这家的一个朋友立刻打断我的话告诫说，“这样问不好。”做父亲的是个技术人员，他畏缩地回答说，“我不知道。”那个女朋友表示赞成地对他说，“这样回答最好。”俄国人认为如果一个小孩惯用左手，也是一个不祥之兆，但这也许是由于希望同别人一致而不是由于迷信。当他们看到一个小孩开始用左手吃饭或画画的时候，他们会立刻把他“纠正”过来。

不愿隔着门槛握手的心理非常强烈，因为担心这会预示着吵架；甚至我在返回美国以后，对于在敞开的门前把手伸过去还有点感到踌躇。俄国人不象我们美国人那样常爱摸摸木头[①]，但为了同样的目的，他们常象征性地向左肩后方吐唾沫。尽管俄国工程师敢造十三层楼房，但十三个人同桌吃饭就被认为不祥。星期五是一个忧郁的日子，这也许是因为耶稣受难是在星期五的缘故，但引起我的兴趣的是，俄国人广泛认为在星期一着手新的事情是不吉利的。直到某个友好的苏联记者提醒我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给外国记者安排的旅行总是在星期日晚间而不是在星期一早晨开始。在路上碰到任何一只猫，不仅仅是黑猫，都是不祥之兆。但俄国人说，当你有了一所新居的时候，应当让猫第一个进去。如果一只鸟飞进窗子里，就是大祸临头的预兆，可能预示死人或坐牢。这许多迷信的根源似乎都来自农村，就象俄国人对谚语的爱好或对民间偏方的信任来自农村一样。城市居民象农村居民一样，也常喜欢用草药或芥泥治疗简单疾病；而不是用现代药物。他们劝一个美国朋友用一枚铜币来消肿。我们看到过俄国人为了医治伤风在脖子上挂着大蒜瓣。

---

① 英美有一种流传已久的迷信，认为用手摸木头可以避免灾祸。——译者

俄国人的娱乐是老式的、单纯的、有益身心的，是一种回到大自然或临时凑合的简单而不多花钱的消遣方法。电视，除了体育节目外，大多是很枯燥乏味的，而且苏联又是一个机器制造的娱乐设备远比西方为少的国家——没有让驾车者坐在车内观看的露天电影场、弹球机、穿四轮溜冰鞋的溜冰场，没有赛车跑道，几乎没有滚球戏球场或者与美国科尼岛[①]相媲美的娱乐场。问一下苏联官员关于假期活动的情况，他们会滔滔不绝地大谈如何有千百万人（实际的或者仅是纸面上的）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或者到疗养院去度有工会津贴的假期。这些有时很难弄到的降价的假期休养证是在苏联制度下给普通人提供的最大福利。因为，象德国人一样，俄国人非常看重健康医疗、硫磺疗法和泥浆浴。在我的公事旅行中，我曾好几次看到工人们在疗养院把胳膊或大腿浸在盛着热泥浆的澡盆里，或者看到妇女吸着硫磺烟气，一面宣称花二百美元到疗养院度过二十六天是一个理想的假期。

但官方设备和官方计划只能解决苏联闲暇时间很小一部分的问题。极大多数活动是比较不正规和规模较小的。男人，不分老少，在公园长椅上围成一团——我曾以为是在下棋——但往往是在打西洋骨牌，

① 科尼岛，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地方的一个海滩和娱乐场所。——译者

而且通常还有相当大的输赢(俄国人也很喜欢买彩票)。作为业余消遣的玩赏动物又时行起来。在莫斯科的"鸟市",一个散乱、泥泞、露天的旧货商场,每逢礼拜天都有大量买卖成交;人们在那里卖鸟儿、巴巴多鱼、热带鱼、兔子、猫、狗、天竺鼠和其他玩赏动物以及给这些动物吃食和栖息的自制设备。青年人的一种狂热爱好是收集别在西服翻领上的纪念别针。这种习惯作为一种风尚,似乎已经超过了收集邮票和钱币,并导致全国各个城市、俱乐部、机关、企业和团体都大量制造成千上万的小纪念章。外国旅游者往往在路上被小孩们拦住,拿他们的一把把的小纪念章来换口香糖。我记得有一次加拿大的冰球队员和球迷们被纪念章收集者完全包围起来,想换取他们所珍视的加拿大胸针。这种业余爱好变得很广泛,花样也很繁多,以致职业收藏家们通常偷偷地聚集在靠近高尔基公园的一个地道里,互相交换、比较并出卖别在铺毡板上、细心地包着透明塑料纸、放在公事皮包里带来带去的特别名贵的样品。出现了相当大规模的牟取暴利活动。有一次《真理报》摇幌了它那不赞成的手指,不仅指责了成年人收集者,也指责了公共企业把大量金钱花费在设计并制造这些纪念章上。《真理报》还因为车里雅宾斯克的狗俱乐部制造了一种同有威望的军人徽章极其相似的胸针而恼火,并因阿塞拜疆共和国一个管子工团体制造了一

种马桶座圈形状的小胸针而怒气冲冲；胸针上面还镌着几个字:“阿塞拜疆卫生技术安装企业优秀管子工”。至于谈到娱乐，俄国人对于古典的单场马戏的传统兴趣不减当年，在这种马戏中有狗熊跳舞和精采的体操和杂技表演。即使是当他们到象有清一色女子乐队的索非亚饭店那样的地方寻欢作乐的时候，大多数人的玩乐也还是充溢着一种健康的体育运动朝气。有些人去只是为了喝酒。少数青年夫妇对西方最新式跳舞相当内行。但最大多数则是去跳一下轻松活泼的快步舞，这与其说是一种跳舞，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运动。

如果让他们自行选择的话，大多数俄国人是会宁愿回到大自然去休养身心的。他们会穿上印花布衣服，乘上一列使用月季票的电气火车到乡间去，漫游在深草丛中，或者躺在河边狂饮啤酒。每逢星期五夜晚，火车站上会挤满了背着简陋背包和铺盖卷、前往乡间徒步旅行并准备在露天睡觉的青年。在田野和森林，凡是有空地的地方，我看到他们打排球，有时甚至在雪地里，如果没有球网，玩的人就围成一圈，把球托来托去。

但俄国人典型的室外业余消遣就是采蘑菇；这可是一种使西方人感到茫然的消遣。在秋天，这简直成了一种全国性的风行一时的爱好。内行人对他们常去的可以寻得优良品种的地方保持绝对秘密。不那么专

门的人则会拎着提桶、小背包，或者拿着权当容器的手帕或帽子，一连几个钟头在老树林里或峡谷间微微移动，象探宝似地仔细看着地面，或者停下来聊天、吃野餐。在高峰季节，竞争非常激烈，各个团体常组织远征队，在星期五向他们的工厂租用汽车，就在停于乡间路上的汽车里过夜，打打瞌睡或者喝茶饮伏特加酒暖和暖和身体，以便在天一亮的时候就能够第一个试身手，采到鲜嫩的蘑菇。蘑菇的品种很多，必须有经验丰富的眼力，才能识别什么是有毒的，什么是没有毒的。为了帮助许多业余爱好者，苏联杂志常在秋天刊载一些类似赛马消息报之类的图表，对各种不同品种生长的最好季节和环境提供一些线索。但这些图表非常复杂，当我们试用的时候，花在研究图表上的时间反倒多于找蘑菇的时间。

这种消遣的意义比乍看起来的要多。内行人坚决认为，吃每一种蘑菇都要有适当的酒与之相配合。"牛奶蘑菇最宜与精酿的棕色伏特加即俄国人所谓的'彼得罗夫卡'一道吃，"一个老手对我说。"小红头蘑菇要同清澈如水晶的冷冻伏特加一道吃，这样，伏特加才不至麻痹你的味觉。其实，有些人采集各种蘑菇，只不过是为喝各种伏特加酒寻找又一种借口罢了。"

对大多数人来说，采蘑菇的真正用意乃是逃到乡下去，散散步，避开一切。俄国人热爱他们的农村。

城里人，就象美国的城市居民一样，非常喜欢租一两间农村小屋，到那里体验艰苦的生活，在棚子里的火炉上做饭，用园子里的茅厕，把深锅浅锅挂在经风雨剥蚀的木栅栏尖板条上晾干。太阳透过白桦树林闪闪发光，或者高大松树树荫的凉意带来迷人的快感。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却认为空旷的农村是令人扫兴的。俄国和美国堪萨斯州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一样，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单调的地方，没有激动人心的风景，没有瑞士的令人叹为观止的纵深景色，没有巴伐利亚美丽如画的山峦，没有使得英国农村如此吸引人的树篱和石垣。俄国比较平凡，比较凌乱，比较荒凉，未经整理修饰。

"我喜爱英国精心照管的花园，"有一天，一个和我同路的俄国人，在我们走进一个在莫斯科郊外的私人园子的时候，对我说。"但俄国的花园对我的心灵是一种安慰。"

这句话令我迷惑不解：这里是一个绿色篱笆围着的俄国花园，荒荒凉凉，未经收拾。我根本不会把它叫做花园，它不过是一座圈起来的树林罢了。灌木、乔木、杂草乱七八糟地滋生着，没有人整理过。接着我就恍然大悟了：正因如此，它才对俄国人心灵有吸引力。正是它的凌乱、荒凉和有趣的杂乱无章，才使俄国人得以从过分受到照管、过分拥塞、过分受监视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俄国人所需要的是：打破锁链，冲出界限，在

精神上脱下他们的鞋子，光着脚奔跑——而这正是他们在乡下所做的。

另一次，安和我来到了莫斯科以南八百哩、北高加索的一个滑雪中心多姆巴伊。两个摇晃的架空滑车仅仅把我们送到约六百五十呎高的山脚下一块空旷的草地上。即使要作一次最起码的滑行，我们也得穿着滑雪鞋先跑半哩路，然后再爬上一座小山。没有牵引工具。每作一次短短的滑行要向上爬约四百码左右的山路，由于三月温暖的阳光在中午前把表面积雪溶化得泥泞难行，这就更其成为一种苦事了。但度假的俄国人却毫不在乎。景致的确非常美丽，令人想起阿尔卑斯山。他们有了一个和大自然亲近的机会，至于滑雪如何就不介意了。随着太阳光辉的强烈照射，这些面色苍白的北方人高兴地几乎把他们所有的衣服都脱掉，在每一块可资利用的露出地面的岩石上，穿着游泳衣或贴身衣，进行日光浴。

除了海滩之外，我看到俄国人的肉体比在这山坡上看得更多的唯一地方就是在公共澡堂里。这种聚会地点就象围绕厨房桌子的那种聚会一样，是完全俄国式的，而且也同样重要。俄国人的公共澡堂是芬兰蒸气浴室和土耳其蒸气浴室的一种混合物。其目的，除了带有俄国人受虐狂的怪癖之外，就是要通过大量流汗把人身上的污垢从毛孔里冲刷出去。“能治百病”，一

个精于此道的老手对我说。但就象采蘑菇一样，重要的并不是沐浴这个动作本身，而是它的全过程——到浴室去；浴前称体重、擦肥皂、散发蒸气、冲洗、浴后称体重等这一整套经过细心安排的仪式，以及从头至尾再来一遍；再加上在公共沐浴时所常见的男人们的乐天派性格、闲聊和赤裸着身子开玩笑。常去的人逐渐互相熟识起来。我可以偶尔听到他们交谈："很久没见了。""是啊，出差去了。""今天的蒸气怎么样？""挺好。"俄国的公共澡堂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消遣形式，是俄国男人享有的最近似于美国男人俱乐部的一种东西（女人被隔离在外），但费用却是每个人能付得起的。正因为如此，它就象采蘑菇那样大受欢迎。

花上六十戈比（八十美分），顾客就付了入场费，领到一条粗布单子，俄国沐浴者就用它把自己的身子围裹起来，象古罗马人穿的宽外袍那样；还可以租到一把用一束带叶子的桦树枝捆扎起来的笤帚，用来在蒸气室里抽打自己的身子，帮助蒸气做清洗工作，同时，还可以把桦树的柔和香味留在毛孔里。尽管俄国朋友告诉我，知识分子、干体力劳动的工人和政府官员往往都光顾他们各自喜爱的澡堂，但据我看，公共澡堂却是在苏联社会里对贫富贵贱真正一视同仁的少数机构之一。在更衣室里，没有供个人存放衣服的小柜，只是在板凳上有些挂衣服的钩子。花上一点小费，服务员可以给

你照看你的钱包。在这里我看到普通西服、军官军服同粗布工作服或破旧的农民短上衣挂在一起。大多数莫斯科澡堂在革命前就有了，它们是富商巨贾爱去的场所，他们在私人包间里大吃大喝，在大理石的池子里泡洗，通常都享受着一种奢华的生活。今天，情况已经比较地无产阶级化了。华丽的桑杜诺夫斯基浴室已经破败得连地砖和塑像都裂了缝，它的枝形吊灯，象一位俄国朋友风趣地说的那样，"庸俗得几乎迷人"。蒸气间就象是一个管道露在外面的锅炉房一样，但俄国人只要能够尝到公共澡堂那种无拘无束的滋味，对于环境的破落，他们倒是满不在乎的。

公共澡堂应该是给人以健康快感的地方。但据我的经验，如果不先有着一点受虐狂的情绪，俄国人是不会对它真正欣赏的。象芬兰人一样，他们喜欢把蒸气间烧到很热，热得在你吸气的时候都会感到烧鼻孔。在他们看来，最好的地方是六七层石阶上最热的楼座，在那里，蒸气热得烧人的眼睛，老手们忍受着痛苦，让身体减轻一磅肉。"你顶多只能呆上五到七分钟，"一个看出我是个新手的俄国人忠告说。另一个俄国人认为，如果我想多呆一会儿，"头上最好戴上一顶旧毡帽什么的。"我坐在他们当中，眨着眼睛，不让汗水流到眼里去，努力保持安定，听着别的沐浴者一边用桦树枝笤帚鞭挞自己或互相把身体抽打成玫瑰红色，一边发出

咒骂或满足的咕哝声，借此来减轻我自己的疼痛感。(“请你抽打我的后背，”或者，“把腿多打几下，腿。”)他们低沉的喃喃语声，不时地被是不是要在炉内火砖上再泼上一些水的争吵声所打断。有些感到汗出得还不够痛快的老手，在看见有新人来到蒸气间的时候会发出命令说，“再弄点水来，”而这个新来的人，按照惯例，就得拎一两铅桶水来泼在火砖上。“够了，够了，”那些不胜闷热空气之苦的人会齐声气喘吁吁地喊起来。有些沐浴者喜欢用几杯啤酒或少量桉树油使蒸气发出点香味，但关键并不是香味而是调整微妙的湿空气，如果水或啤酒太多就会热得受不了，如果太少，又会使这些蒸气浴迷们得不到必要分量的苦痛。

正如俄国人大部分的生活一样，当沐浴者自我折磨得够呛，跑到外面更衣室的一霎那，他们就感到轻松了。在那里，他们赤着身子，或者松松地裹着布单，荡来荡去，说说笑话，对昨晚加拿大人的冰球赛或斯巴达克队对狄纳莫队的足球赛争论不休。公共澡堂是随便偷听或插嘴、毛遂自荐主动提出怎样对付女人、哪里可以买到紧张商品或老年时怎样保持青春等意见的好地方。我记得一个白发绅士曾告诉我和一位朋友，洗澡得多花点时间。“你们青年人总是匆匆忙忙，这样没有好处。”他劝告道。他已经七十五岁了，但看起来要年轻十岁。他说，秘诀是从一个保加利亚人写的一本书中

得来的，这书泛论沐浴，还讲解了每天用热毛巾按摩脸部的技术。“这样做，”这位熟人给我们做如何用毛巾从眼睛周围一直按摩到牙床骨的示范动作时说道，“你就永远不会显得衰老了。”在附近，皮肤上刺着黑色花纹（鹰、女人或者“祖国”两字）的工人们，穿着黑色内衣在踱来踱去，另有几个人坐在一角看书，另外一群人在看着别人打西洋骨牌。

差不多每个人都要服务员从外边过道里拿几杯清水似的日古洛夫斯基牌啤酒来。很多逃避工作的沐浴者带着面包、意大利香肠或者罐头沙丁鱼来下酒。但我可以担保，他们最喜欢的珍肴是拟鲤鱼，一种干硬、多骨、嚼吮着吃的咸扁鱼。这是相当于椒盐脆饼、炸土豆片和咸花生米的一种俄国食物。有些人争论说，到公共澡堂去的最好时间是早晨，因为，正如一个老手所解释的，“这时候的蒸气干燥些。”还有很多人喜欢晚上，因为这个时候适宜于过社交生活。但每个人都指望使它成为一次真正的玩乐。“没有人去一趟会少于两三个钟头的，”一位政府官员说，“一个半钟点太少了。”我们办事处的司机伊凡·古谢夫经常带他的十多岁的儿子每星期去一次，在那里度过整整一个晚间，享受俱乐部式的同志友谊、食物、啤酒以及俄国人称之为“豪华享受”的一种肉体上的满足感。

俄国人大多是在大吃大喝上追求这种豪华感。他们喜欢宴饮，抓住每一个假日，甚至以一个不速之客的来临作为借口。我们认识一些俄国人，他们利用历史上历法的变更以及世俗的和宗教的假日在新旧年交替之际参加四次庆祝活动——旧历新年和新历新年、旧历圣诞节和新历圣诞节——俄国人不习惯于节制和俭朴；他们过的是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如果有一个宴会，特别是喝酒的机会，他们会把全部奖金或相当多的工资——多于他们所能合理地负担得起的——投入一个晚上的大吃大喝和斯拉夫式的纵情恣欲中去。他们会跟朋友们出去寻欢作乐，到有喧闹的跳舞伴奏乐队的餐馆里去，一头栽进跳跳蹦蹦的狐步舞、玛祖卡舞、波尔卡舞、变为体育运动的扭摆舞、猴子舞或者一些仿摇摆舞的节奏中去，舞毕又回到摆满着伏特加酒、白兰地或者苏联甜香槟酒的餐桌上来，以保持高涨的宴会情绪。或者，就象大多数人宁愿做的那样，一对男女缴付二十或三十卢布，在某一个人家里共享一席节日盛筵。

每逢这种时节，俄国人总是兴致勃勃地纵情于宴饮之乐，这是过去食不饱腹的生活的一种反响。他们会事先跑遍各个商店，利用各种关系弄到一点红黑鱼子酱或者熏鲑鱼，只要餐桌上有了这些罕见的珍贵食物，那怕只是摆个样子，俄国人就会感到他们是在过着

一种豪华生活了。妇女们一连多日忙着做“小吃”，这可说是俄国菜中最值得称道的一份美肴。当客人们终于坐到桌前的时候，桌上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食物。吃“小吃”的时候，总要伴以一连串表示友好的祝酒，每次祝酒，大家都要干一杯冷冻伏特加酒。俄国人总是吃腌泡蘑菇和伏特加、咸鲱鱼和伏特加、熏鲑鱼和伏特加、意大利香肠和伏特加、鱼子酱黑面包和伏特加、醋渍黄瓜和伏特加、冷牛舌和伏特加、红甜菜色拉和伏特加、大葱和伏特加、——无论什么菜，一律要喝伏特加。

“你们想象不出节日对于我们是多大的乐事，宴会对于我们是多么重要，”一位中年记者说道。“要知道，在主要节日之前国营商店里总有一批平素没有的好食品。平时我们吃得很糟，但我们已经习惯了，人们并不在乎。但在节日，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吃它一顿，以弥补平时的不足。”

不过，节日并不完全是轻松愉快的日子。因为以友好地围着桌子吃喝开始，往往以喝得酩酊大醉，为逃避无聊、挫折和寒冷而借酒浇愁来告终。若干世纪以来，俄国人都称之为“魔鬼伏特加”，它实际上是一种全国性的恶习，是同美国的吸毒问题有同样大破坏力的祸害，但比吸毒更难根除。

在西方，没有什么可以与俄国人喝伏特加酒的情况相比。象贪污腐化一样，伏特加是俄国生活中的一

种不可缺少的润滑剂和逃避现实生活的途径。只要提一下伏特加这个词就会使俄国人馋涎欲滴，兴高采烈起来。如果要把有关伏特加的种种知识——从表示喝酒的轻轻拍几下喉咙，到俄国人所独创的暗示“让我们喝酒去”的大量流行的谚语——都加以说明，那就非得写一部百科全书不可。伏特加能减轻生活的紧张程度，帮助人们开始互相了解。许多俄国人会说，除非他们同一个人认真地喝一次酒，否则他们是不会相信这个人的。喝伏特加酒是带有大丈夫气概的象征。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告诉我说，当他青年时在乌拉尔教书的时候，他常到村子各处劝告做父母的继续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学校念书，有一次一家的三个年长者对他说，除非他先喝杯伏特加，他们甚至连谈话也不愿同他谈，但在他表演了这套喝酒工夫之后，他们就认为他是可以信赖的人了。在工人和农民之间，伏特加非常受欢迎。如果你找他们做零活，给他们一瓶价值美金四元八角的半公升装伏特加酒，比付现款还强。

那些没有接触过俄国人喝酒的人们，不会意识到俄国人喝得多么厉害。但那些到过俄国并对他们酗酒感到惊异的人们，若干世纪以来就一直在议论这桩事了。1639年，充当荷尔斯泰因公爵朝廷驻莫斯科代表的亚当·奥尔伦斯说过，俄国人“酗酒甚于世上任何其

他国家”。1839 年，法国贵族居斯蒂纳侯爵学会了一句俄国格言：“饮酒是俄国的乐事。”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国人是好客的轻松从容的饮酒者。他们不懂得节制。一旦伏特加酒瓶打开了，那就必须喝光。从来没有把酒再放回架上去的那种习惯。每当西方人提出这种意见的时候，俄国人只是觉得好笑而已。俄国人喝酒，主要是为了忘却他们自己，消除生活单调的感觉，在寒冷的冬天暖和暖和自己的身子。他们渴望借酒以逃避现实。

在塔什干，一天下午，我看到两个穿了一身挺不错的便服的俄国人坐下来吃一顿很迟的午餐，他们随同饭菜要了半公升伏特加酒。面对着我的一个胖子，有着匹克威克式圆脸，圆圆的肚皮，当伏特加出现的时候，他高兴得简直心花怒放。很快伏特加就被倒出来，举杯简短地祝了酒，碰一下杯。头一晃动，一杯伏特加酒下去了。大声呼了一口气，拿起叉子叉了一块鲱鱼塞进嘴里，又吃了一点面包。在很短时间内这一过程重复了多次。不多一会儿，这个匹克威克式的俄国人的两颊上泛起了柔和的粉色红晕。看到伏特加酒使他的生活变得那么美好，实在令人惊异。他显出极其幸福的样子。当我付完账的时候，伏特加酒已经喝完，一瓶盛在普通细颈玻璃瓶里的白兰地又拿上来了。显然，他们那一天余下来的时间就那么完结了。我曾在别处

看到过结束时的场面。如果牵涉到女人而又有人要求她跳舞的话，结局很可能是丑态百出。或者，象有一天晚上在莫斯科柏林饭店出现的情况那样，两个人很快喝完了伏特加，当甜食拿上来的时候，一个目光呆滞的绅士把身子俯向他的冰淇淋碟子，准备用嘴从碟子里吮来吃，简直把鼻子都陷进冰淇淋里去了。他的朋友和服务员不得不把他扶起来，给他揩干净，而接着他又用刀子吃起冰淇淋来了。

报纸和政府领导不时地对酗酒这一全国性的祸害加以猛烈抨击。据高级官员们透露：酗酒是导致大多数犯罪行为的主要因素，而罪行的百分之九十是谋杀案。半数以上的交通事故，百分之四十的离婚案件，百分之六十三的失足溺毙，以及莫斯科三分之一的用得着救护车的事故，都是由于酗酒引起的。对苏联经济造成极大危害的旷工，其主要原因也是酗酒。然而，我对于国家发起的、据说是旨在控制饮酒的运动，却不能不感到怀疑，因为由国家酒类专卖机构所生产的酒类产量逐年上升，酒类消耗量比 1940 年增长了四倍。在农村可怜巴巴的小商店里，即使其他不那么引起轰动的商品有时脱销，伏特加酒却似乎从来没有脱销过。僵直象木头或者烂醉如泥的醉汉乱七八糟地躺在节日的人行道上，不仅在破旧的低级住宅区是如此，而且几乎到处都是。星期日大白天的酩酊大醉和星期五或星

期六晚间的痛饮作乐一样普遍。女人喝酒比男人少，但比西方的女人喝得厉害。我曾看到过十四岁的孩子们喝不搀水的伏特加酒。

在俄国呆久了的外国人，他们的肝脏也不可能不受伏特加的威胁。好多世纪以来，俄国人一直以伏特加灌醉外国人作为他们热情好客的一种形式，这就容易使得旅游者的批判能力麻木不灵。哈布斯堡皇帝驻伊凡大帝朝廷的大使塞吉斯蒙德·楚·赫伯斯泰，因男爵在1526年说过，“俄国人千方百计要把他们的客人灌醉”，在没有良好理由的情况下，他们也会编造出各种祝酒词和饮酒的借口来。他们会很严肃地对那些不和他们一道“干杯”而是犹疑不决或仅仅呷一口的客人说，这样做是对主人的侮辱，因为俄国人认为，把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灌得不省人事才算有本事。我可以肯定，我在俄国三年期间所喝的酒，比我在一生中的其余时间喝的还多。

只有一次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但它使我懂得了苏联生活中一些极为重要的方面。在布哈拉，安和我遇见了两位学者，一位是亚美尼亚人，一位是乌兹别克人。因为我们的出租汽车发生故障，他们慷慨地让我们搭乘他们的车子回到城里去。由此他们就邀请我们尝一尝乌兹别克的肉饭。当我们来到吃饭地方的时候，很明显那天晚上的目的就是要和一个美国人喝酒。

到场的有半打人，都是当地师范学院的教员。他们都把自己的妻子留在家里，因而安就成了唯一的女性。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桌子上放着六到八瓶酒。一个人因为是司机，对喝酒表示辞谢，安也辞谢了。另外三个年龄较大的人喜欢喝白兰地。很快一算，就看出有四瓶伏特加（相当于两夸脱苏格兰威士忌）给我们三个人喝——我、那位矮小的亚美尼亚人和一个漂亮健壮的乌兹别克青年。后一位花了一整天的工夫在地里收摘棉花（这些人教书的师范学院停学六个星期，以便全校师生都参加收摘棉花）。食物通常在喝酒时可以起到某种保护作用，并可作为喝得慢的借口，但在这个桌子上，除了几块巧克力、一点腌泡番茄和一碟大葱外，吃的东西少得令人失望。

那个亚美尼亚人不想浪费时间等待菜肴上桌，他急不可耐地要喝酒。我想以同另一个人谈论他的孩子作为缓兵之计。无可否认，这种场合不容分说，只好服从。我们为我们的会见而干杯，为苏美友谊，为和平，为缓和，为我们的女人，为创纪录的棉花丰收而干杯——这时，壮健的乌兹别克青年站起来背诵了奥马·伽亚谟[1]的几节诗，使我很好地松了一口气，同时我要求吃点东西。我不喜欢吃这种番茄，但没有别的菜。喝白兰

① 奥马·伽亚谟（1050—1123）：波斯诗人，著有《鲁拜集》等。——译者

地的人都是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呷，但我的两个喝伏特加的伙伴却坚决主张，为了证明我们的友谊，每一巡酒都必须“干杯”。当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们，为全世界的孩子们，为希望我们的孩子永远不再彼此打仗，为那个亚美尼亚人据说在旧金山的堂兄弟，为亚美尼亚，为尼克松，为勃列日涅夫，为主人自酿的酒（一种跟伏特加掺和得很拙劣的令人作呕的甜酒）以及为许多其他我已记不清的事情而干杯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好。不过那时的谈话，已经象陀斯妥也夫斯基小说里所描绘的人们在吃闹酒时那样精神错乱和没有条理了。但是，象一个真正喝伏特加酒的人一样，我还在向我的妻子坚决保证，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我的两个酒伴如今和我谈知心话了。过了约莫三个钟头，当我们肥胖的乌兹别克女主人终于把著名的肉饭盛上来的时候，桌子上所有的伏特加酒都已喝完，我们都已麻木得失去知觉，除了安以外，已经没有人能吃了。

正如任何一个俄国人都会告诉你的一样，伏特加酒有一股象绞刑架那样忽然打在脖子底部使得脑袋和身体分离的后劲。当我们因为不喝酒的司机连同他的汽车都跑得无影无踪而出外找辆出租汽车回家的时候，这股后劲在我身上发作了。我的两个饮酒伙伴以真正俄国人的方式使我相信，他们发现我是一个知心的人，他们坚决要求乘汽车陪我回去。当我在市区公园附

近来回走动试图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旅馆门口等了我约一个钟头。两个警察终于驾车把安和我送回旅馆，因为时间很晚，旅馆的门已经关起来了。费了好大劲儿才让人给我们开了门，我的两个醉醺醺的同伴和警察踉踉跄跄地跟着进了我们的旅馆房间，引起了一场大骚动，最后，警察把我的两个不幸的朋友领走了。

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的是第二天。伏特加酒的一个好处是它不象别的酒给人留下头疼或嗯心等症候，但它使受害者完全瘫痪。当我起来用标准的醒酒法把冷水泼在我脸上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的脸仍然麻木。那天上午我们总算想办法乘飞机到了撒马尔罕，但这一天我一直躺在床上，不是生病而是毫无精力，不能活动。正是伏特加酒的这种使人丧失活动能力的破坏作用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前以及从此以后，我都不曾有过这种经历。那一次我之所以终于落到不能自拔的境地，是带有几分偶然性的。但那个矮小的亚美尼亚人和漂亮年轻的乌兹别克人——以及千百万那样喝酒的俄国人——则是从一开始就存心打算毁灭我和他们自己。

五 妇 女

自由了，但没有解放

要彻底解放妇女，要使她与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须有公共经济，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这样，妇女才会和男子处于同等地位。[①]

列宁，1919 年

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马克舍叶娃是一位年近五十、仪表庄重的妇女。她的容貌和高大的身材就象是俄国的埃塞尔·默尔曼[②]。她喜欢唱关于自己年青时代的悲伤的浪漫曲。她的下巴坚毅结实，握手有力，笑容开朗，具有一种我觉得既威严又可亲的充满自信、爱好交际的风度。我是在摩尔曼斯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盟国的战时护航队而闻名的北极港）由当地党报《北极真理报》编辑尼古拉·别利亚耶夫介绍而

---

① 见《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72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2 版。——译者

② 埃塞尔·默尔曼（1909—），美国女演员、歌唱家。——译者

认识她的。他显然很敬畏她。

象在苏联作过广泛旅行的任何外国人一样，我会见过许多担任显要公职的“具有代表性的妇女”——格鲁吉亚的一位副总理、西伯利亚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一位主席、莫斯科和平委员会一位领导人、拉脱维亚工会一位高级官员。她们实际上大多是苏联用来装点门面的样本，是挂名的首脑而不是真正握有实权的妇女。但是，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是我在俄国所遇到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职业妇女，因为她取得了真正的负责地位和权力。

她不仅一手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让他们参加摩尔曼斯克的捕鱼船队，而且她还披荆斩棘地爬上了摩尔曼斯克权势集团的最高层，成为管辖着有四千五百名工人的鱼类联合加工厂经理。她还在管理该城市的共产党市委搞到了一个席位。她的黑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戴着大方的金耳环，穿一身海绿色衣服，看上去跟格洛里亚·斯坦南之类富有魅力的美国女权运动者迥然不同——然而却有着类似的气概。在美国，她准会被称为粗犷的个人主义者，具有这个词所包含的倔强的个性。她体格强健，精力旺盛，聪明能干，意志坚强，是在战后年代俄国极其惨痛地丧失了大量男劳动力的时刻勇敢地踏进工业界的俄国妇女的缩影。她还成功地跻身于一向由男人主宰的管理领域——即使在

那个时代，这也是极不平凡的。令我惊异的是，她比我所见到的许多苏联男人更沉着，她不象大多数官员，在会见外国人时总是带上一大帮助手以为后援，她独自一个人会见了我。

我问她在男性主宰的管理领域里干得怎么样，她报以开朗的一笑，露出了两排整齐的牙齿。她简单地说，她管理了男人，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她风趣地回忆起，有时在宴会上，作为置身于许多男性行政负责人和重要官员中间的唯一妇女，她会听到有人提议为被他们留在家里的妇女们干杯。这时，她就会站起来，调皮地向男人们提出反驳性的祝酒词，提醒他们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呆在家里。

在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看来，一个妇女担任每月挣八百美元工资的鱼类加工厂经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这个厂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工人是妇女，”她说，“这样一个工厂没有一位妇女负责怎么能行？”她的前任也是一位妇女，不过，在那以前这个厂一直是由男人管理的。她和蔼地揶揄我和别利亚耶夫说，如果我们在她厂里工作，就得非常勤勉才行，因为她是坚持高标准的。别利亚耶夫温顺地点了点头，认为她是一位严肃认真的经理。

我们在参观她所管辖的九个凌乱分散的工厂、货栈、冷藏库和码头的时候，天空正飘着雪花。我只看到

三个男人在认真工作。女人却到处可见。身体健壮的女人们，身穿蓝色棉袄、橙黄色安全衫，脚着几层厚毛线袜在外边砍冰、铲雪或者在拖网鱼船的货舱里工作。在里边，青年妇女们——我觉得都是些身材修长、面色灰黄的姑娘——穿着橡胶靴，围着围裙，在浸着水的地板上滑动，使劲地拖着沉重的冻鱼块，费力地把它们举起来送进箱子里。在别的地方，一队队头发用头巾扎在脑后的、年纪较大的妇女，在切去鲱鱼、鳕鱼或海鲈的头尾，并以惊人的速度和技巧，把它们捆起来，用小吊索挂上架子准备熏烤。由于在北极地区工作，除了工资，还自动增加百分之五十的奖金。因此在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工厂里工作的妇女，每月总可以有约一百五十到四百美元的收入。她们显然也为了挣得这些钱而工作得很卖劲。其中有许多人是为厂里捕鱼的渔民的妻子。

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已经在这个厂工作了二十年，她本人对大多数工人都很熟悉。她在向我解释熏、腌等加工处理和装罐过程，并叙述该厂一亿九千万美元的产品在何处销售时，始终以一种亲切的恩人态度同工人们开玩笑。“如今，人们不象从前那样喜欢咸一点了，”她说，“因此，我们得把鱼做得滋味更好些。”我们一边走，她一边回想起二十五年前她在渔业学院毕业后，从莫斯科附近的沙图拉城来到摩尔曼斯克的情景。她

在这个寒冷的北方边远地区经历了艰苦的生活。她的婚姻结果也不愉快，但是，她从来不想再回到气候比较温暖的俄国中部去。她已经完全习惯于北极的严寒气候，因而医生都劝她不要到极南地区去度假，因为那里的气候会对她的心脏不利。“温度太高我就受不了，”她承认说，一面把一些松散的头发塞回到发髻里。

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是苏联官员们喜欢让外国人会见的一类妇女，因为她证实了他们的说法，即苏联妇女是世界上地位最平等的妇女。很久以前，在1936年制定的斯大林宪法里就已宣称，妇女“在经济、国家、文化、公共和政治生活等一切领域里都与男子享有同等权利”，而七十年代中期美国妇女解放运动者却仍在为将此条款载入美国宪法而奋斗。在名义上，苏联妇女已经取得了这一成就。她们已经正式获得了解放。人工流产是合法的。法律明文规定，产期给假四个月，工资照付，必须为头胎产妇保留职业一年。全国普遍建立了由国家津贴的日托中心网，照管着上千万学龄前儿童。同工同酬已经作为一种原则确立下来。苏联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比任何其他工业化国家都高，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已经飞黄腾达。大量妇女接受了高等教育，在科学界、工业界和政府机构里与男人并肩工作。

然而，尽管有这些成就，尽管苏联的宣传工具在妇女问题上大吹大擂，讲得天花乱坠，苏联妇女仍是明显地低人一等。如果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口在受这个制度剥削的话，那就是妇女。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过了三十年，受过教育的城市妇女比过去的俄国妇女更有时间来注意自己的容貌，追逐西方的时髦，并且更多地为自己的女性风韵而操心，妇女仍然大部分是做着工资低而又劳累肮脏的体力劳动。妇女肩负着繁重的双重负担，既要工作，又要完成列宁所谓的"家务苦役"。她们无可非议地抱怨自己没有完全从工作和家务这两种相互抵触的紧张压力下解脱出来。

有些美国妇女身在千里之外，或者对苏联作了走马观花的访问，见到象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那样偶然飞黄腾达的女性之后，就以羡慕的口吻谈论起苏联妇女来。但是仔细一看，生活却另是一种模样。我所遇见的美国妇女，凡是在苏联住过一定时间、能够对苏联妇女的生活负担有真正体会的，没有一个会愿意同她们易地而处的。其主要原因，正如俄国妇女自己所说的：同列宁的名言相反，大量的就业机会，并不象列宁或有些西方女权运动者所推测的那样，是万应灵丹。在许多方面说来，它反而使生活更加难熬。有些俄国妇女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非常不利，甚至有一位妇女坦率地向我所认识的一个美国妇女吐露了这样的心里

话："我希望我的孩子是个男孩，不是女孩。作为男孩，他的生活会舒服得多。"

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宣称他们主张实现男女平等，但是，俄国生活中那种大男子主义的浓重传统习惯，只是被苏联人表现得稍为有所节制而已。男尊女卑的顽固传统观念还表现在俄国人的诙谐中，这些诙谐经常反映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态度。我记得列宁格勒的一个讽刺剧团上演过一出烩炙人口的滑稽短剧。剧中，四个肥硕的女人坐在家里打牌，喝醉了酒乱吵乱闹，用沙哑的嗓门唱歌，讲一些从前的战争故事，而一个怕老婆的男人则竭力投她们所好。女人们越闹越凶，恣意放肆，那个胆小如鼠的男人围着一条古怪可笑的小围裙，唯命是从、手忙脚乱地干着这样那样吃力不讨好的家务活。他徒劳地试图用茶和三明治来取代伏特加，以结束这场狂饮，但是，这四个女人一面因为食物不好而滥骂他，因为桌子肮脏而埋怨他，一面抓住伏特加酒瓶不放。当她们终于散场去睡觉的时候，都已经烂醉如泥，在舞台上到处踉跄；那个愁眉苦脸的男人忙着给她们胡乱地穿上外套，把她们送出门口。等别人都走了之后，他就开始给自已的女人脱鞋子，扶她上床，她却拧着他的屁股。"别碰我！"他尖声大叫起来。接着他们又为喝伏特加酒浪费了谁的钱而争吵起来。

俄国观众觉得这出戏非常逗人，妙趣横生。他们喜欢粗鲁的滑稽剧。他们立刻就领会到，这出模仿滑稽剧完全颠倒了俄国家庭中典型的夫妻地位，在俄国家庭里，干家务杂活的是妻子，而游手好闲地逛荡，读读报、看看电视或者同朋友饮酒作乐喝得烂醉的则是丈夫。

在我启程去莫斯科前不久，一位俄裔美国女人给了我几本俄国谚语的小册子。我看到其中有好些谚语都表现出露骨的大男子主义，不胜惊奇：例如，“老婆不是水罐，打她几下，也坏不了。”“如果你捏着黄鳝的尾巴或者相信女人的话，你手里就会空空如也，”或者，“狗比女人还聪明些——它不会向主人狂吠。”工人阶级妇女现在仍然认为，男人酗酒和虐待女人是理所当然的。一个西方外交官的妻子告诉我，她的俄国女仆曾问她，她的丈夫怎样。听到他并不经常酗酒，也不殴打妻子，这个女仆作出地道的俄国式判断说，“他一定不大象个男子汉。”

俄国人这些天生的态度基本上来自俄国的农民生活，我在俄国听到一个直率到了令人难堪的关于男尊女卑的笑话，也是来源于此。有趣的是，给我讲这则笑话的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结了婚，生长在城市里的青年。据他说，这个笑话是对俄国男人态度的一种恰如其分的讽刺。这则笑话讲的是：从西班牙、法兰西、英吉利和俄罗斯四个民族中，各抽两个男人和一个女

人，分别放在几个荒无人烟的岛上，以试验他们的民族性格。科学家随即离开这些人好几个月；及至他回到那放了三个西班牙人的岛上时，发现只有一个女人在那里，科学家问她两个男人到哪里去了。“哦，他们为了我决斗起来，彼此打死了，”女人憎恶地回答说。在放英国人的岛上，他发现三个人仍旧象原来那样分别站在各自的角落里。科学家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一个男人回答说，“你忘记了给我们适当地介绍一下。”在放法国人的岛上，一切都秩序井然，一个男人正在照料一个修剪得很好的花园。科学家问他怎么会安排得这样好，其他两个人又到哪里去了。“很简单，”看花园的法国人回答道，“他做了她三个月的情人。我又做了她三个月的情人。现在又轮到了他，他俩到别处去了，我就照看花园。”

最后，来到放俄国人的岛上，科学家发现两个男人正在一张铺着绿毡的桌子旁坐着开会，一面喝着瓶装纳尔赞矿泉水[①]，一面相互发表令人厌烦的讲演。

“那个女人到哪里去了？”科学家问道。

“群众正在田里劳动，”一个男人以男性的傲慢态度回答道。

在受过教育的人中，这种态度比较隐晦。在我们熟识的某些家庭里，妻子比丈夫更固执己见，而且，正

① 苏联北高加索地方一种有治疗作用的碳酸矿泉水。——译者

如我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身上所看到的，职业妇女有时比男人更坦率、自信。但根据我的体验，这些都不是典型的事例。在俄国，同在西方一样，一般地说，女人总是遵从男人，侍候他们，自己扮演一个比较谦让的角色，同时又抱怨男人的官僚作风，对待妇女不象对男人那样认真。有时，我看到受过教育的男人把严肃的事情看作"不是妻子该管的事"，很象刚愎自用的欧洲外交官在饭后一定又要捡起刚才放下的雪茄来抽一样。有一次，我问一个搞人权运动的持不同政见者，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妇女在持不同政见者的声明上签名。"如果女人在这些声明上签名，人们会笑话的，"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还是生活在中世纪。"另一次，我同两个成家立业的青年丈夫谈论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他们偷看过这本书，并认为这本书感染力强，动人心弦。但是，当我问起其中一个人的妻子的意见如何时，她无可奈何地耸一耸肩膀。"哦，我们不把这类书给妻子看——我们只是自己看，"她的丈夫急忙加以解释说，完全忘记这句话轻视了她的智力。说句公道话，他只代表一部分家庭的情况，因为我们也认识别的夫妻，丈夫和妻子充分平等地共同享受他们的精神生活。

此外，在大多数俄国家庭里，妇女全权负责安排家庭开支，丈夫只是理所当然地把他们的工资收入交给

妻子，其余一切就都听凭妻子处理。在爱沙尼亚，一个俄罗斯族的银行出纳员告诉我，她同她的爱沙尼亚丈夫闹纠纷，因为她丈夫按照爱沙尼亚的典型传统，要掌握家庭开支，而她则要按照俄罗斯风俗，由妻子管理财务。这位年青的太太还提到其他几对爱沙尼亚人和俄罗斯人结合的夫妻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她说，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民族风俗造成的摩擦总是以离婚告终。普通俄国妇女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家庭的一种粘合力，有时还笑话她们的丈夫无能。"我的丈夫只能出去买买面包或牛奶这类小东西，"一个机场饭店的女服务员眼睛一闪一烁地对我说。"但是买大一点的东西我就不能托付给他了。如果我们要买家具之类真正大的东西，我们就省下钱来，并且共同商量决定。在其他方面，一切东西——包括他的衣服——都是由我经手买的。我总是同他一起上街，要不然，他准会把什么破破烂烂的东西都买回来了。"

大多数俄国妻子都象她这样肩负起当家的责任，尽管实际上这种责任只限于使家庭经济收支平衡、管理家务和照看小孩这些杂活。男人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我记得有一位著名的俄国记者，在访问美国后回到莫斯科，颇为不快地争论说，"美国的男人都受他们妻子的支配。"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他就把一天晚上他在华盛顿一位著名记者家中作客的情况告诉

我:“他一直在那儿忙着安排饮料、煎牛排,而我就完全由他妻子摆布,”这个俄国人抱怨说。“整整一个晚上,我不得不听他妻子的讲话——谈衣服、孩子、物价、买东西以及女人们的闲谈。真是可怕,我几乎没有同那个可怜的男人说上一句话。如果那就是你们的妇女解放的话,我希望这种解放不要在我们这里发生。”使他感到震惊的不仅是那个美国女人的烦累讨厌,而且是她的丈夫竟甘心扮演这样屈意奉承的角色。

正如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的经历所显示的,战后初期出现的男性真空状态,把数百万妇女吸收进了经济领域,成了今天的中年妇女中某些人发迹的跳板。今天在苏联拥有相当于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中,妇女占近四分之一,普通审判员中近三分之一是妇女,最高苏维埃(议会)的一千五百十七名代表中,妇女占近三分之一,医生中占百分之七十左右,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建筑师、作曲家、电影工作者等各种协会的成员中约有一万五千名是妇女。五百万以上的妇女已经受过一定的高等教育,在这方面并不比男子落后多少。部分原因是由于妇女在战后人口中占了压倒多数。然而,即使和平时期的出生率已经开始使苏联人口趋于平衡,使人口中的男性成分不断增加,政府还是继续不断地从家庭中积极征募一切可征募的妇女参加劳动大

军。实际上妇女在今天的劳动大军中占有的比重比1950年更大。在六十年代中又有一千六百多万妇女参加了工作——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尽管在七十年代由于未就业的妇女储备已经消耗殆尽，增长率有所减缓，1974年妇女的就业人数仍有约六千万人，约占工作年龄妇女的百分之八十五，是工业化世界中最高的百分比(在美国仅为百分之五十左右)。

如今大多数苏联妇女都认为参加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工作反而觉得是难以想象的。工作神圣的思想已经在她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因此做一个单纯的家庭妇女就会感到是一种耻辱。宣传工作的重点，也一直放在强调参加工作是应尽的义务这一点上。例如，有一部《让我们活到星期一》的电影，表现了一个教员公开批评一个十年级的女学生，因为她在回答自由问答题“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时候，说她的理想是做一个多子女的母亲。教员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一个可耻的回答。对许多苏联妇女来说，按照美国妇女那样的传统习惯担任家庭主妇、母亲和子女抚育者的角色，看来还是不够的，她们感到不做工作就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尽管我听到过有些妇女苦苦抱怨要干的活儿太多，但紧接着她们就会说，她们宁可耗精费神肩负过多的沉重工作也不愿不上班，无聊地无所事事呆在家里，象一位青年教员所说的过着“精神上死亡的生活”。

但这不仅是一种要求工作的迫切愿望，它是整个儿生活方式的问题。因为苏联社会不仅是一个要求妇女工作的社会，而且苏联的家庭生活，特别是城市里的家庭生活，其乐趣远比西方为少。公寓又狭又小。城市夫妇有一个以上小孩的为数寥寥。大多数体育活动和其他业余消遣都是一种奢侈。俄国妇女不象美国不工作的妻子那样，有广泛的志愿的社会活动，或者享受某种饶有趣味的成年教育，因而可以占去她们许多时间和精力。大多数俄国妇女只有在工作时才有她们自己的生活。

"难道美国妇女不愿意走出家庭吗?"当安提到她为了要专心做一个母亲而辞掉了教师工作时，国际旅行社那位三十岁的向导卓娅怀疑地问道。卓娅可能有点与众不同，因为她承认她对抚育子女不感兴趣(大多数俄国妇女都溺爱子女)。她在自己的孩子三个月的时候就把他交给了和他们住在一起的婆婆——一个典型的祖母。安解释说，象我们这样经常要出差到这一国那一国的人，抚养四个子女已经够忙的了，可是卓娅对这个解释不满意。"难道你不想工作吗?"她问道。"难道你不想自己挣钱，从而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吗?"

经济上的独立感特别为年轻的受过教育的妇女所珍视。有一位栗色头发、容貌动人、离了婚、并有一个九岁男孩的妇女告诉我，有一份职业对她来说是至关

重要的，甚至使她敢于要求离婚。她说，如果没有单独的收入，光靠赡养费就不可能把她的儿子抚养成人（通常一个孩子的赡养费是丈夫工资的四分之一）。"如果你自己有工作，你就不必听某个男人那样对你说话了，"她说。另一些人参加工作则是单纯为了享受与同事们交往的社交生活。许多院校、工厂、企业还组织集体游览、看戏、野游和野餐活动——次数比较频繁，不象美国机关里一年只有一次假日宴会。在这些场合中，有工作的妇女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离开家庭而单独玩乐一番。

尽管如此，确实使苏联妇女除了工作外别无其他选择的根本原因，还是经济上的必需——无论对政府或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大多数日托托儿中心和其他辅助性设施（苏联宣传人员经常把它归功于国家对于妇女解放的亲切关怀），实际上都是为了把尽可能多的妇女安置在工作岗位上而作的必不可少的安排。好几位俄国妇女辛酸地谈到，国家办的这些托儿所、幼儿园和儿童夏令营，与其说是为了帮助她们实现自己的要求，还不如说是为了帮助完成工厂的生产定额。的确，西方经济学者已经注意到，过去十五年苏联的经济发展，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扩大劳动大军的队伍，特别是通过使更多的妇女——和领取养老金的人——参加工作的办法而取得的。

从个人方面来说，只有一个大人参加工作的俄国

家庭简直是一种福气，象这种家庭为数寥寥。大多数父亲挣的钱都太少（1974年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每月一百八十七美元），不够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更不用说四口或更多的人了。我所遇到的俄国人对于美国生活经常的反应之一就是，他们对大多数美国家庭光靠父亲一个人就能够维持感到很惊异。甚至在苏联社会中地位同我相仿的那些中产阶级的俄国人，也都不相信：象我们这个六口之家，我的妻子竟不必参加工作来资助家庭开支。有子女的俄国家庭经济状况，即使父母俩都工作，也常常是一手进一手出，因此有些妇女甚至没过完她们依法有权享受的不给工资的产假就恢复了工作，因为他们的家庭单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是过不下去的。我认识一对夫妻，丈夫是个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每月约有三百五十美元的优厚收入，但是，他的妻子仅仅度了九个月的产假就重新工作了，因为他们感到家里经济拮据。对极大多数的城市妇女来说，不工作的选择实际上简直就不存在。

一个讽刺是，这些经济上的迫切需求，在有些受过教育的苏联妇女中，已经形成了一股可以称之为反解放感的强烈的逆流了——据我所知，在美国，正是在与这些苏联妇女一样受过良好教育、相当富有的社会阶层中出现了一些最朝气蓬勃、最富有积极性的妇女解放运动者，在她们看来，职业就是万应灵丹。美国人正

在公开地反对做家庭主妇，而俄国人却在内心里反对做养家活口的人，这种养家活口的必要性可以把工作从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求得独立的手段转化为讨厌的苦活。

我听到过好几个受过教育的俄国妇女对不得不工作表示不满。一位六十多岁的文艺批评家说，她的四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儿中，有三个都宁愿不工作。有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是某个著名诗人的亲戚，她家境富裕，不必工作。她提到了她的朋友们对她不必工作都表示羡慕。还有一些人私下说，如果苏联制度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容许的话，她们宁愿做非全日性的工作。这种思想偶尔也在苏联报刊上略有露头，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探讨，因为这显然是同当局的意图背道而驰的。我记得一位富有经验的女编辑，由于多年从事出版和报纸工作，她一年到头感到眼睛疲倦，当我问起她对美国式的妇女解放运动怎样看法的时候，她作出了讥讽的回答。"去你的罢，你们的解放运动！"她反驳道。"革命之后，他们解放了妇女，只意味着妇女能同男人一样干笨重活。然而许多妇女宁愿不工作，在家里养育儿女。我有一个孩子，我还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可是谁养得起更多的孩子呢？不幸的是，我们不能不工作，因为我们的丈夫所挣的钱不够维持生活，因此，我们不得不每天去挣钱。"

许多苏联妇女对于职业方面的性别歧视所表示的强烈不满，不亚于西方妇女。从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令人惊异的事；因为在苏联的公共生活中，妇女到处可见。苏联的政客们也象美国政客一样，对于显示"候选人名单平衡"都很敏感，在任何公开场合，他们通常总是把妇女代表放在显著地位。宣传人员不厌其烦地吹嘘那些处于挂名首脑地位的苏联妇女，却不顾实际上还是男人在管理事务的情况。例如，苏联报纸经常自夸出席最高苏维埃的妇女"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妇女议员的总和还多"。这是一种虚伪的比较。最高苏维埃是摆样子的，是给予妇女（或少数民族）的一种糖饵，而外国人却常常被搞得迷糊了。最高苏维埃是一个起橡皮图章作用的团体，凡是送交那里去讨论的议案，无不得到一致通过。

在真正的权力机构共产党内部，苏联妇女的遭遇也不见得好些，恐怕还不如美国妇女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支配一切、并作出一切关键性决策的十五人政治局里，一个妇女也没有。在处理党的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九个中央书记中，也没有一个是妇女。在有权力的党中央委员会的二百四十一名委员中，只有六名妇女，其比例较美国国会中女议员的比例还略小一些（尽管在这些妇女中，还有两、三个是象征性的

劳动人民代表，而不象大多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那样是真正的有权有势的人物）。苏联象美国一样，明显地落后于印度、以色列、锡兰或大不列颠等国家，在那儿妇女居于政府首脑或主要政党领袖的地位。在苏维埃政权约六十年的历史中，唯一进入政治局的妇女是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她是很快就下台的赫鲁晓夫的亲信，她从1960年到1974年死去为止，一直是苏联内阁里唯一的妇女。即使在共和国或州一级里，也几乎没有妇女升到首脑地位。美国历史上或许仅仅有过四个女州长，但没有一个苏联妇女担任过权力相仿的职位，例如共和国或大州的党的首脑。在俄国象在西方一样，有时根深蒂固的、下意识的大男子主义以令人难堪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在我旅居俄国期间，最妙的要数官方正式宣布1975年苏联国际妇女年委员会以一个男子为主席一事了。

在经济部门里，妇女的处境要好一些，但也好不了多少。据说，赫鲁晓夫在一次农业主管人员大会上的坦率讲话中，曾对形势作过概述，并以指责的口吻说道，"看来负责管理的是男人，而干活的是妇女。"妇女确实约占工业部门总人数的一半，但十分之九的工厂经理都是男人。在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员中妇女也约占半数，但在高级教授或科学院院士中妇女仅占百分之十。苏联的中小学教师中有近四分之三是妇女，但八

年制和十年制学校的校长却有四分之三是男人。约百分之七十的医生是妇女，但有声望有地位的工作如高级外科医师、部门主管人或医院院长，却绝大部分是男人。这些数字同西方比较也许并不太差，但注意到妇女在俄国劳动大军中所占的比重，就不能不使所谓莫斯科在给予妇女平等权利方面远为领先的说法大为逊色了。

在俄国，同工同酬是公认的原则，但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做到同工。几百万妇女都被分配到工资较小、声望较低的领域里工作。当教员和做医务工作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实际上都是工资最小、地位最低的部门，而且这些也是妇女占了极大比重的职业。在工业方面，妇女大多数是在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部门工作。根据苏联的研究材料，这些部门的工资和其他福利都比（男人占主导地位的）重工业低得多。在农业方面，妇女构成了低工资、无技术的田间农业劳动者的核心，而男人则开机器，得到较高的报酬。也许，最能说明这种全国性状况的是一份编制工人家庭预算的重要的苏联经济研究报告，它估计丈夫的工资收入要比妻子多百分之五十。[1]

---

① 转引自默文·马修斯：《苏俄的阶级与社会》（纽约沃克公司，1972年版）第82页。关于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较原载1972年11月到1973年1月《文学报》的一系列论文中。

当妇女真正跨进比较称心的职业领域时，她们又常为双重标准而抱怨。“我原来一直在一个设计处工作，处里有十个设计师，全是妇女，但我们的处长是个男人，”一个年约三十五、六岁擅于词令的女建筑师对我说。“他是个很平庸的设计师；除了他自己，谁都知道这点。有些女设计师也很平庸，但有些却很有才能。在有才能的妇女们中间，有一个人，单凭她的优点和特长，就应该当处长。对于这个思想保守、不很聪明、拒绝接受具有独特思想的设计方案的男人，大家都很不满。但是，没办法同他争辩。他会说，‘哦，你们不过是一帮子傻头傻脑的女人罢了’。如果你争辩说，性别和设计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就会说，他得把这些设计草案送交上级审批，而他们都是男人。就这样，他会坚持要我们从头做起。真使人感到灰心。”

“妇女并不喜欢那类事情”，在旁边听着的一位身材瘦长、金发碧眼的艺术家插嘴道，“但是，我们只好忍受。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人们总是说，男人比女人更能以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因为他们没有子女和家务分心，也不会因为生孩子而中断工作。男人简直被认为高人一等。”同样使她感到烦恼的是，这种双重标准还应用在私生活方面。“一个男人可以同别的女人胡调，喝酒，甚至对工作偷懒，却总会得到人们原谅。但如果一个女人也这样做的话，人们就会批评她对婚姻

和工作采取轻浮的态度。”

在美国女权主义者听来，这番谈话也许象是令人丧气地再现了她们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俄国妇女的困境和美国妇女的困境却有着一些根本的差别。例如，在苏联，妇女在劳动力中占的比重较之别的地方要大得多，因而最有才能的妇女们会认为妇女已经在领导工作中也占了比较大的比重。然而，苏联妇女缺乏公开地争取较好待遇的真正机会。妇女问题是苏联报刊能以几分公正、坦率的态度进行讨论的少数领域之一，可是新闻检查人员显然认为，直截了当地指责在职业问题上有性别歧视是违禁的。只有隐隐约约的暗示，或有时对于边远地区发生的事例所作的报道，才能够通过检查的关卡。因此，妇女要想改善性别歧视只有仰仗男性的善心，而不能象西方妇女那样，可以利用强大的公众压力、政治行动或法庭诉讼这类手段。

此外，正如一位教师怨恨地向我诉说的那样，“在俄国，妇女干的是牛马活”——在美国交给黑人和未经合法手续进入美国的墨西哥流动工人干的那种肮脏艰苦、报酬低廉的活。的确，许多第一次来到俄国的西方游客感到大为惊诧的是看到俄国妇女在公路上敲碎沥青，把它一铲一铲地装上卡车（而男司机则在一边看着），用撬棍撬起铁路的旧枕木，扫街，或是在冬天铲雪、敲冰，搬运灰泥砖瓦，在土豆地里锄草，在最冷的天

气给建筑物涂油漆，或者在西伯利亚大铁道沿线把煤装上火车。“看到我们的妇女推着满载铺路石的沉重手车，我们怎能不感到羞愧和同情呢？”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他被流放前发出的一封致领导的公开信里问道。有些苏联官员私下里也对妇女象牲畜那样工作感到不安，但是，许多俄国人并不感到惊异，因为他们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了。

最后，经济上对工作的迫切需求和消费生活的混乱、没有效率，使得俄国劳动妇女处于美国妇女很少经历过的水深火热之中，而苏联的福利计划也只能部分地减轻这种状况。苏联妇女觉得她们自己无可逃避地抵押给了两个世界：工作和家庭。既然在两个世界里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她们只好象一个苏联作家所说的，象“笼子里的松鼠”一样拼命奔跑了。这种困境自然不是西方人所能知道的，但是，在俄国，却是正常现象。按照莫斯科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一则笑话的说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没有获得解放，因为她们没有机会工作。她们只好呆在家里，上街买买东西，做饭烧菜，管理家务和照看小孩。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获得了解放。她们有机会整天工作，然后回家，上街买东西，烧菜做饭，管理家务并照看小孩。”

我好几次向苏联朋友问起，她们作为解放了的妇

女是怎么样生活的，她们都建议我读一读自由主义者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杂志在1969 年发表的一篇以《每周如斯》为题的小说，作者是娜塔利亚·巴兰斯卡娅。这篇以一周日记形式写的叙事散文，立即在苏联引起了争论，因为它直接向官方所鼓吹的、自豪而幸福地做一个"优秀的母亲和优秀的生产工人"这一苏联新女性的宣传形象提出了挑战。这本书现在已经绝版，但它写得十分大胆，超出了七十年代初期官方所容许的范围。

女主人公奥丽加感到进退维谷，因为她一面力图继续在某科学研究单位做全天工作，跟上她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中科学的新发展，一面又试图既不必让老祖母住进来相帮，也不要她那个也是科学家的丈夫宝贵的小小帮助，自己来抚养两个小孩长大。她总是迟到，总是为赶时间而奔跑，总是疲倦乏力，头发也顾不上梳，几乎从来找不到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而且担心会丢掉工作。正如她所说的，这是一种"永远匆忙，经常焦急恐惧的生活。"星期一早晨她开始她的一周工作的时候，她和她的女同事们发现了一张征询她们怎样支配时间的调查表。调查项目中，有一项是"闲暇"。

"啊，闲暇，闲暇，这是个难说难讲的词儿啊，"她沉思道。接着，她对官方的口号嗤之以鼻，继续想下去。"妇女们，为争取有闲暇参加文化活动而斗争！闲暇——

这是个陌生的东西。在我个人说来，我很喜欢运动——喜欢赛跑。可我跑东跑西，两只手都挟着一捆东西。我跑上，跑下。我跑上电车，跑上公共汽车，跑进地铁又跑出来。我们的住宅区又没有什么商店。我们已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商店仍旧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奥丽加每天得同公共汽车和地铁的拥挤人群奋斗，跑到商业区买东西，再把食品杂货搬回家。在办公室里，有人拿着两张多余的戏票问她要不要，但她只好谢绝，因为没有人照看小孩。在俄国社会里，除了祖父母外，并没有从事晚间照看婴儿的小保姆——俄国风俗不容许儿童为挣钱而工作。

家里有幼儿的美国妇女，会理解奥丽加背出的一大串忙碌的家务：烧饭做菜、缝补衣服、护理小孩、换衣服、擦洗、上肥皂清洗、扫地、使用真空吸尘器，直到半夜才筋疲力竭地上床，一、两点钟又得醒来照顾患病的小孩，早晨又得拖着疲倦的身子起床。但是，有些苏联读者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美国人却会忽略过去。例如尿布，据一位俄国母亲告诉我，俄国没有尿布服务处，买不到也处理不掉尿布，没有儿童用的宽紧带短裤，因此每一块尿布都得立刻换洗干净，挂在暖气散热片上或浴室里临时扯起的绳子上烘干。苏联工业还没有生产出一架衣物烘干机来。洗衣服本身就是桩可怕的事情。我认识一个妇女，她象许多人一样，还是用手

在老式铅桶里洗衣服，她住在老式、没有热水龙头的房子里，有时还得用冷水洗。可是现在在大城市里，大多数妇女都有小型苏式洗衣机了。这种机器名为半自动的，但还是要人经常照料并用手操作——把衣服放进去，打开龙头放进水，关上龙头，按动预洗按钮，过几分钟再回来把机器关上，打开排水开关，等它缓慢无力地旋转绞干，再注入清水，等等。有些型号的洗衣机，还需要把衣服拿出来，用手在水槽里漂洗干净。苏式洗衣机同一次能洗十四、五磅衣服的美国式洗衣机不同，一次只能洗三、四磅，因而洗少量的衣服就要花整整一个早晨的时间。洗碟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冰箱不是没有致冷器就是小得放不下一份盒装便餐。苏联压根儿就没有盒装便餐这类东西。尽管有些餐馆有外卖服务，但预先煮好的或随时可供烹煮的饭食几乎是没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妇女做饭全部都得由自己一手做起。这就使得饭食很简单。例如，奥丽加做的晚餐就只有鸡蛋、奶酪、香肠、土豆或荞麦粥。

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四，奥丽加和她的同事们一边在办公室吃三明治，一边讨论调查表上的另一个问题：俄国妇女为什么不多生孩子？妇女生孩子是为了个人还是为了公共利益？（这个问题反映出官方，特别是在俄罗斯民族中，正在大力提倡扩大家庭成员，因为领导阶层担忧俄罗斯民族的人数会被生儿育女较多的少数民

族所超过。)

奥丽加举手发言，她以挖苦的口吻嘲笑苏联官方为了刺激“社会主义竞赛”而进行的浮夸宣传运动：

“同志们，让一个多子女的母亲发一下言吧！我向你们保证，我生了两个孩子是完全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我向你们提出挑战，咱们来个竞赛，希望你们在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上都超过我。”

在大家七嘴八舌地以这种空洞的语言展开一场毫无意义的讨论时，奥丽加暗自想起她是怎样害怕她的第二个孩子出世的。她的儿子科季克才十八个月，她就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我怕极了，我哭了，写了人工流产申请书，”她回忆道，“但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做法。”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医生鼓励她生一个女儿，劝她打消流产的念头。她的丈夫季马本来是希望流产的，后来也心软了，当她因生产和喂奶而停止工作时，他找了一个兼职。

小说中比较不同寻常的段落里，有一段讲到夫妇两人都公开批评苏联所大肆吹嘘的那种招收一至三岁儿童的托儿所。他们抱怨二十八个孩子编成一组太大了，一个“保育员”照顾不过来。他们为小女儿如此舍不得离开母亲而烦恼，每天夜里她总是拼命地紧紧抱住奥丽加不放，早晨也不肯到托儿所去。他们又因孩子们常常从别的小孩那儿传染上疾病而心烦意

乱。在去年一年里，她因孩子生病而请假就总共有七十六天之多(约占她全部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由于害怕再多请一天假会招致什么后果，尽管孩子呕吐了一夜，早晨她还是把女儿送到托儿所去了。

对奥丽加的自尊心来说，有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而当季马建议她退职几年，集中精力抚养子女的时候，她简直怒不可遏。"难道你要把我毁了?"她流着泪尖声喊道。

奥丽加的工作周也并非完全没有愉快的时刻——短时间在图书馆里阅读国外科技报刊，翻阅其他外国杂志；在那个经常为她理发的理发师粗心大意地把她的头发理得面孔象个"等边三角形"之后，她悄悄地给了一点小费，他又把头发理得很漂亮了，这就是一种小小的得意时刻；在回家时心血来潮地步行一段路以欣赏自然景色；星期天在家务劳动之余和丈夫孩子一道乘雪橇。但是，夫妻间的摩擦也是不容情的，尽管奥丽加认为同别人比较起来季马还是个好丈夫。他帮助洗碟子，买些东西，周末用部分时间照看小孩，有时还帮着给小孩穿衣服。但奥丽加最不满意的是，当她自己晚上忙着搞家务的时候，她丈夫却坐在那里慢条斯理地喝茶，阅读专业期刊。有一个星期没能腾出工夫，好容易在星期日的夜里坐下来给自己的衣服钉一颗钮扣，季马却要她给他烫裤子，这时她就发火了。星期日晚上，她

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一头倒在床上，她想，“我真是晕头转向了，在家务和烦恼的死胡同里晕头转向了。”

在一个局外人看来，这种写法也许显得过分夸张了。但是，有好几位妇女告诉我，她们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奥丽加，我也相信，象奥丽加这样的人远比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那类飞黄腾达的妇女多。报刊上经常发表苏联母亲为家务重担而发出的怨言以及丈夫们不肯受人驱使多做家务活而作出的粗声的回答，这进一步证明奥丽加的故事反映了造成许多俄国家庭关系紧张的核心问题。离婚率之高（1974年约为百分之二十八，美国为百分之四十三，但据说莫斯科为百分之五十左右）也进一步证明了现代城市生活的过度紧张，而由于有工作的妇女承受了种种重担，住房又拥挤，个人简直没法安静生活，这就越发加剧了这种紧张状况。

然而，奥丽加的故事就以下三个方面说来，还不算是典型的：她不象大多数俄国城市妇女那样，她已有了第二个孩子；她很幸运，能够给两个孩子都找到日托托儿所，这是只有一半左右的城市家庭才能办到的，因为托儿所不多，不可能把全部儿童都收下来（在农村地区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儿童能进托儿所）；但她没有老奶奶同她住在一起，因此，在她对托儿所不满的时候，就没有人能照看孩子了。

尽管在城市化的压力下苏联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但是，从幼孙到祖父母三代同住的大家庭传统，仍然是俄国的一种强有力的风俗习惯。家庭本身就有照看婴儿的人。我以为俄国人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家庭感情强而有力，而且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的确，俄国家庭纽带的强大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当我听到离婚率很高和家中各人分别度假的做法十分普遍的时候，不免感到大吃一惊——孩子去参加少先队夏令营，丈夫和妻子分别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方式度假。(这部分地是由于丈夫和妻子觉得他们不可能把假期安排在同一个时候，不过有一部分俄国男人告诉我，他们宁愿分别度假。一个俄国外交官微笑地向我解释，如果同妻子一起度假，那就不成其为度假了。)不过，在正常的日常生活中，家庭关系必然是非常密切的。有老奶奶可能会增加家庭住房的拥挤和拌嘴的机会，但是，对于一个有工作的母亲来说，老奶奶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助手，很少的家庭会愿意没有一个老奶奶同住。对于老年人的报答是，和子女同住可以在晚年得到家庭的照顾；尽管俄国社会是以生老病死都有保障而著称的，但是据我所知，它在照顾老年人方面也很有限，只是一种并不很吸引人的慈善机关式的制度而已。说也荒谬，在人生的两头——儿童时代和老年时代——这个制度的种种缺陷，正在日益

增加家庭的重要性。

大多数俄国城市妇女的最大悲剧，据她们自己说，就是迫于环境不得不牺牲多子女的乐趣。“子女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我们却因为养不起子女而被剥夺了这个权利。”一位老祖母悲哀地说，她的独生子是个著名的计算机专家。一个黑眼睛的女作家说出了这样一个辛辣的警句：“苏联妇女被叫去参加生产，却被剥夺了再生产。”的的确确，有好几十位妇女在看到我们有四个孩子时都笑容满面地赞叹说：“你们真是富足！”——不是说我们有钱而是说有福气。“很多很多妇女都渴望有两、三个子女而不是只有一个”，一位女记者说。“但是，这种子女较多的情况，主要是在乡村或中亚细亚才能办到。如果住在城里，对大多数人说来，要多生育子女没有足够的金钱，没有足够的住房，也没有合适的条件。我们只有一个孩子，但我养得活的也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如果你听到某人有两个孩子，那就是大有英雄好汉的本领了。”这种权利被剥夺之感，不仅在随意交谈中流露出来。1973 年 7 月《文学报》发表了一篇对三万三千个妇女的调查报告，它的结论说，绝大多数妇女都希望比她们实际所有的子女多一二倍。另一篇调查报告说，仅仅百分之三的妇女认为有一个孩子最理想；但是，只有一个孩子的妇女却占百分之六十四，而

一个孩子也没有的妇女则占百分之十七。

国家竭力采用各种宣传手段鼓励人们发展多子女家庭，包括公开授予生育十个孩子的母亲以“母亲英雄”的称号。对单身汉和没有子女的夫妻则征收小量税款，对有三个以上子女的妇女每月给以几个卢布的奖金。1974年11月，政府制订了一种新的子女津贴制度，以帮助人口多的家庭，凡是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低于六十七美元的家庭，每月津贴十五美元。但是，这种津贴本身数额似乎太少，不足以刺激人们增加家庭人口，也不足以防止苏联出生率的稳步下降。俄国的自然人口增长率现在是世界上最低的，每年不到百分之一——对于把人口众多看作是国家力量一个要素的苏联政治领导集团，这真是一桩伤脑筋的事情。

从有些人对安和我说的话听起来，尽管俄国妇女在感情上很喜欢孩子，但是许多妇女却害怕分娩。这部分地是由于俄国人镇痛的麻醉药物用得很少，更重要的是由于苏联人对于性教育和出生前各种准备持有一种陈腐的态度。

西方人念念不忘性和性问题；相形之下，在俄国，对此却几乎抱着一种完全沉默的态度。在我居留莫斯科期间，出版过唯一的一本所谓性问题手册，竟主要是讨论变态事例，对普通人可说毫无用处。俄国人在私下里，不论是在大学校园，在作家之家或任何其他男女杂

处助长乱交的环境中，对于两性关系都持有一种活泼而现实的态度。他们在私下里会津津有味地讲些黄色下流笑话，闲聊别人的不贞行为。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们对坦率地讨论性生理问题却抱有一种维多利亚式的拘谨态度，而所谓“公开场合”也可以说是只有两个人的场合。我不仅听到过西方学生对于俄国青年的假正经和生理问题上的天真无知表示惊异，而且苏联报刊上也时而刊登十几岁的怀孕女孩要求得到坦率指导的动人哀告，因为她一提到关于性的问题，母亲就惊慌得简直把手中正在编织的活儿都掉下来了。但仍然没有人给予什么指导，只是作些审慎的告诫，说男人是邪恶的，庸俗的语言很下流，不应当轻易放弃贞操等等。苏联公共生活在对待性问题上持着万分彻底的清教徒态度，同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年代中那种“一杯水主义”的自由恋爱先锋派大相径庭，因此，我坐在莫斯科听到美国人惊恐万状地认为美国学校里的性教育是共产党的阴谋时，不禁哑然失笑。

苏联清教徒主义所产生的一个实际影响是，节育工作的最终结果与其说是有计划的避孕，还不如说是在怀孕后采取措施。……

节育的主要方法是人工流产，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曾宣布人工流产为非法，后来在 1955 年苏联又使它合法化了。按官方规定，有工作的妇女进行人工流产分

文不花，无工作的妇女则仅需花五个卢布(合六点六七美元)，但有人告诉我，妇女或未婚女子为了把事情遮掩起来，或者为了到较好的诊所就医，得到较好的治疗，就要花三十到四十卢布(合四十到五十美元)或者更多的钱，进行私人流产。表面上，苏联医药卫生机关是不赞成人工流产的。"我们不认为人工流产是节育的一个好办法"，勃洛尚斯基博士说，"我们宁愿采用别的方法——避孕丸、避孕环、避孕膜、避孕套，经期推算避孕法。但是，如果一个妇女在怀孕的头三个月里希望人工流产的话，她有权作此选择。在三个月以后，只有出于医疗上的原因才可以进行流产。"如同其他许多领域一样，苏联人是不发表人工流产的统计数字的——已经多年未发表过这项数字。"我们估计，出生与人工流产的比例是一比二"，勃洛尚斯基博士说。"莫斯科的流产数字和纽约的差不多——约二十万人次(1973年)。这个数字包括人工流产与小产。人工流产约占百分之八十五(十七万人次)。"如果这在全国范围内是典型的话，那就是说，全国每年约有五百万人次流产——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但是，是否确实如此，却无从证实。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许多妇女多次进行过人工流产。一个人流产两、三次是常有的事。莫斯科和州医院的护士们说，有的妇女人工流产四、五、六次，我还听到过更高的数字。尽管苏联医生们竭力不鼓励流产

但是，他们说，只要一个妇女体质良好，而且在两次流产之间至少有六个月的间隔的话，那么，从医学角度看来，只要妇女经受得了，流产次数并没有一定的限制。据勃洛尚斯基这样的官员的官方解释，人工流产时全部使用轻度麻醉和现代真空吸引法。在第一流的医院里，情况也许是如此。但是，在一般妇科医院住过的妇女则抱怨不卫生、太拥挤、条件差，而且使用老式刮宫流产法。"那儿活象是条流水装配线，十分拥挤，你听得见别人在恶心呕吐，而护士们还向她们大喊大叫，"一个年青美貌的已婚妇女回忆说，"那里的气氛叫人非常难受。任何一种妇科治疗护理方法都十分令人不快，即使在妇科专家的诊治中也是如此。因此，妇女总是不想去，尽可能地拖延时间。我感到人工流产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并非单是她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

……然而据苏联人口统计学家报告，在各种不同年龄的人们中，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正在逐渐增加，其增长率是如此之高，因而1975年6月份《我们同时代人》杂志上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在十个婴儿中就有一个私生子，每年约四十万人。

俄国的产妇分娩与美国很不相同。为数不多的一些女人采取自然分娩法（人们要她们作深呼吸，因为氧有减轻疼痛的作用，而且除了奴佛卡因外很少用麻醉药）。按理，妇女应该到她们自己所住地区的妇科医院

去，但在大城市里，即将做父母的人通常都事先到各处找好享有盛誉的产科医院。列宁格勒的一对夫妇告诉我，他们的头一个孩子是臀位产，由于医疗护理上处理不当而夭折了，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仔细地打听了好几个医院后，才选定城里的一家最好的产科医院。

妻子在这个产院里，也象在别的产院一样，照例住一个多星期。苏联医生要求头生产妇在产院住八到十天，他们听说美国妇女只在产院住三、四天就准出院都大为惊讶。苏联还有一个习惯是让丈夫和其他亲属同母亲和新生儿隔离开。除了送必需品之外，不让他们进医院，护士们对于准许送什么也很严格。

"绝对禁止把卷头发的器具带进医院——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办公室的一个翻译维克托·格列宾希科夫在他的女儿出生后对我说，"不管你怎样把它们藏在包裹里，护士们都能神奇地发觉出来。他们只收新书，旧书不收——也许是因为旧书脏的缘故吧。医院里的伙食很单调，妇女们都希望送吃的东西——小甜饼或巧克力，乳酪和香肠——但护士们有一张单子，写明什么让送什么不让送。不过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一套绕过所有这些限制的办法。亲戚们都聚在产院病房的窗户外面，妇女们把绳子从窗口放下来。我们把东西系上绳子让她们吊上去。这种情景妙不可

言：父亲们、兄弟们和祖父们把一小捆一小捆的东西挂在绳子上吊上去，大家都很高兴。不幸我妻子的房间是在三层楼，正在护士们房间的上面。在把包裹系上绳子之前，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必须弄清楚护士们的确不在她们的房间里。因此，我们中有些人志愿到传达室去(这是把信息传给母亲们的正式途径)，打听明白护士们是否在走廊里忙碌着，然后每个人就赶紧把包裹系在绳子上，母亲们从三层楼上往下向我们喊话，亲戚们向上喊着答话。大家都很高兴。每一批母亲们在离开窗户时仍旧把绳子留在那里，以便给下一批人使用。”

那是一个典型的俄国式场面：医院当局制定了一套不必要的复杂的规章制度，普通俄国人则想方设法钻这些制度的空子。护士们很可能明明知道这种种情况，实际上却眼开眼闭。外国人会感到这场面很动人也很有趣，但未免有点儿古怪，人们竟得经历这么多的麻烦。对俄国人来说，这一切都十分自然——他们生活的很多方面就是这样过的。而且俄国人对于自己小小的个人胜利特别感到高兴。

在分娩后的头几天和头几个星期中，一直执行这些规章制度。在产科医院里，母亲们得在产后二十四小时才能看到自己的婴儿，婴儿身体被襁褓包裹得紧紧的——腿、身子、手臂都包裹在俄国传统的蜡烛包里

——一种象木乃伊似的包裹法。人们不许婴儿象美国婴儿那样自由活动。一个俄国护士告诉我说，如果让手随便活动，婴儿就会抓破自己的眼睛和腮帮子。腿必须包得笔直。只有小小的圆脑袋从蜡烛包里露出来。俄国婴儿总是仰脸躺着。我们的翻译维克托表达了俄国人的想法，他认为让婴儿脸朝下躺着会闷死的，当我们告诉他千百万美国的初生儿都脸朝下睡的时候，他还不相信。大多数俄国婴儿都吃母乳，常常要喂到一周岁左右。医生和母亲们都相信用人奶喂养。而且，市面上也简直没有配制婴儿食物的各种配料出售。许多俄国城市里做父母的人，把当地护士或儿科专家的话奉为金科玉律。苏联市场上迫切需要斯波克[1]或格塞尔[2]所著的那类书籍。一位俄国青年母亲对我说，苏联出版的此类书籍太呆板乏味，也太形式主义，没有多大实用价值。她最喜欢的是斯波克的书，其他人显然也和她有同感，因为此书俄译本早已销售一空。

尽管西方人有这样的印象，以为俄国儿童几乎一生下来就从摇篮里自动转到由国家给予优厚津贴的托儿所抚养，但是，我发现大多数学龄前儿童实际上都是

① 本杰明·斯波克(1903—)：美国儿科专家，写了不少有关照料儿童的书。——译者

② 阿诺德·格塞尔(1880—1961)：美国心理学家，是专门研究儿童心理的。——译者

在家里养育的。主要原因是，尽管国家津贴的日托托儿中心收费低廉，每月只花父母十四美元，但公立托儿中心在 1974 年只能容纳一至六岁的三千万名学龄前儿童中的三分之一左右。三至六岁年龄较大的儿童要比一至三岁的儿童收得多些。城市托儿中心约比乡村多一倍，不过城市妇女还是经常要为争取儿童进托儿所而四出奔波，有时还在报上提出意见，因为她们得乘车横穿市区把孩子送到又远又不方便的托儿所去。

在莫斯科西南第一〇四幼儿园托儿所里，一个心情愉快、金发碧眼的母亲、共产党员卓娅·莉斯涅尔告诉我，当她的儿子生下来的时候，她是怎样勉强地放弃了在苏联一家出名的工厂——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的每月二百六十五美元工资的工作。她受不了为了上班和送孩子去托儿所而穿过市区往返跋涉的辛劳，决心呆在家里把儿子抚养到三岁。最后，她以自己也在这个幼儿园当阿姨，每月拿一百美元的办法，把儿子送进了当地幼儿园。

我认为她的事例很值得注意，因为它不仅反映出苏联托儿所的不足，而且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妇女宁愿在家里抚养孩子，也不愿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越是这样。大多数苏联母亲对招收三至六岁儿童的幼儿园游戏班感兴趣。从事体力劳动的母亲们为了保住在工厂的工作，别无选择余地，

只得把孩子送到招收一至三岁儿童的托儿所去。但很显然，越来越多的城市妇女，特别是能够安排做非全日制工作的职业妇女，不喜欢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并千方百计地避免这样做。“孩子们能够跟着祖母学习，他们跟祖母在一起，受到的照顾会好得多，”一个女律师说。

这不仅仅是母亲们的反应。受人尊敬的学者们也不时说起他们对于把三岁以下的儿童放在一起养育抱有疑虑。1974 年 9 月，著名人口统计学家维克托·佩列维坚采夫在《新闻工作者》月刊中写道，托儿所的“消极”方面“越来越清楚了：同在家里养育的儿童比较起来，他们在教育方面是落后的，得病率也更高。”他建议削减托儿所的经费，把节省下来的钱一部分用以迅速扩展招收年龄较大儿童的幼儿园，一部分“作为给母亲们的津贴，使她们能够自己抚养已到达进托儿所年龄的儿童。”

这么一来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背离国家关于做工作的母亲的政策，而且还要对日托托儿中心制度作出重要的修改。因此，尽管佩列维坚采夫的批评隐蔽在一篇歌颂苏联社会福利制度的长文章的最后几句中，某些方面的人士还是对其出现感到惊讶。但是据佩列维坚采夫说，别的人口统计学家也持有同样观点。而且，他的文章能够在记者协会机关刊物上发表，这一事实本

身就暗示出他是得到报界也许还有政府或党里相当强有力的人物支持的。这些建议——即让母亲自己抚育幼儿并给予她们一定的津贴——私下里受到许多职业妇女的欢迎。

也许，要求把抚育孩子的工作交还给母亲的最动人的呼吁，是来自喜剧演员阿尔卡季·莱金，他常在节目的结尾说上一段关于母亲的感人独白。那是一个关于名叫斯拉维克的小男孩的故事。小男孩的祖母已经去世，他的母亲既要工作，又要买东西，照顾儿子，处理家务，实在忙不过来。由于在男孩需要她的时候，她不可能总在跟前，她就请求邻居帮忙。在她上班去的时候，她请附近公寓里的一个退休工人帮忙照料孩子及时起床上学。她请一个护士在孩子回家的途中摸摸他的前额看他有没有病。她请附近的一个警察照看孩子不要打架。最后，莱金温文地说道："我认为所有这些人都不能代替一个能唱催眠曲，能回答任何问题，能喂养并安慰孩子的母亲。也许母亲应该少做些工作，多关心些孩子。这样，对于孩子、父母和国家都有好处。"

六　儿　　童

家长与教师之间

学校可以脱离生活，可以脱离政治，这是撒谎骗人。①

列宁，1920 年

原来苏联学校里也有纪律问题。外国访问者走进教室时，身穿从沙皇时代沿袭下来的黑色连衫裙制服的女孩子和身穿公共汽车司机那种灰色制服、容貌整洁的男孩子"刷"地全体起立，齐声向客人致以"早安"，这个问题是看不出的。你看到苏联儿童在下午放学时那样整洁、有礼貌、驯服听话，再同美国城郊的学校里孩子们放学时又唱又叫，互相追逐，衣襟飞舞地涌出学校四下跑开那种吵闹活泼的样子相比，你也不会想到存在纪律问题。但我和安去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区第三十综合技术中学(我们有两个孩子，十一岁的劳丽和八岁的詹尼，在那儿上学)参加第一次家长教师联席会

① 列宁在 1918 年讲的。见《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69 页。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译者

后，我们发现存在纪律问题。

在詹尼的二年级班里，我们和约三十名其他家长一起弯着腰坐在矮小的绿色木制课桌之间（这是一种旧式乡村学校用的、两张连在一起的课桌）。教师伊琳娜·格奥尔基叶夫娜，一个鹪鹩似的小个子棕发妇女，正在讲解语法和短除法。接着，她就孩子们的行为向家长提出了警告。象对所有的教师一样，人们对她要以名字和父名相称，而她对学生则直呼其姓。

“阿·伊凡诺夫，”她高声唤道。家长们扭头四看，在教室里张望，只见后排有个身材魁梧的男人举起了手。他身穿办公服，挤在一张小绿课桌后面，显得难受而不相称。伊琳娜·格奥尔基叶夫娜向他开火了。

“你的萨沙上学老是迟到，”她严厉地告诫说。这时，其他家长有的盯着孩子的父亲看，有的则知趣地把目光转开。“早操做了一半他才来。我们八点十五分开始做操，他却到八点半才到。你去上班不能这样迟到吧。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给孩子树立了坏榜样。我们不能让一个学生象这样破坏班级的纪律。我已经对他谈过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这不是小孩的而是父母的过错。作为父亲，你有责任督促他准时到校。请你照管好这件事。”

她那尖锐的语气使我吃惊。伊琳娜·格奥尔基叶夫娜是一位矮小的女人，扎一束棕色的头发，脸上带有

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一条羊毛大围巾象披巾似的围在肩上。她已执教多年。开学的前几天，我们曾去学校会见教师并看看教室，詹尼由于要在一个使用陌生语言的陌生学校里学习而感到忧郁不安，当时她对詹尼态度和善，并多方安慰。但是到了课堂，伊琳娜·格奥尔基叶夫娜却没有丝毫的温柔和蔼。不管是对她的三、四十个学生，还是对学生的家长，她都是一个纪律严明的人。她对学生家长的讲话态度，就象对她的二年级学生一样独断专横。

"N·谢苗诺娃，"是她的第二个目标。这次举手的是一位母亲，样子更腼腆些——来开会的大多是孩子们的母亲，只有少数几个是孩子的父亲。伊琳娜·格奥尔基叶夫娜拿起一个笔记本，一页一页地慢慢翻着给大家看。她说："看看这个本子。"我看到本子上到处是空白、乱涂的笔迹和墨水团。有一页撕了下来，又用浆糊粘上。伊琳娜·格奥尔基叶夫娜训斥说："这本作业糟透了。这就是你的娜嘉的典型作业。她就是乱搞一气。你能让她在家里也乱搞一气吗？她可以把衣服到处乱扔吗？"她指着她认为是令人恼火的一页说："你们看这儿，她是随心所欲到处乱写。"她所指的那一页，我看上去并不那么糟。但凑近一看，我看到孩子所写的字母没有全部在横格中排整齐。不过，作业的字迹是清楚的，从其他方面看，这种作业对一个八岁的孩

子来说还理应算是整洁的。

“天哪”，我暗自担心地想，“可怜的詹尼，俄语还不大会写、会说呢，她会对她说些什么呢？”伊琳娜·格奥尔基叶夫娜饶过了我们，没有对我们提出个人批评，但是她并不放过俄国家长们。她一个挨一个地向他们指出他们的孩子在学校或是在家庭教养方面的过失。“基柳欣，”她大声地点名说，“他在课堂上经常讲话，常常打扰别人，而且总是讲个不停。”接着她又提到另一个女孩的名字。“噢，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孩。但她就是坐不定，坐不端正，身子老是在那儿扭动摇晃。”她又说，另一个男孩子不但在班上表现恶劣，而且要到下午三点或三点半——二年级学生放学两、三个小时之后才回到家里。她不赞成地说，这说明家长不知道孩子在干什么，不注意他的行为。她又一连串地念了十几个孩子的名字，作为结束语，她说：“我对这些孩子的家长有一个要求——请你们把孩子管教好。”最后，伊琳娜·格奥尔基叶夫娜走到办公桌边，然后又回到这群胆战心惊的家长面前，手里拿着小球、绳索、塑料飞机和坦克的部件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一把刀身厚实、类似切鱼的餐刀似的四吋无套小刀。她告诫说，“这些东西都是在课堂上从你们孩子手里没收来的。”接着她举起小刀给大家看，并责问道，“二年级的孩子要这样一把小刀干什么？在学校里要它干什么？在课

堂上玩吗?”室内鸦雀无声。家长们毫无怨言、抗议或解释就接受了她的大声训斥,并默认了自己的过错,对她的权威毫无异议。听俄国朋友说,这种批评会是一种定期召开的例会,家长和孩子们既害怕它又自相矛盾地期待着它,它成了事后大量闲谈的资料来源,因为无论家长还是孩子都会一家一家地相互传说班主任对每个孩子的评论。

在楼上六年级里,气氛要缓和一些。我们到教室的时候,娜塔利亚·伊凡诺夫娜,一位讨人喜欢的金发长圆脸妇女,已经结束了对孩子们的逐个讲评,正在把新的几何、代数课内容讲给家长们听,其中有些家长要想弄懂孩子们的家庭作业显然是力不能及的。她坚定地告诫家长们不要去替自己子女做实际的作业,极力劝告他们只在事后检查一遍就行。然而她的态度象一位友善的顾问,而不象铁面无私的执法人。一当我们在其他家长中间坐下,她就提醒大家说班上有一个美国女孩子,并对劳丽的课堂作业作了公开的讲评。讲评谈得很公正,也很全面,既直率地评论到劳丽初到校时的胆怯腼腆,又恰如其分地表扬了她最近当众背诵代数公式一事。劳丽的分数也按苏联的习惯做法,与其他学生的分数一道公布在公告栏上。在这个班级里,争论的焦点是美术老师对于她所认为邋遢的作业打了许多两分(即不及格分数,苏联学

校中最高分数是五分)。一位孩子的父亲抱怨教师过于严格，孩子因为没有使用规定的绘图纸(当时店里买不到这种纸)就得了低分数。娜塔利亚·伊凡诺夫娜听后表示同情，但分数并没有改动。

在规模较大的全校家长大会上，一位从师范学院邀请来的讲演者告诉家长们，他们应当对子女爱看电视的习惯给以更多注意。他的话听上去倒象从斯卡斯德尔[①]学来的：完全禁止看电视不是个好办法，完全放任自流也同样不好。他建议家长不但限定观看时间，而且在看某些节目时陪着孩子看，看后一起讨论，使电视成为一种有教育意义的家庭活动。他讲完之后，一位孩子的父亲站起来抱怨说，适宜十四岁以下儿童观看的节目很少，仅有的那点节目播放时间又太早，有工作的家长没法照他的忠告去办。其他家长也点头表示同意。讨论一番之后，校长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马尔蒂诺夫又把会议方向扭回到学校真正关心的议题上：孩子们不做家庭作业的问题、纪律问题、需要家长们配合的问题。他没有涉及具体细节，但是劳丽和詹尼告诉我们，俄国儿童与美国小孩一样，常常在教师背后扔用唾沫弄湿的纸团和纸做的飞机。女孩子的长头发被浸到墨水瓶里，她们则用缝衣针戳男孩子作

① 斯卡斯德尔镇是美国纽约市北郊一个居住区。该镇的法律禁止在该地区内建造工厂或类似的建筑物。——译者

为回敬。学校严格禁止吸烟，但是据劳丽说，男厕所里一到课间休息时就烟雾腾腾，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校长是一位慈祥的秃顶老头儿，戴一副钢卷边眼镜，面带和蔼可亲的笑容，并不象二年级教师那样严峻。但我还是不由联想起在美国家长教师联谊会的会议上那种截然不同的相互关系，在那儿，家长们自豪地前来观看公告栏上张贴的子女作业，听听班主任对自己后代所作的暖人心怀的赞扬；如果有谁公开发牢骚的话，那通常也是家长打扰校长。我后来得悉，有些俄国家长象美国人一样，也同教师一道参加班委会工作，解决纪律问题或者研究帮助比较贫苦的孩子筹集书费这类事项。此外，从关于电视问题的简短讨论中可以看出，教育程度高的家长对于教育专家或学校负责人并不象老一代人那样畏惧，偶尔也在家长会上站出来讲讲话。一位俄国朋友记得在莫斯科一所学校里，有一个孩子的母亲竟问校长兼历史教师，为什么他在上历史课时说耶稣是希腊神话中诸神之一。这时旁边一位老奶奶嘀咕着辩护说，“你干什么攻击他？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嘛。”

不过总的说来，第一次家长会让我们认识了苏联教育哲学的某些要点。不论是培养儿童，还是在各行各业中迫使成年人俯首听命，苏联制度中一个主要做法，就是对于不良行为和较差的表现进行公开羞辱，虽

然在我们看来，这是相当粗暴的。从家长们顺从忍耐的表现中可以看出，每个人自幼就懂得，和当权者顶撞或者对公开的批评进行抗辩都是徒劳的。此外，每个人似乎都接受了这样一个思想：学校应当最懂得如何培养儿童，教师应当指导家庭并为它们立下种种准则，而不是相反。

然而，儿童在学校中过着受人管教、纪律严格的生活，在家里却松懈懒散，被父母娇生惯养、过度溺爱、倍加保护，两者之间有如天壤之别。俄国人在心底里对儿童是宽厚的。我一次又一次从官员们口中听到的一种共同理论是，儿童们必须得到优待，“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未来。”据我推测，真正的理由还带上更浓的感情色彩。俄国人往往在感情支配下溺爱孩子：他们羡慕和喜爱童年时代的天真烂漫。

在农民集市上，集体农庄的妇女总爱把鲜花和其他小礼物赠送给我们三岁的孩子莱斯利，一边还抚弄着她的下巴，嘟嘟哝哝地说上些爱抚亲热的话。严厉的海关检查人员看到我们的孩子也会变得温和起来，有时不加检查就让我们通过。饭店的女服务员会不睬其他顾客，停下来七手八脚地侍弄孩子们。有一次，我们驱车从赫尔辛基到达列宁格勒，旅馆管理员找不到我们那份保留房间的单子。那时早已过了午餐时刻，

我们肚内空空如也，然而她却要我们等着，自己去接待一批比我们后到的七十名学生了。然而，当我"扑"地把莱斯利抱上柜台时，另一位房间管理员马上怜悯起我们来。"奥丽加，"她非常热情地说道，"他们带着个小家伙呢。"房间很快就找到了。

官方也有这种倾向。在我访问过的集体农庄里，托儿所往往是各种建筑中最明亮、也肯定是最整洁的地方，它是人们正式访问农场时必到之处，因为当局对此感到十分自豪。在石油城镇阿尔麦蒂耶夫斯克，我与一个外国记者代表团一起被领去参观当地石油托拉斯主办的少先队营地，这也是它最引为骄傲的设施之一，而且也确实值得自豪，因为该营地隐没于丛林之中，僻静幽雅，悦人心目，管理得十分得当。在摩尔曼斯克，当漫长的北极冬夜来到时，有两个月不出太阳，人们告诉我，儿童们在获得新鲜食物、维生素和太阳灯治疗方面最有优先权。在第一〇一幼儿园暨托儿所里，我和安看着一群学步的儿童把衣服脱得光光的，只剩一条短裤，戴上护目镜，然后象做儿童游戏一样，脚趾沿着粉笔划的圆圈排好。

"好，孩子们，"塔玛拉·波诺马罗娃医生哄小鸡似地喊着："把手举过头。"于是十五双小手就在空中晃动，光光的肚皮沐浴在圆圈中心紫外线太阳灯射出的奇异彩虹之中。

“这儿真暗哪,”一个戴蝴蝶结的娃娃不肯听话,用手扯护目镜。

“玛莎,”一位穿白罩衣的女保育员告诫说,“不要摘下眼镜。”

过了一会儿,又让他们转过身来,在背上稍稍照射一下。我听说在深冬这种治疗每天要进行六至八分钟。在餐室里,厨师们给我们看了供孩子们食用的小盘胡罗卜块色拉和喝茶时吃的新鲜柠檬片。塔玛拉·波诺马罗娃医生告诉我,“我们把最好的食品留给孩子们,他们是我们的未来。”

在家里,家庭生活几乎就是围着孩子们转,特别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有那么多城市家庭都只生一个小孩,因此俄国的家长把所有拿得出来的物质恩惠和硬施滥加的体贴爱护都集中在这个小宝贝身上。一个特别不愿依赖父母的十四岁的孩子嘀咕说,“他们把我们当成玩具,而不是当人来对待。”这个男孩子想要有点大人样子,可是大多数儿童却对父母给予的溺爱感到温暖舒适。我们认识一位语言教师,她非常喜欢让自己两岁的小莉萨穿上百褶裙,头上戴起白色的玻璃纱蝴蝶结。孩子的父亲也溺爱莉萨,给她买了一大批奢华的绒布动物和娃娃,其中许多还是进口货,这种奢侈品他和他的妻子自己可是不大舍得享受的。

一位有了一个女儿的俄国艺术史家,试图找出俄

国人和美国人在溺爱儿童方面的区别。这位妇女说，“你们是让孩子随心所欲地做，我们是对孩子有求必应地给。而我们的孩子长大了自私自利。在很多情况下，这是由于孩子的家长过去生活艰难，因而盼望自己的孩子能过得美满一些。但结果孩子们视之当然，毫不珍惜。我认识一位妇女，她同时在三个地方工作，这样她就能挣得钱给女儿买最精美的衣服。做母亲的穿着十分朴素，她自己什么也不要。可是，做女儿的却认为自己非得有各种最时兴的东西不可，甚至对母亲还毫无感戴之情。在其他家庭中，好食物中最精美的一份总是给孩子吃的。饭桌上有了多余食物，也总是放在一边留给孩子。”千真万确，我们认识一家人，孩子的父亲在部里担任高级职务，生活十分富裕，他们几乎每天规定要给六岁的孩子吃黑鱼子酱。孩子吃得倒了胃口(这正是幼儿的特征)，全家的大人却在一边馋涎欲滴。然而，人人都接受了把最好的留给最小的这一传统习惯。

随着这种溺爱姑息而来的是家长对孩子滥施的过分保护。其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孩子外出时盲目地热衷于给孩子多加衣服。孩子们都变成了会走路的卷心菜，里面鼓鼓囊囊地穿着一层又一层过于宽大的绒线衫，然后包上一件大了两个尺码的皮外套，外面再用一条围巾象饰带似地裹住中腹部。我总不太理解，这些

活动的人球怎么能得到很多的锻炼，但家长的保护感却得到了满足。在公园里，我看到不少老奶奶俯着身子坐在长凳上准备着，一当小家伙那只不听话的屁股偶尔坐到沙箱的沙土上，就猛地把他扶起来站好。俄国的所有学步儿童都得掌握蹲的功夫，以免与寒冷的地面接触而使大人担忧。当一群小家伙在雪地里游戏时，家长们就在边上徘徊护卫着。七岁、八岁、九岁的孩子上学时还有老奶奶陪着去，而且总要跟到学校，替他们脱去外面的衣服才走。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在公共场合没有大人陪伴的十岁、十一岁以下儿童竟是如此罕见。而俄国家长感到惊愕的是，我们竟让詹尼在八、九岁时就独自或与五、六岁的斯科特一起乘公共汽车，即使是到只有几站路远的美国大使馆去。

然而，如果一个小孩由于某种原因走失了，俄国人会齐心协力地负责寻找。刹时间，各方面都伸出爱护、友好之手。一次在高尔基公园，我们在一个小冰场里滑冰，一个俄国孩子的母亲奔离坐处去把被我们放在滑冰场旁边雪地中游戏的小莱斯利抱拢来——虽然她仍是在我们一眼就能照看到的地方。当安滑回去时，这位俄国妇女挥手叫她别过去，并主动地代她照看了一个半小时。她让莱斯利坐在膝盖上，同自己的孩子一起逗着莱斯利，好让安愉快地滑冰。

在家里，父母出于爱护往往不让孩子做家务杂活。

我认识的一位茶褐色头发的记者，对于这类怪事感到烦恼。她说，她那十六岁的女儿在学校自己照料衣着，在食堂里自己取饭菜，同其他孩子一起轮流擦灰尘，洗窗户，打扫教室和操场。"但是玛莎在家什么也不做，"这位母亲告诉我，"她回到家，往桌子边一坐，等着别人来伺候她。我告诉母亲让她自己洗自己的碟子，可是母亲却编个借口说，'玛莎哪能干这种苦活儿——还是我自己做方便。'这些老奶奶最宠孩子。"有一位俄国工程师，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他把这称为"一种犹太人的溺爱——我们为孩子们担忧，怕他们身体不好，担心他们要离家参军，害怕某种不幸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原因在于我们自己目睹了那么多的艰难困苦。"要是某个家庭鼓励孩子独立生活，给十几岁的孩子安排一个有收入的工作，那社会舆论就会出来非难。一位科学家对我讲起过某个医生家庭，家长给女儿找了个暑期临时工作，在电报局做职员。女孩子挺高兴，但是消息传到了亲友们耳中，他们认为做父母的竟让一个小女孩去工作未免太不体面，因此他们硬逼着家长让女儿把工作辞掉方才罢休。

这种家庭爱护的包围，也使得俄国在校儿童比美国儿童更多地依附于家庭，而不是那么一味迷恋于与小伙伴们群聚厮耍，尽管这种情况正在起变化。学龄儿童在家庭以外的游戏和娱乐要比西方少，他们常常

被关在家里跟家里人一起娱乐。确实，有千百万儿童在夏季上少先队夏令营。同成年人疗养院一样，各个夏令营的质量千差万别。最好的夏令营，如同为那些享有特权的成年人所开设的商店一样，非常引人入胜(但难以进入)。一些孩子告诉我说，比较普通的夏令营都是纪律严格，相当枯燥乏味。我那位朋友、茶褐色头发的记者，在解释她的女儿为什么不去夏令营时说："暑期里，孩子们想摆脱纪律约束轻松一下，而在那些夏令营里，他们得'按铃声生活'，体操和活动全得按时间表进行。"在漫长的秋冬季节，娱乐活动更成了问题。马戏团、木偶剧院和儿童剧院以及公园里的滑冰活动都深受人们欢迎。电影和电视动画片集《喂！等一会儿！》是轰动一时的作品，片中描写一头恶狼施展各种各样滑稽可笑的恶作剧伎俩追逐一只可爱的兔子。我们的孩子就象喜欢美国动画片《越野赛跑手》一样喜爱这部片子。但是同西方相比，可供选择的娱乐寥寥无几，公共娱乐场所的数量也远远不足，仅能满足人们需求的一小部分。一天我偶然碰见一位刚从华盛顿回国、正带着全家在树林里野餐的苏联外交官。他主动告诉我，他的孩子是多么厌倦苏联的电视节目，而莫斯科的公园和游乐场所，在他们看来又是多么单调乏味(莫斯科的公园和游乐场所是苏联能提供的最好的)。游历较少的孩子也许注意不到那么多。年龄小些的儿

童在户外庭院里玩耍，可是年岁大一点的孩子就很难有机会获得十二、三岁的少年所向往的那种独立活动。气候迫使他们呆在室内，孩子们自动地变为成年人圈子里的附属物。不管孩子年龄大小，家长在出门拜访时总是理所当然地带上孩子，这样，听大人的话、跟着家里人出去就成了他们社交生活的主要内容。

我听说，由于苏联家庭中住所拥挤，有时会引起父母对子女动辄生气、大发雷霆地严厉管教，但我们所相识的俄国家庭却相当放任随和。我好几次看到孩子们放肆胡闹，从餐桌那儿来来回回地乱跑，家长一次又一次叫他们安静点，坐定下来吃东西，他们就是不听，而家长也只好听之任之。我记得，有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子在离我们正围着用餐的餐桌仅几呎远的椅子和床铺上跳上蹦下地闹了个把钟头，而大人却置若罔闻。这并非只是少数几个没有规矩的家庭的疏忽。莫斯科一位幼儿园主任向我声称，苏联设立幼儿园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它能使被家庭宠坏的“天下最好的”孩子适应社会生活。拉脱维亚的一位小学教师告诉我，家庭的放任纵容同学校的严格纪律之间的矛盾，常常使未上过幼儿园的孩子感到紧张。这位年青妇女对学校的僵硬纪律和家庭的松弛疏忽都持批评态度。她说，“如果马儿一直在自由自在地奔腾，你就没法猛然将它勒住。”

俄国人在孩子离开自己身边时感到难舍难离。开

学第一天，在我们孩子就学的第三十综合技术中学的红砖墙外面，出现了这样一个情绪激动、感情奔放的场面，使我联想起美国人在孩子第一次离家较长时间去夏令营时送行的情景，而不象是仅仅与孩子分开几个小时的样子。在室外庭院里，孩子们全部按班级一排排地在教师面前站好队，父亲们爬上窗台，踮起脚给孩子拍张快照。母亲们大声叮嘱着。最后，由校长讲了话，孩子们齐步走进学校。不少孩子的母亲哭泣起来，我甚至偶然见到一位陆军大尉也在大楼转角处揩眼泪。这些俄国家长们简直不忍离开学校，他们开始透过窗户窥看。"一年级学生的家长们，请不要给你们的孩子增加压力了，"校长通过手提扩音器发出呼吁，"孩子们已经挺激动了，请回家吧！不要在窗户外边听了，让他们在安静的气氛中开始上第一课吧！"

今天，在苏联，人们对于教育仍然怀有理想主义的崇敬，在六十年代城市学校危机引起的幻想破灭之前，美国人也怀有过这种崇敬。受教育同加入共产党一样，是苏联社会中向上爬的两条主要途径之一。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在社会上，教育在使人们相互平等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尽管与美国一样，现实与这种理想差之千里。然而，总的来说苏联教育工作在头六个十年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苏联已从革命前文盲约占人口百

分之七十五和入学儿童仅一千万人的状况，发展到几乎完全消灭了文盲并且拥有五千万名左右的入学儿童。这些并不单纯是抽象的统计数字。我记得在杜尚别郊外某国营农场有一位身材矮小、长着凸牙的塔吉克农民，名叫苏尔坦·米尔哈洛夫，他的一家就体现了在三代人中间发生的教育变化。在一次官方组织的访问中，我和《时代》周刊的约翰·肖被带到他家，并且在标准的中亚细亚家庭用的、雕花的传统户外餐桌上喝当地的葡萄酒，吃了一顿丰盛的羔羊肉饭。我们尽可能把自己那双可怜别扭的西方人的腿盘起来坐，米尔哈洛夫向我们讲述了他父亲的事。革命前他父亲一贫如洗，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佃农。他说，可是现在他的八个孩子之中有七个接受了高中或大学教育，现已十一岁的老八也将受到同等的教育。接着，他十分自豪地说，他在孩子们的榜样的鼓舞下，在五十四岁时"重上学校"。现在正在上葡萄栽培和其他学科的函授班，他嘿嘿地笑着说，"我的孩子帮助我做家庭作业。"

但是，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显著的不平等却依然存在。1970年人口调查统计表明，苏联全部成年人中有一半以上文化程度不超过七年级水平，而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仅占百分之五点五。同时，尽管莫斯科制定了全国统一的基本必修课程，但苏联教育质量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因而苏联和西方学者现在都

怀疑，苏联的教育制度正在对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起着固定和强化的作用。

最高级的中学是五、六所专门的数理学校，它们以纽约布郎克斯科学高级中学为样板，反映了科学在苏联制度中的崇高声誉。在新西伯利亚一所这样的学校里，人们告诉我该校每年从整个西伯利亚地区一百万名学生中招收三百名神童，为选拔这些最有希望的天才，要进行一场知识上的奥林匹克竞赛。与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同样富有竞争性的科学学校一样，该校聘有大学教授任教，并试用比普通中学更为灵活和更激励人的教学方法。校长告诉我，在一次测验中作为一个附加问题，教师要求学生提出内燃机的代用品。过了五分钟，一名十四岁的学生交上来三种设想，其中有两种设想很切实际，因而苏联成年科学家已经开始对之进行探索。在学校的青年技术员俱乐部中，成年人正努力促使这些聪明的年轻人把异想天开的想象变为发明创造。一个男孩自造了一台小型激光机。另一个孩子创造了一种精心制作的液压互拉互牵式机械，可以在西伯利亚沼泽地带滑行而不陷入泥中。在其他地方，有一些师范学院举办了完全废弃记分制的选修实验班。有一个我们所熟识的家庭，由于女儿进入一所实验学校学习，全家都感到高兴，那所学校允许孩子们在课堂上相互争论，偶尔也准许由学生代替教师上

课——这是普通学校中闻所未闻的。

处于另一个极端的是那些师资薄弱、设备简陋的乡村学校，由于学生过多而有时实行两班或三班制的外省学校，以及设备极为简陋的工人区学校，我听到俄国教师把某些工人区学校形容为“苏联的挂黑板的闹市”。莫斯科一所工人区学校的一位忠心尽职的青年数学教师瓦西里告诉我，他班上的八十名八年级学生中有十五人有智力迟钝或神经衰弱症的疾病证明书，他们因而免于考试，或在某些情况下根本不必来上学。他悲哀地称他们为“死魂灵”。瓦西里讲，他的班上有一部分有才华的学生，同时也有许多学生跟不上家庭作业，其部分原因是家庭分裂或者家里有人酗酒。可是，他仍然受到学校当局的严令逼迫，要求除一、二人之外让学生全部升级，因为官方一定要宣布所有儿童都接受中等教育，即使是名义上如此也行（1973年，全国性强迫教育的标准定为完成八年级学业）。我听说，由于一些工人区学校里气氛十分恶劣，因而教师们宁可忍受种种不便和多费时间来回跋涉，以求继续留在莫斯科市中心历史较久、条件较好的学校中任教，也不愿调到离家较近的工人阶级子弟学校去。

一位多年来一直在莫斯科的工人区学校中担任八、九年级文学老师的中年妇女涅佳对我说，“我的学生几乎都是‘文盲’，但是我闭着眼睛教下去。我的四

十名学生中，总有那么五、六个男孩子整天就是打架、抽烟、喝酒。他们是十足的流氓。他们合伙抢劫，有些女学生竟怀了孕。去年我班上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在学校只呆了半年多就因卖淫而被判了罪。可是你又不能给学生打不及格分数，因为校长要填满升级学生的名额。升级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到九十九。如果完不成这个定额，校长就会受到惩戒。一年前，有一位教师因为不及格分数打得太多而被解职。学生们知道这一点。他们会毫不隐讳地对你说，'你没法让我不及格。'一次，我给一名相当不错的学生打了个三分，他心绪很不安。他问我，'你为什么给那个一窍不通的家伙打三分，而给我也打一个三分呢？'我告诉他说，'我要让那个孩子念完八年级成绩及格，这样他就能完全离开学校。那么，明年我就能教你和其他真正愿意学习的学生了！'"

她的意思是说，差一些的学生，在八年级之后，就完全退学，或者转到职业学校去。这种情形已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报纸上不时刊有不愉快的家长来信，抱怨九、十年级（大学预科水平）开班太少，不能满足八年级学生的升学需要。在我们住处附近，孩子们参加了为时一周的八年级分专科考试，成绩差的就转入职业学校，包括坐落在街角的那所训练服装工人的学校。问题正日益尖锐起来，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中苏联

当局大力扩展高中(九、十年级)的招生人数,而没有相应扩大进行高等教育的院校。现在,国家与许多家长之间发生了矛盾——国家需要更多称职的体力劳动工人,而家长一心要让孩子接受更高的教育并获得与之相称的、更有声望的职业。

显然已经出现的情况是:苏联知识界现已足够庞大,可以自已补充自己。长期以来,在革命、内战、清洗和世界大战中有那么多人遭到了消灭,因此国家经常需要从下面补充新鲜血液,而现在情况变了。有钱的家长们现在都把眼光盯着苏联的名牌大学——国立莫斯科大学、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和其他几个大名鼎鼎的院校,竭尽全力要把自已的孩子送到"特别学校"去学习。象我们的孩子就学的这类学校中,开设有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各门科学或音乐(早在二年级就已开设)等专门课程,再加上教学质量较高的一般课程。由于苏联大城市的学校是十年一贯制,从一年级到十年级都在一座学校大楼里学习,因此必须从一开始就在该校入学。按规定,特别学校同其他学校一样是按地区招生的,然而它们并不接纳全部报考者。他们隐蔽地采用非正式入学测验的办法,以剔除智力迟钝的学生。一些邻居告诉我们,我们这所第三十综合技术中学要求报考的一年级学生从一本书里选一段朗读(尽管幼儿园里通常不进行学前朗读教育),背诵幼儿歌

谣、讲几个寓言故事并描述各种不同的季节。许多不住在学校所在地区的家长，为了买通关节，使自己的孩子能进入这类学校学习，就对校长施加影响或是赠送“礼物”。

家长的阶级意识，有时还有体力劳动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抗情绪，都渗透到儿童中间。我们认识的一家人，住在一幢自建公助的公寓大楼里。那里住的全是苏联人所称的知识分子（美国人称之为中产阶级，即工程师、科学家、军官、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的周围全是体力劳动工人居住的公寓大楼。据我们朋友说，这两个集团的人，生活作风很不一样。工人之间的谈话资料是体育运动之类，大人引导孩子上体育俱乐部去，晚上十时半就熄了灯。而在自建公助的大楼里，人们更感兴趣的是文化生活，他们给孩子上音乐课，楼里直到半夜还是灯火通明。这两个集团的人很少交往。我们的朋友也好，其他俄国人也好，都只听说过几件孤零零地逾越阶级界线而结合的婚姻。

出生于两类不同家庭的孩子，进入附近的同一所学校学习，但是他们从幼年起就怀有不同的抱负。工人的孩子希望学完高中课程，然后当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警察或是进厂当工人，而知识分子的子女则希望上大学。“当然，也有例外的，”我们的朋友，一位系统分析家说：“但是基本上存在着两个集团，每个人都知

道自己属于哪一个集团。孩子们几乎从不邀请另一个集团的孩子到家里来，他们意识到社会的差异。在一块儿玩的时候，他们是敌人。”然后，他顿了一下，考虑到“敌人”这个字太重了。“竞争者？”我提议说。“不，竞争者这个词分量不够。”他反对说。“这是介乎于敌人和竞争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总之，其他大楼的孩子认为我们这幢大楼的孩子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他们猜测对方比较有钱，并且对对方怀有敬意。”

不管存在什么差异，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所有孩子在托儿所、幼儿园或学校里都受到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灌输。知识教育的情况可能各有不同，但社会性格的训练则毫无区别。1974年的一份主要的教学手册中声称：“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工作的目的，在于造就坚定的集体主义者，一个在思想上不把自己置于社会之外的人，”“共产主义的和全民道德的形成……是儿童教育必备条件的统一基础。”换句话说，苏联儿童心理学的主要告诫是：学校应创造适当的集体气氛，以保证儿童们正当地成长。一个当过苏联记者的名叫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夫的变节者说，儿童在三、四岁那么大时就从他们托儿所的“保育员”身上学得具有一种政治触角。弗拉基米罗夫写道：“年轻的男孩或女孩，逐渐获得一种在苏联社会中最为重要的本领，他逐渐领会到，哪

些问题是可以问或可以讨论的，哪些问题是必须避开的。”此外，孩子们还被逐渐灌输一种统一的集体主义的热情。弗拉基米罗夫指出，“一个孩子在幼儿园里所能犯的最大的过失，就是与众不同。在很少几个国家里，那些希望逆潮流而动的个人是日子好过的，但是在苏联却使人们几乎不可能逆潮流而动。”

我所参观的那些幼儿园，据俄国朋友们说，都远远超过中等水平，那里通常是明亮、舒适的，有许多玩具，一些角落里种着花木。几乎每一个房间里都有微笑的、慈祥的“列宁伯伯”的肖像。在那里，孩子们在“保育员”的温暖然而严格的母爱关怀下，学着一起玩耍和工作，甚至学着相互督促遵守纪律。在摩尔曼斯克的第一〇一托儿所暨幼儿园里，我看到一群学步的小孩，他们的面前摆着为招待全体洋娃娃而准备得很出色的茶桌。当孩子们开始玩耍时，几名穿着白罩衣的身材高大的妇女围住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用温柔的语气指导他们：坐在哪里，怎样坐，怎样拿洋娃娃，以及一般怎样玩法。虽然这种一会儿叫孩子这样做，一会儿又叫孩子那样做的监督和管理是在明显的爱抚下进行的，但是这似乎必然会抑制孩子们的主动性和自发性。孩子们离了指示几乎就寸步难行。一位年轻的美国儿童心理学家琼·伊普沙曾在莫斯科的托儿所进行调查研究，她也对这种“非常温和的但又是强制施行的”指

导大吃一惊。她说，“从心理上来讲，这使孩子们非常有依赖性，因为他们不希望由于做了错事而失去温暖。”在莫斯科第一〇四托儿所暨幼儿园里，院长莉季娅·亚历山大德拉·阿加廖娃向我叙述了较大的孩子是怎样玩演戏游戏的：教师自始至终管理着他们，安排各种游戏以便对他们进行集体协作的道德教育。我问，如果有的孩子表现得自私自利，或者行为十分恶劣呢？她说，所受的处罚往往是不让参加游戏，并从小组中开除出去。

虽然我们五岁的儿子斯科特在苏联幼儿园里仅仅呆了三个月左右，我们总算有机会注意到了那里友善的然而是强制性的统一活动。有一次，孩子们受了整整一个小时的纪律训练，要他们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另一次，安回家谈起了美术作业的整洁和一致性，她不大相信地惊叹道，“二十个小孩子做粘土兔子，每个兔子都是同样大小、同样形状和同样姿势。你根本分不出哪个是斯科特做的，哪个是玛莎或米沙做的！”后来，孩子们就画雏菊——每幅画上的花都是同样的位置，同样数量的花瓣，同样的颜色，花梗上都是同样三片叶子。我们在格鲁吉亚看了十来岁儿童的画展——装饰美观，色彩丰富，画得不错，画面的空间也利用得好。但是在构思或技巧上也同样是全无个性或独到之处的。我们四处寻找那些大多数孩子都喜爱的、表

现出艺术想象力的作品，然而毫无结果。这是具体而微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孩子们显然是按照教师的画，依样画葫芦或者相互模仿的。

一位前托儿所教师告诉我，苏联小孩不准画的一个题材，就是列宁。她说，列宁太神圣了，“而他们又画得那样糟。”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宣传中的政治内容——特别是围绕列宁的内容——使大多数西方人震惊。俄国人说，现在已经不象斯大林统治时期那样暴虐和粗鲁了，那时候常常教孩子们把那些遭受斯大林清洗的高级官员的画像上的双眼挖掉或把教科书上他们的画像用墨涂掉。他们常常要对那个独裁者唱崇拜的赞歌，或者，在冷战的高峰时期，学习象口号似的反西方的儿歌（“斯大林，是糖果；罗斯福，只会笑；丘吉尔，大草包”——这些字在俄语中是押韵的）。

现在，强调的重点是爱国主义和对列宁的崇拜。一位苏联读者最先读到的不是普通的儿童散文，而是这样的论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儿童乐园。”从两三岁起，孩子们就沉浸在歌曲、游戏和小小的节目表演节目里，这种节目里满是红旗、红星和对十月革命和“世界上最幸福的”祖国的赞歌。一位我所认识的年轻莫斯科人回忆起在他童年时代幼儿园里唱的一支歌，讲的是一个小孩拣到一颗钮扣，交给了一位边防战士，从而抓住了一个外国特务

——其寓意显然在于要孩子不同外国人接触。在他们给我的一本流行儿歌集中，这支歌没有包括在内，但是在那些爱国歌曲中，有一支英雄短歌，唱的是一个坚守岗位的边防战士，他两眼注视着敌人可能隐藏的深谷，时刻准备击退敌兵。

现在不象在斯大林时代，并不把活着的领导人当作偶像来崇拜；所有的感情都集中在列宁身上。教师手册里规定，教师应教育两、三岁的孩子辨认、热爱和尊敬列宁像；四、五岁的孩子在节日里用绸带和鲜花装饰列宁像；六岁的孩子向他们家乡的列宁塑像献花。无数关于列宁的歌曲使他成了一个兼具乔治·华盛顿、圣诞老人和耶稣的特性的人物，世上迄今最完美的人，并且，象一首歌中所唱的，“永远是孩子们最好的朋友”。有些歌想象列宁复活了，在玩捉迷藏，摘草莓，把孩子放在膝盖上蹦跳，而孩子们则爱列宁胜过爱自己的祖父，告诉列宁，“我们希望样样都象你。”

毫不奇怪，这种政治训练是一种迷惑人的东西。我在亚美尼亚的一个村庄、巴库、莫斯科或者摩尔曼斯克听到激动的年轻孩子们热情地歌唱列宁。我们自己的斯科特有一天一回到家就说：“沙皇象英国国王，可是列宁的队伍更强些，列宁打赢了！”当我向一位俄国外交官谈起这件事时，他微笑着回答：“只要给我们时间，我们就能把他培养成一个布尔什维克。”有一家俄

国朋友的一个四岁的侄子，一天晚上看到节日的焰火，非常兴奋，问他的母亲，他是不是可以大声喊叫，她同意了，于是这个孩子就尖声喊道："光荣归于苏联共产党"，这是幼儿园里表达节日兴奋情绪的方式。有一位作家告诉我，他那三岁的女儿有一天告诫他："列宁伯伯说的，每天要刷牙齿，不象你现在这样。"当时，他真有点给逗乐了。但是当他想用列宁来巩固家庭纪律时，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他警告他的女儿要规矩点，"否则列宁伯伯就会吃掉你。"显然，女儿把这些话告诉了教师，因为女教师同孩子的母亲进行了联系，并且一本正经地说道，不应该这样向孩子们谈论列宁。但是，受到震动最大的是一对瑞典夫妇，他们把六岁的儿子送进了苏联的幼儿园，有一天，他的父母要想维护一下做长辈的尊严，就问他说，他尊敬哪一些大人？谁知他并没有首先提到母亲或父亲，而是说，"列宁。"好吧，那么接下来又是谁呢？孩子把从勃列日涅夫起到共产党的区委书记为止的苏联政治统治集团人员名单统统背了下来，却根本不提他的父母亲。

集体责任感、纪律感和集体活动感是从幼儿园开始培养的，并在整个学习阶段中在教室内和一系列儿童组织——如"十月儿童"、少年先锋队和共青团——中得到发扬。少先队（九至十四岁）具有那种为学校和社会做好事的男女童子军式道德标准，只不过他们的

思想灌输和活动通常都具有很大的政治分量，这在共产党的节日前后达到了顶峰。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科学工作者回忆了他十一岁当少先队员时，曾怎样热爱那些描述一个名叫铁木儿的青年和他的伙伴们富于浪漫的革命主义精神的书籍[①]。不知怎么的，当时他的那种热情中混合着一种感觉，好象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们偷偷地做好事、找回迷途的羊羔、协助挫败偷苹果的坏孩子，以及守护那些丈夫已离家上前线的妇女们的家园等事迹，是跟红军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法西斯的战斗联系在一起的。现在，铁木儿小队已被制度化，以在青年中发扬自我牺牲、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英勇行为。这位科学家接着说，“我记得，当我听说资本家鼓励他们的孩子做些零星工作赚钱时，我是多么震惊呀。我现在仍然认为那是讨厌的。有一次，我在莫斯科的闹市区碰到几个美国人向我问路，我在学校时曾学过一点英语，于是就领着他们到了他们要去的那座大楼。后来他们要给我小费，我非常生气。”

十四岁的巴维尔·莫罗佐夫是一位不朽的少先队英雄和烈士。1932年，正值农业集体化的严峻阶段，他揭发自己的父亲瞒着国家私藏粮食。这孩子被反对集体化的个体农民谋杀了，后来党表彰他为不朽的人

① 指苏联作家盖达尔的《铁木儿及其伙伴》等书。——译者

物。现在，纪念巴维尔·莫罗佐夫已不象在斯大林时代那样大张旗鼓了，但是少先队的章程仍然在青少年中间不仅宣传公民的义务，而且还进行政治觉悟方面的教育："少先队员忠于祖国、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少先队员以斗争和工作中的英雄作为他的榜样。少先队员永远牢记牺牲的战士，时刻准备成为祖国的保卫者。……"

苏联的许多教室都有一种所谓自我管教制度，这实际上就等于把搬弄是非制度化：按这种制度，一个被称为小组长的孩子，要把他那一排座位上同学的表现汇报给老师听。劳丽和詹尼说，她们的班级没有这样做，但是，在其他学校确实还在这样做。有一位俄国母亲这样向我描绘这种制度："每天早上，教师要他们汇报，第一个小组长站起来说，'今天萨沙上学迟到了，'接着，第二个报告说，'娜嘉没有完成家庭作业，'第三个又说，'别佳刚才同玛琳娜打架，把衬衣弄脏了。'"还有一种所谓的辅导员制度：教师指定几个最优秀的学生去帮助较差的学生做课堂作业或家庭作业，（劳丽常常帮助俄国孩子们学英语，俄国孩子们也帮助劳丽学俄语。虽然，据她所知，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友谊而不是由于教师的鼓励。）这种小组长和辅导员制度给一些美国教育家其中最显著的是尤里·布朗芬布伦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美国和苏联，两种童年世界》一书很

推崇苏联孩子相互所负的集体责任。布朗芬布伦纳还赞许地谈到了学生共青团委员会中年龄较大的孩子照管犯错误的孩子的做法，例如，一天晚上有一群男孩在没有人照料的情况下出去游泳了，大孩子把他们叫来，处罚了他们。

让布朗芬布伦纳看到的是一种模范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这些制度推行得并不那么理想。据苏联家长和孩子们说，大多数孩子——特别是十岁以上的——根本就讨厌小组长，有时在课间休息时，因为他们搬弄是非而把他们狠揍一顿。这些模范学生从帮助教师或辅导较差的学生中感到飘飘然。其他人认为：这些模范学生的行为是同世界各地教师的得意门生差不多的，而女孩子比男孩子更热中于搞这一套。苏联的独特之处在于，许多教师鼓励孩子们互相汇报对方的举动，并试图使这种做法成为一种制度。一位母亲辛辣地说，“他们正在训练小告密者。”这种制度在低年级还行得通；但是，我们的朋友说，当孩子们到了十一、二岁时，大多数孩子都拒绝跟教师合作了。

此外，我个人的印象是，布朗芬布伦纳所举的几个主要例子——包括学生共青团委员会——实际上是有权的成年人所操纵的、维护纪律的手段，他们指使和利用孩子作为代理人，而不是一种学生的民主制度和自觉的工作责任感。有一位母亲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

"孩子们并不自发地相互进行有组织的惩罚,他们象大人参加会议一样地去参加那些共青团的会议。他们不得不去。所以就去按领导人的暗示办事。他们领会到人家要他们做些什么,于是就做了。"总的来说,苏联的孩子比美国的孩子"奉公守法"些,但是照我看来,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被教育着要服从权威。

苏联儿童到十二、三岁时所产生的明显的纪律问题,说明了自我管教的重要意义并没有在他们心里扎根,一旦没有权威或强大的组织压力把他们控制得规规矩矩时,就又会出现纪律问题。成年人社会中的腐化和偷偷摸摸的违法乱纪行为,将有助于进一步证实这种情况。在第三十综合技术中学,我们的孩子不仅注意到课堂上背着教师干的种种不规矩行为和躲在厕所里抽烟的现象,而且还注意到班上有相当无耻的欺骗行径,而且教师们为了能更好地控制住孩子们,竟在课间休息时把教室锁上。一些俄国家长告诉我们,在他们学校里也有类似的预防措施,教师们也私下抱怨纪律问题。他们对于逃学、有时发生的破坏行为、喝酒以及苏联人笼统地称之为"流氓行为"的东西很有怨言,感到难以对付。报纸时常刊登文章说,酗酒和抽烟从十四岁左右就开始了,还说非法的"无线电流氓"——青年无线电收发报业余爱好者——干扰了政府的

波道，又说青少年犯罪已成为问题。从来没有公布过足以同其他国家进行对比的充分的统计数字。我推测，青少年问题正在增加，但是还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一天上午，我曾同西伯利亚城市布拉茨克的副市长亚历山大·谢苗索夫进行了一次坦率的谈话。我获悉，他的城市的主要头痛事情是汽车失窃、无线电流氓行为以及十四岁至十六岁之间的少年犯罪问题。他告诉我，正在扩充警察部队并吸收大学毕业生参加，以设法用更加高级的方法去对付那些最捣蛋的孩子。"到处都存在着教育年轻人的问题，"他以一种苏联官员少有的坦率态度承认说，"你们有这个问题，而我们也有这个问题。"

从学知识来说，苏联学校开始得晚，但进度快，比美国公立学校中的低年级要快得多。孩子们要到七岁才进学校，而在幼儿园里，他们通常很少受到或根本受不到读、写、算三个基本方面的教育。头几年很快就把这些补上了。1970年的苏联学校改革把过去四年的功课压缩到三年学完。到二年级结束时，我家的詹尼已接触了较简单的乘法表、一些短除法、数列、代数概念和新数学的另外一些基本知识。我们所认识的那些俄国家长，为他们不能理解他们子女的家庭作业而感到苦恼，更不用说进行帮助了。我们发觉，在阅读、语法

和书写方面，给人的印象很深刻。俄国孩子的进度是如此之快，以致大多数美国孩子在转入俄国学制时，通常都要倒退一级，而这就使他们和跟他们同样年龄的孩子在一起了。

我们发现，进步快的原因之一是功课重。学校每周上课六天，从九月一日至五月三十日，中间只有极短的几个假期。劳丽和詹尼感到家庭作业负担很重，这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外国人。俄国孩子们学习也很艰苦。一个聪明而又认真的十六岁的孩子告诉我，"我每晚大约要花四个小时，好学生通常都是这样的。"她又说，"我猜想，差一些的学生还得花更多的时间。"(老实说，根据在几所工人区学校里担任教师的瓦西里告诉我的话来看，恐怕不是这样。）劳丽和一个名叫玛琳娜的朋友在一起做功课，要花整整四个小时，其中包括语言辅导和家庭作业在内，没有玛琳娜的帮助，她在头几个月里几乎就跟不上班了。俄国的家长们抱怨功课太重，有些苏联教员甚至在公共场合大声疾呼，怀疑这样快的进度是否正在造成紧张、疾病，以及可能正在损害视力，但是不管怎样，大多数学生还是对付过来了。

教室的气氛似乎是故意要矫枉过正地补偿俄国家庭在家庭生活中的溺爱姑息。立即通知我们的女孩子们，不能戴戒指、珠宝或用化妆品，还劝导她们剪去长发或者把它整齐地梳到背后去。俄国男孩子们说，有

些教师反对西方的发型和时装。学生的制服有点儿象我想象中的德意志帝国的中学制服——据说斯大林就是从德国中学那里学到苏联课程的精华的——或者象一所严格的美国教会学校或军事学校里的服装。这同近年来美国教育以个人为主的趋势丝毫没有相同之处。在普通学校里，选修科目是办不到的。劳丽的六年级有十二门固定的科目：数学、物理、生物、俄国文学、俄语语法、俄国中世纪史、地理、英语、图画、唱歌、体育和劳动(女孩子学缝纫，男孩子学工艺)。

他们强调的是练习、练习、再练习以及死记硬背，这往往是几代人不变的老办法。就拿文学课来说吧，劳丽就得拼命背诵果戈里的一段描写："在宁静的天气里，第聂伯河是多么奇妙啊！它平稳地、舒畅地，让它那丰盛的河水在森林、山峦和溪谷中淌过。"劳丽的语文辅导员是二十六岁，我们办公室的翻译是五十五岁，在他们读书的时候，也都背过这一段。此外，不仅代数课需要学生熟记那些准备在课堂上逐字背诵的各种规则、定义和定理；而且唱歌课也要求熟记普希金的诗句。

学生的书面作业是以类似于法国中学里那种过分的严格要求来进行监督的。年岁小一点的学生做作业也用自来水笔，而不用铅笔和橡皮，更不用圆珠笔。正如伊琳娜·格奥尔基叶夫娜在告诫家长们时所说的那样，在学生的练习本上出现一个墨团团就象犯了在大

卫·科波菲尔[1]时代那样的滔天大罪。有一次，劳丽花了一个半小时画了一幅美术课的图画交给老师，可是老师不收，因为线条太粗。只得重新画一幅。学生从黑板上抄来的笔记，必须完全照抄老师原来的大写、空格、划单线和划双线；不这样做的学生，就要被记下名字。詹尼说："必须把书本和笔记本放齐在课桌的右上角，边缘必须同课桌的上前沿和右边取齐。"劳丽对我们说，俄国老师不喜欢学生们在上课时到盥洗室去，只允许在休息时去。她说："你也不能这样站起来，走到卷笔刀那儿；也不能觉得口渴就去喝口水，象我们在华盛顿那样（她来莫斯科前在那里上学）。你应该在课间休息时做。"

担心美国学校太偏重于学生成绩的美国家长，一定会对苏联的教育制度感到吃惊，它的成功在于使学生循规蹈矩，失败在于造成了学生的病态恐惧。孩子们在课堂上被叫起来背诵家庭作业，每门功课的老师几乎每天都要给学生定成绩。（课堂上还有其他没有被叫起来的孩子常常小声提单词或词组；有些老师也就眼开眼闭。）每天记的分数都汇总在学生记分册里。这种分数迷的做法甚至应用到体育课上，连我们两个孩子自己也觉得好笑，詹尼说，她在二年级的体育课，记

[1] 英国十九世纪小说家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主要人物。——译者

的是各种翻筋斗的分数。

苏联绝大多数学校，在活跃课堂教学方面，简直无所作为。我和安（她原先就是当老师的）参观过一些学校，却找不到一处学生自办的小图书馆，也看不到可供学生们随自己爱好去动手搞搞的科学实验项目表和科学实验计划。我在摩尔曼斯克和巴库参观了中学的理化课，课堂的内容是：学生死记硬背、老师讲解，或者由老师在全班学生面前做实验。科学"研究室"有单独一间，但是我没有见到供学生通过实验来学习的充足的设备。学生的作用是被动的。那个在工人区学校教书的年轻数学教师瓦西里说，在他上课时很少与学生对话。他说："学生几乎从不提问题。"俄国的家长们也证明：在他们孩子们的课堂上，教师是主宰一切的。劳丽在学年结束时表示意见说："在美国的学校里，有时可以进行一些有趣的离题的讨论。可是在俄国学校好象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知道不是可以搞一些拼字比赛、算术智力测验或算术游戏吗？但是他们不搞这些东西。"

我不打算让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苏联儿童的学校生活完全是枯燥无味、死气沉沉的。在一些大城市，象莫斯科、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等，我限见许多设备给人印象很深的少先宫或者青年技术员俱乐部，一些最幸运的和精神饱满的青少年可以在那里参加无线

电小组，搞他们自己的发明创造，拍摄电影，进行宇航员的模拟训练和练习，研究动物或者制作鸟类标本，等等。规模大的工会联合会、军队、警察以及其他组织，为青少年举办各种运动俱乐部。苏联有一种独特的学校，就是青少年体育学校，那里挑选年纪很小而有前途的运动员，每天进行专业的运动训练。在中亚的伏龙芝市，我参观过一所有七百名儿童的游泳学校，教练员们对一年级的小学生进行沉浮测验，只录取那些能浮起来而且看来手脚动作协调的儿童。负责这所学校的伏龙芝农机厂厂长亚历山大·库梅什对我说："一般说来，游泳比赛得奖的都是十四、五岁的青少年；所以我们很注意在儿童中发展体育运动。"一位教练员介绍说，每年参加学校选拔的一千五百名儿童中，被录取的不到十分之一。这些儿童在学习期间每天游泳一小时或多一点；放假期间，游泳的时间更长些。对足球、田径、冰球以及其他运动员，也同样采取举办业余体校的办法进行培养。这种学校以及大型的体育俱乐部所开设的运动项目仅仅吸收少数享有特权的儿童，这是绝大多数孩子们所遇到的难题。对其余的学生来说，学校生活以外的娱乐活动是更加有限的。

苏联在课堂教学上是态度认真的，其积极方面是使学生们记住了大量的材料，还训练学生掌握了许多基本的东西。象算术和自然科学等课程，在学生入学

的最初几年就采用这种方法，其效果是显著的。劳丽在俄国学校里读了一年书（她跳了一学期）学到好多东西，使她后来整整一年在莫斯科英美大使馆的学校里上数学课时毫不费力。另一个新闻记者的儿子史蒂文·沙巴德在六十年代曾在劳丽同一所学校，即莫斯科第三十综合技术中学读了四年。在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发现自己数理化的基础都很好，但作文和人文学科方面却落后很多。

苏联教育方法的那种死气沉沉的守旧性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使学生失去了学习的主动性，使苏联的教育制度无法教会学生创造性地自己思考问题或者提出富于想象力的、探讨性的问题。劳丽六年级时的数学家庭作业包括分量很重的复杂而难解的练习，这些练习锻炼她解决应掌握的一切机械性作业题的能力，可是对应用题则一窍不通。在课堂讨论时，甚至在较高年级里，花费在苏格拉底式对话上的时间和精力，即使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文学教师娜嘉说，许多苏联教师自认为他们正帮助学生"独立地和创造性地思考问题，但事实上适得其反。"不论是她还是其他教师都对我说，强调的重点在于学生要"正确回答问题"。这个教育方法问题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不过在苏联的学校里似乎远为尖锐，因为他们学校里的这种独断专横的做法，正如一本教师手册所说的，旨在纠正

学生的"各种荒谬的思想，暴露各种不正确的和错误的概念"。在讲授人文学科时，表现出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刻板思想，尤其是历史课，它认为过去，特别是俄国的过去，只是今天苏维埃统治的光辉纪元的一段不可避免的悠长序曲。苏联有一份教学大纲是这样说的："中学的历史课必须使学生清楚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不断说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真正创造者的作用。"史蒂文·沙巴德对我说，他在苏联的中学读书时，"我们有一位历史教员经常说：'不要看书，想、想、想！'但是她并不是说：'你自己独立地想问题，'她的意思是'想，就是记住教给你的一切。'"

学习上死记硬背这一问题，不仅使我偶尔碰到的少数持不同意见的教员和有创新思想的家长，而且也使苏联知名的教育家感到苦恼。苏联的报刊，特别是作家协会的周刊《文学报》，不时刊登苏联学者非常尖锐的评论文章，批评给学生们机械地灌输材料和数据；使学生上大学没作好准备，也不会把他们所学的知识作现代化的应用。苏联教育部长米哈伊尔·普罗科菲耶夫也对六十年代后期苏联中学叫学生大量死记硬背以及不给学生"合理的主动性留一点余地"的作法，表示了摈斥的态度。

1957 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引起美

国的一片惊慌，美国随之即进行教育改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作为对应的措施也进行了1970年的教改，这次教改的基本推动力之一，就是想要摆脱原先机械的教学方法。列昂尼德·赞科夫是苏联科学院的高级成员之一；他是这次教改的一个主要提倡者；他写了一本名为《同教师的谈话》的书，其目的在于说明：孩子们之更喜欢创造性的、有分析有归纳的教学方法，远远超过了大多数教师的设想。有些学校采用了他的较为灵活的做法，但是到七十年代中期，家长们和少数直言不讳的教育家们并没有减少他们的抱怨，这说明教改尚未真正产生重大的影响。实际上就在1974年年底我离开莫斯科之前，国立莫斯科大学语文学系副主任还在报上悲叹说，不幸得很，在苏联中学文学课的教学方法影响下，投考文学系的学生竟把契诃夫和普希金的古典文学著作加上阶级斗争的公式化陈词滥调。

近年来，对教育改革和教学实验精神最严重的打击，也许是1971—1972年期间对莫斯科第二数理中学的整肃，把这所学校整得灰溜溜的。莫斯科有六所培养青年科学天才的尖子学校；莫斯科第二数理中学是其中一所，几年来一直欣欣向荣，它不仅为最优秀的大学输送优等生，而且在全国学生运动会上这个中学的学生总是名列前茅。知名的科学家和其他学者为了发展出某一种实验性的课程，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义务进

行教学的。对一个西方人来说，这种课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创新之处；而对苏联人说来这却是一种大胆的开端。大学教授来校讲课。该校的校友和他们的家长告诉我说，这所学校培养一种真正的文化修养，这在苏联中学里是独一无二的。一位十几岁的少年说，他甚至同其他同学们谈论过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并且同一位非常自由主义的大胆的教师也非正式地谈论过。《时事记事》是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办的一种维护人权的非官方刊物，1973年被取缔，据该刊透露，这个学校的学生们"在高等学校"表现得很出色，"不仅仅由于他们具有高水平的数理基础，而且由于他们对文学的爱好，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切，由于他们在意识形态课程上向教师提出的问题的性质，以及他们对任何尚未得到论证的事情决不轻信的习惯，等等。"申请入该学校的人数，剧增到学校可容纳的三、四倍之多。

同某些教改理论的发展所必然遇到的情况一样，这所学校里存在的那种知识分子气氛显然使共产党内的保守派深感不安。据我在莫斯科的朋友说，犹太学生占的比例是很高的，而且犹太学者在全体教员中的比重也很大。1971年初，教师中有一位名叫伊·赫·西瓦申斯基的，申请移居以色列，这时苏联当局试图控制该校，并且开始在行政上进行刁难。伊戈尔是最近才毕

业的一个高高瘦瘦的学生，据他说，当局为了对学生进行行政审查，就制造借口说：学生们在欢度1971年除夕时曾经进行了轮盘赌博。他说，还有一个借口是说有一群学生去参观了莫斯科的犹太人会堂，本来也就平安无事地回来了，但偏偏有一个学生在会堂附近的篱笆上写了学校的缩写名字。1971年春，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受到清洗，一年以后又清洗了一次。一次行动就把校长和三位副校长解职了；之后，历史教员和文学教员都被迫离校——这是一种征候，说明清洗的真正原因是意识形态的。我听说，其他教师中有几个为抗议解雇这些人而提出辞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课加强了；在这些方面学得较差的学生，无论他们在科学上多么有天资，都被召去训斥一顿。校外教授来校作报告的一个也没有了。到了1972年秋，以前申请入学的浪潮已经一落千丈；用伊戈尔的话来说，这所曾经是出类拔萃的学校已经呈现出"一种垂头丧气、没精打采的可悲景象。"

有几个青年人和老年人对我说，这所学校独特的优点之一就是：在它全盛时期，它不仅是一个进行学术实验和培养优秀学生的场所，而且校内师生之间非常坦率，相互信任。更有代表性的情况是，有些知识分子的家庭私下告诉我，孩子们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那种反常的两面态度：在家里畅所欲言，而在公开场

合则小心翼翼地附和别人，不暴露自己的观点。那位年轻的数学教师瓦西里说:“文化水平高、藏书较多的家庭，他们在家里的讲话完全不同于在家门之外的讲话，这一点他们的子女能感觉到的。或许谁也没有特地告诉自己的子女不要讲出去，但是孩子们是很乖巧的，他们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学到了这套玩世不恭的态度。”文学教师娜嘉也承认这一点。她说:“我们都是官方生活的一部分。在孩子们天真无知的头几年，老师讲什么，他们做什么，一旦过了这段时期，他们就会留意在教师面前应讲些什么话。”

在很少见的一些情况下，天真无知的孩子们，也会反抗苏联制度的政治标准，其结果则适得其反。我认识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他是个文静的、爱好艺术的、有主见的小伙子。他对几个同学说，虽然实际上大家非参加共青团不可，但是他不打算参加。他的父亲是个共产党员，尽管表现消沉，缺乏热情。就在第二天，班主任召他到学校去，他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位班主任被他们一家看成是位性情柔顺、富于同情心的妇女。她对小孩的爸爸谈了另一个学生向她反映的情况。她说:“我宁愿不知道这个情况。”这句话本身就是非常自由主义的，一个苏联教师应该认真对待党的告诫，党要她负责监督学生们在道德上的成长。“但是你知道这可能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你是位懂道理、有经验

的父亲。告诉你的孩子，随便他想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能随便乱说。"于是这孩子就参加了共青团。

此事已经够尖锐的了，但还有一件甚至更触动我的事件。这件事发生在另一个家庭里；父亲是一个官方人物，有一定的地位，担任着一个好差事。他和老婆不知怎么弄来一本索尔仁尼琴的作品《1914 年 8 月》，他们十几岁的儿子在家发现了这本书。当时苏联的报刊上正在猛烈地攻击这本书。小孩学校里的文学老师也谴责过索尔仁尼琴，还特别谴责过这本书。"老师说的，这是一本坏书，反苏的书，西方把一切反苏的东西都捡起来，"孩子对他父亲说，接着又机灵地说："难道我们没有把一切反西方的东西也捡起来吗？"儿子希望在家里读读这本书，但是父母亲不让他读。孩子的父亲告诉我说，他曾经严肃地警告过儿子，不准讲给谁听他的父母有这本书，也不准说他们谈到过这本书。"我要么就我们读过什么、想过什么对儿子说谎，要么教他去说谎，二者必居其一，"他说，在刹那之间诚实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我倒希望跟我们的儿子说真话。我爱他。因为他会懂得太多，所以他将来决不会愉快的。但是至少他不会象头蠢驴似地长大。"

七 青 年

摇 而 不 摆

我们喜欢吉米·亨德里克斯，但不能仅仅因此就认为我们为祖国而战的准备就不如别人。

年轻的俄国摇摆舞迷，1974 年

摇摆舞乐，狂摇摆舞乐，活摇摆舞乐。那种一听即知的、急遽而使人心惊肉跳的摇摆舞旋律。扩音器里乐声大作。一个穿皮茄克的小伙子调节着旋钮，他不时奔到座位间的过道当中听听音响效果。又瘦又高的瓦列里·维尔尼戈尔引吭高歌，唱着《凶恶的女人》和《旋转的车轮》——两首由美国“血汗泪”乐团演奏而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他用英语唱。唱得很有感情。要是没有小号和长号那种尖厉的铜管乐即兴重复，那简直就同美国人唱的一模一样。一个留山羊胡子、穿鲜红色衬衫的花花公子，弹着电子琴，随着乐曲的节拍而摇摆扭动。那位消瘦、热情的鼓手留着八字胡子。一队电子吉他手，头发齐脖子长，目光茫然若

失，身子随着舞曲而摇晃，显得筋疲力尽。在舞台中心的廖沙·科兹洛夫，留着细长的、“垮了的一代”的头发，浓密的、索尔仁尼琴式的胡子，吹着狂热、轻快的中音萨克斯管。房间里音乐声起伏激荡。接着，我周围又爆发出一阵激烈而热情的喝彩声。马胡尔达德·巴迪，一个有着颤抖的男高音歌喉和长得披到肩头的卷发的莫斯科出生的波斯少年，唱起了由《救世主耶稣》和《超级明星》两曲的片断拼凑起来的杂锦曲。

这种场面差不多在世界各地都司空见惯。然而这是在 1974 年 3 月的莫斯科。这虽然不完全是地下非法活动，却也是一种放纵的，有点偷偷摸摸味道的寻欢作乐。在某个星期四下午，有四百个人，其中多数是青年，聚集在湮没于四散蔓延、华而不实的展览场所之间一座其状难以形容的会议厅里。这些展览场所原是斯大林为炫耀“国民经济成就”而建造的。

不但那个环境未必适宜于搞活摇摆舞乐，而且那个乐队头头阿列克赛·科兹洛夫也不象是个搞活摇摆舞乐的人。在他的朋友看来，廖沙是那些使人感兴趣的俄国人之一；他们过着双重生活，因为他们的真正爱好是禁忌的东西，或者是迹近禁忌的东西。其中有靠设计舞台布景或者画插图为生的抽象派艺术家；有嗜好宗教小雕像或色情金属雕刻品的雕刻家（他们为上层权势人物刻制墓碑而挣得丰厚的佣金）；有靠写儿童

神话故事为生的讽刺作家；还有一位爵士乐钢琴教师，他的正式职业是莫斯科理工学院自动化和遥控力学助教。该学院建立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主办莫斯科爵士音乐学校——显然是因为比较对口的单位还不准备接受爵士音乐。

科兹洛夫自己的本行是建筑师。1962年以来，他的正式职务是全苏工艺设计研究所的工业制图专家。他还是莫斯科首屈一指的爵士乐和摇摆舞乐的自由音乐家。他四十开外，在五十年代初就开始收听西方电台的爵士音乐节目。他曾经试验过新奥尔良城爵士乐、扭摆舞乐、快旋律爵士乐、节奏疯狂的爵士乐、古典派爵士乐和摇摆舞乐；目前正在创造他自己的风格。几年来，他不得不在人们(包括他的父母在内)不喜欢西方音乐的环境中进行练习。因而他自己缝制了一只有三个洞孔的大丝绒袋——一个洞孔插萨克斯管的管嘴，另两个洞孔插手；他把萨克斯管装在袋子里，然后就象风笛手那样躲在一边吹那捂着的萨克斯管，免得过分打扰邻居。

在台上，他搞起音乐来生龙活虎，他不是带着滑腔吹奏那支萨克斯管，就是指挥乐队演奏他改编或谱写的乐曲。下了舞台，他就懒懒散散，看起来好象没有骨架似的。他解释说："我把所有精力都攒起来用到演奏上去。"他身材一般，举止谦恭，喝酒不多，也不抽烟，但

是玩起牌来就象他搞音乐一样认真。六十年代，他曾在苏联的一些乐队里吹萨克斯管，这些乐队至今还在演奏五十年代风行的舞曲。1962年11月，他以苏联代表身分被共青团派往华沙参加爵士音乐联欢会。然而，廖沙·科兹洛夫逐渐同官方的音乐分道扬镳了。六十年代中期，列昂尼德·佩列维尔泽夫——声学技师，由于爱好爵士音乐和具有爵士音乐的渊博知识而成为第一流评论家——有一次在莫斯科电视台作关于爵士音乐的演讲时，播放了几首事先录制的科兹洛夫乐队早期较为文雅的乐曲作为说明。但是，“编辑们”(照一位音乐家的婉转称法)剪掉了一段曲子，因为科兹洛夫和他的队员们所演奏的节奏感很强和油腔滑调的旋律，被认为太离经叛道并含有色情意味。

科兹洛夫进一步背离了官方批准的流行音乐，现在他被青年音乐家们奉为大师，这些青年中有些是莫斯科音乐学院学古典音乐的学生，他们想掌握摇摆舞乐。实际上，科兹洛夫所创作的只是爵士音乐和摇摆舞曲的混合物，是把爵士音乐的即兴演奏、大型乐队流行时代的铜管乐表演技巧、同摇摆舞乐强烈的节拍及电子音乐宏亮的音响效果综合为一体而已。俄国青年显然喜欢他所创作的东西，然而他还必须谨慎行事。在我寓居莫斯科那几年中，他的音乐作品还未遭到禁止，但是，官方认为他的作品大有问题。

科兹洛夫乐队的演奏受到那些熟悉内情的青年人如此热烈的欢迎，尽管它纯粹是一支非正式的乐队，根本不是为了赚钱，也完全不进行招徕，但它每年还是举行十五至二十场音乐会，每一场都是私下组织并且是周密地为特定范围的听众安排的，就同我在展览馆看到的那次音乐会一样。邀请他们演出的有年轻的汽车工人、采矿工程师、工艺设计师、石油学院学生以及诸如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古比雪夫等城市里的团体。这些城市的不懂行的当局往往不象莫斯科的头头们那样善于在政治上挑刺。但是科兹洛夫也很谨慎，不让事情闹得不可收拾而破坏了演出。1974年末在莫斯科科学家之家的一次演出中，热情的听众开始欢呼狂叫起来——这是世界各地摇摆舞乐听众的惯例，不过其盛况大大超出苏联的常规。科兹洛夫彬彬有礼地请他们安静下来。"我认为，摇摆舞乐是当代正统音乐的一个分支。"他告诫大家说，"我们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演奏，因此，我们请诸位以同样的精神来对待它。"听众们领会了他的意思。

再说，一般公众都还蒙在鼓里。除了科兹洛夫迷，俄国公众并不知道有科兹洛夫其人。同参加俄国几乎所有比较有趣的地下活动一样，能够赶上他的一次演奏会，就象发现一颗流星那样。流星倏忽横空而过。如果你恰巧是在那个夜晚，那个时刻，在户外望着那个方

向，你就能看到流星。否则，在其他所有的时间里，天空就跟平常一样，你就会发誓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流星。要听到科兹洛夫的音乐，你得事先打听到消息，还得通过一定的关系，才能跻身其中。然而，使我感到吃惊的是，由于流行文化[①]已经渗透进了保守的成年人试图建立起来的那堵意识形态之墙，在全国许多小型爵士乐队中，想成为科兹洛夫的人真是不可胜数，这就是今天苏联青年的状况。

要概括出苏联青年的情况，正如要概括出美国青年的情况一样，都同样是不可能的。就人情世故与生活作风说来，一个出身于莫斯科经常出国旅行的名门家庭的大学生，同一个梁赞(在莫斯科以南不过一百来哩，但仍然是闭塞的外省城市)的青年工人就有天壤之别，更不用说那些住在极北地区或西伯利亚农村的粗鲁青年了。但是，对于所有的青年来说，谈得最投机的一个话题就是流行音乐。还在1971年，《苏维埃文化报》上就刊登过古比雪夫一位姑娘的来信说，"我的几百万同时代人都熟悉和喜爱披头士音乐。"高尔基城有三个青年谈到他们多么渴望改变那种专听苏联电台和电视台硬塞给他们的爱国主义音乐、红军进行曲和半歌剧式的民歌的做法。"我们年青人需要娱乐，就是需要轻松

① 所谓流行文化或音乐都是指在西方流行的资产阶级颓废派艺术。——译者

的娱乐，”他们写道。“科学和技术在不断进步，人总得跟上一切事物的发展。你怎么能要我们在艰辛、紧张的一天之余，还去唱民歌和听进行曲呢？”

在周游苏联的过程中，我碰到过不少“流行乐队”或“垮了的一代派乐队”（对苏联官方人士来说，“摇摆舞乐”仍然是一个极端危险的词儿），不仅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里加或塔林这类城市，而且在一度是穆斯林城的中亚城市布哈拉或者远离纽约一万哩的西伯利亚也都可以碰到。在布拉茨克，我碰到一支乐队，他们收藏了一大批从“美国之音”（那时“美国之音”还受到干扰）录下来的音乐，其中有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杰斐逊·埃厄普莱恩、恩格尔伯特·汉珀丁克以及其他西方明星的乐曲。他们没有一个人真正懂英语，然而他们却快活而熟练地模仿着英文歌词和电台音乐节目中广播员的讲话。他们对西方摇摆舞乐的红角儿非常“熟悉”，象开连珠炮似地问了我许多关于明星们的一些我闻所未闻的私生活情况，然后又很激动地要我帮助他们为马哈利阿·杰克逊的《全世界由他主宰》一曲的录音带配译歌词。我觉得他们丝毫也没想到过这是一首以爵士音乐变奏的黑人圣歌。他们感兴趣的不是歌词而是音乐。他们私下欣赏的东西与他们获准公开演奏的大相径庭。

苏联当局发现那堵抵制西方流行文化的石墙根本

不起作用之后，便退而采取更加隐晦曲折的方法，以打消苏联青年那种追求新奇的欲望。六十年代，在官方倡议下，流行乐队开始在工厂、大专院校以及被俄国人夸张地称为“文化宫”的地方活动中心里很快地发展起来了。然而，流行乐队就象夏季别墅一样花色繁多；从平淡乏味、循规蹈矩的大多数乐队到搞非常时髦、货真价实的摇摆舞乐的科兹洛夫乐队，无所不有。当局鼓励各种比较驯服的乐队参加全国性的选拔会演，先在地方和州评比，然后在全国进行电视转播。然而，我听几个年轻音乐家说，这些乐队的节目、歌词，甚至服装、动作和政治倾向都要经过审查，并且删掉一切在道德、两性关系或政治上不健康的东西。有些曲调经常被无端地删去，其唯一的罪名是它来源于西方。一位嬉皮士派的青年吉他手说，某些外省乐队在电视台试演时，当局告诉“他们应该演奏宣传鼓动性的歌曲——喏，就是那些按照现代风格改编的关于经济成就和宇宙飞行英雄们的歌曲”。因为这些乐队必须得到官方的认可才有地方排练，才有资格演出，有时甚至要有官方认可才能搞到某些乐器，所以它们对控制都俯首听命。

这位吉他手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流行乐队的演技越高，职业性越强，所受到的控制就越紧，对演出内容的审查也越严。因此，他不想成为职业乐师；如果在西方的话，凭他的才能完全可以成为职业音乐家。还

有人告诉我，最出色的乐队并非那些“歌唱的吉他”、“快乐的朋友”、“民歌乐团”等名称古板、专演官方审定节目的职业乐队，而是大专院校的乐队，一些用着象“时间机器”、“暴力的灾难”、“红宝石袭击”等浮夸名称的默默无闻的业余乐队。那些职业乐队的演奏也灌成唱片，但远不如进口的西方摇摆舞乐唱片出名和热门；据那位吉他手说，其原因在于苏联职业乐队无法施展身手。他说，为了防止乐队在电视台演奏时过于粗野疯狂，当局禁止它们使用音量最大和最能发挥特色的乐器。在音乐会上，还规定了乐队演奏西方乐曲的限额（一般标准是百分之十五，因为他们得演百分之六十五的苏联乐曲和百分之二十的东欧乐曲）。文化部和共青团的音乐督导员还不允许乐队演奏自己谱写的乐曲，理由是这些曲子并不是国家批准的官方作曲家所创作的，这同样也束缚了乐队的手脚。

缓和对这种情况并无多大裨益。在苏联最“开放”的城市塔林，一位餐厅乐队钢琴师告诉我，随着缓和的发展，官方对于公开演奏西方乐曲越来越敏感。我听说，餐厅乐队，有时甚至那些纯粹在私下场合演奏的乐队都必须步步谨慎，因为当局在老听众中安插了告密者，以加强监督乐队的演出，不使超出官方批准的内容。有一次，在莫斯科柏林饭店，我们几个朋友听出乐队在演奏苏联绝对禁演的《日瓦戈医生》中的主题歌

“拉拉”。几分钟后，一位朋友上前请乐队重奏一遍。

乐队队长说:“我们并没有演奏过这支歌。”

“啊，演奏过的，”我的朋友坚持说，“我亲耳听到的，我的朋友也听到了。我们听得出来。”

“不，你们一定搞错了。我们并没有演奏过，因此你们也并没有听到过!”他用苏联那种冷若冰霜的语调回答，与其说这是否认客观存在的事实，还不如说是由于某种不便而作出的否认。

偶尔有些乐队试图反抗当局的控制，或骗过当局上演一次，但很少获得成功。1970年，一支名为“佩斯纳里”的白俄罗斯乐队极力坚持在电视演出中按自己的节目单上演。据报道，这场争论闹得不可开交，结果当局非但禁止他们这次的演出，而且取消了他们的其他许多场演出，直到他们打算再次屈服为止。布哈拉市的“克瓦萨里”乐队给披头士歌曲加上了苏联式的抗议标题，正如一位音乐家所说的，他们满以为“谁也不会注意”文字内容。但是事情败露了，他们不得不剪去自己的长发，把自己的全部节目送审，并被禁止参加可以捞到外快的婚礼演奏。一些音乐爱好者感到，六十年代以来当局加强了对流行音乐的限制。一位狂热的摇摆舞乐迷向我描述了六十年代初在莫斯科闹市区克鲁泡特金广场“夜餐厅”的那些如痴似狂的夜晚。当时苏联青年初次为披头士音乐而神魂颠倒。“共青团主办了

爵士音乐即兴演奏会，小伙子们乐得如醉似狂，”这位年已三十的矮胖子讲。“他们狂喊乱叫，好象有人马上要给宰了似的。他们闹得天翻地覆，家具砸得稀烂，窗户打个粉碎。演奏会也就此结束了。后来他们常在青鸟咖啡馆举办，门口设了岗，只准持共青团特别入场券者入内。但是，现在那儿也停办了。”1974年1月，莫斯科的共青团组织曾计划在高尔基公园的玻璃餐厅新开设一所演出“活的”音乐的爵士音乐咖啡馆。一位作家给我们搞来了开张那天晚上的入场券，但是，由于没有获得上级批准，晚会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爵士音乐咖啡馆从来没有开张过，弄得莫斯科没有一个定期演奏活爵士乐或活摇摆舞曲的公共场所。不过，有几个咖啡馆也在播放阿雷撒·富兰克林和奥蒂斯·雷丁等西方明星的歌曲唱片。这些唱片是混在其他经过挑选的作品里输入苏联的。

看来人们必然会得出以下结论：对于苏联当局来说，真正享有盛名的本国摇摆舞乐队要比秘密流传的西方唱片更为可怕。如果本国乐队能获得真正自由并吸引了广泛的听众，那么，它们比那些大名鼎鼎的作家、运动员或科学家还要难控制。不管你是否愿意，选择只有一个；因此，近年来有更多的西方摇摆舞音乐唱片通过邮寄或走私流入国内，当局对此也眼开眼闭了。

西方摇摆舞文化的唱片和其他个人服饰的黑市买卖，生意非常兴隆，因此，一位在列宁格勒大学求学的美国女学生认为这已经可以媲美于美国大学校园中盛行酗酒、吸毒的情况了。苏联的黑市商人就相当于美国的毒品贩子、卖淫者、放债人。有些黑市商人以廉价的粗斜纹布裤或稀有的唱片作为报酬，利用学生为他们代销商品；有时候，警方则利用学生中的告密者来诱捕职业黑市商人。有一次，这位姑娘同俄国朋友在列宁格勒闹市区散步。那位俄国朋友突然指着一小群人说，"就是那几个！"他们身穿黑色外套，挟着公文皮包，象狗一样在街角上转来转去，察颜观色，相互打量，直到双方完全放心才开始正式交易。唱片要等到片名、价格一一谈妥方才肯拿出来。然后，两个人从容离开街角，到大街上某个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停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按照他们的行情，《头发》、《救世主耶稣》、《超级明星》等歌曲的密纹唱片可以卖到一百卢布(合一百三十三美元)以上，这笔钱通常完全可以用十个卢布一次出租给别人转录的办法赚回来。这些走私品，一般都是随外国旅游者或回国的苏联旅客带入国内的。有时，也有人想方设法把这类唱片夹在斯特劳斯圆舞曲或者巴赫大合唱的唱片套子里，混过邮检或海关检查而进入苏联。

但是，从来没有演奏活的音乐的西方乐队获准入

境。1972年初，美国大使馆曾建议派遣“第五度”乐队赴苏作为苏美文化交流的一项内容。该乐队虽非美国最放荡不羁的摇摆舞乐队之一，但它的演奏却也热情奔放，狂劲十足，因而在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巡回演出时轰动一时。莫斯科断然拒绝这一建议，要求另派乐队。不久之后在一次外交午宴上，我恰好坐在弗拉基米尔·戈洛文身旁，他当时是苏联负责全部演出事务的“国家演出公司”副经理。我问他为什么拒绝“第五度”乐队来苏演出，他支吾其词地搪塞说，他并不认为该乐队享有盛名——“至少它的名声还不足以”使它在苏联的六个星期巡回演出中“场场满座”。

“我很难理解你的解释，”我辩驳说，一面追忆起最近我在摩尔达维亚亲眼见到青年观众们对一支来自马里自治州的流行音乐乐队所倾注的热情。在这支风格柔和、比较不太知名的苏联职业流行乐队演出时，那座容纳一千名观众的剧院大厅座无虚席。我告诉他，一支经过删节改编的披头士歌曲《回到昔日的苏联》就足以博得满堂喝彩。

“‘第五度’又不是披头士，”戈洛文轻蔑地说。

“唔，那么，你怎么认为披头士音乐会大受苏联听众欢迎呢？”我探问道。

他避开话锋，回答说，“披头士音乐已经过时了。”

"你的意思是说披头士是古典派了？"

"不，不是古典派。我没这么说。是过时了，"他一本正经地坚持说。关于披头士的谈话也就到此结束。

第二天，我恰巧有一个难得的机会同一位颇有成就的正统派流行歌曲作家交谈。她说，她为苏联青年创作具有流行音乐风格的爱国主义歌曲，每年有两万五千卢布的丰厚进项（合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美元）。当我告诉她美国人曾建议派"第五度"乐队来苏时，她和她的同事们眼睛都睁得大大的。我问这支乐队演出时卖满座会不会有困难，他们回答说，这还用问吗！我追问说，那为什么不邀请他们来呢？那位流行歌曲作家说："这要问演出公司。"我说我已经同戈洛文谈过了，他们都急于想了解他是怎么答复的。他们听到这个答复后，都对他那不值一驳的遁词感到惊讶。

苏联当局曾大胆邀请波兰、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爵士乐队来苏演出。观众蜂拥而来，盛况空前。据一位波兰乐师吐露，东欧音乐家把来俄国看作是"应付差事的旅行"，以便同那些更吸引人的赴西方的旅行保持平衡，免得莫斯科斥责东欧人不忠。然而，对于俄国青年说来，他们应付差事的演出却是如入仙境，因为间接地通过东欧乐队那种比苏联乐队更为大胆放纵的演奏风格和更为华美艳丽的服装，差不多可以瞥见西方文化的一斑。尽管如此，苏联当局还是不轻易批准西方有名

气的真正的摇摆舞乐队入境，唯恐引起无法控制的反应。

这种追求西方音乐和流行文化的各种个人服饰的欲望，充分证明了在俄国存在着两代人的隔阂。这是一种颠倒的两代人的隔阂，至少在中产阶级和有地位的青年中是如此。美国青年唾弃自己父母的富有；他们改穿粗斜纹布裤，离家出走，跳民间摇摆舞以示反抗；而苏联青年所向往的恰恰就是有钱和过舒适的生活。他们是新实利主义的急先锋。只要能挣到一千个卢布的现款，青年人在暑假就会上西伯利亚建筑工地去做小工，而机关职员们则从牙齿缝里省下钱来，然后一下子花掉近一个月的薪金去购买喇叭裤、假发、齐膝高统靴、厚底高跟鞋这些象征西方安逸生活的物品。

上述风气在已婚青年和十几岁的青少年中都很盛行。青年工程师瓦基姆和教师斯维特拉娜就是一对典型，不过他们的钱包要比大多数青年充裕些。在他们居住的公寓的客厅里，装饰着从精美的西方时装杂志中剪下来的彩色画片，有穿三点式豹皮游泳衣、戴月形大墨镜的模特儿，有身穿现代派运动衣、作环球旅行的富翁，还有时髦的现代家庭室内陈设。从苏联标准来看，他们自己那套两间卧室的公寓布置得小巧玲珑，然而又十分简朴。瓦基姆引为骄傲的是一台掏出四百卢

布(两个月的薪金)买来的“格农迪奇”五波段短波晶体管收音机，以及斯维特拉娜用进口料子为他缝制的阔领带。他为了买一张好听的波兰爵士乐唱片会很乐意地去排两小时的队。一张原版的保罗·德斯蒙德密纹唱片，就能使他欣喜欲狂。斯维特拉娜则喜爱色彩鲜艳的日本头巾和她自制的包屁股裤子。总之，凡是与战前和战时一代人的斯巴达式作风以及与战后他们自己父母所过的那种单调乏味的生活背道而驰的东西，他们都极为欣赏。

这种追求时髦服装的风气迄今还不象西方所谓“孔雀革命”那样浓厚。“服装表达个性”这一观念尚未深入人心。俄国青年并不炫耀五光十色的奇装异服，也不故意打扮得妖形怪状。在莫斯科有一小帮嬉皮士，但多数青年懂得邋遢的衣着会招致当局的干预，还不敢冒这个险。苏联追求时髦的风气主要是赶上西方比较定型的样式。但是，在我们旅居莫斯科的三年中，追求时髦的愿望已有明显的滋长。我们在1971年抵苏时，大学生们曾抱怨说，他们领取大学助学金时得先把齐脖子长的头发剪掉，否则就领不到。这类情况在我们离开苏联时还有，但已经少得多。甚至在苏联最保守的宣传工具——电视中偶尔也会出现齐脖子的长发。

吸毒现象也出现了，其流行范围远没有美国那么

广泛，但也足以使得忧心忡忡的苏联当局几次加强了反吸毒法令，对吸毒集团和惯犯严加惩处。1974 年 5 月颁布的一批法令指出，违法买卖毒品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从医院窃取以及使用假造的或用过的处方骗取药用麻醉品。敖德萨有一位青年医生曾私下证实了上述情况。有人多次以巨额贿赂要他提供一批麻醉品。他说"这笔款子可以让你买到一辆新汽车"。虽然这位医生并未上钩，但是他说：在敖德萨这样的早在革命前就有罪恶都市名声的港口城市中，这类买卖"到处都有"。据他说，参与这类交易的大多是政府研究机构中制造麻醉品的制药技师，以及从医院窃取大量烈性麻醉剂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还说，有时吗啡来自那些战争年代的老兵手中。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麻醉剂治疗伤势时吸上了瘾。按照苏联的保健制度，他们领有小本子，可以凭它定期向国家领取一定剂量的吗啡。这位医生说，流入地下交易的既有吗啡也有小本子。

1972 年，一位生物学家向我叙述了一件发生在莫斯科自然化合物研究所的丑闻。当局破获了该所研究人员制造的一些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报纸上对此只字未提，但其他生物和化学研究单位都接到严格指示，要求加强管理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但是这并没有使这种交易停止下来，因为一年后，我有一位熟人参加了

莫斯科大学的一次茶会，就有人当场服用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更常见的毒品却是苏联中亚或高加索山区出产的大麻制品。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一位小伙子问我要不要一点大麻制品，并且拿给我看。莫斯科也有好几个人提到有人服用这种麻醉品。一位苏联老记者指出，离莫斯科伊兹麦伊洛沃公园不远的圆柱形祖国电影院，是一处人所共知的毒品交易地点。他说，一粒小小的、只有半个顶针箍大小的黑大麻丸(够卷一支大麻烟)要卖五个卢布(合六点六七美元)。但是，尽管隐隐约约地听到这样那样的关于毒品买卖的传说，苏联学生以及同苏联学生住在一起的外国留学生总的印象是：同西方相比，可以说苏联大学校园中尚未出现吸毒现象。大成问题的倒是酗酒——伏特加。苏联大学生同他们的长辈一样，喝起伏特加来就象西方那些一醉以求忘却一切的吸毒成瘾者一样，丝毫不顾戕害自己的身体。

至于两性关系，俄国的确不是情侣散步的地方。在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很少看见互相拥抱或接吻的情侣。这种公开表现亲昵的情况是会使人皱起眉头来的。事实上，俄国人在公开场合，甚至在私下是忌讳率直谈论两性关系的。在苏联完全不存在西方那种肉体崇拜。实际上，在舞台上和银幕中也看不到一点裸体场面。一位俄国朋友开玩笑地说，俄国人在公开场合所

能得到的最大刺激就是芭蕾舞中富有性感的双人舞。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想起他于1952年在展览会上首次看到一幅现代派裸体油画时是何等惊讶。画的是一个丰腴健壮的俄罗斯乡村少女赤身裸体从乡村浴室中出来。雪花在她那嫩红的肉体周围飞舞。他回想起来津津有味，傻笑着说："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说，真是够大胆的了！"

在最近上演的《瓦连京和瓦连京娜》这出比较直率地描写青年情侣的戏里，莫斯科艺术剧院曾试图在这对情侣在别人的寓所里一起度过了第一夜后，安排一个倏忽而逝的裸体场面。在1971年首次公演时，据说阿列克赛·柯西金总理观后大为震怒，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于是，这对情侣就穿上了衣服。别的剧团虽然也演出这出戏，然而，没有一个剧团胆敢安排一刹那的裸体场面。在列宁格勒上演的另一出描写青年的话剧《普尔热瓦尔斯基马》中，一对年轻的情侣只是在共青团建筑工地上晒晒太阳，他们相距六呎，穿着内衣躺在木板上，彼此伸出手去接触一下，接着就是一个迅速的暗场。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那部描写俄国圣像画家的杰出影片《安德烈·鲁勃廖夫》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它摆脱了艺术上的假正经做法，拍摄了许许多多异教徒场面。这部影片被检查机关扣了四年，只是在它赢得了国际公认之后才批准发行。

苏联虽然在革命时期大谈特谈过自由恋爱，但是今天占优势而仍是社会舆论所依据的准则还是列宁的观点，这个观点听起来就同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寄宿学校校长的观点一样，列宁深叹他所谓的“对两性问题的过度爱好”后，写道：

> 青年人特别需要生活的乐趣和力量。增进健康的运动、游泳、赛跑、散步、各类体操和多方面的智力游戏……这些都会使青年获得远比无休无止地谈论两性问题更多的好处……革命要求集中，要求增强力量……它不能容忍放荡的情况。性生活上的放荡行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自我节制、自我严格要求并不是奴性，即便在爱情问题上也是如此。①

斯大林继续推行这种维多利亚式清教徒主义，然而在俄国人的生活中不公开谈论性问题的情况可以追溯到革命以前。托尔斯泰描写两性问题十分节制而婉转，甚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感情奔放的作家也是如此。在俄国的大文豪中，普希金最为放荡不羁，是一个十足的唐璜。据说他把自己的一百零三桩恋爱事件都作了详尽的记录，可是今天他的色情诗歌几乎一首也未印行。

① 节自《妇女解放》，《弗·伊·列宁文集》，纽约，1966年版。

从种种证据看来，在目前这一代苏联人中，普希金的信徒至少同列宁的信徒一样多。列宁格勒一位教授可能会发出这样的警告："婚前性关系可能成为严重精神错乱的一个原因，并会导致社会性的品德下降。"然而，1969 年对列宁格勒大学学生的一次社会调查结果证明，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男学生和百分之七十的女学生在二十一岁之前都有过婚前的性关系。尽管列宁格勒是一个国际都市，可能格外自由化一点。但是，一位社会科学工作者评述说，"不管怎样，这个数字还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男人缺乏，俄国女人已以孟浪放纵而闻名。姑娘们追逐农村青年并同时搞多角恋爱的故事偶尔也在苏联小说中出现，显然这在现实生活中更为常见。莫斯科一位大学毕业生告诉我，有时俄罗斯姑娘跑到高加索去找黑头发的格鲁吉亚人谈情说爱，这同所传有些英国姑娘到西班牙去的情况相似。而男男女女在大学宿舍里一起睡觉则是家常便饭。

为了节约的缘故，苏联大学早在美国大学之前就已改为男女同校住宿。莫斯科大学象其他大学一样订有严格的规定，不准男生于课后在女生宿舍逗留，并定时在走廊搜查作为一种防范措施。但是，学生们告诉我，苏联学生中的罗密欧们这时就悄悄爬出窗口躲在这幢二十六层大楼的窗台上。由于学生们都是在比较

拥挤的居住环境中成长的，因而俄国同住一室的学生的忍耐性，也比美国学生在此情况下可能表现得强一些。他们三、四、五个人住在一间大房间里，但是，一位姑娘说，如果某个小伙子同她房间里的女同学过夜，其他姑娘就干脆背过身去了事。"人们这么干了好多次都安然无事，"她说，"只要同宿舍的人不抱怨受到打扰就行。"一位留苏的美国学者告诉我，在有些班级里，当局把晚上十一点以后还把男生留在自己房间里而被捉住的女学生的名字予以公布，试图用这种公开羞辱她们的方式来杜绝乱搞男女关系。"笑话，"他接着作了一番十分美国式的评论："这种办法在美国根本就行不通。小伙子们会哄堂大笑，并且会把女孩子的名字记下来。"据报道，在工人集体宿舍大楼，在作家协会的隐蔽角落里，在旅馆中，两性事件屡见不鲜，因而俄国人有这么一句笑话："我们不需要妓院，我们有旅馆。"

放荡的风气也侵蚀了十来岁的青少年。1973年敖德萨的一位社会学家曾报告说，在对十四岁至十七岁的中学生所作的一次考察中，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学生承认有过两性关系。男学生们对于性关系已形成一种他们所谓的"工业心理学"，"认为性爱是一种生理要求。"莫斯科一位青年医生补充说，由于开展了卫生运动，减少了花柳病的危险性，由于青年人生活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而宗教又不再起道德上的引导作用，因

而乱交情况必然增多。“人们既无信仰又无顾忌，”他耸耸肩膀说。

年青人的主要难题就是寻找幽会的地点。和美国不同，苏联青年们不能只是办个登记手续就住进旅馆或汽车游客旅馆。在苏联住旅馆要检查身分证，还得回答一些令人窘困的问题，解释为什么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里还要找一个房间。旅馆女服务员还十分注意未办登记手续的房客。大多数青年人同父母朝夕相处地共同生活。《瓦连京和瓦连季娜》一剧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们这种困难处境。戏中安排两个情侣在图书馆和地铁车站相会，或在电梯里接吻。后来瓦连京从一位离家外出的单身朋友那里弄到了寓所钥匙，他们终于可以一起欢度良宵了。这类屡遭挫折之苦的情况，常常促使俄国青年早婚，以便争取早日能过幽静和独立的生活。

按照西方的标准看来，苏联一般结婚仪式相当简朴。人们经常要求充实婚礼内容，使结婚显得更有意义。但是，这在目前依然是一种华而不实、流水作业式的事情。美国的教士如果在六月里一天主持三、四次婚礼就会觉得劳累过度，可是，在苏联的婚礼宫里，星期六一天举办三、四十次婚礼却不足为奇。

前面提到的瓦基姆和斯维特拉娜夫妇，他们出身

于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他们为了举办婚礼花了一大笔钱，虽然他们的双亲并未出席结婚仪式。斯维特拉娜同许多俄国姑娘一样，想穿一身袖口齐肘、饰有花边的白色的结婚长礼服。她因为手头宽裕，又做了一件式样新颖的紫红色短礼服，供婚礼后宴会上穿着。她为两身礼服共付给裁缝近二百卢布，此外又花三十卢布买了一双白色的鞋子。比较一般的家庭则到婚礼用品商店购买做工不甚精巧、但售价便宜得多的婚礼服装。瓦基姆那天也打扮得风度翩翩，非同一般：一套黑色西服，一条白色活结领带，里面是一件尖领衬衫，这一身衣着代价确实不小。而且，他的打扮也是与众不同的；大多数青年结婚时都穿日常便服装——买得起新的就穿新的，买不起就穿通常的便服。

在他们准备结婚的一个月前，瓦基姆和斯维特拉娜就到民政机关去表示自己的愿望，付出一个半卢布手续费登记结婚日期。他们希望把婚礼安排在星期五或者星期六——这两天结婚的人最多，因为接下去就是休息日。然后他们得等上三个月才能挨到。结婚那天早晨，他们由两位最要好的朋友陪同离开家门，那位女朋友作为斯维特拉娜的证婚人，而男青年则是瓦基姆的证婚人。有时父母也来参加结婚仪式，但通常父母都是不来的。这里没有“把新娘交给新郎”的风俗。斯维特拉娜出嫁时，只有他们四个年青人坐上出租汽

车离家，汽车上装饰着飘带和气球，但是没有饰上“新婚”字样。车头的防护罩上拴了一个洋娃娃（有的喜欢拴个玩具狗熊），象征着他们盼望生儿育女。

婚礼宫里通常挤满了等候的人群——紧张不安的新婚夫妇在接待室里进行最后一分钟的修饰，父亲们焦急地看着表，或者向工作人员抱怨说，如果婚礼不马上开始，出租汽车就要开跑了。婚礼过程仅六、七分钟，然而排队等候的人群如此众多，因而必然显得很慢。我没有见到瓦基姆和斯维特拉娜的结婚仪式，但是，他们告诉我这同我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大道33号甲的婚礼宫里所见到的仪式十分相似。在那儿主持婚礼的是宫主任亚历山德拉·苏沃洛娃女士。

苏沃洛娃女士外貌端庄、头发灰白、态度和蔼，主持婚礼时穿一件紫红色长袍。她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正统的婚姻问题专家。她胸前挂着一条红色饰带，上面印有俄罗斯共和国国徽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字样。巨大轩敞的婚礼厅里空空荡荡，苏沃洛娃的办公桌位于大厅的一端，桌上放着一只插有红石竹的玻璃花瓶，桌后的墙上镶嵌着褪了色的苏联国旗镰刀锤子的图案。当大厅另一端的门一打开让举行婚礼的伴侣入内时，扩音器便播出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的陈旧录音。在一位穿普普通通的灰色衣服的女人的示意下，他们在办公桌前十呎处猝然止步，音乐也

嘎然中止了。全体都站定在那儿，开始举行一场与其说是婚礼不如说是正式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仪式。

“莫斯科市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授权本人对……的婚姻进行登记，”苏沃洛娃女士用一种毫无表情的官腔开始讲话。她面前站着两对青年人——新娘和女傧相捧着包在玻璃纸里的长梗花束，新郎和男傧相则在她们旁边垂手而立——同天下所有处于这种场合的青年人一样，他们看上去态度紧张而不安，直到那位灰衣服的女人先唤新娘、再叫新郎上前，在结婚证书上签字为止。苏沃洛娃女士从桌上的盒子里拿起两只纯金结婚戒指，走到新婚夫妇面前，让他们交换戒指——不必起誓。接着，她用比刚才亲切得多的热烈口吻向他们简要地叙述了婚姻的义务和互敬互爱的必要性。她告诉一对新人说：“无论是幸福还是悲痛，是充满希望还是犹豫彷徨，是遭到挫折还是获得成就，在一切家庭事务中都要共同合作。”然后，她宣布他们已结为夫妇，于是，那位灰衣服的妇女便催促说：“年轻的新婚夫妇互相祝贺吧。”

当新人轻轻相吻的时候，穿灰衣服的妇女再次打开录音机，这一回播放斯特劳斯的圆舞曲，以使气氛轻松活跃一些。不过她在领人进入大厅时不止一次地错过了乐曲该停的地方，第二次播放时开始是继续播送刚才关掉的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接着是吱吱喳喳的延

声，然后又是斯特劳斯的圆舞曲。苏沃洛娃女士同新婚夫妇握手，把注上已婚的身分证发还给他们，并送他们走出房间。在大厅里人们花上点钱就能取用香槟酒和糖果，但是，大多数新婚夫妇宁愿自己在外面办喜筵。我常常看到年轻的新人在“阵亡无名战士”纪念碑的永不熄灭的火炬前面作礼仪性的停留，新娘献上自己手中的花束；或者驱车到列宁山去俯瞰全城，拍照留念。瓦基姆和斯维特拉娜省去了这些仪式。“我可不要那一套，”斯维特拉娜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你星期六下午去列宁山的话，你每小时都能看到十个披白礼服的新娘，她们显得那么窘。干吗要搞那种仪式呢！”

不管怎么样，婚礼后的喜筵是这一天的高潮，也是个人尽情欢乐和享受家庭温暖的时刻。瓦基姆和斯维特拉娜象许多新婚夫妇一样，在一家公共餐厅——水晶咖啡馆——的一个单间里办筵席。七十多位宾客欢乐了好几小时，大嚼佳肴美味，狂饮香槟、伏特加和白兰地，唱着俄罗斯歌曲，并且在瓦基姆的大学校友伴奏下翩翩起舞，他们曾经组织过一支非正式的流行乐队。可怜的新娘新郎不时被“苦哇，苦哇”的喊声缠得无法脱身，这话的意思是“生活苦哇，来点甜的吧！”这么叫喊是要求小俩口子站起来，在朋友们的欢呼声中亲吻。

这种大吃大喝，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灾难性的

开销。花掉一千个卢布的情况屡见不鲜，因而报上不时刊登新婚夫妇因办喜筵而负债累累的悲叹。有的则抱怨说，在水晶咖啡馆那样同时承办几户人家喜筵的餐厅中，竟有吃白食的不速之客。比较穷的人家为了节约就在自己家里办喜筵，自己准备菜肴，客人也请得少些。然而，西方度蜜月的习俗在俄国人中并不十分讲究。有的夫妇设法搞一张两个星期的特别旅行证。有的则到某个地方去作周末旅行。但同样普遍的做法是象瓦基姆和斯维特拉娜那样，双亲从公寓里搬出去，让新婚夫妇自个儿过几天，然后全家再开始住在一起。

老一辈和小一辈可以一起生活一段时期，但是，这并不能解决两代人的隔阂，也不能消除俄国人所谓"父与子"的问题，自从屠格涅夫写了以此为名的一部小说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着。我对七十年代苏联人颇感兴趣的事情是，为孩子们一味追求物质享受而担忧的正是他们的父母；为正在成长的一代对政治漠不关心而忧心忡忡的，也正是那些作为权势集团成员的父母。这在西方，情况恰好相反。俄国中年人当年曾饱尝艰辛，可是他们有着哲学上的信仰。现在，他们发觉自己的下一代娇生惯养，而且没有任何信仰。

"我们的孩子什么都想要，而且马上就要有！"一位

体态丰满、具有清白无瑕历史的女党员对一位美国朋友抱怨说。她这种从伦理角度表现出来的愤懑，令我想起白手起家的旧式美国企业家的那种加尔文主义的道德准则，他们发迹时曾历尽艰辛，但又深信这对心灵大有裨益。她说，“如今青年们一结婚，就想有自己的公寓和漆得光亮的家具。我们花了好多年工夫才弄到自己的公寓。他们干吗要这么急呢？应当让他们等一些时候，那样他们才会格外珍惜爱护这些东西。”在婚礼宫，苏沃洛娃女士面露愁容地对我说，在她这儿登记结婚的夫妇中，有一半年龄还不满二十，而且对成立家庭毫无准备。她认为自己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劝他们别这么年轻就结婚。另一位妇女是个雄心勃勃、精力充沛、个性顽强的女作家，她出身于老党员家庭，虽然她自己不是党员。她也觉得青年一代简直已变得娇嫩了。“我对自己的孩子感到失望，”她焦虑不安地对我说，“他们意志薄弱，懒惰，不能约束自己。我的儿子才华出众，智力超群。但他虽有这些才赋，却相当缺乏工作能力，不会支配自己的时间，也分不清那些事情是应该先做的。我知道你们美国人认为对于学生和不满二十岁的青少年来说，这是正常现象。可是，我十五岁就已经进工厂干活，挣钱糊口了。”

青年人的反应则是：俄国人为了享受生活乐趣已经等待得够久了，现在没有理由要他们重过父辈的艰

难困苦的生活。在莫斯科一家咖啡馆里，一位年轻的、公开愤世嫉俗的政府译员对我说："青年人要这要那，什么都要。他们没有时间考虑问题或提出问题。我想，我们正处于你们美国人在五十年代的那种状况。青年人想穿得好些，弄一辆汽车，过奢侈的生活。"

有些家长感到，年青一代一味追求物质享受已经造成了政治上的麻木不仁，这种情况非常令人担忧。"我念完九年级就离开学校去参军，"一位外贸官员回忆道。他是个党员，经常出国到西方去；他的两个儿子在赫赫有名的国际关系学院求学。他说，"当年，我身材高大，强壮有力。喏，就是那种自以为成了大人的毛头小伙子。母亲反对我参军。但是，我父亲是红军军官，我一心想做的就是离家去打德国人。我的孩子们不了解我。电视放映战争影片时，我和我的妻子都爱看。我们回想起自己走过的历程。但是，孩子们对此毫无兴趣。他们说，'哦，又是这种片子，尽是些射击呀，轰炸呀。你们干吗爱看这个？'我看得兴味盎然，可是，他们宁愿到别处去跳舞。他们挂在心上的是我所不喜欢的现代流行音乐。他们知道所有的明星。不仅是披头士，那根本算不了什么，我是说最新的明星。有一次，他们遇到一个英国人，问了他闻所未闻的关于明星们的各种情况。当这个英国人回答不出时，他们大失所望。我觉得，他们对那种玩意儿着魔了。真弄不

懂他们。”

为青年一代在意识形态上的退化而忧虑不安的，不仅有做父母的人，而且有党的理论家。《真理报》称这种现象为“寄生虫主义”、“民族主义倾向”、“对于在青年中灌输无神论思想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或者干脆称为“对意识形态问题漠不关心”。苏联报刊发表肆意夸大的统计数字说，有五十万名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被“选入国家权力机构”，两千万以上的青年加入了共青团；这种夸大宣传正是当局惶惶不安的一个标志。我确实碰到过象那位黑头发共青团积极分子一类的大学生；她的房间里放着供床头阅读的列宁选集；当俄国人同外国留学生混在一起时，她就注意监视，以便在他们相互之间的友谊超出限度时进行干预。此外，美国青年在同苏联共青团代表团举行联席讨论会之后，对于二十岁左右比较年轻的积极分子所表现的那种教条主义式的僵硬态度感到吃惊。一位感到惊愕和怀疑的美国研究生在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讨论会之后评论说，“那些比较年轻的积极分子真是使人望而生畏。年龄大一些（近三十岁）的人倒还知道点有关斯大林的情况，在政治上也比较灵活一点，至少有那么一点儿。而那些比较年轻的人僵硬到了极点。”这些人也许是装装门面的，因为《真理报》一面象在1974年年中那样吹嘘说，有两万名青年满腔热情地整装待发去建设远东的

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或是在夏天到俄罗斯中部去帮助开垦农田；而一面却又立即补充说，一定得加强青年的思想工作。(一位共青团领导人后来私下告诉我，在三千名被迫报名参加铁路建设的莫斯科共青团员中，真正去的只有几百人。)

甚至那些并不热情支持共产党的中年人，也注意到青年人已经失去了理想。一位年近半百、大腹便便、高大肥硕、头发卷曲和眼镜滑到鼻尖的记者，回忆了当年他自己的政治热情。“我在战争时期加入了共青团，”他气喘吁吁地讲道，“我们当时都很激动。入团是我们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可我的儿子却不然。他感到入不入团无所谓。他快念完高中时，我问他是否打算申请入团。可是他说，‘不，如果我今年申请入团，我得去求他们。而明年他们就会来求我。还是等一等好。’”

“直到中学最后一年，他听人家说入团对于考大学有好处，他才着手申请。他径直走进办公室，在申请书上签了字，他们就发给他一张团证。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但仪式对他来说无关紧要。要是入团有助于他进大学的话，他是高兴的。而在共青团办公室里，他们为自己的发展定额中又增添了一名团员而高兴。但是，事实上我儿子也好，他们也好，都不把这当作回事。我儿子对团组织毫无兴趣，甚至连每月二十戈比左右的团费也不交。我岳母是老一辈的人了，她认为这样不好。

因而每个月乘公共汽车去为他交团费。我儿子进入大学之后，人们告诉他，为了获得助学金，他得担负一项'社会工作'。他说，于是'他们让我当训练国际主义者小组组长'。哼，叫他当组长！当我问他这小组是干什么的时候，他说，'哦，爸爸，谁需要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呢？'"

上面这个例子可能是极为特殊的，可是西方学者见过好几份未曾出版的社会调查报告。这些报告指出，青年的思想觉悟很低，这同青年们自己的评价相一致。"我不知道有谁是出于政治热情而参加共青团的，"一位俊俏的金发姑娘说，几年前她曾担任外地某工业城市共青团负责人。"在学校时我是一个充满理想的人，但是后来我变了。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时期是同共青团连系在一起的。"她向我历数了共青团组织的种种义务工作和星期六"义务"劳动，为了了解和监督其他工厂青工参加活动的情况，她自己不得不亲自参加这些活动。"在共青团所组织的活动中，人们所喜欢的只有建设大队，因为男孩子们能在里面挣一大笔钱；还有宣传鼓动队，因为我们可以自己谱写歌曲到全国老远的地方去演唱，这样我们就可以免费旅行全国。"还有人说，他们认为共青团是青年人出国到波兰或东德、甚至在难得的情况下去西方旅行的最好的、常常也是唯一的跳板。有少数几个人谈到他们在参加突击收割劳动时的那些充满青年人同志式友爱的日子，但是很

清楚，他们对一般事务淡漠而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同较早的岁月里苏联青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团结奋斗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

愤世嫉俗是有的；但是没有反抗。按世界标准来看，苏联青年界平静得有点反常。有许多西方人士推测说，政治骚动和持不同政见的反主流文化，必不可免地要在摇摆舞乐、粗斜纹布裤、长发和长须之后接踵出现，但这种推测在俄国是要碰壁的。对某些青年、特别是那些生活在思想保守的外省的青年来说，留齐脖子的长发确实是表示个人抗议的一种温和的象征。对于出身于显贵家庭的青少年来说，仿效西方生活方式有时也意味着他们对于父母一生追求飞黄腾达和政治权力表示鄙弃。但是，在大城市里，特别是在受过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中，从西方输入的流行文化已经相当普遍，并且已完全为当局所默认，因而它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政治锋芒和政治内容了。

“粗斜纹布裤在西方是一种抗议的象征，”一位出身名门、善于思索的犹太青年科学家阿列克斯·戈尔德法勃说，“但是在这里，它却是富裕生活的象征。如果你要寻找某种矛头针对父母或当局的反主流文化，并认为粗斜纹布裤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那就大错特错了。就你们（美国人）而言，这一切都是有机地发展起来的。

在西方，粗斜纹布裤是在反对越南战争、反对父辈生活方式的青年中流行起来的。它是贫穷的象征，故意装成的贫穷样子，因为美国青年把外表贫穷看作时髦。但是，在这儿，事情就截然不同了。粗斜纹布裤和流行文化都是外来的东西。对我们来说，粗斜纹布裤不是贫穷的象征，而是财富和优裕生活的标志。这就是它成为黑市中最畅销的商品的原因。在美国一条新的粗斜纹布裤也许值十个卢布，而优质的羊毛裤卖二十五个卢布。但是，在这里你发现人们愿意以七十五到八十个卢布（一百到一百零六美元）的代价买一条粗斜纹布裤，花上二百卢布（二百六十七美元）买一套粗斜纹布衣服，而一条质料远为优异的裤子或许只值十五到二十卢布(二十到二十六美元)。粗斜纹布裤因人们的崇洋心理而身价百倍。”

阿列克斯停了一下，让我细细体会他的意见。我们坐在他的厨房里，饮滚烫的俄国浓茶，吃大块的硬干酪。他呷了一口茶后，又对我讲起一次引人入胜的辩论，说明吸收西方流行文化的政治含义是何等微乎其微。阿列克斯是一个睡眼惺松的青年，留着蓬松的黑胡须，喜欢穿一身凌乱皱折、睡觉时穿的粗斜纹布衣服，使得他看上去更象伯克利大学校园里的亡命之徒，而不象苏联最有名的科学研究机关的一名前研究生。他是一位年近三十的犹太人，也是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者。

他不顾官方的反对，积极参加要求移居以色列的活动(1975年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后，他终于获准离境)。然而，阿列克斯出生于著名的科学家家庭，他的社会联系也反映出这种显赫的家庭背景。

阿列克斯说，就在几个月前，他参加了一次聚会，会上遇见了前克格勃首脑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的儿子。这位前首脑是一位地位相当高的党的官员，以严厉的强硬路线派著称。“我穿着粗斜纹布服，他(谢米恰斯内的儿子)也穿着粗斜纹布服，”阿列克斯回忆说。他们随便聊聊，这两个青年人发现他们两人都收藏有《救世主耶稣》和《超级明星》唱片，于是就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流行音乐唱片的黑市买卖。这位姓谢米恰斯内的小伙子上衣翻领上别着一枚共青团团徽，当两人谈到政治时，冲突发生了。

“我们只是在谈论流行文化时，才有共同的语言，”阿列克斯对我说。“但是，一谈到政治，我们的看法就截然不同了。我批评苏联援助阿拉伯人，并为以色列辩护，这时他就勃然大怒，并且对我说，如果他和我都是在中东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枪毙我。我也对他说，我也同样会把他干掉。所以你看，我们都穿粗斜纹布服，听《超级明星》唱片，但是，这并不是一码事，除了我们两人都出身于权势人物家庭——他出身于政治界的权贵，我出身于科学界的显贵。他靠他父亲的地位弄到

粗斜纹布服，而我靠我父亲能出国从西方给我买来粗斜纹布服。可是粗斜纹布服本身却毫无政治含义。”

其他青年人也都异口同声谈到这种看法。他们不但讲起粗斜纹布裤和摇摆舞乐，而且讲到有些熟人收听西方新闻广播，或者偷偷阅读查禁的亚力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和其他地下文学作品，但在社会生活中却表现为保守、逆来顺受和唯命是从。正如莫斯科一家右翼杂志的一位与其职位不相称的青年编辑所说：“他们上班时衣着正派，行为得体，言谈恰当。”还有一位青年是某科学院的共青团负责人，但在政治上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是狂热的西方摇摆舞乐迷。他明确表示自己完全忠于现行社会制度。一位美国朋友对他说，他感到在苏联青年中看不到有反对普遍征兵制的骚乱以及为在大学校务中争取更多发言权而产生的校园骚动，也看不出有类似美国青年那种揭露社会黑暗面的行动。这位俄国青年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们喜欢吉米·亨德里克斯（美国摇摆舞歌手），但不能仅仅因此就认为我们没有时刻准备为祖国而战。”

看到苏联青年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他们政治上的唯命是从态度也就不会感到太惊奇了，因为在苏联当局花了很大本钱的地方（例如苏联的大学，只有很少数人获得机会在那里开始谋求飞黄腾达），它决不会容忍

出现那种西方认为是大学校园必然会出现的、攻击传统观念的情况。有一次，我问一位英国留学生，他对国立莫斯科大学苏联学生的主要印象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受压抑!”

“你指的是什么?”

“我是指他们缺乏生活，缺乏自由发展。不仅仅政治上如此。在国立莫斯科大学，自由自在的嬉笑打闹现象，比你在西方任何一所大学里看到的要少得多。”

基本原因显然在于近年来苏联总的政治气候和当局的控制。然而，这种控制与西方人士所想象的有很大不同，而且也远为复杂、有效并带有根本性，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苏联青年所赖以生活和成长的那一套基本体制。它并不是克格勃对于持不同政见分子进行的那种控制。这种控制只涉及极个别青年。在苏联高等教育和官场升迁的制度中，安下了一个比较简便、比较单纯然而却更加强有力的检查和控制网。它是统一的、由国家掌握的教育制度的功能之一。

这种制度不仅为大学青年提供免费教育和并不十分宽裕的助学金，而且为他们规定了严密的、经过系统安排的生活。大体说来，他们进入工科学校、农业学院、艺术学校或者文学院，毕业以后就成了持有证书的工程师、农艺家、艺术家或作家。经济计划工作者每年提出各个学科的招生名额，而一旦学生修完了自己的

全部课程，就能保证获得自己所学的专业范围的工作——不仅保证有工作，而且被分配去干这项工作。

1974年5月，白发苍苍的塔吉克农学院院长古兰·阿利耶夫对一群来访的美国记者说："我们象生产棉花一样生产工程师和农艺学家，我们有一个生产计划，按国家需要的数量生产专家，并且按照我们得到的'定单'（申请）进行分配。"他解释道：换句话说，本共和国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申请提出他们所需要的专家，这些申请通过各共和国的计划委员会上报，或许一直报到莫斯科，然后又按农艺学家或水利工程师等毕业分配名额的形式，下达到各个学院。在其他各种领域内，也是这样做法。当我在伊尔库茨克访问时，当地大学的校长告诉我，该校法律系发展最快，因为许许多多西伯利亚城市都需要律师。后来发现，原因之一是警察当局需要受过专门法律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以协助对付青少年犯罪问题。

实际上，名额分配制度并不象听上去那样不近人情。每个学生对于自己所报考的院校和专业都有选择的余地。苏联的大学招考制度与美国不同，美国允许学生同时报考多所院校，而苏联则要求大多数考生选定一所高校和该校的一个系以进行应试。这样学生就冒着孤注一掷的风险。

考取大学就意味着进入"职业市场"的道路实际上

已经畅通无阻，因为一旦入学就很少有人会因学习成绩差而被开除。然而，正如格鲁吉亚某大学校长所承认的，学生一旦进入某个系学习，就几乎没有可能再改换专业。你得一直念完入学前所选定的专业。学校的课程是划一的，通常由莫斯科统一规定。选修课程很少。这是一种反复灌输专门技术的教育制度，而不注意陶冶学生的作为通才的素养，如学会思考，发展个性，以及表现个人的情感等。美国的教育带有自由发展、实验性以及注重个性的倾向，而苏联教育制度则千遍一律，严格而保守，而且非常侧重于运用和掌握某一具体技能。很难想象有比这两者更加截然不同的教育制度了。

大学考试落第成了学生一生中的转折点。一般说来，这意味着要等上一年之后再重新投考。每年大约有七百万学生从高中毕业，而能够受到大学教育的只有一百万人左右；其中近一半人还是上的夜校或函授学校。从夜校或函授学校转入正规大学极为困难。许多名落孙山的青年应征参军，而在校大学生则接受比较轻松的预备役军官训练并获得军衔。不少青年服役期满后从事体力劳动，不过也有些人上了大学。不管怎样，考不上大学总是一次打击，因为尽管苏联极力吹嘘和宣传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如何受人尊敬，可是在中学生中进行的社会调查却不断证明，他们强烈希望

有“知识分子前途”而把体力劳动摆在很低的地位。我们所熟悉的一些苏联家庭的情况也充分证明，学生没有考取大学是何等沮丧，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这差不多是宣告这一生没有指望了。

结果是为了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出现了极为剧烈的竞争；许多人临时抱佛脚去死记硬背功课，或者请私人教师补课。高中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十分紧张；有很多人对招生委员会及其他教育工作者暗地施加影响，而贿赂招考官员的教育界丑闻也层出不穷。这类贿赂事件一般发生在边远地区，以免使莫斯科的重要人物为难。从理论上说，任何人都不得通过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高教部长或其他高级官员去影响招生工作。“但是，”一位进取心很强的职业妇女说（她为自己儿子的入学进行过广泛的幕后活动，并最终获得成功），“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到高教部长和副部长的接待室去看一看的话，你就不会相信了。里面坐满了宇宙飞行员、女演员、记者和官员们。每个人都想提出要求。要是你想进入部长办公室的话，秘书们——那些坐在办公室门口，甚至不问人家有什么话要说就一律回答‘不行’的女人——就会告诉你·‘没用。里面已经有一大群人了。’”

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对于他所感到的教育制度不平等发出了怨言。“我的孩子不能上大学，但将军的孩子

却能进大学，”他发牢骚说。“考试时将军的儿子得五分，工人的儿子却得三分。”言下之意是完全按等级录取学生的；这种说法也许并不公平，因为政府也定期作出努力使工农子女有更多的入学机会。一位教师告诉我，1973 年国立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奉命在工人夜校中招收百分之七十的新生。根据这个指示，他们只招到百分之四十合格的学生。可是，由这些学生组成的班级，质量很差，因而1974年他们完全不考虑学生的成分这一条件了，改为只凭分数录取。工人出身的学生人数逐渐减少了。苏联六十年代期间的社会调查证明，知识分子的子女升入高等院校的机会为工农子女的二到八倍。在名牌院校中，这种情况甚至更为突出。哈佛大学的一位社会学家理查德·多布森告诉我，他看过一份未发表的苏联论文，指明了国立莫斯科大学优先录取知识分子子女的趋向正在增长中。文章说，1960 年学生中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占百分之七十，而到1970年就增长到百分之八十。此外，有很多来自工厂和国营农场的学生，被保送到各工业部管辖下的技术院校学习，由原单位负责学习费用和对他们的政治考察，并规定在毕业后应返回各自的工厂和农场。

毕业分配的时刻是苏联青年的又一个重大关口。这是学习成绩、政治表现和家庭社会关系都发挥作用的时候，因为大多数青年人都极想留在生活比较有趣

的大城市，而不愿被派往外省。按规定，虽然学生在首次分配工作的地方可以只呆上两三年（从理论上讲，这是为了报答国家对自己的教育），然而，惯性是无法抵挡的。我所遇见的在北方、西伯利亚或其他边远地区工作的人，绝大多数都说他们是首次毕业分配来这里的，并且已经决定长期留下来。他们发现一旦到了外省就很难再回到城市。分配工作同招生一样，鼓励学生既要有完美无缺的政治表现，又要保持优异的学习成绩。

苏联大学生在整个学习期间都受到强制性的政治教育——有五门须修一年的课程：苏共党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以及科学共产主义基础。他们在私下里经常对这几门课程发牢骚，编一些讽刺性的笑话。但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下，要主动摆脱这些课程并提出抗议，差不多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我记得有一位又高又瘦、相当腼腆的十几岁的青年，他戴一副角质框的眼镜，出身于一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家庭。他对我讲起他在大学里参加的一次学生会议的情况。班级里的军事教官向全班提出一份关于该班的“社会主义义务”——大概是指志愿参加的工作——的决议。教官把决议高声宣读之后，这位青年举起手来，对于决议中写上了“一致通过”表示反对。他争辩说，既然决议甚至还没有讨论过，事先就不可能说是“一致通过”了。全班鸦雀无

声，其余的人都不相信地盯着他看。教官呵斥了他。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教官责问他。“你是共青团员吗？”

“不，”这个小伙子答道，“我没有入团。”

“那么，你是个托派分子！”教官一口咬定说。这就足以保证不经讨论就一致通过了。

“我们的大学生既不激进也不进步——他们属于沉默的多数，”一位中年的母亲评论说。“他们必须忠诚，听话，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在现在这个地方读书，尤其是莫斯科大学这样的地方。”“对他们施加压力的途径是如此之多——助学金，宿舍；而最重要的是在大学里的学籍。如果你了解只有少数青年能够进入大学，而能进真正不错的大学的则为数更少，你就会理解学生们多么想保住自己的学籍，不被撵出学校。保住学籍就是保住前程。档案里一旦沾上污点，就会跟随你一辈子。被一所大学开除了，你就再也进不了别的大学。因此学生们极其希望能在学校里读下去。这不一定是出自金钱方面的考虑，而是出自对自己专业的兴趣。如果一个学生很喜欢生物学、物理学或者历史学，那他无论如何不会去冒被开除出大学的风险，因为这意味着要毁掉自己毕生的前途。我们的学生如此奉公守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联青年同西方青年另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

他们对父母的依赖和浓厚的家庭观念，因为这往往可以增强他们政治上的正统观念。由于缺乏住房，很多人在上大学前，在求学期间，而且常常在毕业后都不得不住在家里。有人为此感到焦急。另一些人则视之为正常现象。然而，大家都知道自己对此几乎毫无办法。外交部有一位高级官员的夫人回忆（她曾多次出国旅行），她曾以十足的西方家长口吻对她那位到了上大学年龄的儿子说："现在你该去找个工作，挣些钱，过比较独立的生活了。"可是，孩子无动于衷地说："行啊，妈妈，你给我找一套房间，我就这么干。"

"当然，找一套房间谈何容易，"她继续说，"所以他仍然跟我们一起住在三间一套的公寓里。他上了大学，老是不呆在家里。有两个月，他离开大学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可是他又回来了，又去上大学，当然还是同我们住在一起。"

住在家里的日子并不好过。这会引起家庭不和睦，因为这使青年人更难找到自己需要的清静独处的场所，但是，这也会使家庭联系更长久地保持下去。它意味着父母亲在某些方面仍然可以进行干预，而美国青年也许会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自主权利。例如，一位学化学的学生告诉我，他拿到大学助学金，交了团费之后，就把余下的钱全部交给母亲作为家庭开支，自己分文不留，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些住校的学生

则说，他们每月四十卢布的助学金，还不够付膳宿费，更不用说其他的个人开销了，经济条件好的青年每月的个人开销得要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卢布（在外省也许要少得多）。他们说，为了维持收支平衡，他们依靠父母接济。这是同老一代的又一种联系。

此外，同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也值得注意。这里并不存在类似美国的那种对青年的崇拜，父母的尊严还是相当强烈。苏联学生不象美国青年那样随意责备自己的父母。很多青年人依从父母的意见，在学业、旅游、职业和婚姻问题上都同父母商量，有些人还会乘飞机赶回家参加父母的生日或其他庆祝活动，在这方面要比西方学生主动得多。家庭关系的重要性（特别在比较有钱的家庭里）也提高了父母的权威，在子承父业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而这种情况在苏联是举不胜举的。

尽管如此，今天的青年一代与历史相隔绝的情况，比苏联历史上任何一代更为严重。对于西方人士，尤其是那些因公民权问题、越南战争和水门丑闻而饱受精神折磨的美国人来说，很难想象如果生长在一个对于历史一无所知的环境中会是什么样子。苏联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斯大林主义——已被隐讳不提，而从一切外部迹象来看，在七十年代青年一代的成长期

间，是严格禁止重提那一段历史的。年纪大一些的党的官员宣布说，斯大林的镇压措施纯属机密，已为党所处理并永远抛弃，不再公开旧事重提了。

当然，一些家庭在私下里还是谈到这个问题，但有时出乎我的预料之外，两代人结果竟站在截然不同的方面。我想起一位个子高高的苏联青年，他对摇摆舞乐迷得发狂，有一天夜里竟冒了一种不可想象的风险，悄悄地混过苏联的武装警卫潜入美国大使馆去观看一部著名的披头士影片《孟加拉演奏会》，并在看完之后安然离开。他同他父亲（一名党员）争论过斯大林问题。象许多厨房里的谈话一样，他们信口闲谈，但扯到一个问题时谈话变得相当激烈。儿子为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强制推行集体化并以严厉手段强行实现全国工业化一事辩护，这使他的父亲十分不快，后者尽管年龄大些，却比较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也许正是因为在时间上他离他们所争论的可怕事件比较近，因而对这些事有着切身的体验。这同西方人士想象中的俄国两代人在讨论斯大林问题时通常所持的立场截然相反。

“我认为当时国家需要斯大林这样的人物，”这位青年宣称，他是一个共青团积极分子。

“什么？”他父亲反驳说。“以两千万条人命为代价吗？”

儿子稍作退让，但仍然坚持自己的基本论点。“嗯，

恐怖显然搞得过分了，也是不幸的。可是，斯大林也许不得不运用这样的手腕使全国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当时这样做是必要的。”

上面这种例子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已经是中年人的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告诉我，有一次在西伯利亚他看到一群青年人围着营火而坐，其中有一个人竟幼稚地提议为斯大林干杯，这个人实际上对清洗事件一无所知，因此，叶甫图申科感到非得把斯大林恐怖的全部内容向青年们讲一讲不可。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私下对他的老朋友——另一位美国记者说，他那个十几岁的儿子对斯大林的评价很好，他对此大为惊异，并且力图说服他儿子放弃这种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他儿子在西方住过，见识过西方世界，而且一直十分欣赏美国电视、流行文化和各种娱乐。

还有的青年深感自己对苏联的大部分历史、二十年代艺术界和知识界的骚乱以及斯大林的镇压等所知甚少，因而坦率地表示不安。有一位青年对他在大学里的女朋友的父亲表示了自己的强烈不满，他说：“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过去，不了解政治史，不了解文学史。我们开过了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6年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秘密揭发了斯大林〕，但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文件，所以无法对于过去的历史形成自己的看法。”有些青年人，象在西伯利亚同叶甫图申科一起开

营火会的那些青年一样，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对过去的历史无知到何等程度，因为在书刊检查制度下，他们已经同不符合当前党的路线的那一部分苏联历史相隔绝了。

西方人士往往没有注意到，虽然他们远离这里十万八千里，可是有时他们对于某些苏联历史事件却比俄国青年人了解得更多。

我听说过苏联著名喜剧演员阿尔卡季·莱金的一件生活小事，这件事明白无疑地向我证实了上述情况。

据他的一位亲友说，有一年冬天，莱金因心脏病发作而住院治疗，他的十八岁的孙子去探望他。莱金突然看见至今还活着的斯大林最亲密的副手、前总理兼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从病房门口走过，他吓得在床上坐了起来。

“啊，他在这里！”莱金气喘吁吁地对孙子说。

“谁呀？”孩子问道，他不认识这位几乎自他出世以来就从苏联报纸上销声匿迹的人物。

“莫洛托夫，”莱金咕哝着说。

“莫洛托夫是谁？”孩子问道，他无知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一位中年的科学家指出，这种不懂历史的情况使得这一代青年的心目中既无坏蛋又无英雄，也许只有

西方摇摆舞明星。他认为，这是不会作出是非判断和抉择的阉人似的一代。

就这方面说来，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一代苏联人同以前的任何一代人都大不相同。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岁月曾给人们留下显著的思想烙印。西班牙内战的那一代人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他们经历过如火如荼的反法西斯斗争，经历过斯大林主义镇压的威胁；他们或者具有斯大林所培育起来的那种思想面貌，或者直言不讳地对他怨声载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现已年过半百，他们也曾怀有反法西斯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明确志向。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和非斯大林化时期的一代人也已四十多岁了，他们现在慑于淫威，但在思想上并未心悦诚服，而且暗地里还打算提出既否定斯大林又否定赫鲁晓夫的看法。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代人，经过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与缓和的这一代青年，可就很难捉摸了。

"我们的青年跟我们疏远了，"一位党员记者评论道。他的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希望不向我们请教、由他们独立思考他们的问题。同我们相比，他们是内向性格者。我们是外向性格者。我们从西班牙内战开始踏上人生道路，又经历了反希特勒战争。我们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这一代人的所作所为仿佛同意识形态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其中有许多人认为

意识形态与他们无关。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大动乱。他们无所作为。他们不闻不问。”

八 农村生活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农场

乡村，乡村，有着墓地的乡村，

仿佛整个俄国都集中在乡村……

你必定知道，祖国毕竟不是我曾欢乐地生活过的城市，

而是我们祖先曾经漫步过的、在俄罗斯式坟堆上竖着简单十字架的小村。

康士坦丁·西蒙诺夫

瓦西里·波钦科夫在苏维埃制度中是一个罕有的人物。他的工作是促进私营企业活动。

他的二楼办公室设在几乎有麦迪逊广场花园那么大的一幢大楼里，我进去的时候，他从办公桌旁站了起来。他长得很结实，显得一本正经，象个药剂师那样，衣服上罩了一件白色外套。我们进行了足足一个小时的谈话，谈到了预算和利润、供出租的十吨卡车、仓库面积和化验室的检验等问题；谈到了租用场地和制服

的手续，谈到了订立商品价格以及在他管辖的旅馆里为那些从摩尔达维亚、中亚细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白俄罗斯以及有时是从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来到莫斯科做买卖的人提供住宿房间。然后我们参观了这幢房屋及其附属建筑。

波钦科夫是切廖穆什基农民自由市场的经理，这种市场在莫斯科有三十个，在苏联有八千个。农民们把自己有限的私有菜园里的产品，或者把自己的牛、鸡和兔子宰了以后，运到自由市场上，以不同于苏联其余经济部门兜售的方式推销出去，就可以合法地得到几十亿卢布。

我们发觉这种农民自由市场真是天赐的好地方，许多俄国家庭也认为是这样。有时候家庭主妇们由于碰到几乎可与华尔道夫饭店房金相匹敌的高价，只得望物兴叹——生菜从夏天的三十美分一磅涨到十一月份快要断档时的一元五角美元一磅；花菜在冬天二元五角美元一棵；来自南乌克兰的甜梨将近五十美分一只；而来自格鲁吉亚的一枝玫瑰花在一月份要一元三角五分美元。但是，这些东西质量比国营商店好，品种也比国营商店多。而俄国家庭主妇就是甘受这种哄骗和奚落，陶醉于摆在她面前供她鉴别的成熟产品的香味，听任摊贩为了讨好她和看中她的钱包而在她面前展开竞争。

“到这儿来，姑娘，”一天下午，一个白发老奶奶向安兜生意。她以俄国人那种无拘束的亲昵态度来诱使她尝尝装在罐里的又稠又粘的黄褐色蜂蜜。“尝尝味道，看它有多好，多甜，年轻的妈妈，”她讨好地说。“给小宝贝儿买点吧。”那位农民老奶奶一边夸着那刚从蜂房取下的淌着蜜汁的蜂窝有多么新鲜，一边让安和我们三岁的莱斯利舔一舔木棍上的蜂蜜。

只要有一个随便逛逛的顾客在一个摊贩那儿徘徊一下，竞争的合唱就开始了。这儿，有一个没刮胡子的、掉了几颗门牙的农民，在叫卖剥了皮的兔子。那儿，一个矮胖的俄罗斯人，粗壮的手里炫耀着饲养场刚下了不久的新鲜鸡蛋。一个老太婆，象个木乃伊那样，头上缠着头巾，正在叫卖一大块放在蜡纸上的自制甜乳渣，或是从一只白搪瓷罐中拿出来的酸奶油。一个皮色黝黑、戴便帽的格鲁吉亚人一边在削一只梨子，一边狡猾地盯着买主，然后要你尝尝他刀上一小片多汁的梨。在老远的拐角上，穿着乡下粗布衣裳的妇女，招呼你去看那象软木塞项链一样用绳子串起来的干蘑菇。农妇们在她们的货物上不断地洒水，因此，那些长长的石柜台上就摆列着一堆堆闪烁着水珠的黄瓜、甜菜和红菜头，或是象栽植它们的农民的手指那样又粗又壮的甜得出奇的胡萝卜。莳萝的浓烈辣味刺激着人们的鼻腔。

一个饥饿的顾客在中央市场或者在切廖穆什基市场的那些货摊间漫步一阵，就可以捱过一餐饭，他不仅可以尝一下蜂蜜和奶酪，还可以尝一小匙醋渍酸菜，尝几口刚从桶里取出来的、滴着盐水的腌莳萝，尝一点点石榴或者一小撮阿月浑子果仁和来自撒马尔罕的小粒紫葡萄。但是，乡下人唯恐莫斯科人占便宜太多。"好了，好了，"一个精明的摊贩会提醒说，"怎么样，来一公斤吧？你今天到底买不买哟？"

生产这些商品的自留地面积很小，而且大多是用部分时间耕种的，但是它们的产量却那么大，而且是苏联经济所必不可少的，因此，没有这些产品，这个国家的二亿五千万人就过不了日子。由于这是意识形态上的痛心之处，这个政权极不愿意宣传这个私有部分的成绩，而是宁可吹嘘"社会主义化的农业的巨大成就"。但是，1975 年 3 月有一篇不寻常的文章却透露：在苏联农产品的总值中，有百分之二十七（约为三百二十五亿美元）来自只占这个国家的农业土地的百分之一的自留地（约二千万嗽）①。根据这种比率，自留地的效率大体上等于集体耕作的土地的四十倍左右。根据每一种作物的实际收获，1973 年苏联经济年鉴指

① A·叶麦里扬诺夫：《党的土地政策和农业结构的发展》，载《经济问题》，1975 年 3 月，第 22—34 页。谷物数字是根据《1973 年苏联经济》（莫斯科，1974 年）第 353 页上的数字计算的。

出：在这个共产主义的故乡，按产值而论，全国百分之六十二的土豆，百分之三十二其他水果和蔬菜，百分之四十七以上的鸡蛋和百分之三十四的肉类和牛乳，都来自农村的私营业主，他们的人数约有二千五百万多一些。有一种说法认为，大作物——主要是谷物和棉花——都是集体耕作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民的产品在市场上自由销售，比通过国家售出更能获得好价格。对这些使人吃惊的统计数字的第三种解释是，农民在自留地上的产品大约有一半供他们自己和乡邻们消费，不上市场。但是，农民耕作他们自己的自留地，要比耕作集体的土地仔细得多，这也是明显的。

共产主义的理想是：随着工业化了的国家农业在规模上和产量上的发展，要使私营企业这一最后的麻烦、然而又是必要的残余逐渐消亡。尼基塔·赫鲁晓夫不顾这一问题的农村根源，大力追求上述目的，因而引起了农民的憎恨。他把自留地的面积削减到最高只有半嗽地，使农业集市贸易营业发生困难。有一个俄国朋友告诉我说，乌克兰农民为此十分恼怒，因此不再把鸡蛋当作食品出售，却用鸡蛋来制造油漆。"蛋清可使油漆非常经久耐用，"莫斯科一个油漆工对我说。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情况有了改善。自留地的最高额又回复到一嗽，并且采取措施，改善农业自由市场的经营。苏联所发表的数字表明，私营农产品从

1966 年到 1973 年几乎增长了百分之十五。尽管国营部分增长得还要快，个体耕作几百年的旧习惯显然在俄国农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在农奴制的时候，只要满足了农奴主的要求，农奴还有他们自己的小块土地可以耕作。在得到农奴主的同意后，他们可以拿自己的剩余产品到城镇市场上出售。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由于斯大林把残酷的集体化作为制止农民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一种手段，这一制度便被永久固定下来了。现在，每当谣言象 1974 年那样流传，说是某些农业改革将会取消自留地，高级官员便立刻加以否认，这显然是害怕骤然的变化会引起农民的强烈反抗。

在苏维埃时代，自留地为减少贫困提供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回旋余地。自留地本身不足以弥合城乡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但对许多家庭而言，自留地意味着勉强维持生活和生活过得略微好些之间的差别。因为，如果你在那些乡下人出售了他们的产品后尾随他们走去的话，就可以看到他们立即跑到莫斯科的商店去买一些他们在那小得可怕的乡下小店里买不到的东西。从南方来的、出产高价的热带水果和花卉或者冬季蔬菜的那些幸运的格鲁吉亚人、乌兹别克人或者阿塞拜疆人，都去贿赂那些女售货员，以便搞到一些紧张商品，给孩子买些玩具和小玩意儿，到饭店里大吃大喝，或者偶尔买上一辆旧汽车。但是，那些来自缺少土地的

中部俄罗斯人，收获的只是价廉的土豆、胡萝卜或甜菜，他们就立即跑向国营商店去采购又粗又长的香肠和冷肉块，或者购买冬天的长统厚袜、厚的布大衣或是铝制锅壶等物品。

如果你在晚上尾随乡下人回家去，在火车站上，你就可以看到俄国人称之为人民群众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官员们和知识分子们私下里讲起这些人时，总是带着恩赐和蔑视的态度。他们都是粗俗而纯朴的人，象他们住着的木屋一样饱经风霜，象缅因州渔民那样的吃苦耐劳，一生战天斗地，磨炼得很坚强。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经过喀山火车站的情况：喀山站是每天输送一百多万往来莫斯科的旅客的九个火车站之一。晚上十一点，候车室里挤了两千多人。每个可以坐的位子上都有人坐了。男人们躺在桌子上、地上，想睡睡觉。这整个人海反映出一种吝啬而艰辛的生存——阴郁的表情，粗陋的衣着，寒酸的行李，克制的举动，漫长的等待。俄国人经常吹嘘他们博览群书。但是，我看到只有六个人在看报纸。那些农妇都有着又宽又扁的脸，双颊光滑，象用久了的洗衣板的木头，身体壮实得象载重的马儿似的。她们象男人一样坐在长凳上，摊开两腿，紧握的双手放在肚皮上，身上没有一丝女性的样子。她们由于穿着一层层褪了色的、没有样子的衣服，身体的轮廓也不分明了。我细看了一个干瘪老太

婆。在她的磨破了的黑丝绒外衣里面是一件灰色羊毛衫；再里面是一件齐膝盖的印花布的宽大便服；宽大便服下面又是一件羊毛衫，一件花布衫等等。那些衣服全都早就褪了颜色，每件衣衫显然都象穿着它的主人一样已经历经了多少个年头。那些身穿鲜艳上装和塑料靴子的年轻少女，或者甚至是穿着卡其服装的士兵，相形之下也似乎很漂亮了。男农民就象是黑色的影子——穿着深色、皱折的、没有领带的上装和裤子；十分粗糙的深色羊毛厚大衣；深色的工人便帽或者皮帽；黑色橡皮靴或是世世代代没有擦过鞋油的黑皮鞋。到处都是临时凑合的行李——廉价的马粪纸提箱，硬塞了许多包包而撑大了的网线袋，用拣来的麻布片或报纸胡乱包扎的新行李。火车一靠站，人们便拖着一捆捆难看的行李蹒跚地走了出去。

如果尾随这些人到了农村，现代世界便令人吃惊地突然消失了。不仅是农民，就是那紧靠着莫斯科附近的乡村也是如此。令我吃惊的是，就在离开克里姆林宫不过十哩、靠近小梅季希村的地方，城市生活和现代化设备就全都不见了。新的公寓大楼让位于农民的低矮木屋。突然间，小道也不再是铺过的了，却变成了泥土路，往往宽度不超过两条车辙，或只不过是蜿蜒于花园篱笆之间的小径而已。多亏列宁对电气化的信仰，大部分农民家里都有了电灯——还有电视机。但是，自来水

管设备仍然是一种奢侈品，只好留待将来再说。每个菜园子都在角落里有一个户外厕所。沿路边每隔几百码就有一台手摇抽水机和一口井。不管是在温暖的夏日还是在严寒的冬天，我都看到乡下人吊起了一桶桶的水后，用一根木头扁担把两只木桶小心地挑回家去。在离开大路的地方，我看到农妇在乡间溪流冰冷的水里用手搓洗衣服，树梢头露出一座教堂的洋葱般的圆顶。

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些村庄里，特别是沿着那条通向著名的扎哥尔斯克寺院的旅游路线，约在莫斯科北面六十哩的地方，农民的小木屋就象故事书里那样都饰有雕花和彩色的窗框。小木屋的篱笆整齐而结实，村子看上去相当兴旺。但是，俄国的农村生活大都是寒酸、单调而不整洁的，而且最糟的是泥泞不堪——这种泥泞使生活和行动都不方便。关于俄罗斯中北部的"非黑土地带"——大约就象在赫德逊湾那么远的北部地区，而且气候也不适宜人们居住——作家鲍里斯·莫扎耶夫不久前曾哀叹说，那里的农村生活"日趋衰败，慢慢地在瓦解"。他描述了我驱车在莫斯科北面所看到的情况：农民小木屋因失修而倒塌，乱糟糟的牧场渐渐地让位于重新生长起来的矮树丛。好象是现代文明以城市为中心按同心圆向外扩展，越是扩展出去，乐趣就越少，生活就越艰难。

这就是根纳季告诉我的情况。他是一个圆脸蛋

的、说话很快的会计，出生在列宁格勒，并在那儿受过教育，但是，在市郊三个不同的国营农场工作过。按照苏联社会主义那种讲究等级的情况，国营农场被认为比集体农庄更高级，因为集体农庄在理论上说是自愿联合的组织(虽然要退出也极其困难)。这两种形式都可以是很大的，可以并入数千嗧土地和几个村庄。国营农场给农业工人发付一定工资，而集体农庄庄员则以现金或实物分到公有的收获。国营农场工人的工资比较高，还享有其他一些社会福利，例如国家的住房，但是，他们的自留地面积要小得多，因此，实际上，往往比集体农庄庄员所赚的钱少；不过，碰上坏年成，他们由于有固定工资而稍有保障。

“在离莫斯科或列宁格勒不远的一些实力较强、较大的国营农场或是为了装个门面给人看看的国营农场里，”根纳季对我说，“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石砌的房子，每户工人家庭各有一套住房，有下水道系统，自来水。我工作过的头两个国营农场就是这种情况。这两处都离开列宁格勒约一小时左右的路程。但是，第三个国营农场就更远一些——约两小时的路程。那是一个差一些的农场。木头房子，一点也没有什么现代设施。没有暖气。没有下水道系统。没有自来水。这三个农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肉类。简直是一点也没有。就其他的食品来说，越是靠近列宁格勒，店里

卖的东西就越多。离列宁格勒越远，店里卖的东西就越少。这就是规律。可以买到苹果，但是，柑桔只有在列宁格勒才买得到。”我在莫斯科附近一些乡间店铺逗留所见，证实了他的这番话。那儿只供应少量几种基本商品，如黑面包、两三种奶酪、猪油、罐头鱼、梨子、几种干粮，难得也有大红肠。有些还有几种家用器皿和很少的几种服装。这些店铺都是死气沉沉的，既没有装得满满的货架，也没有传统的美国乡间铺子那种高谈阔论的热闹气氛。

然而，即使对俄罗斯中部农村的生活这样走马看花地看了一下，我听到了加林娜·拉戈齐娜下面一句话后，仍是不免感到意外。她是一个娇小的、金发的基洛夫芭蕾舞剧团的演员，结婚后和瓦列里·潘诺夫一起到国外去了。她说，“我在两年前（1970年）来到列宁格勒的时候，才第一次知道子鸡可以吃。”她是在莫斯科东面约八百哩的乌拉尔山区长大的，那儿是一个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工业区。加林娜认为，所以禁止人们到那儿旅行，是因为当局不愿意让西方人士看到住在乌拉尔山区的人生活多么可怜，不过，我猜想是因为那儿有国防设施，也可能是因为六十年代在那儿发生过核子事件的缘故，我的一些朋友讲过这件事。

“我们从来不吃子鸡，”加林娜回忆道。在我表示惊奇的时候，她把一只盛了两只小柑桔的碟子推到我

面前。“我一生还是第三次吃到这东西。”她在乌拉尔的童年时代，经常是一个月才吃到一次肉。即使当她在彼尔姆那个极好的芭蕾舞学校学习时，她也觉得情况好不了多少。“一年中，大都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可吃——冬天就什么也没有，夏天也只有几种蔬菜，”她说。“我记得在十三岁(1963年)的时候，在芭蕾舞学校里，我班上每两个女同学中就有一个得了肝病。她们都得了黄疸症。水脏得简直不能喝。全是从那里的工厂里来的。我老是掉头发。我想就是因为水的缘故，因为现在头发不掉了。列宁格勒有好水。我们能喝到牛奶，当然只是在早上才有牛奶。要是我在下午到店里去，牛奶就卖完了。”

这是外国人所难得看到的俄国的一面。我记得有个俄国妇女，她嫁了个美国人，她告诉我说，她来到美国，最使她惊奇的是，同俄国相比，美国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是那么小。大约有一亿人口生活在苏联农村。要概括他们的基本特征，就同概括苏联青年的情况一样困难。对于一年四季都生长作物和赚钱的商品作物的南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农民来说，他们的生活要比俄罗斯中部的农民好得多。农村生活也到处都有它的等级制度——农场主席，总农艺师，高工资的拖拉机和康拜因手，会计和工程师，他们总是比

女挤奶员，饲养员和没有技术的普通田间劳动者高出一筹。正是属于最后一种的这些人，即最没有技术的人，他们在社会各阶层中构成了一极，成了为之设有特殊商店及供给带有司机的小轿车的党政头目特权阶层的对立面。然而，局外人想要了解他们生活的实际情况，就象要了解权贵的特权生活一样困难。

苏联当局对于农村情况及其给予西方人士的印象是极端敏感的。即使在城市里，当我注意一下那些旧木屋时——它比起旁边那些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预制构件的难看的房屋来，倒有一种农村气息，官员们就连忙对我谈起拆除陈旧小木屋的计划来。看来，石头好象就是现代建筑的一种标志，而木头房屋则被认为是不发达的一种可耻的迹象。小木屋同自称为社会主义先锋的国家所标榜的形象是不相称的。在农村也是这样，要是我们的车子停在路边的话，农民就会出来抗议我们拍照或者抄下我们汽车的牌照号码。外交部对于要到农村去的要求，不管你要去多长时间，总是留难和拖延。三年里，我一直要求许可我到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去住上几天，以便对农村生活获得一个全面印象。我提出在收获季节让我去，因为我认为那将是活动的高峰，因此也是最讨人喜欢的时间，尽管我也愿意接受他们选择的任何季节和任何农场。当新荒地取得了创记录的粮食丰收时，我要求到那儿去，但是，外交部一

位官员对我说，那儿的人们太忙了，他还说，“那儿的人们不喜欢你所写的关于亚美尼亚的文章。”（在几篇关于亚美尼亚的文章里，有一篇我写到了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情绪，这触犯了莫斯科当局。）我说，我听到在新荒地竟有《纽约时报》的读者，实在有点惊奇，但是，这句讽刺话也未能触动他。

同其他的外国人一样，我偶尔也在有人陪伴的情况下，到一些样板农庄匆匆地参观一下。我通常是到摩尔达维亚或乌兹别克那种南方地区，那儿的气候和土壤不仅使庄稼比俄罗斯中部出产得多，而且使一般生活也好过些。在中亚细亚贫瘠的大平原上，那个引人注目的垦荒计划给我印象极为深刻，这一计划从半干旱的沙漠拿到了成千上万畝的土地，而且现在棉花获得了创纪录的收成。一位工程师描绘了他们怎样修建成一条七十码宽的灌溉运河的情况。这真是工程上的一项伟绩，河水贯穿如灰尘般干燥的大地，使人们和庄稼都获得了生气。农庄主席滔滔不绝地大谈其堂而皇之的统计数字，使人难以置信地把农民讲得比政府的高级官员或大科学家还要富有。我同其他一些记者被领到刚粉刷好的屋子里去，主人是一位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或是同样不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专家，他在热情地回忆前几次外国代表团访问他这个无懈可击的家庭时，无意中露出了马脚，原来他这个家就是象博物馆

一样陈列给人看的，有镶花边的窗帘，塞得过多的家具，在角落里的小桌上有一架大型电视机。我偶尔也会碰上一些普通人，但是，因为在一起的有许多官方旁观者和多管闲事者，不可能进行有关日常生活的真实的谈话。人们总是这么说："生活很好。我们样样都有。"

有一次，在亚美尼亚，一位集体农庄主席对《华盛顿邮报》的鲍勃·凯泽和我说，一个普通的田间劳动者，全年平均每月收入是三百五十到四百五十卢布，同时还讲了与苏联所公布的统计数字太不相符的其他一些数字，因此，我们干脆就不作记录了。但是，他还是低声地继续讲下去。我们向他的家走去时，正好有些什么事情需要他去料理，我就趁此机会单独溜开一下，去同一个农业工人谈谈，他告诉我说，他在收获季节，每月可收入一百五十卢布，平时还要少些，因此，要是没有自留地，他就无法使收支平衡了。但是，在我们进入细谈之前，那个主席急急忙忙赶上来了，就此中断了谈话，他把我领进他的家，招待我们吃了丰盛的一餐，再加上他家自制的烈性"葡萄伏特加"，频频为苏美关系干杯。我们从来没能去农场参观，未能看看在劳动的人们，同他们谈一下。这是一种经常重复的做法——打断谈话，强行劝酒，紧跟不舍的陪同参观，没有自由交往的时间。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在提高农村生活水平方面已经做了好些工作，如提高政府收购谷物的价格，降低向国家义务缴纳谷物的限额，增加集体农庄庄员的基本工资，但仍然低于国家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每月一百八十七美元）。1974年11月，政府实行了一项计划，作为援助最困难的家庭的一种抗贫措施，对那些每年每人收入低于八百美元的家庭，按月发给十五美元的儿童生活津贴。报纸的文章指出，在一千二百五十万领受津贴者中，大都是农村的大家庭。

近年来，农民自由市场食品价格飞涨，也有利于集体农民，特别是有利于那些生产最能赚钱的商品作物的农民。诚然，他们突然涌进莫斯科销售产品，然后冲进商店大肆抢购可以囤积起来的肉类、香肠和衣着，确实使城市居民为之眼红。我听到城里人抱怨说，他们那些乡下表亲景况较好，因为即使工资低，钱在乡下更值钱，而且他们可以生产自己的食物。一位化学家对我谈到了一件使他惊奇的事。有一天，他让一个过路农民顺便搭乘他的汽车，发现那个人在银行里存有三千卢布的存款（但是没有汽车）。有些材料表明乡村地区的平均存款，实际上可能高于城市。这反映出农村里能买到的东西是多么少。

尽管最近有了一些改善，农村里的俄国人仍然是二等公民。农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最明显的标志

是，大量农民离开了他们的土地涌进了城市（从1959年至1970年有二千一百万人）。象人口统计学家维克多·佩列维坚采夫这样受人尊敬的学者，偶尔也坦率承认"农村的日常生活极端落后"。几十年来，最大的耻辱是：其他公民都拥有的身分证，政府一直拒不发给集体农庄庄员。从法律意义上说来，农民没有这种身分证，就几乎象过去的农奴那样被束缚于土地上。很多人为此而感到忿懑。然而，很多人却想方设法来解决这一问题，特别是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其他地方去，到了十六岁时就在那儿登记，获得第一张身分证，因此，政府最后不得不在1975年同意给农民发身分证。但是，还得慢慢来。这项工作要到1981年底才会完成。

按照衡量生活标准的任何尺度来看——收入，学校，社交生活，福利，保健，消费品，娱乐场所，交通运输——农村人民都比城市居民来得差。成百万的人都生活在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贫困线上，或者还在贫困线以下，这从政府默认了给新生婴孩以补助的计划便可见一斑。我从苏联报纸上所了解到的一鳞半爪的消息，感觉到俄国农村同美国若干贫困的农村地区一样，都存在着使人沮丧又得靠自已解决的种种情况，诸如，社会不良现象，条件差的学校，与外界隔绝，恶劣的工作条件，低工资，灰心丧气，有限的余暇和慢性酒精中毒。这些情况就使得俄国农村贫困成为一个

世代相传的难以解决的核心问题，因为最能干、最强壮的青年人都到城市去了，只剩下能力差的和年老的来从事农业。

农村的各种弊病在农民的一生中很早就反映出来了，然而迟迟还未消除。农村养老金平均每月为二十卢布(二十六点六七美元)，是国家平均养老金的一半。农村儿童进入托儿所或幼儿园的机会只有城市工人子女的一半。对童工也没有什么保护。而他们的学校格外差，报上反复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受过教育的城里人千方百计地逃避当乡村教师的差使。

"乡村学校里出来的儿童并不笨，"莫斯科一位有经验的中学文学教师娜嘉对我说。"但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我们给孩子的教育是无法比较的。没有教给他们什么东西。他们的一个十年级生只好进我们这儿的七年级。在文学课上，他们时常自己甚至连书也不读。他们只是听老师念和做课本上的习题。"而社会学的调查表明，他们上大学的机会要比城市学生少得多，尽管她并没有这样说。

谈到农业机械化问题，苏联的电影和电视新闻似乎总是展现出第一流的崭新拖拉机或康拜因收割机，以整齐的队形行进在阳光灿烂、微风拂动的麦田上或是几何图形般整齐划一的棉田上。在拖拉机驾驶室里，坐着一个典型的故事片主角，在一边颧骨上还小心的

抹上一点泥污，往往是一个头发上蒙着一块印花大手帕的妇女，下巴显得意志坚定，眼睛看着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指标，嘴里说，“经过这样的坏天气后，党所要求的就不可能完成了，不过，瓦夏，我们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义务，为了祖国，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别发愁，我们总会设法完成的。”

但是，当我随便驾车经过农村时，我常常大吃一惊：十分沉重累人的农活，竟仍然是用手工操作的。不错，机械化、灌溉、工业化耕作技术正在扩大。然而，由于一再看到的情况，在我心眼中总是有着一种无法抹掉的形象：穿着厚棉衣和靴子的妇女，弯着身子在黄褐色的田地里干活，挖土豆或是把一棵棵包心菜搬上平板拖车。在这种场面，唯一的机械化就是拖拉机给平板拖车挂上了钩后把产品拉走。或是我还记得在中亚细亚看到一些十二岁或更小的儿童，在一排排的棉花中，拖着帆布袋，用手采摘康拜因没有摘掉的棉球——约占作物的三分之一。

这些目击的印象，不仅为秋季号召城里人到农村支援收获土豆和其他作物的运动所证实，而且也为报纸上定时出现的怨言所证实。有件事我印象很深，不能忘怀。1975 年，在土库曼，有几位母亲对《真理报》申诉说，为了让孩子们去帮忙采摘棉花，竟把学校停办了三个月。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母亲们很想知道此中缘

故。《真理报》显然很想把农场设备管理部门——向来是苏联农业的最讨厌的部门——痛骂一番，坦率地答复说，这是因为土库曼的农业机械有五分之一都给送去修理了。更使我惊奇的是经济学家基里钦科在他的出版物中公开承认，1970年，在社会主义化的农业部分中，仍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作是手工操作的——俄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仍然有美国的四至五倍之多，这显然是最大的原因。

实行机械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实际上，是由于最能搞现代化机械化的人，即青年人，都在逐渐离开农村。那些农庄主席为了堵住这种人群的大量外流，都把最好的机械操作的工作留给青年人，并给他们高工资。确实有些青年人留下来了，因为在妇女们正挖着土豆的那些田地里，我看到那个孤零零的拖拉机手总是个男人，而且经常是一个青年人。"一个拖拉机手，在四月到十月的农忙季节里，"国营农场会计根纳季告诉我说，"每月可以挣到二百五十卢布之多，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没有休息天。在其他的月份里，挣八十到一百卢布。"

然而，就青年人说来，工资并不是使他们流入城市的最主要的原因。而是因为无聊，因为农村生活的空虚，就象《烟草路》[1] 中所描写的那样。在农村，娱乐往

[1] 《烟草路》，美国作家欧斯金·考德威尔的作品，描写美国农村的贫困情况。——译者

往不过是坐在那围着菜园使之与世隔绝的绿色篱笆外面的板凳上，瞅着偶尔驶过的卡车或汽车而已。对于拥有一亿辆私人汽车的美国人（其中有很多人可搭乘卡车或农家的破旧汽车)来说，很难理解俄国农村那种与世隔绝的意味。据根纳季说，一个有着三、四千人的国营农场，光就同外界进行通话联系而论，可能只有六架电话——装在主要办公室里或是那些头头的家里。路边小屋里也许不会有电话。（1970年，苏联有一千一百万架电话机，美国则有一亿二千万架。）根纳季说，要是晚上有人生急病，就必须找到某个农场官员，让他打开办公室，再打电话叫救护车，而且电话网又不总是可靠的，救护车得好几个小时才能开到。

旅行可说是最令人头痛的事。冬天，人们被风雪围困在家里。春天，那种咖啡色的泥浆，足以使大卡车陷到车轴，因此除了几条大路外，人们只好停止活动。一些偏僻的村庄则要同外界隔绝几个星期。孩子们不能到农村的地区学校上学。即使是好天气，旅行也是一种累赘。我驱车经过农村时，一直看到许多人在公共汽车棚候车，或是单独在旷野里行走，他们很想招呼我们停一停让他们搭便车。当我们让他们搭乘后，他们便谈到等车时间之长和公共汽车服务的不正常。一个被流放到塔鲁萨——离莫斯科约九十哩——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金兹伯格对我说，实际上那儿列入行车时刻

表的公共汽车只有一半在行驶，而且即使他刚好乘上车的话，至少也得花三个小时才能把孩子带到莫斯科去看病(因为他那地区的一位儿科医生外出了)。住在莫斯科的另外一家人说，要到一百五十哩以外的地方去看一下乡村朋友，就得一大早起身，一整天呆在公共汽车上，能在吃晚饭时到达那儿就很高兴了。

看来正是这种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居民所特有的外省僻乡感觉，起着比什么都大的作用，驱使着青年人离开农村。我记起了一个秋天的星期日下午，在苏联格鲁吉亚的帕萨纳乌里，离第比利斯约六十哩的一个小城镇里的情况。时间在高加索的这一山城里过得又长又沉闷，就象在美国的阿巴拉契亚一样。村里一些老年人都聚集在大路上准备参加一次葬礼，三三两两的在闲谈。一个男孩跳跳蹦蹦的从这家跑到那家，把他抓到的狐狸给邻居看。接送旅游者到山区去的国际旅行社的招待所前，有一头母牛爬上了门前的台阶，服务员不得不三次把它赶走。在旁边一个街区，围着黑披巾的妇女在路边摊头上挑选几块亚麻布，其他一些人则在百货店里观看一批新到的、有凹痕的铝锅。

在一座石头房子边上，我同一个方下颚的格鲁吉亚青年工人交谈起来，他已经离开该城到第比利斯去了，尽管他这一去就少挣了钱。确实，他说，他当一个工厂工人只赚一百三十五美元一个月，而他的父亲在

帕萨纳乌里当木匠和打零活——有的是公活，有的是私活——却比他多挣一倍。确实，他说，帕萨纳乌里村那种坚实的石头房子比第比利斯的国家造的公寓更宽敞，尽管还缺少卫生设备。确实，这儿是阳光充足的格鲁吉亚，当果园和葡萄园为酿造格鲁吉亚酒和白兰地的水果和葡萄丰收的时候，有些农民也能挣得足以买一辆汽车的钱。但是，在工厂里，他快活地说道，你用机器来干活；而在这儿，却是手工劳动。第比利斯有餐馆，有姑娘，也有事可干。它是现代化的。

“在这儿没有什么事可干，没有地方可以消遣，”他阴郁地说。然后抬头凝视着光秃秃的树木和山谷两边阳光闪耀下的连绵山峦，又补充说：“这里没有电影院。什么也没有。除了打猎和喝酒以外，没别的好干。”

这是我到处都可以听到的故事。根纳季，这个受过教育的、三十岁刚出头一点的人，感到呆在列宁格勒附近的国营农场的村庄里会使他发疯。“在一个国营农场上，看来看去都是泥巴和无法行走的路，整天得穿着靴子跑来跑去，”他叹息道，“真使人厌烦。厌烦之至！而这还是一个离开列宁格勒只有两小时路程的农场。这儿有个俱乐部，是幢木头房子，又潮又冷，放映的是你已看过三四次的老影片。象他们所说的，人人都喝醉了。青年人想到列宁格勒去看电影，不是穿着靴子而是穿着皮鞋在城里逛！就是为了使你觉得自己不

是牲畜而是人。要是你是在城里，你就是人了。”

在这种情绪笼罩下，农村的外流人数竟不是很大，这倒是很出乎意外的。这不仅反映出行政上的限制，而且反映了俄国农民的保守主义和他们已扎根于农村这一事实。当代“乡村学派”宣扬农民那种长期受苦的道德品质，并鼓吹农民的艰苦精神。这个学派的一些大作家如费奥多尔·阿勃拉莫夫和鲍里斯·莫扎耶夫写道，很多人想脱离土地，因此大地变得荒芜了。看来也就是说，农民已不再依恋公有土地了。党的官员们不很文雅地粗声叫嚷说，田间农业劳动者在集体土地上劳动得很差，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偷偷地溜去耕作自留地。

党对苏联农业上各种长期性问题所作出的反应，是对农业进行大量的投资（在1971—1975年间，约有一千五百亿美元），特别是对那些促进大规模农业工业化的宏伟计划进行投资。在某些方面说来，增加使用化学肥料和现代化灌溉技术正在收到效果。棉花产量已经达到指标，而且，即使在年成不好，莫斯科不得不向美国购买粮食时，粮食收获也比赫鲁晓夫时期多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吨。勃列日涅夫在七十年代中期的新政策，是要促进建立集体农庄的联合经营，把建筑、畜牧和其他任务都放在一种联合的工业

化基础上。勃列日涅夫的第二个政策，类似于赫鲁晓夫的开垦新荒地计划，是宣布一个三百五十亿卢布（近四百八十亿美元）的计划，促使长期被疏忽的俄罗斯中部，即非黑土地区的农田重新恢复活力。一位记者对我说，这是政治局里亲俄罗斯的一派，包括俄罗斯共和国总理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和农业部长季米特里·波利扬斯基所推行的政策。从长远来看，这两个计划似乎不仅是要使农业工业化，而且还要减少自留地的作用。

有一小帮自由主义者和主张经济合理化的人在大都没有受到国外注意的情况下，正在根据六十年代中期的工业改革办法，试图以相反的方针进行工作。他们企图把自留地的物质刺激原则用在集体农庄上，以分散农业，重新使农民从属于土地。“穿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一个改革者私下对我说的话。

这种设想是要把大面积国营或集体土地交给农业“小组”——由六至十二个有资格的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他们的工资完全视土地的收成而定。按照这种出现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想法，小组有权控制机器和土地，因此，它不仅对土地的耕种，也对机器的维修负有责任——这是苏联农业制度上长久不得解决的一个头痛问题，也一直是造成收成不好的一种严重因素。事实上，

每个小组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合作企业。理论是简单的：如果工资是视收成而定，劳动力又是以很小的小组为单位组织起来的，每个人就能象对自留地那样看到生产得好的益处。

这种设想和现行制度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在正常情况下，集体农庄的庄员都在一大块土地上流动操作，今天在这块地上干这种活，明天又在另一块地上干另一种活，没有责任感，同他们的劳动果实也没有什么直接的依赖关系。有人对我说，一个拖拉机手是按照他犁地的面积计算工资的，因此，他只好犁得快犁得浅，以便多犁一些土地，虽然要获得最好的收成，必须对土地犁得慢，犁得又仔细又深。除草也和其他一些活儿一样。小组据说就是要同这种完成计划的思想作斗争。

这种制度的一个著名标兵是弗拉基米尔·佩维茨基，一个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他在一次试验中表明，他那个十人小组在一块地上劳动所得到的收成，通常可以抵得上八十个人在不同时间劳动所得的收成的三倍。他的小组在犁地，种植，除草，收割和保护土地方面都比一般工人搞得好。他们逐渐觉得这些土地是“他们的土地”了。这是亚历山大·亚诺夫告诉我的，此人原来是个苏联记者，因为他在所发表的文章里对改良主义鼓吹得过了头，被秘密警察强逼

移居国外。我在 1974 年 12 月，即在亚诺夫离开莫斯科两天后，在纽约碰到了他。这种小组计划曾在六十年代中期得到过充分支持，好些农庄象征性地搞了一些——每一个很大的农庄里都有一两个小组——尽管它受到了农庄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人双方的反对，照亚诺夫的看法，他们觉得如果这些小小的小组结果竟是很有效的话，那么，他们自己就要变成多余的了。这就暴露了大多数国营和集体农庄是大大的人浮于事了。后来，政治局里的这种小组计划的创议人根纳季·沃罗诺夫逐渐失势，保守派便取消了这种小组的试验。

不过，亚诺夫却对我讲了另外一个异常有毅力而且大胆的改革者的情况，他在七十年代初重新作了一次尝试，以更大的规模推广了本来就具有利润动机的这种小组制度。这个人就是伊凡·胡坚柯，一个身体结实、面孔红通通的、直言不讳的老共产党人，他为了要进行他这种激进的试验，在六十年代辞去了他在哈萨克共和国的高级农业官员的职务。据亚诺夫说，赫鲁晓夫在 1964 年 10 月被推翻的时候，曾一度不太认真地考虑过采用胡坚柯的某些设想来改良苏联农业。由于胡坚柯所作的努力外界知道的很少，因此亚诺夫在纽约提到他的种种努力时，对我说来，还是一桩新闻。

胡坚柯是亚诺夫所崇拜的偶像，是苏联进行改革

的一个模范。“我们认为这种小组制度，特别是胡坚柯对这种小组制度的做法，将使俄国的农业得救，”亚诺夫热心地说，亚诺夫本人给苏联报章杂志写过很多关于农业和其他经济题材的文章。“我们认为它会完全改变俄国的面貌。”

胡坚柯在一个集体农庄上作了一次失败的试验后，他说服了一位国营农场场长，让他使用哈萨克的阿克西附近大平原上一大片地处边缘、未经开垦的农田。他想试验一下，要是按照这种小组的原则经营生产的话，一个以农业专家构成的人数有限的小组是否会比普通的国营农场工人显示出更大的生产力。胡坚柯为了要建设他们自己的家园，从他原来的国营农场借来了拖拉机和原料之后，便和他那六十名精选的专家在1972年——即俄国人的农业受灾年——进行了他们的试验。

“胡坚柯的想法是，有了这种更大的规模的小组制度，他就可以同美国和西欧那些最好的农场企业争个短长。他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他还用试验证实了这一点，”亚诺夫对我说。“不幸的是，这一试验只进行了一造便告结束，因为情况已经摆明，如果胡坚柯是正确的，那么，整个农业方面的领导人员就是错的了。这个试验是一次成功。它说明了这个农场的劳动生产力高出邻近一些农场二十倍。哈萨克人是那么高兴，以致

当地的一位记者为胡坚柯写了一出戏。这出戏在1973年1月7日给一批经过选择的观众进行了一次最后的'预演检查'。"出席预演的不仅有审查人员，还有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记者和经济学家。

"第二天，胡坚柯就被捕了，而且被控为企图盗窃国家一千卢布，"亚诺夫激愤地回忆说，"这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莫斯科那些执掌农业权力的人都反对这种试验。"

看来胡坚柯落入了官场所布置的一个阴谋陷害的圈套。关闭胡坚柯在阿克西的农场的命令，是由阿拉木图的农业部长签署的，但是，胡坚柯声称这是一种不符合手续的做法，因为采取这种行动必须由部长会议全体作出决定，因此，他到法院去申诉，要求补发他和他的六十名工作人员十一个月工资。哈萨克的一个地方法院支持了他的诉讼——事实上，这是超越该院的权力的——然而，胡坚柯并不了解这一点。亚诺夫说，等到他按照法院的决定到银行去领款的时候，他被控企图以欺诈手段获得国家资金而被捕了。

据亚诺夫说，在胡坚柯一案背后存在着高级的幕后干涉活动，直到最后一刻还被认为是倾向于他的那个法官，却对他和他的两个最得力的助手作出了不利于他们的判决。胡坚柯被判六年监禁。虽然莫斯科一些重要学院的经济学家和学者都同情胡坚柯的种种

努力，虽然一些象亚诺夫这样的朋友曾设法聚集力量来支持他，但是并没有能够为他进行什么辩护。领导集团拒绝了他的做法——这种做法倒是可以使苏联农业建立在一个更为灵活的实用主义基础上的——并且决定推行更为集中的、工业化的计划以提高苏联农业。胡坚柯在1974年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二岁。

九 工业生活

马上就会有了

只要老板们装着他们是在付给我们还不错的工资，我们也就装着是在干活。

苏联工人的谚语，七十年代

“一个月里，每一旬的劳动速度都是不一样的，”拉希德说道，他是乌兹别克某个工厂的工段长，身体结实，脸色好看，他在对我解释塔什干拖拉机零件厂的劳动情况。“你可知道——‘斯普雅契卡’、‘戈里雅契卡’和‘里霍拉德卡’[①]这些字眼的意思吗？”

从字面上讲，我知道它们的意思有点象冬眠，发热和狂热，但是，我并没有立即把它们同他的工厂联系起来，所以，我摇摇头。拉希德笑我无知，用他那只长了茧的手擦擦自己的面颊。

“这些是我们给三个‘十天’——即每个月的上中

① 这三个词儿即俄语“冬眠”、“热病”、“发疟子或狂热病”的发音。——译者

下三旬所起的代号，”他说，“上旬是睡大觉的时候，中旬是大干的时候，下旬就象发疟子似地蛮干了。”他停一停，让我领会他的意思后，又继续说下去。“劳动的速度也取决于哪一天发工资。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每个月有两次发工资的日子：一次是在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间，另一次是下个月初的头几天里。在发工资的前两三天，就有一种节日前的感觉，谁都没有心思劳动。两三天后，人们“实际上喝得烂醉了，不得不再喝点儿来解除宿醉。”

这就是另外一些人一再讲过的故事，尽管说法有所不同，内容上有所增删；其中也包括约瑟夫在内，他是俄罗斯南部某大城市一个瘦长个子的中年工程师，他在谈他所在的工厂时，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听了他对苏联一些制造空气调节器和冷冻设备工厂的描绘，就象是透过一面苏联的镜子，发现了苏联工业的内幕；而这一内幕看来简直是对西方所想象的控制经济的一种歪曲，西方倒设想这种经济是通过垄断性的协调一致和铁的纪律而发挥作用的。

“突击”就是拉希德和约瑟夫所描绘的情况。由于这是苏联制度所常有而重要的做法，所以，俄国人创造了一个很妙的词儿，叫做“突击”，以说明应急计划这种全国性的现象，以及大大小小的、民用的、军用的工厂那种极其反常的工作节奏。突击完成月度、季度或者年

度计划，使每个月的生产搞得乱糟糟的：月初松散疲塌，月底紧张如狂。

“一般情况是，一个企业经过上个月月底的突击后，在月初实际上就处于瘫痪状态了，”约瑟夫解释说。根据他的说法，劳动力之所以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不仅是因为酗酒，而且是因为有许多熟练工人在突击运动期中，被迫进行长时间的加班加点劳动。他说：“有许多人在突击期间，不得不一天做两班，他们连星期六和星期日——他们的正常休息日——也全天劳动。管理部门无权〔发给他们加班加点的工资〕，因为工厂的工资单上有最高限度，而且财政检查机关还要核查。有时候实在急需一个工人加班的话，那么可以让他得到一倍半或两倍的调休时间，作为补偿他的超额工时。但是，不管工人们是否休息了，工人们都得参加那些额外的工作（这些工作日都被普遍称为“黑色的星期六”），却没有额外的工资。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每月月初总有很多工人休息，企业就处于瘫痪状态。”

“工厂不管怎样都不能以正常能力开工，因为他们没有开工生产所需的大量的原料和部件，”约瑟夫继续说道。“尽管有了计划，而且表面上也有一定的交货期限，但是，供货部门并不完成计划或按期交货。因此，制造工厂不能有节奏地进行生产。通常总是要到每个月的十日或十二日以后才能得到足够的零部件。有些项

目几乎可以全部装配好，但是，却缺少某些零件。有许多产品项目不能装运出去，只好堆积在仓库里。因为零件还没有来或是还少了某些部件，一直要堆放到那个月的二十日。最后就是下旬(二十日到三十日)了。要是所需的每样东西确实能在二十日到手，那么这个月就是个上上大吉的月份了。及至每样东西最后都到了手，就可以开始对计划进行突击了。许多工段的工作就可以立即同时开始。”

约瑟夫实事求是地谈了这种情况，讲明了这就是苏联工业的正常情况，而并不是他所劳动的工厂或是一年里的某一个季节里的特有的反常现象，尽管到了十二月即年底的时候，总是比其他的月份还要差劲。

“在别的国家，生产总是整个月正常地进行下去，”约瑟夫说，“但是，在这儿，只有在十五日或二十日，在所有的原料都到齐了，才好开始生产。因此，工厂必须在最后的十到十五天里完成计划(定额)的百分之八十。这时，谁都不管质量问题。数量是主要的东西。有些工人被派去完成那些部分已装配好而堆放在仓库里的项目。有些产品也不是在厂房内完成，而经常是在露天里完成的。水、污物和灰尘会落进设备里，这当然就降低了它的质量，缩短了使用期限。

“人人都了解这些情况，因为每个人都劳动，”约瑟夫说，“因此，通常的情况是，每当有人要买一样家用

器具时，他总想买一样在出厂证上写着它是在十五日以前而不是十五日以后生产的〔苏联商品都贴有生产日期标签〕。如果产品是在十五日以前生产的，那显然不是匆忙赶出来的，顾客就会认为‘它也许还能行。’如果它是十五日以后生产的，那就有可能很快就坏了。”

同我交谈的其他俄国人都比约瑟夫更能适应环境，因为约瑟夫是个技术人员，他所持的标准比大多数人要高。大多数人认为，买一件不超过二十日生产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太大的危险。但是，一个中年的莫斯科妇女所提出而且得到其他的人附和的坦率忠告却是：不管什么东西，“如果是二十日以后的产品，就别去买它。”

她的丈夫点头表示赞同，并且以俄国人那种典型的苦中取乐的幽默感开始讲述他最喜爱的关于突击的笑话。那是一则关于一个不幸的苏联工人的故事，这个工人死后，发现他在一个炼狱里碰到了一位官员，后者以苏联官僚那种做作的、恩赐的态度对他说：“按照你的道德品质，你是不许进入天堂的。你的证件还不够被接纳入天堂的条件。你只能进入地狱。我的责任是提醒你，地狱有两种——资本主义地狱和社会主义地狱。你可以选择一种。”

那个工人问了这两种有什么不同之处。

“在资本主义地狱里，他们整个月里每天都把一枚钉子钉进你的屁股，”那个官员简短地说。

“那么，社会主义地狱也是这样吗？”

“社会主义地狱就不同了，同志，”那人说，“在那里，魔鬼们喝得烂醉，那里长期缺少钉子。”

“唔，既然这样，我就选社会主义地狱罢，”新来的人高兴地说。

“好吧，这是你自己选的，”那官员说，“但是，我有责任提醒你，他们还是会在每个月的最后五天把三十枚钉子全钉进你的屁股。”

这种对苏联经济情况不礼貌的看法，可以说多少看透了俄国的现实。正是这一现实促使陀斯妥也夫斯基把他的故国描绘成为一种宏伟的、普遍的和有组织的混沌状态。然而，这同西方的访问者在官方向导陪同下参观经过布置整齐的苏联工业设施所见到的景象，同通过电视实况转播苏联联盟号宇宙飞船与美国阿波罗号在外层空间对接而表现出来的技术力量所得到的形象，或者同从克里姆林宫不断对世界人民吹嘘它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宣传所得到的印象，都大不相同。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计划”作为科学地管理人力和资源的关键，作为取得最大经济增长和日益提高生产率的正确无误的手段，作为保证世界第二个最

强大的经济制度发挥大协作作用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办法。“计划”可以说是该国的基本法。“完成计划”是苏联生活中最经常使用的符咒之一。在公开场合，以迹近神秘的尊敬对待“计划”，仿佛“计划”具有可以把凡人的努力提到更高水平、消除人类弱点的超人能力。

正是这种五年计划——斯大林在1928年为了加速工业化的步伐而提出的——得到苏联官方的赞颂，认为它使苏联生产从1913年到1973年增加了五十倍，是建成苏联经济的主要支柱。莫斯科确实在六十年里把一个虽属新兴然而落后的大陆，变成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它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站网，开发了西伯利亚地下无法估量的矿藏，生产了原子破冰船、空间站和机械操纵的月球探索器，并且在诸如钢铁、水泥和石油等这些衡量工业力量的基本产品的产量上超过了美国。

但是，这种“计划”，正如国内某些批评者用他们伊索寓言般的语言所指出的，也并不见得就保证了经济象时钟般地正确运行。在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的同时，它也产生了死板、浪费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苏维埃制度看来与其说是一种计划经济，倒不如说是一种集中于主要目标的体制，使克里姆林宫能按此决定轻重缓急，并动员群众努力完成。(同大多数其他西方人士一样，我原来一直没有觉察到苏联领导

集团在发动人民参加劳动方面竟如此成功，因而在1970年，苏联的劳动力竟达一亿二千二百万之多，而美国只有八千五百万，包括失业者在内）。通过“计划”的作用，苏联领袖们已对重工业、军火生产和科学研究投入大量资金，特别是在斯大林时代经济激剧上升的时候，他们主要是以苏联消费者的重大牺牲来为这些工业提供资金的。

某一西方专家评论说，斯大林“给他的继承者既留下了一个工业大国，也留下了一种效率低的经济。”斯大林所奉为至宝的集中统一的计划，也许更适合于迅速地大力建设经济的时代，而不适合于目前苏联经济正面临着更为尖端的现代化的问题的时代。苏联的增长率在七十年代慢下来了，然而，西方专家们仍然认为，从1968年到1974年，苏联经济比美国经济增长平均要快一倍。① 由于实行经济统制和中央统一规定价格，使俄国人得以避免那种震荡着西方经济的螺旋形的经济盛衰以及两位数通货膨胀。诸如环境保护和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是否明智等问题的严肃认真的讨论，

① 中央情报局经济学家们在1975年7月估计，从1968至1974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从五千五百五十亿美元上升到七千二百二十亿美元，而美国则从一万零九十亿美元上升到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亿美元，相比起来，苏联经济年增长率近百分之四点七，而美国约为百分之二点四。在1968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刚好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1974年，由于美国经济衰退，国民生产总值下降，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就达美国的百分之五十六。以上数字均按1973年的美元计算。

目前正使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茫然不知所措，而苏联官员们上自勃列日涅夫下至农村党组织书记，却大都不受其干扰，他们以不亚于十九世纪的那种(马克思曾经热情地表达过的)对产量的绝对魔力的迷恋劲儿，滔滔不绝地大谈生产的统计数字和计划指标。他们自豪地指出，他们觉得只有借助于“计划”的令人敬畏的能力，把巨大资源集中用于国家最主要的重点项目，才有可能在工业上实行大规模的联合经营。

卡马河卡车厂是苏联的典型的突击项目，也是1971—1975年五年计划的陈列品。我也看到过苏联其他一些设施，如布拉茨克大水坝，它在现代技术上可与西方的设备相媲美。我遇到过一些西方商人，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里加和列宁格勒的电子工厂，也碰到过美国一些飞机专家大谈生产图-144超音速运输机的沃罗涅什飞机工厂里苏联工程师正在使用钛一类的现代金属的情况。但是，这些都不能同卡马河卡车厂相匹敌，该厂是苏联计划人员追求巨型工程的样板，是苏联认为越大越好，以及苏联决心不惜任何代价造出最大的东西来的一种象征。

卡马就是那种能够吸引俄国人的宏大突击项目。它体现了从无到有形成并通过五年的拚命突击而成为现实的工业力量。它迸发出了强大的力量。1971年，苏联的建筑队伍在莫斯科以东约六百哩的狂风呼啸的

空旷平原上，自手起家地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卡车厂。到了 1973 年我到达那儿时，原来是一片空旷的黑麦田，附近有个沉睡似的农村，一些久经风雨的农舍，如今已经变成一个迅速发展的、有九万人口的热闹城市了。地面上耸立着为建设工人而构筑的幢幢相连的多层公寓。已经向美国、西德、日本、法国和别的国家订购了价值近七亿美元的、最现代化的工业机器，而且正在激励建筑工人，要在冬季以前将厂房的构架搭好，以便安装设备。

我们这群记者们乘了几小时的公共汽车，越过深及脚踝的泥浆(在七月里！)，驶过一哩又一哩的管道、有棚的传送带和巨大的厂房骨架。这项工程之宏大着实令人吃惊。苏联工程师对我们说，卡马并不是只有一个厂，而是有六个，全都是大型的：一个铸造厂，一个锻压厂，一个车身厂，一个引擎厂，一个仪表和修理厂和一个装配厂，它们由一百七十五哩长的、以计算机控制的传送带和装配线连接起来。这个生产联合企业花了几十亿资金，占地二十三平方哩，面积比整个曼哈顿岛还要大。卡马的最大生产能力内定为每年生产十五万辆重型卡车和二十五万台柴油机，这使底特律或德国的鲁尔相形见绌。

作为国家五年计划的首要项目，卡马拥有大大超过苏联的普通工业的有利条件。然而，尽管它有各种

高一级的优先权，它仍然被纠缠着苏联经济的一些长期性问题所折磨，而这些问题是计划无法解决的。1969年，花在卡马及其卫星城的资金估计约达二十二亿美元；到了197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五十亿美元，这不仅表明西方机器的价格提高了，也表明国内的工业品价格飞涨了。尽管有了五年计划的最后期限和克里姆林宫的关怀，建设的进程还是脱期很多。我在卡马的时候，巨大的横幅上写着："让我们在1974年〔向祖国〕交付第一辆卡马汽车。"然而，到了1975年秋天，卡马的汽车还没有生产出来。

总之，我觉得难以理解，干吗要这样赶？要么是作为激发民族热情及提高苏联威信的一种办法。苏联计划人员的解释是，需要以卡马的卡车来解决国家交通运输方面的困难。但是，苏联的公路网（更别提汽车修理网），无论如何也负担不了一支庞大的、重型卡车的新车队。苏联的公路网只有美国公路网的四分之一，而且其中有百分之六十是泥土路或砂砾路，不能通行重型卡车。另外，我不禁要问苏联是否有很多顾客准备有效地使用卡马的卡车？因为在莫斯科周围，最阻碍交通的就是那成群结队的卡车，冒出阵阵的黑烟，闯进了交通线，但是，车子却空着。俄国人和外国人都同样习惯于对着空卡车暗暗发笑。这种麻木不仁地浪费卡车运载量的情况使人们从卡马所制订的野心勃勃

的生产指标回想起另一次拚命的竞赛：竟要使布拉茨克大水坝赶在1961年投入生产，尽管它的最主要的主顾布拉茨克铝制品厂再过十年也建不好。布拉茨克是计划上的一项大错误，甚至有些苏联经济学家也提出过批评。

尽管这样，计划指标在卡马还是有它自己的铁一般的逻辑。尽管有所延误，俄国人还是声称——西方一些工业家也承认——他们在建造这项巨大的设施上，比任何国家都造得快。然而，为了赶上计划所硬性规定的期限，仓促从事也造成了浪费。为了在名义上抢时间，俄国人总是赶在技术计划草拟出来以前，赶在苏联外贸机构签订购买工厂和需要安装的设备的合同之前，赶在卡马卡车图样出来之前，就轻率地开始建造厂房。结果，为了能够安装设备，不得不修改一些厂房，于是，一些有待安装的昂贵的西方机器，不是被塞进了临时仓库，就是被放在外面让它生锈。

1973年，卡马的苏联头头对美国报人抱怨说，被请来设计金属铸造车间的美国斯温德尔-德雷斯勒公司因为赶不上进度，打乱了整个时间表。几个月后，斯温德尔-德雷斯勒公司一些董事私下对我说，所以停顿下来，是因为生长于保密制度下的那些苏联工程师不给美国人提供同美国机器有关的苏联设备的说明书。没有说明书就不可能拟订工程设计。他们说，另

一障碍是由于苏联和西方设备供应者在价格方面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造成了重大的延误。技术计划必须等到苏联买主打定主意以后才能开始制订。

即使工作进行得很迅速，苏联人也还是要在质量上付出代价。维克多·佩尔斯捷夫是卡马的一位脸孔渲红的富有经验的建筑工程头头，象他这样的工程师就喜欢吹嘘苏联的建筑工程队能够在一个月里建成一幢十四层楼的公寓（三百套）房子。打远处望去，那些公寓倒是挺好看的。但是，走近一看，这些房屋一旦住进了人，很快就会变得百孔千疮，一下子就会变得好象年久失修的样子，几乎所有的苏联建筑都有这种毛病。地板不平；窗户和墙壁裂缝；厨房和洗澡间的卫生设备既粗糙又安装得很糟。总之，工作质量很差劲，几乎到处都是这样。如果有一个美国记者问一个俄国人，为什么这些活儿都干得这样糟，那个俄国人就耸耸肩膀说："它不归哪一个人所有，因此，谁也不去管它。"

总之，这种机械的苏联经济计划似乎同俄国人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在世界上，俄国人素以遵守纪律著称，因为他们表面上驯顺地服从权力。但是，这是一种外界强加的纪律。如果听任他们自行其是的话，那么，一般说来，俄国人都是懒散轻松、毫无秩序、无拘无束地自得其乐、而且效率也不怎么高的人民。（耐人寻味

的是，在俄语里没有效率这个词，因此不得不从英语借用这个词儿。)莫斯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一个典型的苏联办公室——这是外国人不大会看到的——总是拥挤不堪，乱作一团，有一个搞宣传的小角落，而且不是每人都有一张桌子可用。我被领去参观的那些工厂一般倒都很整洁，然而，我一听到机器发出的可怕的噪音，看到工业上的安全标志那么少，不免使我大吃一惊。但是，苏联朋友坚称，这些都是专门布置齐整供人参观的工厂，至于那些普通的苏联工厂，简直象是“一个妓院”，不止一个人这样说过。

此外，外国人可以参观好多设施和细看机器之后仍不懂得什么是“突击”，或者仍不懂得俄国人的时间概念松弛得既令人陶醉，又令人心碎，再不然就根本没有时间概念，同西方商业社会里的时间完全是两码事。大多数旅游者听到在餐馆里点一客饭得花上一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才能吃到，不禁为之愕然。一次一小时的记者招待会，几乎要在规定时间的一小时后才开始，一开就是两个多小时；一个简短的答复可以花上四十五分钟；一次十分钟的访友总要拖长到三、四个小时；晚上一直搞到凌晨两、三点钟才睡觉，是俄国人更引人注目的缺点之一；一个星期的活儿要干三个星期；电梯坏了，要两个星期或更长一些时间才恢复正常；其他一些修理工作要花无法预计的大量时间；建设工作的时间

表在全国范围都要落后几年。俄国人因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正在失去耐心而真正感到不安，因为美国人对俄国生活中白白浪费时间和犹豫不决的做法，既失望，又十分恼火。天真的西方访问者一向认为苏联是个先进的社会，等到他一发觉苏联大多数商业基本上还处于不发达阶段时，往往大感沮丧。要过一段时间才能领会到俄语中“马上就会有了”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让“明天”拖到无限期的将来。拖延已经成了俄国人的脾气了。也许这就是所以要经常进行宣传，迫使俄国人准时完成计划的主要原因。

如果强迫俄国人劳动，他们也能够作出巨大努力，尽管如此，持久地艰苦工作却不是他们的民族特性。他们没有美国人、德国人或日本人的那种工作道德。“美国人工作卖力，长时间地干活，跑在前头，可是也有不少弊病，”这是一位苏联编辑的评论，他承认他很少竭尽全力地工作。“俄国人干得并不十分卖力，或者也不想干得十分卖力。因此我们生活得更轻松些。”一位小学教师对安说，她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她生活中最美好的一部分，“因为没有人催促我。”玛蒂克·玛顿茨，一位美籍亚美尼亚共产党人，他自愿从纽约回到苏联去居住一阵，他告诉我说，他对苏联人想象中的美国人的形象感到吃惊。“他们认为〔在美国〕每个人都很富有，”他气吁吁地说，“他们不了解人们在美国需要多么

卖力地工作。”

一位电影剧本作家暗示说，许多俄国人所以不更为卖力地工作，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一般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那位作家说，如果一个诊疗所里有一位医生以工作好、责任心强而闻名，其结果是他要治疗更多的病人，要更多地加班加点，却得不到加班加点的报酬，而那些得到提升的医生，通常总是那些会在党的会议上唱高调和拍党的官员马屁的人。俄国朋友还提醒我说，再一个原因是，苏联还不象西方社会那样是一个金钱决定一切的社会。“光有钱还不够，你还必须要有能使钱花出去的东西，”一位年轻的科学家说。“关系比钱更重要。有了关系，你就能搞到紧张商品，把钱花出去。没有关系，就不值得花力气。”

劳动时溜掉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全国性的消遣，因此，喜剧演员阿尔卡季·莱金以此为主题的几出滑稽短剧是经过审查后获准演出的。在一出戏里，他扮演一个工程师，此人整天懒洋洋的躺在一张犹如高尔夫球轻打区那么大小的床上，想起他的工作干得很少，因而要为他逃避工作寻找借口。“我跑开了是帮他们一下忙，”他嘲弄说。在另一出戏里，三个人在工作时间偷偷地溜进理发店，但是，理发师服务得很糟糕，因为理发师们自己也想溜出去。一个理发师要去买桔子，另一个想去修理一件东西，而第三个却要上牙医生那里

去。当这几个理发师都扑了空而回来时，这才发现杂货商、修理匠和牙医生就是坐在他们椅子上的三位顾客。“情况确实如此，”一个俄国人在幕间休息时对我承认说，“我妻子就是在工作时间跑出去买东西的。这是唯一的办法，因为下班后店里挤满了人，排的队伍简直吓人。每个人都这么干”。一位语言学家对我说，她的朋友们就是在工作时间溜出去拜访朋友或是看场电影的。

如果在工作时间溜出去一段时候在职员中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那么，在工人中大规模旷工就达到了一种灾难性的程度，特别在发工资日子前后，以致克里姆林宫的领导集团和苏联报纸要定期申斥一下“懒汉”和“糟糕的劳动纪律”。一家西方航空公司驻莫斯科的经理对我说，他那些苏联地勤人员极不可靠，他的西方技术负责人必须亲自检查是否有燃料，地勤服务是否准备妥当，是否为他们的进场班机准备好了防冰器和其他设备。在他们的飞机到达的日子里，技术负责人总要到苏联机械师和工人家里去找他们，以保证他们届时会来上班工作。

苏联经理要约束工厂工人使之就范，是件很麻烦的事，这不仅是因为几乎不可能解雇他们，而且因为工人一般总是缺乏的，而且一个不满的工人知道，他可以一走了事，也很容易找到另外一项工作。从理论上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总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工人不会离心离德，因为他们能够享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果实，而且苏联宣传家也力图支持这种大言不惭的说法。但是，偶尔有一些社会调查和报纸上的文章透露：仅仅在俄罗斯共和国，1973年就有二百八十万工人调换工作，仅这一事实就足以驳倒上面的说法。作为不满的理由，工人们列举了恶劣的劳动条件，缺少其他的福利，例如住房，倒没有提工资问题。

从我同少数几个工人进行的有限接触中，我感到工人和管理部门在工资和劳动定额上的摩擦，远比我所想象的多。有一个后来当了工程师的人说，他十七岁的时候，就由一位老工人教他怎样操作一台车床，当时他问这台车床是否能开得更快一些。“能，可是别说出来，”那老工人说，“要不他们下个月就会修改定额，所以我们故意放慢车速。”

苏联的工业是按照从前十九世纪那种公司城的办法进行经营管理的。苏联的工会同公司的工会一样，更有兴趣于发放少量的休养证和办理福利以及帮助控制工人，使他们规规矩矩，却不愿意就改善生活问题同管理部门进行斗争。事实上，在苏联工业方面很少出现工人为工作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事件。报纸扣压这种消息，即使西方人士会听到这种消息，那也往往是在几个月或几年之后的事了。

然而，我通过莫斯科一些朋友，碰到过几位工厂工

人，他们告诉我，怠工抗议偶尔发生在装配线上。一个结实的年青金属制造工尤里，提到发生在莫斯科附近他所在的金属浇铸厂的两个事件，但是他不愿意谈下去，因为担心这个消息会追查到他。然而，他还是给我讲了一件事，即他邻近的一个纺织厂有三个班组曾使他们的装配线停车数小时，以抗议由于采用自动针织机而提高定额、却降低工资的做法。

尤里说，苏联管理部门对付这种情况的手法是，人为地挑选一个班组作为劳动模范班，然后按照新机器弄虚作假的产量数字，给他们以大量奖金和其他特权。这种做法就成为提高其他三个班组定额的口实。其他班组发觉他们受骗后，就提出抗议。尤里说，尽管不过停车三个小时，但是，这已经严重得足以使工厂的保卫部门来进行调查了，因为它牵涉到三条不同的装配线。"要是只有两条线停车，他们就会认为这一点也没有什么不正常，因为两个班组可能发生了争论，"他解释说，"但是三条线就是一桩紧急事件了。这意味着有人组织了怠工。那是很严重的。我不知道那些组织者后来怎样了，不过，我听说那些头头只得取消前言，降低定额。"

为了要提高产量，共产党采取了各种精神引诱的办法，从给劳动模范特别奖，到开展班组之间或厂际的"社会主义竞赛"，直到成年累月地规定"社会主义义

务"。在每个重大节日前夕，全国的劳动集体都有义务超额完成劳动定额。他们庄严地保证要贯彻党的决议，要"提高思想水平"和提高产量。钢铁厂保证轧出的钢材达到定额的百分之一百一十，糖果厂宣誓在十一个月里完成全年的糖果产量，图书馆则发誓保证在三个月里将借出空前大量的列宁著作或有关列宁的书籍。

苏联宣传家们喜欢用的另一种鬼把戏就是搞响应的计划，照字面上意思，就是工人们自己提出具体计划来响应、配合或超过国家给他们制订的计划。从理论上说来，这种计划是自发地提出来的。但是，人们普遍把这套仪式看成是一种可耻的欺骗。因而工厂工人就对这种响应计划发明了他们自己的反唇相讥的黄色笑话。……

不管党是多么喜欢这种鬼把戏，工业管理部门看来还是相信多给钱就是最好的刺激。重点建设项目，特别是那些条件艰苦的如西伯利亚油田，或是金矿所付工资，往往是苏联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一百八十七美元的三倍或四倍。苏联经济交织着使人搞不清楚的一大堆奖金和完成计划定额的附加津贴，但是，据尤里这样的工人们说，基本的附加津贴很快地就被算作工人工资的固定收入部分，因而也就失去了作用。

尤里所描述的同他一起工作的工人的政治和社会态度，竟同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吸引过去的

那些美国少数民族保守派工人惊人地相似。他说，他们在工作上有一种同志爱。一个班组里，如果有人生病或者有象庆祝婚礼、生日之类的大事，便彼此相互顶替。但是，他们不喜欢那些不可救药的酒鬼和劳动模范——因为酒鬼会给别人增加额外负担，而劳动模范，尤里说，往往是党"为了政治原因"或是管理部门"为了提高定额"而挑选出来的。阶级感情都很强烈。同华莱士的选民攻击"拔尖人物"和知识分子一样，据尤里说，苏联工人们谈起知识分子来就轻蔑地叫他们为寄生虫。(他引了一句工人嘲笑知识分子的谚语："一条鱼是从头上开始烂的。") 工人们都是忠于苏维埃制度和党的，尤里肯定地说，但是，他们并不喜爱那些坐着配备有司机的黑色伏尔加轿车跑来跑去的大工厂头头。"要是发生第二次革命的话，准是首先反对那些坐黑色伏尔加的头头，"他说。但是，他连忙又补充说，"当然不会发生什么第二次革命的。"

尼古拉·波德戈尔内主席有一次庄严地称苏联的工厂厂长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特命全权代表"，而我所遇到的一个苏联妇女则说她丈夫——他在俄罗斯中部负责一个有一万二千工人的工厂——在他所管辖的范围里就象"一个王子"那样。尽管名义上他的工资是每月四百五十卢布(六百美元)，然而，通过一系列

定期的奖金，他实际上挣到这个数字的两倍。另外，他可以要求厂里给他提供免费服务，按月可以从莫斯科为权贵开设的商店里得到专门送来的免费的食品包裹。他的家庭可以分配到便宜舒服的上等房子，他们可以从邻近的国营农场里非常便宜地买到肉、蛋和其他产品。他们实际上可以免费在部长会议的宾馆里度假，而且享受到例如同克里姆林宫有直线电话等其他特权。她说，“我走过村里时，那儿的人都会讲，‘那是大头头的妻子’，他们会假惺惺地对我献殷勤和恭维我等等。”同其他一些家庭相比，她的家庭生活得象贵族一样。

然而，这位妇女却把她丈夫的工作看作是一种梦魇，并且劝告她几个儿子不要干这一行。她说，七月是“最紧张的月份”，因为她的丈夫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压低计划”上，他为降低他的工厂下一年度的指标而一直在同部里争吵。她解释说，一个工厂厂长最重要的是不要透露他的工厂的实际能力，决不要超出现定计划指标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否则，下一年的定额就会大大提高。经常使人担忧的是总工程师可能会挖厂长的墙脚，因为在苏联工厂里，总工程师向来是由上级越过厂长而任命的，因而被认为是“部里的人”。

同其他一些工厂厂长一样，她说，她丈夫经常在工资单上保留着大量的额外工人，这样，他就可以有足够的人手来完成突击计划。而且他也可以把工人借给别

的工厂，以换取他所需要的设备或其他好处，因为，如她所说，“没有哪一个干得很成功的工厂厂长是按常规办事的——你不可能那样做。”他唯一担心的大问题不仅是计划。他还必须同当地党的大头目搞好关系，那就是说要提供人力帮助他们进行收割，修筑道路和完成其他特别任务。不必管那虚报的工资单会怎样损害效率。她说，一个工厂厂长懂得，要是出了问题，那多半是因为他未能使党的统治集团高兴，而不是因为他的效率下降了。最后她透露说，她丈夫在七十年代初期丢了工作，其原因是政治而不是经济。

她认为，最经常使人头痛的问题是供应方面没完没了的斗争。盗窃是最严重的麻烦事。整车皮整车皮的原料或部件会不翼而飞，或者根本就没有运到。但是更经常的则是延误。“在家里，电话铃声整夜响个不停，”她说，“人们告诉我丈夫，‘西伯利亚的金属尚未运到，或是敖德萨的部件还没来。’没完没了。有时候，原料迟到倒是帮了工厂厂长的忙，因为他可以此作为压低计划的借口。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原料都是最急用因而可以作为借口的。要是原料是次要的话，他就必须自己设法解决。”

她所说的这方面的情况，由一位苏联记者证实了，这位记者碰巧在列宁格勒一家工厂厂长的办公室里，当时某车间主任向厂长报告说，厂里没有金属漆了，只

得暂时停工。

“经理抓起电话，给州党委工业部打电话，”那个记者告诉我。“为什么找他们？因为到了月底，对缺货的原料要进行一次总的重新分配。企业也有等级：第一等是军工工厂；第二等是重工业；第三等是轻（消费品）工业。轻工业所积累起来的一切储备原料全都被收回征用，交给重工业。厂长要他们从某轻工业工厂把金属漆搞来。但是，他已经太迟了。他们对他说，‘现在不可能给你办什么事了。别人早已把它偷走了。’情况的确象他们所说的那样——被偷走了。‘你一定要给我们厂偷些漆来，否则，我们就完不成计划了，’厂长对他们说。可是，他们说，‘我们极其乐意为你偷点来，但是，一个更重要的工厂早就把漆偷走了。你已经迟啦。你应该在两天前就告诉我们。’”

据我那位记者朋友说，那个工厂厂长由于处境困难，因此就打电话给州党委头头，希望通过私人关系，他能从邻州的一个党的头头那儿弄到漆。“党的头头们彼此都有持久的关系，”那位记者说，“今天，这个帮那个忙。明天，那个帮这个忙。他的党头头答应去搞那批原料——只是要到后天才能搞到。这就是说今明两天工人们没事可干，而且也没有完成月度计划的足够时间了。因此厂长决定让工人放一天假，但是，要他们干一个‘黑星期六’。”

长期供应不足——计划里并没有把这种情况估计进去——迫使工业部门的厂长们抄近路，采取不正当的做法，因此，从技术上说来，虽然制度上不许可这样做，但是，也只好默认了。政府报纸《消息报》有一次举出一个囤积大量金属材料以防缺货的工厂厂长作为坏的典型。但是，他却有一个现成的回答："你总知道俗语是怎么说的，'如果你需要一匹双峰骆驼，你就必须提出要一匹三峰骆驼。规章制度会砍掉一峰的。'"从理论上说来，各公司可以因为延迟交货而彼此提出诉讼，但是，这是一种十分麻烦的手续，结果又是那么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大多数工厂就使用"催货人"，一种传奇式的、半非法的苏联中间人，来强迫或贿赂他们的供货者及时交货，或者在计划以外使用欺骗诡诈手段同别的工厂进行复杂的交易。根本问题是因为每个人的产品就是别人使用的原材料。某一生产环节缺少材料就会造成多米诺骨牌似的后果。很多工厂无可奈何，只得以偷工减料欺骗消费者的办法来增加他们的供应。

一位制造罐头食品的工程师向我的一位苏联朋友承认说，在他那个行业里，使用这种花招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如果我们在果酱里放了少于规定的糖，或者不管水果的质量标准，那么，我们就可以生产更多的罐头食品，并且完成计划。"他说。这种情况曾经使他在一次

国际罐头食品制造会议上感到很窘。"当时我们正在尝保加利亚的罐头食品，其质量之高和味道之好，几乎使我们打了一个哆嗦，"他回忆道。"我们问了保加利亚企业的代表，他们是怎样取得如此高的质量的。他吃惊地看着我们说：'噢，我们始终是一成不变地按照你们苏联的配料方法和工艺生产的。'他的回答使我们极为难堪，因为我们从来就做不到按照我们自己的配料方法进行生产。"

有时候，欺骗更为露骨。一个中亚细亚的家禽饲养员说，他那个国营饲养场是全国最大的饲养场之一，经常捏造数字来表示它已经完成计划。他说，每天的指标是十万只鸡蛋，而饲养场经常要缺少三万只鸡蛋。饲养员说，他向场长报告确切的日产量，而场长则向区里的上级虚报产量。"场长报告说，日度计划已经完成了，"饲养员说，"而第二天早上，他就叫我把三万到四万只蛋作为破损或喂了小鸡而销掉了帐，尽管根本就没有这些蛋。"他说，同样地，饲料运到场里的时候，三十吨里总要短缺一吨半到两吨，说明别人也以短缺分量来完成自己的计划。

这是苏联各行各业的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所说的故事。官方报纸上偶尔暴露了十分广泛流行的伪造帐册和两套帐册的做法，弄得许多苏联人干脆就不相信官方有关计划完成的说法。我到达莫斯科才几个月，

一位化学工程师就告诉我说，中央政府每年总要进行无数次的调整来降低各种计划指标，因此，从技术上说来，到了年底总是全面“完成了”计划。后来在苏联格鲁吉亚的一次清洗中，公开证实了这种情况。原先那里经常报道说计划完成了。党的新头目做了一系列报告，严厉批评格鲁吉亚的工农业完成得很差，而且透露了格鲁吉亚的经济实际上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远远没有完成原定计划指标。以后在亚美尼亚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到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我已经没有理由怀疑这种偷砍计划的做法到处都在采用。一位用假名写文章、隐藏在国家机关某处的持不同政见的经济学家，确曾传过一份秘密文件，说明1966—1970年的五年经济计划的许多项指标均未完成，尽管国民收入全面增长的数字已经完成计划的目标。① 潜在的通货膨胀掩盖了绝大部分的差额。

---

① 在一本1971年12月流传的名为《自由思想》的小册子上，有一位经济学家用了一个讽刺性的笔名A. 巴布什金，用公开公布的苏联统计数字作了一个比较，说明从1966—1970年实际完成的计划数字如下：汽车只有百分之二十六，拖拉机百分之四十，纸张和奶酪百分之五十，罐头食品百分之五十八，纺织品百分之六十五，电力百分之七十，钢材百分之七十一等等，尽管党在1971年声称计划的所有主要指标都已经完成，并以国民收入的卢布数字从理论上来支持这种说法。巴布什金还列举了几项虽然确实超额完成了计划的，但是还没有完成党所声称的绝对数值的项目。

毫无疑问，计划的压力每个月都逼使俄国工人不得不生产出大量产品，如果没有计划限期，产品数量就不会那么多。但是，这种计划思想也给它自己造成了混乱。因为所谓计划（实际上就是克里姆林宫领导集团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活动）要求一种长期缺少原料的经济，交出比它按情理所能提供的还要多的东西，因此，计划造成了突击、工厂劳动力过多、月底为原料扯皮、偷工减料、伪造数字和各级都在进行有计划的欺骗。有时候，他们以某种可笑的小手段拆自己的台脚。有位科学家对我说起这样一件事，他那个研究所在年底的时候，发现还有一笔购买新设备的基金没有花掉而大吃一惊，于是迅速买了一件昂贵、非常花哨但完全不必要的新产品，却不愿因为今年的钱没有花掉而使明年分配的经费遭到削减。在更低一级的地方，有一位小学教师承认，她在发现学校经费中还有八百卢布没花掉时大为惊慌。“我跑出去给学校买了八百卢布的仙人掌，”她说。

一位驻莫斯科的美国武官不礼貌地把苏联的经济制度比作美国的陆军。“那是一种官僚制度，”他说，“那儿的规矩是：‘不要反对制度，’‘不要兴风作浪，’‘不要去找份外的工作，’‘不要提改革，因为那意味着要改变办事的方式’，干脆‘不要使丑事外扬。’”

这种“不要使丑事外扬”的哲学，看来在建筑业里

最为盛行，在那里，尽管项目还不能投产，但为了按期举行开工仪式，还是郑重其事地宣称已经竣工了。最精彩的一个例子是我的同事特德·沙巴德报道的，他在1973年6月14日的工会报纸《劳动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承认1968年12月为庆祝纳扎罗沃一台新的西伯利亚发电机开始运转而举行的精心布置的仪式是假的，因为这台发电机差不多过了五年之后还没有运转。在预定的验收时刻，苏联报纸登载了头版的吹捧文章，欢呼纳扎罗沃的发电机开始运转是“技术革命的开端”。但是，《劳动报》透露说，实际上那台五十万瓩的汽轮发电机在工厂车间试车时就烧坏了，甚至没有装到发电厂验收。《劳动报》一反苏联报纸早先详细介绍纳扎罗沃的新电流是如何大量流进西伯利亚电力网的报道，承认“仪表上指示发电量的针根本动也不会动，本来就没有电流；而且，由于制造厂连那台发电机也没有供应，怎么会有什么电流呢。因此那个既有乐队伴奏又有讲话的开幕典礼也就纯粹是一种象征性的了。”

对于那些受控制的苏联报纸和神经过敏的苏联领导集团来说，这样公开承认倒是史无前例的。但是，苏联朋友告诉我说，纳扎罗沃事件远非是独一无二的。建筑工程师阿古斯特，一个秃顶、脸上带着调皮笑容的拉脱维亚犹太人，有一天下午花了一两小时滔滔不绝

地根据自己的经验大谈其关于建筑业中的掩人耳目手法。他说，有一次，直到举行庆祝工厂验收宴会时才发现屋内管道还没有同外面的下水道管道连接起来。“我们知道要花好多时间和工夫才能把它搞好，”阿古斯特说，“但是已经签好了‘验收’文件，而且谁都不愿意为这样丢人的错误承担责任。”所以，一致同意那幢房子将被正式认为完工——而且，实际上，已经准备使用了——但是，管道问题将以小号铅字列入某些“毛病”之中。他说，另一次，一家轧钢厂除了一些关键机器尚待运到外，已经全部峻工。包建单位为了能得到完工奖金，急于把这个厂作为已经完工的项目上报。厂方最后同意作为“试车投产”接收该厂。这种做法双方称心如意，阿古斯特说，因为工厂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什么计划指标，而又可以得到国家资金来进行试验和校正机器。“就这样搞了两年后机器才来，”阿古斯特说。

据阿古斯特说，更为典型的是一家纺织厂的情况。因为机器到最后一分钟还没有运来，建筑人员只好在厂房外面的围墙上留了一个二十呎见方的洞，以便让机器塞进来。阿古斯特说，最后一台设备确实在验收前夕运到，而且安装完毕，于是建筑人员迅速地把那个洞封掉了。“我们同时进行砌砖、抹泥和油漆，”他说，“每项操作都需要时间，而且都需要等一等才可做下一道工作。砖砌好了需要时间等待它缩水。泥灰必须干

了才能油漆，等等。但是，我们没有时间等了，于是每项工作都违反操作规程：砖匠在砌砖的时候，泥灰匠就开始从底向上抹泥灰，漆匠则开始在湿的墙上油漆。每个人都知道两三个月内，油漆就会剥落，泥灰会脱落，砖头会裂缝。但是这都没有关系。我们唯一关心的是能否准时完成。”

我在听他这样说的时候，我的思想马上想到了卡马河卡车厂的公寓和我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里所看到的那许多质量很差的建筑物。那些新公寓的住户给苏联报纸编辑写的伤心的信就充分证明，建筑部门采取的通常手法是：一心要在限期之前宣称完成了多少多少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以达到取得完成计划奖金的目的。政府官员为了急于宣布他们已提供了多少新的公寓住宅，因而对这种情况故意装聋作哑，听之任之。

尽管存在这种欺骗狡诈情况，苏联经济还是以其愚蠢笨拙的方式乱糟糟地混下去了。从卡马河卡车厂项目就可以看出，苏联计划人员就是依靠工业上的拚命突击来弥补技巧之不足。

真正拖住苏联经济的后腿、而且也是使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领导集团担忧的问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力创造出相当先进的现代化工业技术，并把这些技术迅速地应用于生产，尽管这个问题在经济增长

和完成计划的统计数字里是看不出来的。数十年来，莫斯科也许已经有过惊人的增长率，不过步伐现在日益慢下来了，而且革新的动力也在消失。苏联的计划经济缺乏西方那种刺激技术发展的竞争的动力，共产主义的设计人员和理论家也还没有发明出一种适当的替代品来。

实际上，整个制度从上到下都抵制新发明、新产品、新思想。遏制的因素已经直接渗透到苏联经济的结构中去了。一般说来，革新似乎总是由上面发布命令，很少有来自基本消费者的意见。革新项目是在规模较大的研究所里试制出来的，研究所脱离工厂企业单独进行工作，而且研究所引以为荣的是，让一些特殊的、每种只有一件的、手工做成的样品，在苏联工业展览会上展出，而不是把它投入生产。由于为繁复的技术条例所束缚，即使有某个机构加以推动，一项新建议也必须通过错综复杂的手续才能取得中央官僚机构的批准。

报纸引用了苏联一位经理发的牢骚说，为了生产一种简单的铝杯，他必须得到“十八个单位的同意——不仅是在莫斯科的，还有外地的单位。”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的著名小说《不仅是靠面包》，就是描写一位发明者为了要使他在冶金工业方面有所突破的发明能够获得采纳而同官僚机构进行了教人难以相信的斗争。《共青团真理报》定期发表文章揭露官僚主义扼

杀种种新设想，从高效率的制鞋机器到矫形的新疗法。它报道说，正是那些被指定发展新技术的研究所，经常带头压制局外人的新设想。《真理报》在1972年10月叙述了鄂姆斯克一家工厂的艰苦历程，这家厂进行了市场调研后提出了生产柱式衣架的建议（苏联的公寓都没有壁橱，人们又大多不喜欢钉在墙上的衣钩）。衣架的价格必须报请莫斯科的上级决定。三个月杳无音信。后来，全苏家具设计和工艺研究所来了一份通知，要求重新填写一张一式三份的附上图样的申请书。又是等待。工厂派了一位负责人去莫斯科，结果发现有关衣架的档案已经丢失。《真理报》刊登这则故事时，这家工厂已经等了十个月，而且受到一个商业部门要求赔偿损失的控告，因为这个部门订购了两千只柱式衣架，不愿意再等下去了。然而仍无回音。

那个曾被保加利亚的精美果酱搞得很窘的罐头食品工程师，讲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拒绝变革的例子。他在摩尔达维亚的罐头厂通常是腌制青西红柿的，但是，有些货在转运时耽搁了，等到运到时已经变成熟透了的红通通的西红柿，他迅速采取相应措施，开始腌制红西红柿。"它们虽然不合标准，但是质量确实很好，还为国家节省上万个卢布，"他说，"但是，我并没有为此而得到奖励和赞扬，而是恰恰相反。上面派了一个专门调查小组来检查我的工作。他们根本不愿相信我的

用意是为国家而不是为我自己来抢救这些红透了的西红柿的。他们怀疑我进行盗窃，尽管他们没有证据，这一件事给我带来了没完没了的麻烦。党组织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我几乎被开除出党。还好我及时想起了战时关于要利用不管是否符合标准的一切原材料的教导，我这才得救了。”

俄国人讲了大量关于他们社会那种天生的、官僚主义的、吹毛求疵的反对革新的故事。这种情况在其他的社会里也同样会发生。但是，从这位罐头食品工程师的遭遇中所显出的俄国人特点，就是深刻的怀疑，过分的反应，以及琐碎的事情所引起的、很难逃脱的严厉惩罚。诚然，西方的经济，特别是美国的经济，也由于滥用自然资源、能源和环境，由于大手大脚地浪费汽车、日常用具以及制造一些不久就成为过时货的新产品而遭到批评者的指责。但是，西方远不象苏联社会那样浪费人员和思想，苏联不仅扼杀持不同政见者，也扼杀有才干的工程师、研究人员和要求改进他们的制度的人，这些人的想法总不免流产或胎死腹中，因为这种制度如此顽固地反对独创精神。

这些问题基本上应该归咎于从上到下的结构，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阻力都在中央官僚机构。据说勃列日涅夫有一次曾经说，苏联工厂厂长们回避革新犹如“妖魔鬼怪躲避香火一般”。他没有补充说，呆板的计

划规定才是造成这种态度的主要原因，但是，一位有经验的苏联记者曾经这样对我说：

“在计划经济中，一个拥有新颖的和效率更高的机器的人，对每个人都是危险的。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计划要求百分之一百的产量，一年十二个月，一个月二十四——或许三十天。每一样东西都计算好了：工厂里机器的生产能力，劳动力的人数，所需的钢和其他材料的数量。计划人员只知道能够生产些什么东西。如果你引进新机器，你就得关掉车间或者车间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计划将完不成。这对工厂厂长和工人都不利。他们就会拿不到有时占其工资的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奖金。这对主管这家工厂的部也不利，因为它也将完不成自己的计划。而且要是车间为了安装新机器而停工，又得花好几个月的时间，你就不得不停止这个车间向其他车间供应钢和其他产品。因此其他车间也就难以完成他们的计划。这就是计划经济的问题所在。计划阻碍了自己的发展，阻碍了经济效能的改进。”

我在莫斯科期间，苏联领导集团显然已经注意到这点了。迹象之一就是决定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在苏联就是效率的代号，是顺利完成计划的主要指标。尽管经常有取得成就的报道，东西方在效率上的差距并没有显著地缩小。从总产量说来，苏联经

济也许仅次于美国，但是，即使根据苏联的统计，1973年苏联按人口计算的产量也不过列于第十五位，而根据美国的计算，苏联则被排在第二十五位——居于美国、加拿大、西德、法国、英国、所有北欧和中欧国家、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几个生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我在俄国旅行中所注意到的问题——工厂，商店，农场，饭店或理发店，总是人浮于事，似乎有过多的人手——已由统计数字所证实。1973年苏联经济年鉴估计苏联工业的效率约为美国的一半，建筑业的效率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二，农业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偶尔有某些注意效率的苏联经济学家写文章指出，在俄国从西方买来工厂之后，这些厂往往雇用了多达八倍的劳动力，从而抵消了西方技术的效率。

所有这些情况似乎都很难同下面的事实相称：例如苏联宇宙飞行员和美国人一起进入轨道；西方的陆海军将领由于受到苏联新的一代的多弹头导弹或核潜艇的威胁而发出了恐怖的警告。如果苏联的实际情况是那么糟，又为什么看上去会那么好呢？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的答案是两方面的。

答案的一个因素在于俄国人的心理状态，苏联一心只想克服历史性的俄国落后于西方的情况。这不仅

仅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也是民族自尊心的问题。就象他们从前的沙皇一样，苏联的领袖们都被一种深切的自卑感和要克服俄国的历史性的落后面貌的决心所驱使。正是斯大林这个人物在 1934 年道出了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当时他宣布说：

>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①

我们把这种令人痛苦的自卑感看作是探索苏联今天同西方发生关系的动机的一种线索，这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俄国人决心不甘落后，决不甘居第二，而

① 见《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3 卷第 37 页。——译者

是要在今天的世界舞台上同他的头号对手美国人平起平坐。今天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伟大的标准就是要看它是否具有一个核大国的力量，是否具有空间的技术水平。因此，特别是在这些领域里，俄国人为了达到与美国同等，或者至少要突出一个处于同等地位的形象，将作出必要的牺牲。例如，按照西方的估计，俄国从 1958—1973 年在载人的宇宙飞行上花了四百五十亿美元，而美国只花了二百五十亿美元。美国人登上月球后，俄国人为了抹掉落后的形象并突出均等的局面，因而搞阿波罗-联盟号飞行，同美国人在空间连接起来，这就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了。

答案的第二个因素在于苏联社会那种等级分明的性质。在西方，军事技术是同整个经济总的技术水平密切相连的。俄国却不是这样。如果事关国家的切身利益，就会做得特别道地，而且可能还会做得很好。如果是为了领导集团，或是为了第一流的科学家、芭蕾舞团、作家、运动员以及对国家关系重大、在西方又有影响的人物，也会不遗余力或不惜工本，而普通的俄国老百姓则不得不束紧裤带为之付出代价。一位美国医生看到苏联社会这种等级分明的特点后，对我说，“俄国人能够把一个人送到空间，他们却无法使电梯经常开动。他们能够搞最尖端的病毒研究工作，他们却不能很好地治疗常见疾病。”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能力

问题，而且是个选择问题。为芸芸众生而生产的质量很差的消费品，不应该作为衡量提供给权贵们或国防部的产品质量的标准。

国防和宇宙空间的工作，不仅取得了全国最优先的地位和资金，而且这些工作是在和其他经济部门完全不同的体制内进行的。一位美国律师、作家和东西方贸易顾问塞缪尔·皮萨尔对我谈了很精辟的看法，他认为军事部门才是"苏联经济中搞得象市场经济的唯一部门，意即顾客可以向经济机构订购他们所要的那种武器。一般说来，苏联的经济是一种推销性的经济——产品是通过上面的命令推销给消费者的，主要是重复过去的生产，不必发掘实验室和研究所里那些苏联科学家的新技术和新发明。但是军方却象西方的顾客们一样，有一种订货选购作用。它可以说，'不，不，不，那不是我们所要的东西。'它还可以把坦克或萨姆-6或萨姆-7导弹先卖给阿拉伯人，赚到一大笔钱，并在战场上试验一下，然后为苏联的生产者带回来'市场反应'。"

此外，国防部不仅有自已系统的、从事生产军工产品的"保密"工厂，而且军工在整个苏联工业中是以不同于一般民用经济的标准进行生产的。那个金属工尤里告诉我说，他的工厂有三种不同类别的产品，有不同的装配线和不同的劳动班组，工资也不同，即使他

们做的是同样的产品。一种是为部队生产的；其次是为出口的；第三种是"普通的"内销品。"例如钉子、平头钉、茶壶；五金、制服、毯子、手套；或者一些仪器。每样东西都是这样安排的。"他说。俄罗斯南部的冷冻设备工程师约瑟夫也讲了同样情况。"普通生产工资挣得少些，"他说，"出口和军工产品工资挣得多些，但是要求也较高。在生产上多花些时间，质量规格也就高些。这种工作通常是交给老资格的工人干的。"

塔什干拖拉机配件厂的工段长拉希德说，每次他的工厂接到军工生产定货要"为火箭生产开关或灯具或类似的东西时，部队就送来检查部件质量的具体指示。我就亲自签文件说，我们的产品不符合军工规格；然后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比如，各种仪器、工具、扳头、旋凿、零件等等。"

我另外的一位朋友，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分析家，他在好几家工厂搞自动控制系统的工作，其中有几家是"保密"国防工厂，有的则是民用军用综合工厂。他说，在产品质量的监督上是不能相比的，即使一些普通的产品也是这样。"军工和宇宙空间计划的效率取决于检验是否合格，"他提醒说，"军官们都坐镇在每家工厂——坐镇在大工厂的是一些将军——他们按照严格的军事纪律行事。他们有权拒收次品，而且他们拒收很大数量的次品，往往造成大量损耗。但是在工厂的预

算里已经把这些损耗计算进去了。在这样一些工厂里的工人，为军队生产优质的冰箱，而大多数不合规格的冰箱便上了民用市场，没有人过问这等事情，因为对民用品实际上并没有质量监督的制度。我曾看到他们制造半导体收音机的情况。如果他们生产了一百只，军代表可能只挑选一、二只。有的就作为残次品而丢弃，其余的就上了〔民用〕市场。”

即使这样，有关国家重大利益的最重要的产品，军工和宇宙空间项目以及主要的民用产品，苏联的水平都无法同西方相比。一般认为俄国人在计算机领域里要比美国落后十年。1975年初，一份苏联科学院学报报道说，苏联的计算机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第二代的、慢速的、晶体管式的计算机，而不是美国广泛使用的那种第三代的、快速的、微型电路计算机。差距还不仅仅在于过时的计算机。不止一个苏联的计算机专家私下告诉过我，苏联的程序设计工作大大地落后于西方的程序设计工作。一位在国防工厂里有多年工作经验的电子工程师对我抱怨说，计算机和其他电子工具的不可靠性，是一件更使人头痛的事情。“我们的计算机老是出故障，”他说，“我们的计算机的停工期（不能进行运算的时间）根本不能同你们的相比。你们的计算机效率要高得多。”

苏联出口商品的特殊质量标准，依然不能够使苏

联的技术质量提高到足以引起西方的兴趣。衡量东西方经济之间差距的最简单尺度，也许就是它们之间在技术交流上的不平衡的情况。根据苏联《对外贸易》月刊的材料，先进的西方在1974年只买了价值一亿七千万卢布(二亿二千万美元)的苏联机械和设备，换言之，即工艺技术；而苏联则从西方购买了价值二十亿卢布(二十六亿七千万美元)的技术。同莫斯科几乎是十二与一之比。要不是有石油、天然气、黄金、铬和稀有金属等（基本上都是属于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商品），莫斯科就无法同发达的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精密机械、精密技术、精密生物化学等是苏联科学家们自认为薄弱的领域。“生产原子弹或同位素要比生产晶体管或生化药物容易得多，”一位物理学家说，“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种精确的技术能力。我们落后了好多年。”

通过集中力量和资源，俄国人在宇宙空间和军事领域里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遥遥领先于除了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这部分地也是因为其他一些国家还没有在这方面作过努力。但是，绝大部分西方的估计仍然认为，美国在尖端的导弹技术和载人宇宙飞行的发展方面还是领先几年，虽然俄国人顽强地紧追不舍。1975年7月阿波罗—联盟号在空中连接，就是美国占优势的标志。在进行联合飞行以前的一段时期里，苏联搞了一次载人宇宙飞行，在发射时失败了，其余几次

也在外层空间相接的时候失败了。在联合飞行中，俄国宇宙航行员在与美国的阿波罗号相接的时候遇到的困难，要比美国宇宙航行员与苏联的飞船相接的困难大得多。事实上，在这次飞行计划中事先就有意识地把更多的任务分配给了美国宇宙飞船。

我在电视上观看这次飞行时，不禁想起了美国宇宙航行员万斯·布兰德于1974年7月4日——这次飞行的前一年——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对我说的话。布兰德和其他一些美国宇宙航行员是到苏联来结识苏联宇宙航行员、了解他们的宇宙飞船情况的。我问布兰德总的印象如何，他从杯子里呷了一口果汁，想回避我的问题。最后，他说，"嗯，仔细看了联盟号以后，我大大提高了对俄国宇宙航行员的敬仰。"另一位美国宇宙方面的官员对此解释说，美国宇宙飞行员拿苏联的联盟号同已经到过月球而又返回地面的美国阿波罗号相比之后，看到苏联联盟号那么原始不免大吃一惊。"宇宙航行员不过就是上去跑了一趟，"美国人说，"他们不过是些乘客。他们不象我们的宇宙航行员那样，远远还没有掌握控制的技术，即在飞行中相机改变飞行任务的技巧。"美国人有意识地避免在公开场合进行比较而使莫斯科受窘，可是，他们看到苏联宇宙飞船原来那种维护生命和安全的特殊的设施多么有限，看到俄国人怎样处理一些故障的情况，还是

不免感到惊奇。那个美国官员说，俄国人只求暂时弥补一下具体的问题，而美国的技术人员则从体系上进行探讨，通常总要了解还有其他什么部分会出问题，检查整个系统，设法进行预防性的维修。这不仅是衡量技术思想上差距的标志，也是衡量他们之间在整个经营管理观点上差距的标志。

最后，经营管理问题一直是苏联经济中顶讨厌的事情。半个世纪前，列宁对他的那些布尔什维克同志说，要学习美国的管理技术。今天，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的女婿杰尔缅·格维夏尼等人正在鼓吹同样的教导。说来真够奇怪，在积极主张改革苏联经济管理工作的人中，居然也有苏联军方权势集团一些幕后的有影响人物。偶尔有《武装力量共产党人》一类杂志谨慎地批评苏联计划工作的呆板，主张要更灵活些。我在私下里也听到过一个相当可靠的消息，这是通过一个同莫斯科上层有联系的西欧共产党高级领袖在1973年末传出来的，消息说，军队最高统帅部门和主张工业专家治国的上层分子，都对苏联经济管理上的种种弊病深感不安。据这则消息说，这些人想大大地减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构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这自然也是柯西金总理在1965年推行的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当时的理论是，要赋予工厂企业

的头头们以更大的权力来管理他们自己的业务，从而打破技术的停滞状态，使其重新恢复活力。这种做法不强调增加产量作为经济上取得成就的主要标志，而是强调利润，以提高效率，实际上就象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有些经济改革者所主张的那样。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后期，由于党的统治集团和中央各部唯恐失去自己的权力，以及不肯放弃统治工厂企业的任何权柄，柯西金的改革就遭到了破坏。苏联的朋友们也争辩说，莫斯科对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自由化运动在政治上所产生的副作用大为惊慌，这也推动了扼杀那种苏联经济权力下放的做法。

1973年4月，又推行另一种做法，这次是由勃列日涅夫干的：即组织跨行业的联合大工业，叫做生产联合公司，这种公司具有广泛的新权力，包括有更大的权力可直接进行对外贸易。为了支持这种做法，《真理报》登载了一篇由主张自由化的权势集团的一个著名经济学家阿贝尔·阿根别格扬写的直率得令人吃惊的文章。他写道，在对一千多名工业企业经理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表示他们在作出决定时需要更大的灵活性，百分之八十的人则把他们种种问题归咎于上级干预了他们的正常生产。

在这次显而易见的运动中，开了最坦率的一炮的是外贸部副部长尼古拉·斯麦利亚科夫写的一篇文

章，他对苏联的工业无法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提出了（按苏联的标准看来）辛辣而又真诚的批评。此人曾一度担任苏联贸易公司驻美国的负责人，而且在西方作过广泛的旅行，他这篇文章发表在1973年12月号的《新世界》杂志上，含蓄地对苏联经济学中的某些准则——如定额，完成计划的指标，质量指标和产量定额——提出了异议，强调指出在国际贸易这个激烈的角斗场中，竞争能力是唯一的衡量尺度。他宣称，正视这个问题，将是对苏联工业的一剂“良药”。他的批评清楚地表明他觉得墨守成规的苏联官僚机构太僵化、呆板和缺乏想象力了，苏联的工业在推销产品，适应顾客的需要以及在修理服务和供应配件的紧密配合方面也太差了。

“我们的计划和分配机构在写文章，大谈有多少机器和什么类型的机器可供出口，大谈是否可能供应少些而钱赚得多些，同时又不必提供必要的配件，”斯麦利亚科夫写道，“他们还在争论，把出口产品做得比供国内消费的产品质量高些是否会有损我们的尊严，或者能不能把国内市场卖不掉的机器卖给国外，或者能否不出口国内市场大量需要的机器。就在我们高谈阔论的时候，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占领了许多市场，牢牢地控制了它们，专心致志地干起来，在商业上扎下了根，并且大规模地出口机器和设备，对整个工业

部门实行集中垄断以便为出口服务。”

由于这种很可能有象勃列日涅夫这样的上层人物支持的直率批评，在苏联经济中仿佛正在吹起一阵改革之风。泄漏出来的消息说，1973年11月，勃列日涅夫曾在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大力提出在计划和管理方面进行一些改组以提高效率。大约就在这时，一些具有现代思想的数学经济学家则在大力鼓吹放松那种从进料到出产品都由中央统一计划的硬性规定。这种规定还是斯大林订立的，至今仍然有效，莫斯科力图通过它对经济上的每一细端末节都作出决定，一般一定就是五年。他们要求代之以更为灵活的计划工作。他们主张只制订总的发展目标和方案，放松控制，每年公开修订总的计划。

然而，不消几个月工夫，保守的官僚机构就击败了这种主张，尼古拉·波德戈尔内主席要苏联统治集团不必为制度上过激的改革操心。到了1975年初，勃列日涅夫那个生产联合公司的计划显然已被阉割，尽管从法律上说来已在付诸实行。有几个大工业家在苏联报纸上公开地发牢骚说，柯西金总理属下的一些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对他们的干涉大大增加了，而且工业企业经理们所不得不担心的计划指标已从五项增加到了八十项。总之，权力下放的做法再次受到抵制——受到政治局领导集团内的相互竞争和党政最高官僚机构的

保守反对派的阻碍。

“这是一个僵局，”一位高级的党员记者在我离开莫斯科前不久告诉我说，“我们的经济需要改革，但是，只要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还活着，就什么也不会改革。在该怎么办的问题上，他们是不会取得一致意见的。而且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哪怕是勃列日涅夫——权力大到可以违反另外两个人的意志而推行任何重大的变革。”

十 领导人和被领导者

怀念铁腕人物

俄国人所引以为荣的事，却正是外国人所非议的事——盲目地、无限地忠于君主的意志，甚至当君主狂暴地把正义和人道的法律都踩在脚下时，他们仍然忠诚不渝。

十九世纪俄国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

“美国换了一位新总统，这同你有什么关系?”理查德·尼克松由于水门丑闻被迫离开白宫以后，基辅国际旅行社一位好奇的向导问我。

“以前，我们的总统不诚实，而现在，我们有了一位诚实的总统，”我说。“那关系可大得很啦。”

“不，我是说对你个人，作为一个记者，”她执拗地说。“既然有了一位新总统，会把你召回美国吗?”

起初，我不明白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但是当我们交谈下去时，我逐渐明白了。这位受过良好教育、会说英语的年轻妇女是根据她在苏联的切身经

验来考虑问题的。她知道，《真理报》驻华盛顿的高级记者必定是受到党的统治集团信任和精心挑选的党员。许多苏联人把《纽约时报》看作是相当于《真理报》的一家报纸，因此，她以为，这家报纸驻莫斯科分社的社长一定同尼克松的白宫有关系。由于尼克松这一派刚刚失势，大概我在政治上的处境也不妙。

“不，”我说，这时我们漫步经过1972年尼克松在基辅下榻的马利英斯基宫。“我们并不隶属于政府，同它完全没有关系。”

“那末你在苏联的旅费是谁提供的呢？”她想了解。

“我的报纸——《纽约时报》给我经费，”我答道。

“不是政府？”

“不是，”我说。“《纽约时报》不是政府的报纸。实际上，《纽约时报》在水门事件上与尼克松意见分歧，我们要求他辞职。我们是一家独立经营的报纸。在苏联，《真理报》是共产党领导机关的权威报纸，而在美国并非如此，我们并没有政府的机关报或者党报。”

尽管这次谈话发生在水门事件的高潮以后，这位年轻女士作出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的样子，但她还是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她开始对我关于美国报界的说法表示异议，话讲了一半，她顿了顿，摇摇头，不再谈这个话题了，显然认为谈下去也是白费。

俄国人永远不能理解水门事件。这不是指他们对破门而入、窃听、包庇不理解。从历代沙皇和共产党人的统治下充满血腥阴谋和玩弄政治权术的历史中，他们对这一套是颇为熟悉的。不，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此后出现的丑闻。这桩丑闻的政治含义，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他们的反应暴露出很多他们自己政治上的精神状态。

关于政治权力有意识的分散以及统治者应受法律约束的观点，好多月来连苏联最老练的美国问题分析家们也一直表示怀疑。他们看到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不顾国会的强烈反对进行越南战争，因而觉得很难相信国会拥有实权。很长一个时期，这些俄国的美国问题专家倾向于认为人们对水门事件的愤怒只是民主政治中装模作样的骗人把戏，将来总会逐渐消失，不必认真看待。1973年年中，在水门事件消息充斥美国报刊差不多已达一年以后，《真理报》一位地位很高、见多识广、分工负责注意西方政治的编辑评论说，他总是跳过水门事件的新闻报道不去读它，以节省时间。他的看法是："要看的东西太多了，水门事件只是个枝节问题，无关大局。"

后来，副总检察长米哈伊尔·马利亚罗夫发表了似乎是高级官员们的共同看法。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争辩说，水门事件证明美国民主

政治在起作用，马利亚罗夫鄙夷地对此嗤之以鼻。“这只是为了装装门面而已，”马利亚罗夫反驳道。“尼克松只要表现得稍微强硬些，全部事情就会不了了之。”

我确实认为这并不完全是对美国政治一种鄙夷的贬低，因为有些持不同政见者谈论此事时也有这种口气。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认为水门事件是党派间的杯水风波。此外，一位美国学者告诉我，1973—1974年冬季，克里姆林宫的一位高级美国问题专家私下承认，不可能向最高领导解释水门事件，因为克里姆林宫不会认真看待这件事。马利亚罗夫的回答反映了俄国人的独特态度：如果美国的最高统治者表现得强硬些，整个事件就会烟消云散。尼克松只是在同他的批评者逗着玩。

看来这也不仅是由于对尼克松政治上可能取胜或败北的估计错误（毕竟某些美国人也判断错了）。对俄国人来说，这个问题要深奥得多：他们就是不能理解许多美国人何以认为闯入水门大楼以及包庇这一事件是对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的不能容忍的侵犯，他们不能完全理解这件事怎么会在群众中激起这样的轩然大波。他们觉得难以置信的是，尼克松亲手挑选的“政治局班子”——我所认识的一些俄国人就是这样来指霍尔德曼、埃利希曼、米切尔及其一伙的——竟不得不忍辱负重地象普通公民那样当众受到审讯，而阿格纽

副总统和尼克松总统也竟被迫下台。

他们不仅不相信，而且在内心里对这样做法是否明智深表怀疑。少数有自由思想的人私下里赞赏美国的政治制度。但是另外一些俄国人，甚至那些不相信他们本国报刊的知识分子和那些经常收听国外电台广播的人，对美国国会、司法机关、报界能够——而且是故意地——动摇美国领导的基础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大惊失色。这种事情跟他们自己的政治习惯格格不入。他们的历史使他们不可能从法律、道义和宪法角度理解在我们制度下总统权力的限度或总统在法律面前应负的责任。因此，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陈词滥调和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的框框之中，他们倾向于认为水门事件是苏联报刊所谓的“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派别斗争阴谋，或者是反对党民主党大举进攻的一着棋。

尼克松下台后，莫斯科一位消息相当灵通的律师想要了解：“杰克逊参议员何时会当上总统？”

根据苏联的观点，这又是一个十分自然的问题。一直到水门事件结束为止，苏联报刊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少得可怜。我的一些俄国朋友怀疑这种做法不仅是为了保护勃列日涅夫个人在缓和问题上的伙伴理查德·尼克松的形象，而且是要避免使苏联群众产生向执政当局挑战的危险思想。可是，莫斯科的宣传机器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水门事件是反对缓和的一个花招。

“我要强调，水门事件是在〔1972年〕民主党遭到失败之后才激化起来的”，塔斯社社长、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列昂尼德·扎米亚京在电视中就尼克松辞职一事所作的唯一一次事后分析讲话中说。“事实上，它〔水门事件〕被用来作为党派斗争的主要武器，而又蒙上一层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部门和以国会为代表的立法权之间发生冲突的色彩。”就象其他的苏联报道一样，他从来不提闯入民主党总部或者尼克松在所得税方面遇到的麻烦，而是抱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肯定采用了洗脑筋的手法来左右舆论，”以反对尼克松——这位明显地被称为苏联在缓和问题上的朋友。

那位打听华盛顿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接管白宫的苏联律师，就是从这种评论中得出了这个合乎逻辑的结论的。从“美国之音”的广播中，甚至从苏联的报刊中，他了解到杰克逊是国会中最激烈地抨击缓和政策的民主党人。他由此得出的必然结论是，杰克逊会当上总统。他认为福特是名不见经传的过渡性人物。回想起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或者1964年赫鲁晓夫的突然被撵下台，苏联人的看法是预计会有新的铁腕人物出现。美国人关于法律程序的谈论，在他们听起来就象是在装饰门面。1974年4月，即尼克松辞职前四个月，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来到莫斯科，他庄严宣称，水门事件一旦听其自然地结束，美国的政治结构就会更加巩固。我

记得俄国人把这些话当作是可以理解的、民主党必然会讲的花言巧语。肯尼迪和民主党人也许会得到好处。但是，关于一个总的政治制度会从其领袖所遭到的正面攻击中获得益处的想法，是同俄国人关于国家权力和权威的概念格格不入的，因此他们无法相信这种说法。

“你们这些人怎么对待你们的总统的？”水门事件后期，另一名记者的译员问我。这是一位对美国有好感的俄国人，他见到美国乱成这个样子而很生气。“你们这些人怎么对待你们国家的？”他冲着我大声嚷道。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尼克松怎么对待我们国家的？’”我表示异议说。

“那么，就算是这样吧，”他答道。“但是这种事情哪儿都有。你以为我们这里就没有这种事情吗？”他迅速地把手拢成杯状，放在耳背后面，作出表示偷听的样子。“当然有，到处都有。如果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是捂起来，谁也不知道；或者，假如一名官员干坏事真的被抓住了，那末只是把他调到其他工作岗位——同级的岗位上去。大头头自然不必担忧。没有必要为了尼克松所干的那类事而毁了你的国家。”

他和许多象他那样的人在水门事件全部结束以及杰拉尔德·福特访问符拉迪沃斯托克重申缓和以后，觉得并无什么不同。民主遭受创伤在他们看来是毫无

意义的。

如果说水门事件使俄国人迷惑不解的话，那末苏联老百姓对斯大林的怀念也使我感到诧异——而这两种情况所代表的思想感情，正是织成同一政治面貌的经纬线。我动身去俄国时的想法是：斯大林不仅是战争时期的统帅和严厉的暴君，因为在他强制实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严酷计划下，建成了苏维埃强国；而且也是独裁者，因为他的血腥清洗跟希特勒迫害犹太人一样被视为二十世纪最严重的大规模暴行。我和其他西方人一样，认为赫鲁晓夫虽然华而不实，反复无常，在柏林问题上威胁恫吓，在古巴进行导弹赌博，但他敢于揭露斯大林，暴露他的恐怖统治，为一些遭受他迫害的人恢复名誉，倒有点儿象个英雄。当然，我知道勃列日涅夫一伙已经改变了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政策。他们逐渐恢复了斯大林的名誉，在他的墓上树起一个塑像，允许出版吹捧他的文学作品和让他的形象在电影中出现，并且对“个人崇拜”一词的意义进行粉饰，从而把大清洗的罪行一笔勾销，这样就使人们听起来好象斯大林的唯一罪过只是浮夸自负，而不是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但是我意想不到地发现，斯大林在普通老百姓中具有巨大的潜在威望。而除了那些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及遭受过大清洗迫害

现已恢复名誉的人——他们是赫鲁晓夫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以外，人们普遍认为赫鲁晓夫简直是个无可救药的乡巴佬和笨蛋。

斯大林爱喝他的故乡格鲁吉亚出产的红色烈酒“金兹玛饶里”，这种酒就是现在也和在他生前一样很难觅得。现在，在私人宴会上，只要“金兹玛饶里”一出现在餐桌上，有时就足以促使人们一遍又一遍为斯大林祝酒。一位瑞士外交官向我描述过一天晚上他听到一批外交部中级官员在喝“金兹玛饶里”酒时几次为斯大林祝酒时的惊讶心情，在这次聚会中他凑巧是唯一的外国人。我的其他一些朋友，即那些憎恨斯大林的俄国知识分子也同样感到震惊的是，他们在一个节日到工人阶级亲属的家里赴宴，发现一帮人唱着战争时代的老歌曲，其中一首的重唱词是：“为祖国干一杯，为斯大林干一杯。”人们竟为这位已故独裁者举杯祝酒。

在苏联，格鲁吉亚人被认为是个性很强的人，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因此，他们对本族人约瑟夫·朱加什维里——他由一个鞋匠的儿子高升到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的忠诚，被当作是他们的一种特性，是向俄罗斯人摆威风的一种方式。格鲁吉亚人非但为斯大林干杯，敢于顶撞批评斯大林统治的俄罗斯人，而且还拿出隆重的节日庆祝活动的照片给我看。在照片中，格鲁吉亚官员高擎着斯大林的画像和列宁、

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在大街上游行——这种公开表示尊敬斯大林的行动在别处是被禁止的。然而在苏联的其他地区，许多人也许表现得比较谨慎，但是仍然怀念斯大林。

在巴库，一位阿塞拜疆的出租汽车司机在被问及贴在他汽车挡风玻璃上的斯大林照片时断言道："我们这里的人热爱斯大林，他是个铁腕人物。有了斯大林，人民心里就踏实。"

一位从敖德萨乘火车到莫斯科去的五十来岁的厂长，在对苏联青年的长头发和邋遢的样子以及他厂里的工人不听话和不可靠的作风感叹了一番后说："他们都是懒鬼。我们如今纪律差极了。我们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在斯大林领导时，纪律真是严明。要是有人迟到五分钟……"他用手指在喉头上抹了一下。那个时期是他所向往的。

塔什干图书馆一位三十岁的俄罗斯人管理员说："斯大林肩负起了指挥战争的全副重担，他使国家建设得强盛。当然，有些错误名义上是他犯的。那是别人干的。他不应该那么信任他们——尤其是贝利亚。但是你看看，斯大林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在 1961 年〕把他的遗体从陵墓里搬走。老百姓不赞成这样做。那是赫鲁晓夫的主意。他既粗暴又愚蠢。他把钱浪费在愚蠢的计划上，比如打算在哈萨

克种玉米。他跟自己开玩笑，也拿国家来开玩笑。”

国营农场的会计根纳季说：“知识分子可能向往民主，但是广大的人民向往斯大林——他的强大力量。他们并不反动，但是遭到顶头上司的虐待、欺骗、剥削和镇压。他们希望有一位铁腕人物来压一压那些小头头。他们知道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经济〕状况不那么好，但是在斯大林时期国营农场的场长和其他官员不掠夺他们，也不欺骗他们。对地方当局是有监督的。”

二十几岁的年青冶金工人尤里说：“你想知道工人们的想法吗？你知道下面这句话吗，‘俄国人需要一个巨灵神那样的人物’？这就是说，俄国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好躲在他身后，受他庇护。这一说法在斯大林时期比现在影响大些，但是现在还很有影响。这就是现在工人们的想法。他们希望有一位象斯大林那样的强有力的领导。他们认为勃列日涅夫并不是那种人。”

一位年过半百的语言学家说：“现领导不懂得如何举止得体。斯大林懂得如何给人以深刻印象。他健在时，其他国家更尊敬我们，也更害怕我们。”

一位在斯大林的劳动营呆过八年的六十开外的作家，想要解释工人农民为什么对斯大林怀有潜在的同情：“斯大林在群众中深得人心。他们觉得他建设了国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如今他们看到农业乱糟糟，工

业乱糟糟，经济的所有部门都乱糟糟，而且这一切混乱又看不到尽头。他们为物价的上涨而操心。他们认为以往有斯大林那样的坚强统治者，我们就没有这样的麻烦。人们忘了当时的情况也很糟糕，忘了我们付出过可怕的代价。”

西方人士很难理解这种健忘，这是因为对他们说来斯大林的名字是同大清洗难解难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关于斯大林的一本本传记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又使他们想到了大清洗。但是由于苏联重新编写了历史，俄国人患了历史健忘症。我知道，这样说法听起来简直有点荒诞不经，但是只是从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所讲的经历中，我才深深意识到这句话的含义。

一个下着雪的星期日下午，当我们在佩列杰尔基诺作家村中一座美丽的老教堂附近会面时，叶甫图申科焦急万分。仅仅几天前，索尔仁尼琴被逮捕了。叶甫图申科向勃列日涅夫发了一份温和的抗议电报，因而处境也不妙。他穿着一套蓝色运动服迎接我，但是他神情太严肃了，不象一个真正打算外出作缓慢跑步的人。他这身打扮就是他到教堂来见我的“掩护”。他用他那紧张低沉的声调极快地向我讲述偷偷摸摸、匆匆忙忙地阅读《古拉格群岛》的情景，当时只有从国外非法带进的几本在莫斯科流传。每人只能在二十四小

时之内把全书狼吞虎咽地读完。人们通宵达旦地阅读，接着传给别人。叶甫图申科之所以焦急不安是因为原定朗诵他的诗歌的一个集会已被取消，他散发了一个文件来说明他的态度。

最使我感动的倒并不是他为索尔仁尼琴辩护时的那种矛盾心理，而是年轻的一代对斯大林的惊人的无知使他产生无限的苦恼。一年前的夏天，在西伯利亚一堆营火的周围，他写道，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提议为斯大林干杯，这使他大为震惊。他问她为什么要为斯大林干杯：

"因为那时全体人民都信任斯大林，由于这种信心，他们赢得了胜利，"她回答。

"但是你知道在斯大林统治的岁月里有多少人被捕吗？"我问。

"嗯，就说有二、三十人吧，"她回答。

营火周围坐着其他跟她年龄差不多的学生，我也开始问他们同样的问题。

"大概两百个人左右，"一个小伙子说。

"可能有两千人，"另一个姑娘说。

十五至二十个学生中只有一个说，"我看大概有一万人。"

当我告诉他们这个数字不是以万计，而

是以百万计时，他们不相信我的话。

"你们读过我的诗《斯大林的继承者》吗？"我问。

"你真的写过这样一首诗吗？"第一个女孩子问我，"它发表在那里？"

"发表在《真理报》上，1963年，"我回答。

"可当时我只有八岁，"她有点茫然地回答说。

"于是，我突然第一次意识到，今天年轻的一代确实无从了解当时悲剧的真相，因为他们在书本和教科书上是读不到这类材料的。即使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提到在斯大林主义迫害时期死去的我国革命的英雄人物，然而报纸对他们的死因却绝口不谈。在刚刚出版的〔奥西普·〕曼德尔什塔姆诗集中，一点也没有提到他是如何死的——他是在劳动营里折磨而死的。真相为沉默所代替，而沉默其实就是说谎。"

如果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斯大林的恐怖被普遍地遗忘了，或者斯大林受到普遍的颂扬，这肯定是错误的。不单单是叶甫图申科和大清洗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他们的人数何止成千上万——拒绝为斯大林祝

酒，其他人也这样。一位记者告诉我，他在共产党统治集团内的有自由思想的朋友们暗中害怕并反对新斯大林主义分子，因为他们认为要是再来一个大清洗时代，他们肯定过不了关。我也听到有人，例如军官，私下谴责斯大林对最高统帅部的大规模清洗，或者工厂厂长咒骂斯大林没有预见到1941年希特勒发动的进攻，战后又拒绝接受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然而同人们经常嘲笑赫鲁晓夫相比，这些对斯大林的批评看来都变成微不足道的了。在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看来，赫鲁晓夫是个反复无常的冒失鬼。报刊上经常强调党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如何纠正了政策，或者对他的死讯尴尬地保持沉默，用这种办法来对他表示蔑视。赫鲁晓夫所以受到谴责，部分原因是他的继任者认为他是现成的替罪羊，人民发泄不满的活靶子。但是据我看，现领导之所以要贬低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对斯大林的揭露使人们对党的一贯正确采取将信将疑的态度。他使人们对千百万人高呼着斯大林的名字为了斯大林的事业而作出的英雄事迹和个人牺牲产生了怀疑。他使那么多在斯大林面前默默地低首下心的人显得十分愚蠢，或者有罪在身。

今天，把大清洗撇在一边——这正是大多数俄国人想要做的，把它撇在一边吧——那些怀念往昔斯大

林统治下美好日子的人，主要是向往他的领导作风。随着时光的推移，人们对他那种骇人听闻的狠毒行为、患妄想狂似的猜疑和随心所欲的暴虐的记忆已经淡薄了。斯大林缔造了一个现代化国家，在战争时期锤炼了人民并使他们取得了胜利，接着使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苏联的实力面前发抖。作为这样一个领导人，他就是力量的化身。发人深省的是，当苏联官员或者旅行社向导们谈起沙皇统治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时，他们不象美国人那样，大谈一通自己的宪法，也不象法国人那样讲述第四共和国或第五共和国的诞生。他们的提法是："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这并不纯粹是语义学上的斟酌或是翻译不确切的问题。这是探索俄国人政治思想的重要线索。对他们来讲，关键的问题是一种形式的政权代替另一种形式的政权。在俄国历史的方程式中，宪法和共和国都是无关紧要的。

这种关于力量的语言是许多俄国人在回忆斯大林时常用的，因为他们欢喜强有力的领导。在他们最崇敬斯大林的时刻，俄国人赞扬斯大林为"强硬的当家人"。他把社会团结在一起，牢牢掌握在他手中。而俄国人喜欢这种情况。许多中年人和老年人认为，在想到如何统治俄国这一问题时，斯大林是如此不可须臾或缺，以致现在他们还经常回忆起他去世时他们的惊慌失措。一位知识分子对我回忆道，"当时我们简直不

知道，没有斯大林，国家会出什么事，我们又怎么活下去。”

他们的这种态度并不局限于对待国家机关的最高统治者。在工厂、农场或者发电站工地上，我听到工人、农民或者建筑工程师自豪地把自己的领导称为“铁腕人物”，握紧拳头，挥动右臂，表示他有力量。他们喜欢有这种心情，即感到他们的领导处理事务果断有力。

我回想起一位技术专家在1966年苏联空间计划领导人谢尔盖·科罗廖夫去世后伤心地认为，此后这项计划必定会走下坡路。他说：“以后，我们不可能和你们美国竞争了。现在一片混乱，失去秩序，‘老大’太多，但没有一个真正的头头。没有一个大人物来抓总，就会一事无成。”1973年，苏联图-114超音速运输机在巴黎航空展览会上坠毁后，一位工程师同样表现出疑虑不安。他说：“如果主管负责的是一位卓越的强有力人物，他早就会把一切安排得很妥贴，以免出现这种差错。”从一位年轻的受过技术训练的知识分子口中听到他这样依赖强有力的领导，这使我感到特别吃惊，而根据他所受的教育，他本应认识到要使这样的计划取得成功，需要依靠的是在复杂工艺流程中进行协作、统筹管理和各方面紧密的配合。但是科学家们也告诉我，一些研究机关，或者说整个研究领域，由于缺少一个统一指挥的领导人而受到损失。1974年4月，苏联

国家冰球队在世界冰球锦标赛中以二比七输给捷克斯洛伐克队后，一位体育爱好者认为毛病出在缺乏强有力的人物。他把输球归咎于教练员太软弱。“塔拉索夫是个独裁者，”他想起球队以前的教练时说。“他很粗鲁，但是他让球队训练、训练、再训练。在他的领导下，他们的球打得比现在好。对待俄国人，你得严格，非常严格。”

十九世纪杰出的作家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他的小说《一个城市的历史》中，讽刺过俄国人这种对铁腕统治者的崇拜。一个俄国朋友对我讲起书中的俄罗斯人落入敌人手中时的情况，他们叫道：“即使他们把我们捆成一堆，四面放起火来，我们也忍受得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头头。”

这就着重说明了俄国人和美国人的根本区别。美国人怎想寻找出这两个民族性格中的相似之处。他们的性情可能都很坦率开朗。但是俄国人和美国人对待权力或权威的态度截然不同——这并不光是由于苏联是共产主义的缘故。生来就不迷信权威，这是美国人的传统。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美国人对任何拥有无限权力的庞然大物，如大政府、大企业、大劳工组织或任何大的东西都有戒心。部分美国人欢迎强有力的领导，但是我们还要制订成文的法律来抑制垄断资本，要使政府的权力受到种种限制，并在政治体制上实行分

权管理。我们要撤换类似水门事件那样滥用权力的那些总统。

俄国人就不是这样。庞然大物和权力受到几乎无限的钦佩。规模巨大引起人们的敬畏——沙皇统治时期的宏大的克里姆林宫、大炮、教堂的大钟；共产党人统治时期的大水坝、巨型火箭和原子击破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大规模生产，为共产党领导人以及中央计划人员实行中央集权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从伊凡大帝和伊凡雷帝以来的六个世纪的集权统治，早在列宁和斯大林出现以前，已经使得俄国人成为彻头彻尾的君主主义者。他们没有英美那种习惯法及其人身保护条令留传下来，也没有一种悠久而完善的公开辩论政治问题的历史传统，更没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用来分散政府的权力和支持个人反对国家。

"在沙皇时代，我们国家是独裁统治，而现在我们国家是极权统治，但是这个极权国家依然是从俄国的过去脱胎而来的，"斯大林的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孙子、持不同政见者保尔·李维诺夫告诉我。"你应该了解，领导人和一般人民都有同样的独裁主义心情。勃列日涅夫和普通人都认为强权即公理，这就够了。这并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纯粹是个权力问题。索尔仁尼琴装得好象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共产主义的缘故而从天上掉下来的。但是他本人也没有多

大的与众不同。他并不要民主。他希望从极权统治的国家恢复到独裁统治的国家。”

俄国人从过去继承了如此多的遗风旧俗，以致他们把许多政治专制手段视为天经地义的事，而西方人却会立刻把这些手段看作是一种侮辱。历史给俄国人安排了不同的条件。十六世纪伊凡雷帝的血腥统治和十九世纪尼古拉一世的铁腕统治，孕育着斯大林的残酷暴政。彼得大帝由于把俄罗斯向西方开放并建立了较现代化的军队和国家行政机关，因而蜚声海外；但是外国人却很少知道他也提高了独裁统治的效能，而他的某些统治方法还一直沿用至今。正是彼得大帝创立了第一个政治警察机关，正式制定了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开始实行国内通行证制度，以使俄罗斯人未经特别许可就不得离开他们的住地到外地旅行。

沙皇对待持不同政见者的手段与今天的苏联领导人也没有多大的不同。彼得因自己的儿子阿列克西斯消极反抗他的改革而让他受审并判处他死刑。据有些史料说，他亲手杀死了阿列克西斯。作为苏联对待缓和问题的矛盾心理的一种先兆，叶卡捷琳娜大帝最初向西方思想敞开大门，而后又关闭了大门。象苏联领导人一样，对于最不安分的作家的作品，几位沙皇也亲自扮演了检查官的角色。尼古拉一世是普希金作品的检查官。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就象今天持不同政见的

作家一样，把他的一些引起争论的作品偷偷地送到西方出版，而陀斯妥也夫斯基则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苏联把持不同政见者送进精神病院的做法，也有先例可援，那就是出名的彼得·恰达耶夫案件，恰达耶夫是十九世纪初期卓越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由于发表了一篇文章责备俄国落后、鼓吹学习西方和皈依罗马天主教作为解救办法，因而被官方定为疯子。如果硬说革命以后一切仍然一成未变，那就太天真了。但这种历史上的相似之处却是很多的。

无论是在沙皇统治下还是在人民委员统治下，俄国人从来就对无政府状态和妨碍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的各种离心力怀着根深蒂固的恐惧。孟德斯鸠写道，象俄国这样庞大而落后的国家，专制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不管能否避免，突出沙皇或共产党领袖作为国家化身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一直是俄国人在历史上解决他们唯恐发生的混乱的方案。

俄国在历史上遭受过蒙古人、拿破仑直到希特勒的入侵，发生过农民起义和国内战争，出现过沙皇和皇族策动阴谋或者父皇图谋杀死皇子的事情——恰如斯大林阴谋对付和杀掉他的革命同伴一样。这样一部历史，已经使得俄国人对秩序和安全的珍视不下于美国人对自由的珍视。据我看来，大多数俄国人对美国人生活中的失业、犯罪、政治性暗杀、吸毒、劳资冲突真正

感到惊慌，以致宁愿忍受书报检查制度、警察控制、任意捕人、劳动营、强迫知识分子就范等不利条件。当我倾听年岁较大的俄国人向我讲述他们骇人的苦难历程时，我对于他们为什么厌恶任何孕育着动乱的形势才有所理解。他们中有些人大半辈子毕竟是在大劫大难的边缘度过的。

“请想想，”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列夫·科佩列夫说，明亮的眼睛在白胡子上方闪烁，“我认识的人经历了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斯大林时期——工业化、集体化和恐怖统治——然后是战争。他们经历了你闻所未闻的饥饿。他们忍受了严寒。想想吧，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斯大林时期失去了父亲，接着在战争中又失去了一个兄弟，从来没有见过健在的祖父母，还不得不为继续生存下来而挣扎。”

他停顿下来，似乎是在想象一下这种情景，接着他突然问我，“你可曾吃过土豆皮做的‘肉饼’？”

然后，他对这种阴郁的幽默（他称之为“墓地的幽默”）付之一笑。列夫说，“想想看，我们比你们饱经过多少风霜啊。”

俄国人似乎不仅害怕他们周围的混乱，而且还害怕他们内心的无政府状态。他们表面上循规蹈矩，克己自制，服从权威，使他们博得遵守纪律的民族的美名。我认为这一声誉似乎是言过其实。俄罗斯人不是

日耳曼人。他们的纪律性是强加于他们的，而不是由于他们这个民族生性爱好严密组织。“俄国人在灵魂深处是无法无天的，”一位女剧作家向我发表这样的议论。“在俄国，法律算不了什么。唯一重要的是风俗习惯。”我想作一个修正：最重要的是权力。俄国人服从的是权力，而不是法律。如果当权的人注意力转到别处，或者只是没有注意到他，俄国人就会为非作歹，干出任何他们以为可以逍遥法外的坏事来。

俄国人气质中这股无法无天、桀骜不驯的暗流，在当局无法控制的许多生活细节中表现了出来。无处不在的贪污腐化是其中的一个迹象。另一种迹象是普通俄国人顽固守旧、不遵守交通规则乱穿马路和古怪的开车习惯。苏联的驾车者容易心血来潮，不守纪律，以致一个亲身经历过纽约街道交通的俄国人向我惊叹道，“美国人的车开得真漂亮！”但是，你说有没有意思，正是莫斯科的行人，质朴的俄国乡巴佬，成了最大的危险。苏联的行人，由于对交通规则还不熟悉，更可能是由于健忘，看到一辆正在驰来的汽车会突然在马路中央站立不动，甚至当他们有权穿过漆有条纹的安全岛时也会这样。或者他们会既不发出警告，又违反普通常识，不顾交通信号，出其不意地从路边窜到马路上，企图从川流不息的车辆中穿过一条具有十个单向行车道的繁忙大马路，好象一个步行者危险地从

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越过一个个急流湍滩一样。

在私下，或在共产党人控制不到的其他场合，俄国人往往象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人物那样，一个劲地从事海阔天空、东拉西扯、忘乎所以的闲聊。有些西方作家把这种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无政府状态归因于俄罗斯辽阔的原野所引起的俄国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品质。但是列夫·科佩列夫向我暗示，这是一种从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恶习。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由于意识到他们将永远不会有掌权的机会和责任，因而一味发表政治和哲学的空论，而不去注重实际，也不会为了采取一致行动而相互妥协。这种缺乏责任感助长了俄国人固有的无政府心理状态。

列夫谈到现代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时说，"假如现在我们聚在一起，试图决定为了达到某一政治目的而要采取些什么行动时，我会讲，'让我们发表一项声明'，另一人会讲，'让我们举行示威吧'，第三个会讲，'等一等吧'，第四个人又会有什么别的主意。我猜想这是正常现象，哪里都一样。但是我们俄国人会有分歧，而且一直不能取得一致。两三天以后，我们就变成了敌手。我们就是这样地不同于你们。俄国人需要一种从上面灌下来的思想意识和统一——民主集中制——否则我们就会四分五裂。我们不是象你们美国人那样讲求实际。"

还有一次，《华盛顿邮报》的鲍勃·凯泽和我同一位俄国科学家谈论苏联严厉的控制。我们问他为什么当局对少数几个持不同政见者、对误入歧途的诗人和红场上的七名抗议者采取了这样毫无必要的过火行动。他的回答是画了一张图解来说明俄国人及其领导对他们自己的制度的不安全感。



左边，容器的高壁表示美国社会及其已经建立起来的稳定的政治制度。这位科学家说，这就是说，人的行动这个球可以从一边到一边很自由地转动，人们可以享有很大幅度的自由。在俄国，他说，领导和被领导者都感到一种危险的内在的不稳定性——由右图（人的行动这个球只能在一块既浅又窄的地区中活动）来表示。人民之所以需要受到牢牢控制，是由于稳定的墙壁是这样低，社会是这样易受暴力和突然变化的损害。在我看来，苏维埃制度似乎始终比他所说的情况要稳固得多，党和警察的控制是很牢固的。但是我的评价无关宏旨，当局的一举一动几乎总是象这位科学家所讲的那样出于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苏联制度老是念念不忘控制群众，我自己第一次对这种情况的亲身体验是难以忘怀的。这是在同爱尔

兰足球队的一次国际比赛之后。按照国际标准来看，苏联观众一直很有节制，他们不是那种发出尖声怪叫或者喝倒彩的观众。唯一真正激动的时刻是对苏联队拙劣的球艺和死板的踢法感到不耐烦，间或吹吹口哨表示嘲笑。(苏联队踢得相当呆板，完全是按固定位置或者按冰球那样的踢法，就象图画书上经常画的那样，没有花哨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假动作。)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安静的俄国观众在比赛结束后会象拉丁人那样大发脾气。可是苏联当局还是没有存侥幸之心而是预先作了防范。我同其他十万名足球爱好者走出体育场时，看到武装士兵肩并肩地在街道上排成一道卡其布军装的人墙。他们形成了一条通道，观众只能从这条通道涌向地下铁道和公共汽车交通线。沿着另一条街道，步兵在骑兵的支援下也肩并肩地排列成行。其声势之大使人愣住了。

那天，我避开了拥挤的地下铁道。但是在另一次，当士兵排成的钢铁般的走廊没有延伸到站台时，我看到了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当列车到站时，由于站台上无人控制，原来秩序井然的队伍突然散乱了，人们疯狂地争先恐后地挤上地下火车，就象职业橄榄球队比赛中在决定胜负的最后一秒钟、踢进一球时的猛烈冲锋一样。我对俄国朋友们讲述这件事时，他们笑着讲起在这种时刻被踩掉鞋子、挤掉钮扣的情景。那次我没有

遭到财产损失就逃脱了险境，只是当时有点胆战心惊；唯恐将我顶了起来的流动人潮会把我挪进站台和火车之间的缝隙里。于是我对当局为何要在街上强行维持这样严格的秩序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对俄国人来讲，“秩序”这个词有一种特别神秘的味道。辞典上的解释是正常的秩序、程序、顺序。在西方人看来，可以理解的译法是井井有条、整齐、整洁、有组织。对俄国人来说，这个词可以只是指“一切都好”、“非常令人满意”。但是这个词也往往具有法律和秩序的含意，即事物按照当局、首长，通常是指政治首长指示的方式进行，但同样也很可能是指按照厂长、商店负责人、学校的教师、甚至父母指示的方式进行。就是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它不是一个使人害怕的词，而是一个严格的词。它含有这样的意思：有人监视着你，或者在什么看不到的地方时刻注意着你，以保证事物按照规矩进行。在公开的生活中，苏联社会是强调“秩序”的。

莫斯科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街道，市内完美无缺的地下铁道网都是“秩序”的典范，肯定会使美国任何城市的市长羡慕不已。地下铁道建筑宏伟美丽，装饰有古典的半身雕塑像和镶嵌的艺术图案，既无乱丢的垃圾，也没有故意破坏艺术的事情发生，更无破坏纽约地下铁道外观的那种任意在墙上乱涂乱画。“嗨，真有纪

律！”哈莱姆大街学校一位对此感到敬畏的美国青年黑人拉塞尔·戴维斯，在访问莫斯科时惊叹地吹了声口哨。“街道清洁，人们清早上班。他们对警察很尊敬，你发现纪律性很强。”

你也发现，领导人和被领导者之间，最上层的“他们”和最底层的“我们”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的俄国朋友平常谈到领导人时，把他们统称为“他们”，或当局（更确切的译法为“掌权者”）。普通俄国人不仅避免大声提到秘密警察的简称（或避免在其总部所在那一侧的街道上行走），而且在讲到勃列日涅夫时往往避免指名道姓，而只是用手指在眉毛上迅速地比划一下——暗指他的浓眉。这一手势使人们想起在《屋顶上的提琴家》中一段饱含俄罗斯风味的情节。当有人问犹太教士是否为沙皇祝福时，他答道：“是的，愿上帝保佑你们，让沙皇离我们远一点。”这个小人物本能的感觉就是对那些最上层人物要敬而远之。

这个问题不大，因为领导人并不企图在人民中开展政治活动。有关他们的家庭和私生活几乎是完全秘而不宣的。对普通公民来说，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只是电视中定期出现在隆重仪式中的形象，接着就消失了。领导人的生活是神秘的。他们似乎很重视隐姓埋名，把这种作风作为他们神秘的、不容挑战的权威的不可

缺少的组成部分，正如俄国一位马基雅弗利式人物[1]很早以前指出过的，如果一个领导人的个人生活过于公开，他就不会再有威严，反而会变得象常人一样，易遭物议。例如，在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一书中，沙皇告诫他的儿子，如果他想要独揽大权，统治卓有成效，他就不能在人民中露面太多，而要保持深居简出。

对于老百姓来讲，政治和领导人的权力犹如自然界的风雨雷电一样。凡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党员——连做梦也没想过要对它们有所作为。这些东西简直是天赋的、是一个既不可抗拒、也永远不可改变的事实。国家的政策就象天气一样。它自天而降，普通俄国人只能以听天由命的态度适应风向，尽量顺应出现的任何情况。在风平浪静的政治季节尽情享受，在浊浪滔天的季节则想方设法觅个避风港。难怪俄国人多半不问政治。

"在我国，个人和统治者以及和政府完全不能等同起来，"一位出身名门、才华横溢而又苦恼沮丧的女语言学家，一边吃茶和冷的烤面包片，一边告诉我说。"在我们这里，公民个人并不把自己同政府视为一体，不象你们在美国那样，因为你们认为政府多多少少还应该

---

①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家。马基雅弗利式人物指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物。——译者。

对你们负责。对我们来说，政府就象风，象堵墙，象苍穹一般地存在着。它是某种永恒的、不可改变的东西。因此个人默默地服从，并不梦想改变它——只有很少很少人是例外。在美国，人民对政府的某些行动，例如进行越南战争，感到羞耻。但是在我国，人民不感到羞耻。我不对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什么地方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我为我们的社会或其他情况感到遗憾。但是我并不对政府的作为感到耻辱，因为政府与我完全不相干。我觉得和它风马牛不相及。”

政治上的自信和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对于民主制度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俄国人特性的组成部分——掌权者或极少数持不同政见者除外。他们中的一位，年青的历史学家安德烈·阿马利里克在他送往西方出版的《苏联能存在到1984年吗?》一书中指出了极权主义和民主思想的截然不同。安德烈为这件事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流放三年。

不知是由于历史传统还是由于其他某种原因，自己管理自己的思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个人自由的思想——以及随这些自由而来的责任感——对俄国人民来说，几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他写道，“即使从实用主义来考虑自由这个概念，俄国人也往往不是把它视为可以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而是更多地把它看作是一种有被某个机灵鬼用来损人利己的危险。在

绝大多数人看来，'自由'这一字眼是'混乱'的同义词，也是有机会随心所欲地从事反社会的或危险的活动而不受惩罚的同义词。至于尊重个人权利，这种想法本身简直就使人莫名其妙。一个人可以尊重力量、权威、甚至才智和教育，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认为人格竟然代表某种价值，这是荒谬绝伦的。"

俄国人议论说，现在的人民已不象斯大林时期对当局那么唯唯诺诺了。我相信确实如此。而对于经历了一代人的示威、反战抗议、批判权势集团、撤换了一位总统的美国人来说，俄国公众的唯命是从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在红场上，趾高气扬的苏联民警对着行人吹哨子，执意要他们在横道线上行走，即使在没有车辆驶来的地段和没有明显理由非要按照规定道路走不可的地方也要这样做，我记得美国的旅行者对这种命令就置之不理。但是俄国人却完全服从。在一次复活节时，我在一座外地的大教堂前看到许多青年人很想进去看看壮观的宗教仪式，但是由于门口站着一个警察，除少数人以外，他们不敢贸然一试。

有一年春天我搭乘苏联民航飞机在塔什干着陆时，一个长着一双杏眼的乌兹别克族女服务员宣布说："好了，你们可以下飞机了。"人们站起来，开始收拾行李，但是这位女服务员喝道，"不，同志们坐下，"她冷冰

冰地指挥着苏联乘客。“我刚才是对我们的客人讲的”——意指六、七个外国记者和陪同我们的苏联人。俄国人对这样的当面冲撞全都默默地逆来顺受，他们坐了下来，伸长脖子看着我们先下飞机。我在许多场合中经常看到这种情景。

我感到惊诧的是没有人拒绝服从这类命令。然而，我有一次确实亲眼目睹一伙青年人对官僚主义的不公正做法表示了强烈抗议。这些人的特点是不象老一辈人那么胆小怕事，他们显然出身于受过高等教育、有社会关系可作靠山的家庭，一向受到较优异的待遇的。

同我们一样，他们来自苏联寥寥可数的简陋的高加索滑雪地之一，准备从矿水城乘飞机回莫斯科去。黄昏时分，我们都上了班机，但是由于飞机发生严重故障，一时无法修复，我们只得下飞机在机场过夜，等了十七个小时再换乘另一架调来的飞机。不幸，这架飞机座位较少。上飞机以后，这些年轻的滑雪者突然发现一个同伴被挡在飞机外面的舷梯上。一个年约三十岁、身穿蓝色防风外衣、有着一头金色卷发的英俊青年和一个衣着讲究的黑发女郎到女服务员那儿去，想使他们的朋友乘上飞机。

“同志们，没有座位了，”一个圆脸的民航女服务员告诉他们。“班机乘客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另一个

女服务员声称他的票子无效——这不大可能，因为他上过原先那架飞机。

“那是你们的过错，不是他的责任，”穿防风外衣的人抱怨道。“如果他的票子无效，那我的票子也无效了。我们是一道来的。我们一共有七个人，我们是一道行动的。”

“我们机上人员有什么办法呢，”女服务员说。“去坐好吧，我们要起飞了。”

这个抗议非常温和，也完全合理，但是，这种对当局最微弱的挑战，也使几个坐在我们附近的中年妇女激动起来。她们不责备民航，反而责怪表示抗议的青年人。“冒失的年轻人，不负责！”一个戴着蓝色马海毛帽的妇女嘟哝着说。“他们会讲上两三个小时，但是不会有什么结果。”

“他们干么无理取闹？”一个粗鲁的乡下妇女附和道，加入了这场不仅是顾客和官僚之间，也是老少两代人之间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冲突。“他们把我们大家都耽搁了。”

这时，年轻的一对男女同四个朋友一道要求见机长。

“机长也无能为力，”女服务员执拗地说。“蹲下去！”她下令道，故意用俄国人对狗所用的侮辱性语言。

“你们是小孩吗？”一个男乘客的抱怨声音。“你们

是在瞎胡闹。”

“我们朋友的行李和我们的一起放在机舱里，”一个年轻人争辩说。“如果你们说他那张票无效的话，他已经没有再买一张票的钱了，况且下一趟飞机什么时候才能到呢？”

民航的女服务员们不耐烦回答他们。一个上年纪的旅客提出道，“他们应该叫警察来。”

果然，两名穿灰制服的警察乘坐一辆小型摩托车穿过跑道来了。他们走上舷梯，准备把这个倒霉的滑雪者拉开。飞机上的这些年轻滑雪者一见到穿制服的人就开始散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当他们经过过道时，那个中年妇女还在责骂他们。大家都打退堂鼓，只有那个穿防风外衣的金发高个子坚持说：“那末，至少让我下飞机一会儿，给我的朋友一点钱。”这个要求得到同意。但是他的朋友到什么时候才会到达莫斯科，那就说不上了。那天夜里我们问了一下民航，据说五天之内飞往莫斯科的班机已经全部客满了。

苏联的知识分子讲起他们同胞的这种逆来顺受的事情可以一直到深夜。一个控制论专家追述说，1953年斯大林病重垂危时，《临床医学》杂志曾经刊登了一篇题为《白大衣下面的谋杀》的重要社论，谈所谓谋杀斯大林的“医生阴谋案件”，这是发动一场新清洗的前奏。但是这位独裁者溘然长逝，形势变了，医生们被宣

布无罪，这期杂志匆匆忙忙重新出了一版，换了一篇社论，并要求订户退回不再符合党的路线的原先那一份，许多人听从指示照办了，而不愿担当因为家中留着有错误的那一份刊物而被捕的风险。

同样，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上原先刊载有关于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的长篇条目，贝利亚后来在同赫鲁晓夫等人的争权斗争中被处决。百科全书的编者竭力想要抹掉人们对贝利亚的记忆，于是编写了一篇关于白令海峡的专门条目。这个条目，连同要求读者把这个条目直接贴在贝利亚的条目上的指示，邮寄给百科全书的购买者。我的朋友讲，他认识的许多人又照办了。

比起斯大林统治时那种压抑的气氛来，今天要好得多了。在私下，在信得过的好友之间，俄国人会嬉笑怒骂地批评他们的领导人。但是我看到许多人，即使不是出于真正感到害怕，也是出于习惯，在这样做以前总是先关上厨房门，拉上窗帘。此外，他们知道，公开抨击任何政治人物是危险的——这里的"公开"可以不是指大庭广众，而只是指在不适当的人面前。这种谨小慎微是根深蒂固的，当一位美国记者告诉莫斯科的一个中年妇女说美国人可以公开地批评他们的总统时（在水门事件早期），她们竟不相信。深通世故的青年人很喜欢用下面这个笑话来取笑俄国人的这种态度：

一位美国旅行者向俄国人夸耀说，“我们有言论自由，我们可以上大街随意地批评尼克松。”于是这个俄国人回答说，“我们也有言论自由，我们也能上大街随意地批评尼克松。”

据一位英国留学生1972年所看到的情况，上面这样的说法也并不十分确切。他是根据文化交流计划在罗斯托夫一所州级大学里学习的。有一次，他和四个朋友同苏联学生在辩论民主和专政问题时，提到了苏联无处不挂的列宁画像。一个俄国人反驳道，这和英国人悬挂女王照片并无不同。一个英国学生为了戏剧性地证明这种区别，当着俄国人的面扯下挂在自己寝室里的女王照片，把它撕掉了。当这一政治上的大逆不道行为传到学校当局耳朵里时，引起了极度的惊慌。他们召集了英国学生并且提出警告说，如果再发生类似事情，他们五个人将统统被开除。

我不想给人以一种印象，好象俄国人全都俯首贴耳。我看到过驾驶汽车的人同交通警争吵，虽然吵得不十分激烈；我无意中听到有人咒骂商店售货员和小官僚；我也听说工人们同上级顶嘴的事。有些人向苏联报纸投寄读者来信，就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对地方党委的官员提出申诉。但是，大多数人都避免同当局发生对抗。“如果一个人驾驶汽车撞了另外一个人的汽车，或者造成了一次事故，他是准备为自己辩护的，”一个年

轻的职业妇女对我说。“但是，如果他发现对方是个什么官儿，比如说，是在区党委工作的，他就会马上点头哈腰，尽量避免麻烦。我自己就不提出申诉。你牢骚太多，他们就会堵住你的路，在许多方面刁难你。招惹官员们恼火是不明智的。”由于官员们有权进行报复，以及官员可以对个人生活肆意进行干预，因而俄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这对美国中产阶级说来，几乎完全是陌生的，也许只有美国的黑人和穷人才能理解。但这种思想却影响着几乎所有的苏联人。我记得一位颇有名望的犹太科学家，就对官员抱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心理。他已申请移居以色列，因而已跟苏联的制度脱离了关系。他给当时的国务卿罗杰斯写了一封非常温和的公开信，批评美国在移民问题上搞悄悄外交的政策。他问我发表这封信是否明智。

“你认为这样做对吗？”他想了解。

“你得自己决定是否要冒这个风险，”我回答说，“但是在这件事上有什么使你担心的呢？”他的回答是典型的俄国式的。

“我知道你们国家的做法和我们不同，”科学家解释说。“我认为搞悄悄外交是错误的，而且我想公开这样讲。但是假如我发表了批评罗杰斯国务卿的公开信，我不会有危险吧？他会不会采取行动对我和我的

家属进行报复?”

官员们的权力也使大多数俄国人在当局面前有一种理屈心虚的感觉。一些人告诉我，假如当局指控某人干了坏事，甚至只是在报刊或是公众集会上提一提，那么大家都会认为被指控者有罪。同样，我听到俄国人说过，如果他们自己受到指控，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开始提出解释、寻找借口或者推卸责任，而不是反对这种毫无道理的找麻烦，或者坚持要求依照合法程序处理。有一个俄国妇女，她是一位不畏强暴的持不同政见者；可是她却说她对一位非洲学生朋友那种她认为是异乎寻常的大胆妄为感到吃惊。这个学生同莫斯科卢蒙巴大学校方发生了纠纷。他公然违反了校方的意见，在假期中从非洲返回莫斯科途中在巴黎停留了一下。当他回到学校时，系主任把他叫去询问他在巴黎干了些什么。这个非洲学生答道，这是他个人的事情，或许也可以说是法国人的事情，但是不关俄国人的事。“没有一个苏联学生会这样回答，”这位妇女断言。“要是俄国人的话，他可能会说：‘哦，你晓得，我在巴黎有个朋友，他邀请我去。’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想方设法把事情搪塞过去。俄国人的第一个反应是纠正自己的错误。从儿童时代起，我们就知道要在上级面前感到理屈心虚，并且设法为自己辩解。只是到后来，我们第二个反应才是问自己：‘他们干吗要知道?’”

权力和权威来自上面而不是来自下面，这个事实已使俄国社会中的等级地位观念比西方社会浓厚得多——尽管在一个自诩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中，存在着这种情况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权力决定苏联社会自最上层至最底层的地位。根据列宁老实不客气的公式，决定地位的标准是"谁战胜谁？"但这句话较深的含义是"谁能对谁怎么办？"这是俄国人在相互交往时经常考虑的不便明言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苏联社会的各个等级给予莫大的注意。西方所以出现了"克里姆林宫学"这门学问，正是因为苏联领导本身特别注意在正式图片或在列宁陵墓上各人所站的位置。这在沙皇统治时期就是如此。几世纪以前，西方国家派往克里姆林宫的使节已经懂得研究某些画像，以辨别各种各样宫廷人物重要与否，因为他们在行列中的位置往往不是根据真实的情况或者透视画法则，而是根据他们的地位和重要性画出来的。

今天，西方已经对苏联社会中等级制度的一些信条有所了解，但是极少有人充分意识到这种等级制度的信条是多么虔诚地被遵守着的。例如，在1974年最高苏维埃选举时，尽管这只是政治上徒具形式的选举，党的领导还是在幕后精心地操纵着选举程序，因而《真理报》报道勃列日涅夫被五十四个选区提名为候选人，

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次之，各有二十二个选区提名，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再次之，各有十个选区提名，等等。政治局委员地位的高低，通过提名的选区之多寡，清楚地反映了出来。当然，每个候选人又只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代表一个选区参加竞选，每人只发表一次"竞选演说"。而发表演说的先后次序和演说的城市或地区的重要性，几乎又是完全按照由下而上的等级制度来安排，这样，资历最浅的政治局委员应首先在最边远的州级城市发表演说，勃列日涅夫则最后在克里姆林宫通过全国电视发表演说。

这种对社会等级的热中之情，遍及苏联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层。这是彼得大帝为政府部门制订的包含有十四个等级的一套复杂的文官制度在当代的翻版。不仅是政界人物，而且在学者中也自上而下细致地划分等级，如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研究所所长、正教授、部主任、实验室主任、博士、高级研究员等，每一等级不仅工资各异，而且住房分配也不同。级别较高的人还有取得兼职或担任报酬优厚的顾问工作的合法权利。对运动员也正式规定了等级：功勋运动健将，国际级运动健将，一级、二级运动健将，等等。在剧院和音乐会中，节目单上和报幕时都要对主要演员、独唱独奏演员和指挥分别加上一些称号，如："俄罗斯共和国功勋演员"、"苏联功勋演员"(大大高了一等)、"苏

联人民演员”(最高级),以及列宁奖金获得者或其他国际比赛优胜者。我出席过有电视转播的音乐会，那儿在演出每一个节目前都要翻来复去介绍这些头衔——甚至对同一个人介绍多次。假如作曲家也出场的话，对他的地位和桂冠也一一加以介绍。

作为一个民族，俄国人喜欢讲究排场，爱好这些浮夸的头衔以及地位和成就的象征，就象美国的小男孩爱好幼年童子军的优异徽章一样。如果在讲话中一不当心疏漏了他们的头衔或荣誉，他们就会老大不高兴。我记得在一次关于苏美两方就贸易问题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百事可乐公司的唐纳德·肯德尔在介绍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阿尔希莫夫时，介绍了他的地位，详细的经历，比介绍任何一个美国人更详细。但是阿尔希莫夫站起来时，头一条意见就是说肯德尔“忘了提到我是苏联英雄”——相当于美国国会的荣誉勋章获得者。在人行道上，我经常看到老战士在便服上挂着勋章，恰如勃列日涅夫在发表演说和在重要场合炫耀他胸前的列宁和平奖金勋章以及苏联英雄(军人)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非军人)勋章一样。在美国人看来，这种事跟英国人对待他们的贵族、骑士和勋位制度的情况相似得出奇。

这种做法并不完全是为了炫耀自己或者为了满足高人一等的心理。这些奖章、勋章和地位还有着现实

的功用。获得这些荣誉和地位的人，日子过得更加舒服一些——这样的人大概多达几十万。在火车站，贴在普通售票窗口的告示说，最高苏维埃代表(这当然也包括最重要的党政官员)、残废军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以及其他荣获三级或三级以上社会主义奖章者可以优先买票。在军人售票口，苏联英雄、将军、海军将领、校官享有这种特权。这种优先权同样适用于机场、剧院、旅馆和无数其他公共场所。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各有自己的"重要人物"等级制度，并在其国境内给予相应的特权。

苏联公民身上小小的工作证情况也一样，它们的颜色和大小各异。就象蒙特卡洛赌台上的筹码一样，这些工作证根据其本身的重要性而决定大小和颜色。这些硬封面的小证件比盒式录音带盘稍微小一点，一般是蓝颜色的。但是共产党的各级官员和重要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证件是红颜色的。大剧院的芭蕾舞和歌剧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文艺团体，因此就发给他们红颜色的工作证。而当列宁格勒基洛夫芭蕾舞剧团1972年获得这种荣誉时，一些基洛夫剧团的舞蹈演员告诉我，这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方便有利之处。大多数证件上盖有所在工作单位的硬印，这也立刻使人想到权力和地位。保安机关的证件上有苏联国徽的硬印。只要亮一下红颜色证件，特别是有国徽硬印或重要党政机

关名称的红颜色证件，就完全可以让许多人立即进入房管局、剧院、饭馆或通过警察关卡，而其他人却要排在令人头痛的队伍里等待。我见到这种不排队而大摇大摆闯进去的现象常常感到愤懑，而俄国人却不表示异议。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管你内心里怎么想，你得学会沉住气，”一位年轻妇女无可奈何地说。

得到荣誉最多、地位最高的人物持有特别证件，象袖珍本那样大小。芭蕾舞演员瓦列里·帕诺夫给我看过他的证件，这是由于他曾荣获高级国家奖而颁发给他的。这种证件看起来象一个由“宫廷”书法家端端正正填写的小毕业文凭似的。一个普通官僚见到这样的证件就会马上认出对方的身分，简直卑躬屈膝地竭力讨好奉承。

契诃夫曾把俄国官僚那种对上级虚伪和奴颜卑膝的丑态以及对群众那种傲慢骄横、颐指气使的态度刻划得淋漓尽致，当代没有任何一个苏联作家能够超过他。契诃夫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创作于俄国革命前二十多年，但是读起来就象是昨天写的那样新鲜。在《胖子和瘦子》这篇小说中，两个老同学阔别几年后偶然相遇，感到格外高兴。及至瘦子发现胖子的地位已经升迁得比他高了一头，正常的个人联系就猝然变得不可能了。由于胖子老朋友身分高贵，瘦子对他巴结讨好，

敬若神明，甚至到了神经质似地傻笑的地步。俄国人对我说，今天更多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上级装出一副移樽就教的样子，使老朋友的情谊烟消云散了。不管怎么说，在公共生活中，这种从属感和优越感看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美国人在相互关系中是以金钱取人的话，那么俄国人则是以地位取人。他们按照地位和身分彼此相待。

又是契诃夫在《变色龙》这篇短篇小说中维妙维肖地刻划了这种特性。这个故事叙述一个小城镇的法警在处理一只迷路的狗时，一会儿盛气凌人地目空一切，一会儿胆小如鼠地容忍顺从——视过路人告诉他狗的主人是何许人及其地位而定。当听说狗的主人是个无名之辈时，法警就准备严加追究；而当他听说狗主人是个将军时，他又想息事宁人。他就象一条变色龙那样，随着不同的说法而改变态度。在苏联社会中，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俄国生活过的外国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旦发觉某件事涉及到有点地位的人物时，人们的态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从盛气凌人变得象尤赖亚·希普[①]那样大献殷勤。外国人比大多数俄国人地位高些，因而享有某些优待。一个苏联记者告诉我，住在国际旅行社旅馆里的俄国人必须在一

① 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指阴险虚伪的小职员。——译者

张表格上签字，保证只要外宾需要，不论白天黑夜都得随时搬出房间。一天傍晚，在从摩尔曼斯克到莫斯科的火车上，一个衣衫不整洁的侍者态度生硬地告诉安和我，由于餐车已经打烊，我们不能吃晚饭了。他把我们当成俄国人了。我们知道离打烊时间还有一小时，因此不管怎样还是坐了下来，指望有什么人会来帮我们一下忙。侍者不理睬我们，一个头发染成赤褐色——工人阶级妇女喜欢的色彩——梳着布隆希耳达发式的胖胖的女侍者，也不理睬我们。但是其他用餐者听到我们用英语交谈，就提醒那位布隆希耳达发式的侍者，说我们是外国人，这时她的态度骤然改变，我们就吃到了晚饭。另一次，《纽约时报》外事编辑吉姆·格林菲尔德想去莫斯科，但是一连几天国际旅行社总是说，在他打算逗留的期间内莫斯科的旅馆连一个空房间也没有。而一俟我巧妙地让外交部来过问这件事时，不仅有了房间，而且格林菲尔德和他的妻子被迎进了民族饭店宽敞的大理石的“贵宾”套间里。

其他国家也可能有这类事情。美国人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也有等级地位和奉承拍马的观念，但是很少象苏联生活中的等级观念那样表现得赤裸裸。“我们有一个朝廷，因而人民的一举一动就象朝臣，”苏联一家杂志的编辑向我承认。在工厂或者农村并肩劳动的普通人民中，我感觉到有一种大体上平等的感情。有人

对我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举国上下团结一致的观念使正规的等级观念有所削弱。但是，今天俄国人的生活中等级观念却很显著——一些人高高在上，另一些人处于下层；一些人有权有势，另一些人俯首听命。

一些有经验的西方外交官以及我所认识的俄国人，令人信服地指出：这种态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苏联同西方的谈判——不仅是政治谈判，而且还包括商业谈判，并使这种谈判复杂化。他们提出理由说，妥协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认为取得一种大致平等所应具有的观念。这个观念在俄国官员的心灵中是本能地不会产生的。对俄国人来讲，他们出于本能地想到的问题是：谁是强者，谁是弱者（这是使得缓和变得极为困难的一个因素）。他们生来认为任何关系都是一种实力的较量。有一天，在一次宴会上，一位瑞典外交官谈到了俄国人的这种特性，并且就莫斯科对瑞典等小国家怠慢无礼的态度发泄了心中的怨气，当我听到这些话时感到相当吃惊。"俄国人尊重力量，"这位恼火的斯堪的纳维亚年轻人粗声粗气地说。"他们同你们美国人打交道时尊重你们，因为你们有力量，因为在你们的言语背后还有点名堂。但是他们对待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不强大，我们是小国。"

在俄国社会里被果戈里称之为“小人物”的那种人，在苏联国家机器面前同样有无能为力的感觉，所不同的是，他早就硬起心肠不去太多注意这方面的事了。

根据描写清洗、劳动营和秘密警察的大量引人注目的材料，西方人士对克格勃干预普通俄国人日常生活的程度的估计是夸大其词的。诚然，自从斯大林去世以来，恐怖行动有所收敛，但秘密警察依然在迫害着最勇敢的人物。而只要有秘密警察存在，就足以使绝大多数人不敢轻举妄动。每个苏联机构都设有“第一科”——安全部门，它不仅给每个人建立了终身的详尽的个人档案材料，而且对每个人政治上的可靠和忠诚老实进行不间断的监视。当一个人调动工作、被提升、申请到国外旅行或者要办什么特殊的事情时，都必须取得“鉴定”，里面不仅包括此人的工作表现和上级的意见，而且有党和克格勃填写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评定”，即所谓“安全评定”。邮件检查、电话窃听、对打字机和复印机之类用品的控制等等，已经屡有报道，无需在这里重复了。这些控制，构成了苏联公民总的生活环境，但还不是小人物的最大负担。每天悄悄消磨人们意志的，主要是苏联生活中的那些小霸王——即头脑僵硬的小官僚和自告奋勇的爱管闲事者，他们用没完没了的条例和文件，折磨、压制和戕害普通

老百姓。

我本来以为，普通俄国人既然遭到种种麻烦，不胜其苦，就会本能地团结起来使紧张的生活轻松舒坦些。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内是这样的。然而，总的来说，苏联社会中到处都是小小的独裁者，他们给自己的同胞制造麻烦和痛苦。看来这往往是他们自己在遭受困苦和挫折之余，对这个制度进行报复的一种方式。“农民学会了吃苦，因此也就不反对受苦，”英国评论家莫里斯·巴林在俄国革命前不久写道。“他学会了逆来顺受，因而一有机会就麻木不仁地把痛苦施加于人。近几年，我听到俄国人把这种现象说成是表现于个人间的集体报复行为。

“如果让一个俄国人去负责管理一小块地方，或去看守一个地方的大门”，一位戴眼镜的科学家伤心地一面沉思一面对我说，“他就会利用他管理这个地方的一丁点儿权力，给别人的生活制造麻烦。”几乎每个人都在一定的岗位上为国家工作，因而，他们都沾染上政府官员的心理，至少在职的时候是如此。这种心理的特点是墨守成规，僵硬固执，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恐发挥了任何主动性日后就会挨批评。

结果，成师的两鬓斑白的养老金领取者，守卫着饭店大门，成旅的头戴马海毛帽的专横拔扈的女总管，看守着这个国家每家旅馆的一层层楼房，担任值班军官，

成团的年青妇女，警卫着机场、车站和百货商店的大门。他们都有足球守门员一般的把关精神，猎狗一般的坚韧顽强，叭喇狗一般的粗暴凶猛，法国凡尔登军队誓“不让他们通过”的耿耿忠心。政府报纸《消息报》有一次曾经指出盲目执行规章制度可能落到何等荒谬的地步。报纸报道说：一个可怜的人，星期五下午离开办公室，在机关大门口发觉遗忘了公事皮包，但是看门人不准他再进入办公楼，因为他是临时调到那里工作的。周末公休时间已经开始，临时工作人员在周末休息期间不得入内。这位工作人员竭力申辩说，他所有的东西，包括旅馆的钥匙都放在公事包内，他甚至连他的旅馆房间号码也记不得了，然而看门人无动于衷。最后来了一个可以进入大楼的人，请他进去把皮包取出才算了结。

我自己遇到过一次更加使人莫名其妙的死板地照章办事的事例，那是发生在苏美关于环境研究方面进行合作的新协议签字之日。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默里·弗罗姆森，《洛杉矶时报》的默里·西格到工会大厅出席记者招待会。这幢革命前建造的宏伟壮丽的圆柱大厅离大剧院不远，在这里经常举行一些重要的活动。这是九月底的刮风天，我们三个人进了大门都很高兴。接着，总是穿着一身蓝制服和总是会出现的女门卫，照例要我们在进入大厅前出示证件。我们出示

了苏方发的记者证，当她正要让我们到衣帽间去时，突然拦住了带着盒式录音机的弗罗姆森。“带录音机的人不能从这个门进，”穿蓝制服的女人命令弗罗姆森说。“你应该拐弯走另一个门。”她打着手势要他退出门去。

在下一个门口又有两个穿蓝制服的女门卫，我猜想她们可能要没收录音机。但是在我们进去时，她们非但没有注意这架有危险的玩意儿，甚至不愿费神来检查我们的记者证。显然，她们正在期待美国人的光临，在这次标志着苏美合作的活动中，她们放松了一贯保有的警惕。走进这第二个门十多步，我们来到一个楼梯平台，可以俯视第一个大门的门厅和我们刚才走过的衣帽间。我们向下走几步，寄存了大衣，向刚刚不放弗罗姆森及其录音机进去的女门卫点点头。她严肃地看着我们一言不发。

“现在请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录音机可以从一个门带进去而不能从另一个门带进去，”弗罗姆森低声抱怨说。

“我不知道，默里，”我回答说。“一旦我们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了解这整个国家了。那时候我们就该回国了。”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我们下楼来到门厅，领回了大衣，朝最靠近的第一个门走去。穿蓝制服的门卫又出

来了，再次拦住弗罗姆森。“对不起，”她执拗地说，示意要他停下。“录音机不能经过这个门带出去。”我们哄然大笑起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拥而出。

女门卫的这种做法，在旅馆管理人员，房管局职员，警官以及每一个单位里担任类似职务的官僚主义者中也很流行，他们都由于苏联国内普遍对证件的极度重视而威风十足。俄国人经常被要求出示身分证明、劳动手册或证明书，来证明他们的一切活动，如住旅馆，看病，在农民市场出售货物，度假，出差，用政府的配给券购买汽油、上图书馆等，都是经过批准的。俄国人编了一首小调：“没有证明，你只是个虫；有了证明，你才是个人。”俄国人所需的证明名目繁多，简直不胜枚举。不过最重要的是身分证、劳动手册、工作证（红的或蓝的），鉴定（前面已经讲过），以及有专门用途的证明书。劳动手册是一生的工作履历，记载着一个人一生中所担任的每项职务，工作性质，工资级别，纪律处分情况，以及离职原因。就业人员把劳动手册交给雇用单位保存，在离职或者被解雇时必须取回，才能寻找新的工作。劳动手册对职工的流动和擅离职守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并不是始终有效。身分证是最重要的证件，因为上面不仅记载着出生年月、父母、民族（在苏联人中这一点很重要）、婚姻和离婚情况等重要内容，而最重要的是当地警察局的居留许可印记。这是实行控

制的基本手段——身分证上的居留许可印记就是一般人所称的"户口"。

在二十多个控制户口的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第比利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其他主要城市和国防要地——新进来的人要报上户口是极端困难的，因为当局要尽量压缩人口，解决过分拥挤、住房缺乏和人烟稠密的问题。任何人从一地移居另一地必须登记并经警察局批准。到其他城市逗留三天以上的人也要登记。但是很多人有办法在一段时间内打破制度。"凡有所规定，必有反规定"，一天下午，诗人约瑟夫·勃罗茨基坐在公园的长凳上笑着告诉我。要打破三天限期的规定很容易，他说，只要住到朋友家里，或者租借私人房屋就行了，而不要去住旅馆，因为那里的工作人员会自动地到警察局去给你办理登记手续。来来往往旅行的人相当多，合法或非法租借私房的人也相当多，警方不可能掌握所有那些不住在公共住所的人。要想长期违抗制度就比较困难了。但在西伯利亚，由于劳动力经常感到紧张，当局对规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批批的工人从一个建筑工地流到另一个建筑工地，为了获得较高的工资待遇而迁来迁去。当地党的官员容忍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和建筑工地头头一样，热衷于使工程项目尽快竣工，乐意招收超额的工人。

然而，在大多数时候，俄国人东奔西走是为了要在某一份证明上盖一个图章或供人查阅，以证明他们执行了某项任务，得到了某一项许可，或到达了某一地方。在我的印象中，许多俄国人几乎都随身带有一张揉皱、摸脏和变灰了的纸头，也就是一张证明，以备检查。在一次赴西伯利亚的恶梦似的旅行中，一批西方记者乘飞机于后半夜在州首府秋明机场降落。由于缺乏住所，我们只得在机场贵宾休息室地板上睡几小时。我们唉声叹气，而一名记者竟发现陪同我们的两个苏联人——很有势力的苏联新闻社的负责官员——甚至不能睡觉。他们不得不半夜三更在机场四处奔波，找值班民警警官在他们的旅行证明上签字盖章，证明他们确实象原先计划的那样在秋明停留。

对于为数众多的不公开的机构、苏联生活中的重大节日和活动来说，证件特别重要。最使我感到惊异的是11月7日和五一劳动节在红场的游行。我原以为群众可以自由参加这些游行，后来才知道，和纽约的感恩节游行或法国攻破巴士底狱纪念日在爱丽舍大街上的游行不同，共产党的这些庆祝活动是不对普通群众开放的。只有持有专门的请柬的权贵们，加上经过挑选的外国人才能出席。戒备相当森严；我数了一下，到达红场得经过九个不同的检查站。参加游行的人编成许多组，并且受到严密监视。除游行队伍外，大街上没

有普通群众。

在九道封锁线的每一道上，都有一番手续。一名警官会拦住我的去路，要我出示记者证和请柬，对照一下是否相符，并且仔细端详我的脸，看看是否和照片一样，然后傲慢地说声“请”，把我领过封锁线。

俄国人有时会嘲笑他们本国的证件癖，但是他们对西方社会没有这样一套证件而照样能够运转确实感到困惑莫解。“我认为，《真理报》记者奥西波夫描写英国的那本书，是我们已出版的比较好的书之一，”一天下午，一位姿色动人的高个子俄国妇女和我在树林里散步时对我说。“由于我到过英国，我的一些朋友问起我有关这本书里的情况。书中最使人感兴趣和最使人惊叹的部分，就是他描写如何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英国的学校那一章。他有一天到学校里去，只说了一声：‘这是我的孩子，我想送他上学’，这就行了。对我们来讲，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的医生问我，‘拉拉，真是这样的吗？他们没有任何证明怎么能进学校呢？他们没有东西证明这个孩子居住在这个地区，没有东西证明这个孩子年龄多大，只凭父母的一句话，这怎么能行呢？’”

我笑了，接着她也笑了。我们谈到俄国人如何需要经常不断地证明自己的身分，不是为了经济上的原因，象美国人或者其他西方人士那样随身带着赊帐单、

支票簿和驾驶执照，而仅仅是为了到什么地方去或者进入某个地方。“我们这里不信任人民，”和我一起散步的这位女伴说。“彼得洛夫干吗要冒充巴甫洛夫呢，我真不懂。假如你想求职，你就得带上文凭，否则他们怎么知道你是中学还是大专毕业的呢。”

这种无处不表现出来的不信任，使她不愉快。但是接着她承认她对美国的自由散漫感到惊奇。“我的朋友问起的第一个问题，我也感到百思不解的问题是：‘如果他们〔美国人〕要找人，怎么找得到呢？他们怎么能抓住罪犯呢？’如果不要求人们登记自己的住址，住旅馆办手续时也不要求交出身分证，那么这个社会怎么能执行自己的职能呢？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同样，普通俄国人把这些束缚他们生活的清规戒律视为天经地义的事。俄国人有时也不耐烦，但，这些清规戒律看来就象太阳、月亮一样是天然如此的。在美国人看来，苏联人的生活往往象整天呆在军队里差不多，不仅工作时如此，连度假也不例外。

六月里一个晴朗的早晨，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郊外的雅翁凯梅里疗养院里，主任医生解释了在二十四天期间休养和治疗的制度。他说，整个作息时间和饮食都由莫斯科的一个科学研究机关详细拟定，在全国范

围统一实行——这种主意使我吓了一跳。一位在塔什干人民监察委员会担任一项轻松工作的疗养员，身强力壮、脸色红润的老战士伊凡·萨弗隆诺夫，象个小学生似地作证说，如果要到海滩去，必须向海滨的服务人员出示由护士发给的证明，否则他就不能去做日光浴。虽然他非常想到凉爽的波罗的海中去游泳，但是他发誓赌咒说自从开始热泥疗法以来，他就没有洗过海水浴。尽管由于工会的大量津贴，他的休假费用便宜得使人难以置信(二十四天仅付六十四美元)，然而很难说是一次尽情享受——早上七点半钟起床，集体早操，早餐，医疗，按医生嘱咐在海滨散步（全部根据时钟安排)；午餐，自由活动一小时，奉命在自己房间里休息静养一小时；喝下午茶，集体文娱活动或游览，晚餐，按医生嘱咐作晚间散步，集体欣赏演出或音乐会，晚上十时吃酸牛奶（主任医生说："我们把酸牛奶发给每个人——我们把它当作药品一样看待")。十一时熄灯，立即锁门。

"如果有人回来迟了，过了十一点钟怎么办?"我问。

萨弗隆诺夫、主任医生、我的拉脱维亚官方陪同人员都摇摇头。医生说没有人迟回来，言下之意是说人人都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拉脱维亚官员消除了人们的任何疑虑："我知道有过这么一回事，有一个人回来迟了，就给自己招来了麻烦，"他说。"他被遣送回去，一

份报告送到他所在的工厂，从此以后他不可能再有资格得到疗养证（一种有补贴的休假证）了”。我相信他讲的事情，但是，我了解俄国人，我深信必然有相当多的人有办法对宵禁阳奉阴违。

在少先队夏令营里，每天的作息时间安排得非常严密，从起床号到降旗，没有多少时间可供自由活动。在高加索山区多姆巴伊的一个滑雪基地，我注意到初学者领到一份两星期训练的详细日程表。头两天他们不是上山坡去，而只是领取滑雪用具，了解其名称，学会如何穿戴，听讲滑雪理论。实践安排在后面（所有各门学科都强调理论必须和实践结合）。城市招贴栏里的征聘广告，号召青年人参加四个月的学习，当一名面包店店员，或学习五个月当一名收款员，或学习八个月做一名驾驶员。学习时间分为理论教育和实习两部分。我无法理解学习时间为何要这么长。据朋友们说，理论部分枯燥无味，内容空洞，而且经常包括马列主义和党史课程。

俄国人比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更能忍受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正如他们比较能容忍那些自告奋勇的多管闲事者的干扰一样，那些人监督公众的一举一动，硬给人家提出一些劝告。这种毛遂自荐的社会“军士”（契诃夫这样称呼今天这号人的十月革命之前的祖师爷），是街道和地下铁道保持如此清洁的一

个原因。许多人，大部分是中年人和年岁大的人，会迅速干预"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在拉脱维亚大教堂一次风琴演奏音乐会上，我记得官方指定的纠察发出嘘声叫别人静下来，而他们自己的嘘声之喧嚣和煞风景，较之观众中零零星星的低声谈话更加使人讨厌。另一次，我的俄国朋友们外出吃饭。一位朋友的妻子穿着方格花呢长裙，长发飘垂，她要求丈夫去叫一辆出租汽车。"我受不了公共汽车上的那些人，"她说。

"他们干吗要管闲事？"我问。"你看上去很漂亮嘛。"

"你不知道，"她忿忿地说，"他们不赞成这样打扮，一路上唠唠叨叨数落你。"

这种好管闲事的性格，也可能有一种吸引人的、友好的、我家小弟的保姆般的一面。陌生的妇女不止一次走上前来关照我们给孩子穿得暖和点，以防感冒。年纪大的人，有一次甚至一个警察，好心地劝我戴顶帽子。另一些人一本正经地告诫我们坐在石头上肯定会患感冒或肺炎，我们最好不要坐在水泥台阶上。一个俄国妇女拉开一位美国朋友撑着下巴的手，严肃地告诫说这样肯定会生脓疱。不太令人愉快的是，老奶奶诉说我们的孩子调皮，因为他们在公园的路上奔跑（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好奔跑呢？），或者我们认识的其他美国孩子到公共场所去时衣着不够整洁。

一个星期六上午，我牵着狗在俄罗斯共和国司法部附近散步。一个穿深棕色大衣、带着买好的食品准备回家去的普通俄国妇女，严肃地向我打招呼。

“你的狗在这个院子里跑是违禁的，”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其实，狗并没有在院子里，只是在院子边上的树丛里跑，因此我没有理睬她。“这是禁止的，”她坚持说。“把狗牵出去。”

“你怎么知道这是禁止的？”我问。“这里又没有告示。”的确这很不寻常，因为在苏联城市的景色中，告诉人们不得入内、不得抽烟、不得吃东西、不得停留的“禁止”告示，到处可见。

“这是禁止的，”她坚持说。“这里是国家机关。”

“你在那里工作吗？”我反问道。她摇摇头。

“把狗牵到那边去，”她命令说，指着五十码以外的一小块孤零零的荒地。

“狗喜欢这里，反正我们只呆一会儿，”我敷衍着说，希望她会走开。

“这片草地是供人散步的，”这女人又提出异议说。

“不过现在是星期六上午，今天没有人在那儿上班，”我表示怀疑，不能想象草地上竟不准狗走而让人走。“这只狗又没有打扰谁。”

“我们美化莫斯科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狗，”她声明说。“草地是供人散步的，你的狗可以到那边的小院

子里去活动。”她始终钉住我不放，直到我把我们的杂种小黑狗艾米使劲拉出树丛牵走为止。我承认我这样固执的一个原因，是对俄国一天到晚有人纠缠不休，管头管脚，告诉你这也禁止那也不行，感到十分愤懑。

但是俄国人对此一般并不感到愤慨。一个寒冷的午夜，火车在列宁格勒车站停靠，我看到两个女列车员责备并纠缠着一个五十多岁的海军军官，因为他打算在严寒的夜里不穿大衣贸然走出车厢。他只是想透透空气。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厚运动衫，俄国人男男女女乘火车旅行都喜欢穿这种衣服，既能白天穿，又能当睡衣。但是这两个女人毫不留情地吓唬他。

“你会感冒的，同志，”第一个开导说。

“不穿外衣不准出去，”第二个下令道。

这个可怜的怕女人的男子汉，象个没主意的五岁小孩似的，徘徊于车厢门口，极想出去同月台上的其他人一起溜达一会儿。不过他还是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两个普通妇女好意的然而是令人厌烦的劝告。要是换了西方人，也许很多人会对这种干扰置之不理，而只会感到非走出车厢以表明自己的独立自主不可。

但这不是俄国人的特性。俄国人遇到这类情况时一般是服从那些爱管闲事的人，就象他服从当局的权力、服从等级和特权的制度、服从规章和条例、服从证件、服从对他的生活无休止的控制一样。我记得一位

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的作家告诉我，他从军队中学到的窍门是："永不违抗，每次总是回答：'是，长官，'让他们去为了你是否执行命令而操心吧。"

这句话极其准确地反映了俄国的现实。俄国人的策略是不反抗当局，不谋求去改革制度，而是退后一步，忍受，然后找个空子，或是但愿某一个人的无能会莫明其妙地帮助你过关。正如俄国有句谚语所说的，"聪明人不爬山，而是绕着走。"就这一性格特征而言，今天的苏维埃新人同沙皇时期他们的先辈毫无区别。有人对我引用十八世纪俄罗斯作家伊凡·诺维科夫说过的一句话："俄罗斯的大幸在于人们糟糕地执行了糟糕的法律。"同样，今天俄国人聊以自慰的是想到：俄国生活中的疲疲沓沓，缺乏效率——同日尔曼条顿人的严守纪律截然相反——也许会减轻这一制度的严酷无情。

"上帝保佑，幸亏我们不是德国人，"留着胡子的俄国作家列夫·科佩列夫滔滔不绝地说。"如果我们是德国人，那就无法忍受了。"

层出不穷的规章条例导致了层出不穷的漏洞。对证明和条例的重视，大大增加了官僚的权势，也增加了他自行酌定处理之权。他既可以玩弄各种手段使事情成功，也可以使事情失败，这要根据他的兴致、情绪、性格以及他跟站在他面前的人的关系而定。"法律"，正

如俄国人所说，“就象牛车上的轭，你把它转向哪里，它就走向哪里。”公开生活多半是老一套的，也不容许改变。但是只要有可能，而且当然只在自己的亲属、朋友、熟人、同事的小圈子里，俄国人就会悄悄地彼此哄骗、引诱、妥协、贿赂和勾结，使公开生活中的严峻秩序有某种程度的放松。而当所有其他办法都无济于事时，他们就在小心翼翼保持的私人生活这一小天地中找个避难所。